

# 第一章

## 两党关系演变的历史回顾

恩格斯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创造的。”<sup>①</sup>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关系的演变，同样与他们的历史传统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联系。为了揭示左翼联盟产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06 页。

生、发展和破裂的复杂原因，我们有必要对两党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做一简单的回顾，对其主要特点做一概要分析。

## 第一节 从图尔的分裂到人民阵线时期的合作

### 一、社会党的分裂与共产党的建立

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同源于一 905 年成立的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05 年，在第二国际的干预下，法国各个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和派别联合起来，成立了统一的工人政党。各党联合声明宣布，社会党是一个阶级政党，党的目标是使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社会化，手段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一个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社会。但组织上的统一并没有消除思想上的分歧，社会党内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对立和斗争始终存在。特别是会议通过的党纲允许党内存在不同派别，规定领导机构按派别比例构成，更为后来的分裂从组织上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和社会党的多数领导人采取机会主义立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在 1918 年 7 月举行的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以让·龙格为首的反对战争政策的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会议谴责了战争政策，选举弗罗萨尔为总书记、加香为《人道报》社长，取代了主战派。

1917 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国际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党内各派的分化。特别是共产国际针对法国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提出的九项条件以及加入国际的二十一条公布后，更引起了党内各派的激烈争论。在 1920 年底举行的法国社会党图尔代表大会上，以加



香和弗罗萨尔为首的多数派和以龙格、勃鲁姆为代表的少数派围绕是否按照“二十一条”的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发生了严重分歧。

多数派认为，二十一条“是共产国际向我们提出的使我们党更加适应革命斗争条件的方法。”<sup>①</sup>“在国内形势严重的能够激发工人阶级行动的时候，集中化的组织是必要的。应该以俄国人为榜样，按照二十一条尽快修改党的章程，建立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性的党，对党的议员和党员们，对所有愿意全心全意为党服务的人都规定明确严格的义务。”<sup>②</sup>他们主张，党应当按照二十一条的要求向无产阶级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用暴力夺取国家权力，用无产阶级专政迫使一小撮被剥夺特权的阶级就范，以实现社会主义。“党应该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把改良主义者从党内清除出去，并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切决议。”<sup>③</sup>多数派要求立即无条件地加入共产国际。

少数派尽管同多数派一样，也主张“把所有劳动者组织在一个阶级政党中，为尽快将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sup>④</sup>认为“法国劳动人民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力量支援俄国劳动者反对资产阶级扼杀俄国革命的任何企图”<sup>⑤</sup>。但他们对按照二十一条的要求加入共产国际持保留态度。中间派代表龙格认为，共产国际“不是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而是一个完全俄国式的、带有俄国的观点、俄国的纪律的国际，一个对其他国家不适合的国际”<sup>⑥</sup>。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中有些条件不合法

①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 9 期第 210 页。

② 同上，第 200 页。

③ 《图尔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137--138 页。

④ 同上，第 683 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第 683 页。

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因而在法国是无法实行的。例如，工会脱离政党完全独立是法国的传统，因此，不能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把工会运动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是俄国专制制度下的特殊产物，而在法国共和制度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建立与党平行的秘密组织。特别是第二十一条要求把拒绝服从共产国际加入条件和指导原则的那些党员开除出党，尤其不能接受。认为那样做会导致党的分裂，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革命事业。因此，他要求坚持超越党派之争的宽容精神，实行党内各派的比例代表制，保持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sup>①</sup>

以勃鲁姆为代表的改良派认为，共产国际和法国社会党在许多方面有着重大分歧。共产国际所要求建立的党是“一个完全一致”的党，一个没有思想自由、没有派别分歧的党，一个自上而下的、由少数服从指挥的先进分子创造的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而失去独立性的党。法国社会党则是自下而上组成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党，是允许各种派别存在和思想言论自由的、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党。如果法国党加入共产国际，就会失去独立性而成为共产国际的附属<sup>②</sup>。勃鲁姆支持俄国革命，但他不认为法国已经成熟到了能够接受俄国革命启示的程度。因此，他反对把共产国际的理论纲领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搬来指导法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主张通过一切方法(包括合法的方法)来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在法国，暴力革命成功的可能性极小，“现有的国家可以逐步得到改革，不能忽视议会制度提供的武器和法律条文的实施所创造的可能性”。“建立在人民自由和自愿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一个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制的党所实行的专政，不行”<sup>③</sup>。

<sup>①</sup> 《图尔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238—240 页。

<sup>②</sup>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 9 期第 202—206 页。

<sup>③</sup> 同上，第 206 页。

上述争论和分歧不仅在当时造成了社会党的分裂，而且在以后几十年中，一直是共产党和社会党争论和斗争的焦点，对两党的分裂和合作、发展和倒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过激烈辩论，主张立即无条件加入共产国际的提案以绝大多数票获得通过。在此基础上，以加香为首的多数派与社会党决裂成立了共产党，有党员 11 万；少数派仍沿用原来的名称，有党员 3 万。从此，法国工人运动分裂为由共产党和社会党分别领导的两大派别，开始了分裂与联合、斗争与合作的历史。由于“事实上（法共）干部的选拔由俄国的代表操纵，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因而，“从根本上就确定了法国党对共产国际，也就是对俄国领导人的屈从地位”<sup>①</sup>。图尔代表大会的分裂和共产党的建立，成为法国工人运动的转折点。

## 二、日益恶化的两党关系

图尔大会分裂后，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关系不断恶化。从共产党方面看，根据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要求，法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统一指挥，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而当时，特别是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在指导思想上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他们从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出发，把十月革命经验作为唯一的样板强行推广，要求各国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上，放在组织武装起义上，把一切对资本主义的比较符合实际的清醒分析和满足工人阶级日常需要的斗争都当做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谁不同意其脱离实际的纲领和口号，谁就会遭到被开除的厄运。这种错误做法，不能不对法共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法共成立之初，党内一方面存在着对社会党的愤恨和急于夺

<sup>①</sup>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 9 期第 219 页。

取革命胜利的“左”的情绪;另一方面,由于在思想习惯和组织作风上仍受社会党传统的影响,也存在着被共产国际称之为右倾的、要求按照法国实际制定政策的倾向和主张同社会党联合行动的倾向。

在 1924 年初法国议会选举前夕,法共曾提出与社会党结成左翼选举联盟的建议。1925 年,法共部分领导人和党员针对法共中央提出的把统一战线策略局限于基层,把一切要求同社会党上层联合的主张作为右倾加以批判的做法,公开发表了由 250 人签名的答复信,信中指出:“把群众和领袖分开的主张完全是空想。我们不能建立不要领袖的统一战线。”<sup>①</sup>这种主张受到共产国际的谴责。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法共很快把所谓“250 人集团”中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和一批党员开除出党。

1927 年底,共产国际针对法国即将来临的议会选举,在致法共的两封信中说:“党的全部政策应该是促使人们摆脱传统的议会生活,要通过广泛的阶级斗争运动来领导明年的选举斗争。党所应该考虑的选举策略不能是对‘左派候选人’放弃竞选的手段,而应该是动员群众的方法。党必须坚决反对对左倾政党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而且要在揭发‘社会党左派’的同时,谴责那种同社会党制定联合竞选名单的策略。”<sup>②</sup>法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向党员提出:统一战线应该以阶级反对阶级的形式组织起来。在选举中,共产党不仅要以自己的候选人同资产阶级的候选人相对抗,而且要支持无产阶级的候选人来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保卫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所有社会党领导人对抗。这一时期,法共把主要精力放在同社会党的斗争上,用“资产阶级的鹰犬”等过激的言词揭露和批判社会党的“背叛”,认为只要通过揭露和批判,工人群众就

<sup>①</sup> 《法国共产党史》第 1 卷第 109 页。

<sup>②</sup> 同上。

能摆脱社会党的影响,转向共产党的革命行列。这种把“上层”的统一和“下层”的对立起来的“左倾”宗派主义路线不仅激起了社会党人的义愤,而且引起了广大党员的不满,致使许多分裂后加入共产党的工人群众离开党的队伍,重新加入了社会党。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法共通过不断的反右倾斗争,先后把大多数建党初期的领导人如总书记弗罗萨尔、驻共产国际代表苏瓦林、罗斯梅,以及洛里欧、莫纳特等开除出党,扶持极左分子担任党的领导职务,致使法共执行的路线越来越左。他们不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和广大群众的觉悟水平,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利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和合法手段,致力于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和斗争条件,通过满足人民群众对面包、就业、工资等方面的迫切要求来争取群众,而是高喊“为消灭资产阶级民主而斗争”、“立即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际行动保卫苏联”等口号,给资产阶级政府制造了镇压法共的借口。1929年,由于准备发动支持苏联的示威游行,法共中央委员几乎全部被捕,数千名积极分子遭到关押,法共力量受到极大摧残。

从社会党方面看,图尔的分裂使社会党的力量 and 影响遭到严重削弱,陷入非常困难的地步,特别是对巴黎等地的工人群众吸引力大为下降。此后十余年中,共产党一方面多次提出同社会党结成左翼选举联盟或共同行动的下层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不断指责社会党是“社会法西斯”,左翼社会党人是“最危险的敌人”。所以,社会党也针锋相对,谴责共产党分裂工人运动,是法西斯的独裁政党,坚决拒绝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建议,提出建立统一的工人政党来对抗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主张。社会党领导人莱昂·勃鲁姆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二大上声称:“我们回答一切问题可以没有共产党人。我们通过我们的决议,并不顾及共产党存在不存在。”1928年,法国社会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说:“只有同共产党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统

一，只有在社会党的范围内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sup>①</sup>

社会党对共产党采取不合作态度还与他们对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的认识相联系。勃鲁姆认为，共产党与社会党人具有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但是斗争的道路不同；社会党人与激进党人没有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但是在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中有共同利益。由于社会党面临的不是社会主义任务，而是民主主义任务，因此，同激进党的合作是可能的，同共产党人的合作则是无法实现的。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社会党于 1924 年后调整选举策略，同激进社会党结成“左翼选举联盟”，并在大选中取得胜利。激进社会党领袖赫里欧受权组阁，并邀请社会党参政。但勃鲁姆从社会党的纲领原则出发，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基础上选举出来的政府，不可能利用自己的权力通过革命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因而反对社会党人入阁，但允许社会党议员在议会中支持政府。

由于社会党的口号和政策比较符合当时法国社会的现实，1924年后，其力量 and 影响逐渐恢复。到 1932 年，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共党员人数由 1920 年的 11 万下降到 2.9 万，选票由 1928 年的 106 万下降到 1932 年的 79.6 万，议员由 26 席下降到 12 席。与此同时，社会党党员则由 1920 年的 3 万增加到 1932 年的 13.7 万，选票由 1924 年的 169 万上升到 1932 年的 196.4 万，议席达到 131 个。法共执行左倾路线的结果，使党的队伍及其政治影响大大削弱。

### 三、两党政策的转变与人民阵线的建立

本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对法国的经济、政治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 1929 年到 1932 年，法国的经济倒退了约 20 年。经济危机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生产

<sup>①</sup> 《国际共运史研究》第 1 期第 147 页。

下降和企业倒闭使大批工人失业。经济危机给法国带来的政治后果是法西斯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在国际上,则是德、意、日一系列国家法西斯上台执政。

面对日益增长的法西斯威胁和工人阶级的分裂状况,1932年刚刚担任法共总书记的多列士,开始考虑抛弃过去的宗派主义做法,寻求适合于形势的对待社会党的新政策。1932年底,多列士在一次演说中强调:要“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使各派别、各组织的工人都来参加共同的斗争”<sup>①</sup>。1933年3月,法共再次向社会党建议签订“明确的符合法国条件的行动纲领”,建立基层联合委员会,并“保证停止对接受这一协议的社会党做任何批评”。但社会党根据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在两个国际达成协议前,不要同各国共产党直接对话”的指示,仍然对共产党采取敌视态度,多次拒绝接受法共的建议,甚至把主动参加由法共党员巴比塞和同情者罗曼·罗兰发起的阿姆斯特丹反战大会的社会党人开除出党。所以,法共的呼吁在当时并没有产生明显效果。即使如此,在同年12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法共仍因向社会党呼吁联合的主动行动而受到严厉批评。会议重申只能和社会党工人,而不能与其上层搞联合。

共产国际的干预使法共调整政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压制,不得不回到原来的立场上。1934年1月,法共中央全会决议号召全党:“坚定地运用同社会党下层工人建立战斗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时最坚决地反对目前打算同社会党上层建立统一战线的各种机会主义企图。”<sup>②</sup>2月初,当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群众在反击法西斯的进攻中自发实现了联合行动后,法共领导人还是受共产国际指示的束缚,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对社会党的态度。在3月召开的

① 多列士:《人民的儿子》第48页。

② 《国际史》第2卷第501页。

中央全会上,仍然坚持:“只有在对分裂工人阶级的社会党和总工会作顽强斗争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行动。”<sup>①</sup>

2月6日,巴黎发生法西斯暴乱事件,社会党工人群众在没有得到社会党领袖赞同的情况下,自发地组织起来,同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联合行动。面对这种情况,社会党领导人尽管仍坚持传统的改良主义立场,但它毕竟不得不考虑到工人群众反对法西斯的共同愿望,同意在停止相互攻击的条件下,同共产党采取共同行动。2月7日,社会党的《人民报》说,社会党人愿尽最大努力同法共和法国统一总工会签订一项“忠实的、兄弟的协议”。社会党致函法共说:“现在不是闹分裂的时候,所有的无产阶级组织应该携起手来,以组成牢不可破的防线反对法西斯的冒险。我们要求举行会谈来确定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协议基础。”<sup>②</sup>法共在答复信中强调:社会党和激进党已经为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我们和社会党工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友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希望他们和共产党同志采取联合行动,而且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厉斥责社会党的领导人,斥责社会党——资产阶级的走狗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堡垒。”<sup>③</sup>

这一时期,尽管法共拒绝同社会党领导人谈联合,并继续公开批评社会党。但从广大群众的愿望和斗争现实中,法共认识到,党要适应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发展,就必须改变对社会党的政策,并在实践中同社会党采取了一些联合行动,如同意2月12日举行全国性的总罢工和示威游行。2月12日,两党及其影响下的总工会率领各自的游行队伍在行进中走到了一起。两党党员高呼“统一、

① 《法国共产党史》第1卷第142—143页。

② 让·拉古图尔:《莱昂·勃鲁姆传》第23页。

③ 克劳丁·费尔南多:《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1卷第185页。



统一”的口号，显示了团结的强大力量。但法共囿于共产国际纪律的压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社会党的态度和政策。

直到 1934 年 5 月，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会见了多列士后，法共才真正实现了政策的转变。季米特洛夫在与多列士的谈话中，充分肯定了法共在统一战线上的创见，明确指出：“共产党工人和社会党工人之间的隔阂应当打破，凡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任何方法都是正确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必须摆脱季诺维也夫时期的陈旧的教条主义公式。”<sup>①</sup>

多列士回国后，在法共全国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精神，纠正了在统一战线上的宗派主义错误，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寻求同社会党的合作。

5 月 30 日，多列士在《人道报》上发表文章，表示“愿意与社会党联合行动”，希望能“立即肩并肩地开展斗争”。同时，法共中央召开会议，第一次直接建议与社会党领导商谈采取反法西斯的统一行动。6 月 11 日，勃鲁姆和齐罗姆斯基代表社会党同法共代表多列士和弗拉商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会上，社会党把首先订立一个结束相互批评的协议作为统一行动的前提，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能反映出法共同社会党合作的政策有多大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社会党的这一建议遭到法共的拒绝。

6 月 23 日，社会党的《人民报》再次建议两党订立互不侵犯、互不干涉条约。6 月 24 日，法共中央召开全国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多列士在发言中说：“如果我们不能使统一战线跑的快些，更快些，永远快些，法西斯主义就会把工人阶级击败。既然我们不愿意法西斯主义在法国出现，那就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求统一行动。”<sup>②</sup>

① M·莱布索恩：《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第 87 页。

② 《法国共产党史》第 1 卷第 144 页。

与此同时，社会党领导人对待统一行动的态度也有了改变。原先勃鲁姆主张共产党和社会党实行组织统一，合并为一个政党，而不接受法共关于“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口号。然而，面对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基层群众要求联合的迫切愿望和两党的地方组织如火如荼的反法西斯联合行动，勃鲁姆认为，社会党不能再回避建立统一战线了。7月11日，勃鲁姆在《人民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多年以来，我们曾经认为并且每一次谈到统一行动时说：不是统一行动，而是统一组织。因此，我们力图避免任何达成部分的、偶尔的统一的努力，直到认为有可能实现完全的组织统一。我自己过去是这样想和这样说的。但现在我认为，这样的立场不符合目前的状况，我们不能凭借简单的否定立场来克服各种困难。我觉得，现在不可能利用组织统一作为借口拒绝统一行动。”<sup>①</sup>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两党经过多次商谈，于7月27日在巴黎签订了《统一行动公约》。公约确认：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社会党和共产党采取反法西斯的统一行动。在统一行动过程中，双方互相克制，停止互相攻击和批评。两党均有义务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解散法西斯组织，为营救台尔曼和保卫苏联而斗争。两党成立了“共同行动协调委员会”，双方各派7人参加。公约的签订结束了1920年以来法国工人运动的分裂状况，标志着两党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由此开始了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历程。《统一行动公约》的签署奠定了两大无产阶级政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团结统一的基础，也迈出了人民阵线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为了建立强大的反法西斯屏障，必须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都认识到，有必要把两大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扩大为人民联盟，同代表农民和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党实现联合。1934年10月，法共声明准备同激进党

<sup>①</sup> 《莱昂·勃鲁姆文集(1934—1937)》第165—166页。

结成联盟，并向共同行动委员会建议起草一个能够作为“劳动、自由与和平的人民阵线”的基础的纲领，提出了人民阵线的口号。法共的明确态度和积极行动，对实现工人阶级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广泛联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35年7月14日，在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的这一天，巴黎举行盛大集会，包括共产党、社会党和激进社会党在内的69个左派政党和团体的万名代表庄严宣誓：“我们，当选代表和7月14日人民集会的参加者，怀着给工人以面包、给青年以工作和给世界以和平的共同意愿，我们庄严宣誓，为了解除法西斯主义联盟的武装并瓦解其组织，为了保卫并发展民主自由，为了确保世界和平而采取共同行动。”然后，50万人参加了游行，多列士、勃鲁姆和达拉弟并肩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人民阵线正式成立了。

经过共同努力，社会党和共产党在1935年9月23日签订了《共同行动纲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人民阵线纲领》。1936年1月6日，左翼各党派通过了这一纲领。主要内容有：解散各种法西斯组织及其武装；宣布政治大赦；消灭失业和农业危机；对失业者实行社会救济；取缔投机；降低地租；改组法兰西银行；军事工业国有化；对外实行法苏友好，反对侵略，建立集体安全等。这一纲领反映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936年4月，人民阵线以这一纲领为旗帜参加议会选举，取得了重大胜利。社会党的议席从97名增加到147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共产党议席由10名增加到72名；激进党则由159名减少到106名，3党共获得375席，大大超过右翼党派的238席。社会党领袖勃鲁姆受命组成了由社会党和激进党联合执政的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法共未接受勃鲁姆的入阁邀请，但表示要从外部支持政府。

勃鲁姆上台之初，为了平息罢工浪潮，调解劳资纠纷，为实施人民阵线纲领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积极协调劳资双方的谈判，终

于促进双方于 6 月 8 日签订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马提翁协议”。该协议共有 7 个条款。主要内容是订立集体合同；承认工人加入工会的权利；以 5 月 25 日的工资为基数，提高工资 5—7%；在 10 人以上的企业选举工人代表监督；保证不因罢工而给予工人任何处分。

马提翁协议签订后不到一个月，在人民阵线政府的努力下，议会首先通过三项同工人生活和权利有密切关系的法令：关于带薪休假的法令、关于 40 小时工作周制和关于集体合同的法令。工人阶级从这三项法令中获得很大好处。法案规定：凡受雇于工业、商业、自由职业或合作社的工人或雇员等，在各该企业中已连续任职一年以后，每年均有权享受 15 天带薪休假。7 月，政府和铁路部门协商后宣布，带薪休假享受者及其家属在休假期间可以享受半价或减价乘坐特别快车。这年夏天，成千上万的工人携带家属奔赴各避暑胜地休假，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带薪休假。工人们非常感谢人民阵线政府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此外，议会在不到 3 个月的时间里，还通过了 130 个重要法令。主要内容有：改革法兰西银行的法律地位，废除该行旧董事会，对它实行改组以收归国有；实施军事工业国有化；设立国家粮食局以管制小麦；防止并惩罚资本外逃的行为；取缔逃税和非法涨价；改善社会保险制；规定矿工退休制；受义务教育的年龄延长到 14 岁；清理农业债务并对工商业给予临时援助等。

到 1936 年底，人民阵线纲领中提出的大部分社会改革措施都已实行或即将实行。这些改革措施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福利待遇甚至社会地位有所改善，带薪休假法令使广大劳动者获得了休假的权利，40 小时工作周法令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国家小麦管理局的建立改善了农业生产者的生活；集体合同法案打破了企业主在企业一手遮天的局面，提高了工会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应享有的权利；大公共工程计划有助于减少

失业人数。在勃鲁姆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时期，工人的实际工资指数由 108 上升为 133。一批大企业和法兰西银行收归国有，打击了大资产阶级的势力，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能力。在当时法国不具备革命的条件下，人民阵线政府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采取的这些改革措施，无疑有利于保障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改善他们的处境。人民阵线的成果为法国留下一笔遗产，当时的许多改革措施，如带薪休假制在今天的法国仍然存在，它开创了福利国家的先例。两党合作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实现了法国工会运动的统一，提高了两党在工人中的声望。两党的党员数、议席数和选票数都有了很大增加。法共党员从 1932 年的 2.9 万增加到 1937 年的 34 万。

人民阵线的实践不仅阻止了法西斯在法国的上台，促进了法国社会进步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而且为战后两党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提供了经验和模式，从而使两党关系的发展具有了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

## 第二节 从二战前夕的对立到战后初期的合作

### 一、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与人民阵线的破裂

勃鲁姆政府上台之际，面临着德意法西斯日益加重的战争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勃鲁姆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是谋求和平，把集体安全和裁军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1936 年 7 月 18 日，以佛朗哥为首的反动势力发动推翻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武装叛乱。如何对待西班牙内战，成为勃鲁姆政府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中心。勃鲁姆政府在接到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求援电报后，最初是毫不犹豫地决定支援西班牙政府，但此举不仅在国际上遭到英国的阻挠和反

对，而且在国内也受到右派舆论的猛烈攻击。当勃鲁姆不顾英国鲍德温保守党内阁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警告，就向西班牙提供武器举行谈判时，英国政府指示英国驻巴黎大使乔治·克拉克爵士向法国政府递交最后通牒。通牒声明，如果法国不立即停止向西班牙输出武器，英国将在法国同德交战的情况下不履行盟国的义务。由于德意威胁日益严重，加上法国本身国力的衰落，法国想单方面对抗德意是不可能的。为了保持同英国的联盟，法国不得不屈从于当时在欧洲有很高威望的英国政府，转而采取中立的“不干涉政策”。

更为严重的是，议会和内阁中的许多激进党人认为，向西班牙运送武器会导致战争或法国革命，因而坚决反对援助西班牙合法政府的决定。在双重压力下，勃鲁姆 8 月 8 日正式宣布对西班牙实行不干涉政策。

不干涉政策引起了作为人民阵线三大支柱之一的共产党及广大工人群众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1936 年 8 月 8 日，在巴黎地区共产党员举行的一次报告会上，法共领导人揭穿了不干涉协定的骗局，指出这项协议使判乱分子可以得到外援，而由人民选出的合法政府却得不到外援。9 月初，多列士号召巴黎钢铁工人采取罢工行动以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对西班牙内战的不同看法是法共和社会党之间的最大分歧。这一分歧使法共和社会党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再加上对国内政策和慕尼黑协定的意见分歧，两党的裂痕进一步扩大。

勃鲁姆上台后，在财政上面临着“资本囤积”“资本外逃”的严重问题，由于多种原因，勃鲁姆政府在振兴经济方面并未取得预定的成功。经济的不景气，特别是对人民阵线运动胜利的恐慌和敌视，使许多资本家把资金藏匿起来，或转移到国外。财政部长奥里奥尔 1936 年 6 月在向议会作的财政报告中估计，从法国经济中抽逃出来的资本约有 600 亿法郎，其中 26 亿已流往国外。对于这一

严重问题，勃鲁姆最初还想通过创造信任的投资环境来吸引人们把资本放回流通中，以此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及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勃鲁姆拒绝对外汇兑换进行控制，拒绝通过限制和禁止购买外币来减少资本外流。法共对此极为不满，它要求政府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控制资本外流，并禁止藏匿资本；必要时可以没收藏在国外的资财，或没收这类财产在法国国内的相等价值。而勃鲁姆和社会党害怕激怒大资产阶级，拒绝采用强硬手段。事实是对勃鲁姆创造信任投资环境想法的最好回答，不管人民阵线政府的政策多么温和，一个由社会党人领导的政府绝不可能取得金融资产阶级的好感，更不可能获得他们的信任。外逃的资金不但没有回到流通领域，反而越逃越多，使财政状况更为恶化。

面对这种情况，法共提出了自己的财政政策：实行税制的民主改革，减轻赋税负担，以复兴经济；对巨额收入征收累进附加税，并重新规定遗产税；实行纳税证制度，以消除流通证券的一切欺诈舞弊；大量豁免间接税，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法共财政政策的基点 是使富人出钱，保护工人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反对法郎贬值。但法共的建议未被政府采纳。

由于经济上的贫血，人民阵线政府社会改革初期的一些繁荣景象很快就过去了。从 1937 年 2 月起，工业生产开始倒退，失业人数又有增加。面对这种情况，勃鲁姆在 1937 年 2 月 13 日宣布，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绩，改革必须“暂停”。宣布“暂缓”实施人民阵线纲领，这使右派势力更加嚣张。3 月 16 日，由法西斯组织“火十字团”改组成的“法兰西社会党”公开在巴黎郊区集会，而政府竟然派警察加以保护，并与反对法兰西社会党的工人群众发生冲突，造成 5 人死亡、240 余人受伤。法共把这次事件称为“反人民的阴谋”，要求政府制止法西斯分子的挑衅活动，而勃鲁姆政府却在右翼势力的进攻面前步步退让，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6 月，勃鲁姆提出了“关于整顿财政的计划”，遭到参议院的否决，

不得不宣布辞职，由激进党领袖达拉弟取而代之。

此后，在对待慕尼黑协定问题上，两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勃鲁姆这时对希特勒仍抱有幻想，他以欣喜的心情欢迎慕尼黑协定，认为该条约是欧洲和平的保证。1938年9月21日，社会党背弃了它同法共商定的要求议会反对任何形式投降政策的诺言，在4个政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民主联盟和共产党)联合组成的人民阵线委员会上投票反对共产党要求谴责慕尼黑协定和履行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承担的义务的提案。10月4日，达拉弟要求议会批准慕尼黑协定和给予特别财政权力，对此共产党投了反对票，而社会党投了弃权票。正是由于法共和社会党不能在以激进党为代表的右派势力进攻面前保持一致，激进党才得以逞势。达拉弟上台后停止了一些已经实行的社会改革措施，如宣布灵活实行40小时工作周，向一贯抵制该法的资本家做了让步。11月10日，激进党正式宣布退出人民阵线。11月21日，达拉弟颁布紧急法令，宣布取消工人的罢工权利和其它改革措施，人民阵线名存实亡。1939年3月，社会党提出废除两党联合行动的建议，法共和社会党的第一次合作到此结束。

## 二、从二战初期的对立到后期的并肩战斗

人民阵线破裂后，面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威胁，法共采取了保卫祖国的正确立场，号召人民坚决同法西斯作斗争。直到苏德条约签订后的1939年8月25日，法共《人道报》虽然表示支持苏德条约寻求和平的努力，但仍然声明：“假如希特勒胆敢真的采取他所计划的决定性步骤的话，那么，一贯强调和平不可分割和要求对法西斯侵略持强硬态度的法国共产党人，将站到受到威胁的法兰西共和国最前列。”“我们党赞成政府为保障我国边境所采取的各种



措施。”<sup>①</sup>

9月2日,希特勒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后,法共的议会党团宣布:“共产党人过去是并且永远是坚决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面对希特勒的狂妄侵略,共产党人过去是并且永远是我国民主和独立的最坚决的保卫者。”<sup>②</sup>并在议会与社会党一起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支持政府对德宣战。但法共这种反法西斯战争的立场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指责。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法共“没有及时地理解8月底发生的急剧变化的革命意义”<sup>③</sup>,并派全权代表雷蒙到巴黎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他们把“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路线立即改变为反对英法帝国主义战争的路线。”<sup>④</sup>

共产国际的干预使法共改变了反法西斯的立场,开始采用苏联宣传的观点,翻印苏联的宣传刊物,把英法反对希特勒的行动说成是“帝国主义战争”,谴责英法是侵略者,把主张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戴高乐说成是“英国金融资本的代理人”<sup>⑤</sup>,号召采取革命失败主义政策。9月17日,当苏联红军进入波兰后,法共中央立即电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解放”,并“强烈抗议法国政府没有向议会咨询就向德国宣战”<sup>⑥</sup>。德国入侵法国后,法共领导竟派人请求德国当局允许正式复刊已被取缔的《人道报》,幻想在德国统治下恢复合法活动。

法共的这一急转弯,引起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人们指责共产党人赞成两个同谋者瓜分波兰,说共产党打算向纳

① 《人道报》1939年8月25日。

② 《法国共产党史》第2卷第7页。

③ 雅克·福韦:《法国共产党史》法国塞耶出版社1977年版第228页。

④ 《国际史》第2卷第600—601页,《法国共产党史》第2卷第7页。

⑤ 《法国共产党史》第2卷第27页。

⑥ 同上,第1卷第207页。

粹分子屈膝投降，指责共产党通敌，涣散士气和全国人民的斗志”<sup>①</sup>。“人民阵线的同盟者都怀着轻蔑的心情离开了共产党。正直的知识分子也跟着谴责斯大林罪恶的 180 度的大转弯。”甚至有些劳动者也对自己的共产党同志埋怨“苏联背叛”。不仅政府，而且原先的同盟者和新近的支持者都指责法共追随莫斯科。

由于法共放弃了反法西斯口号，追随苏联的对外政策，支持苏德条约，支持苏芬战争，支持苏联入侵波兰，斥责本国政府是战争的煽动者，反对政府的反侵略战争政策，因而被社会党说成是莫斯科指使的纳粹德国的代理人，是苏联的党，而不是本国的党。社会党还在议会投票支持政府对法共的镇压。在社会党的支持下，政府查封了《人道报》，取缔了法共，并宣布共产党议员“对祖国有罪”，撤销了他们的议员资格，2778 名法共的市镇议员被驱逐，所有的法共报纸被取缔，财产被没收，629 个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被解散，3400 名法共积极分子遭被捕，27 名法共议员公开宣布脱离法共，近一半党员退党。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苏联不惜牺牲一切的指示，扼杀了法共刚刚开始萌芽的独立意识。法共由于追随苏联的对外政策而放弃了反对法西斯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旗帜，使自己蒙受了巨大损失，许多党员丧失自由，甚至丧失了生命。

尽管法共领导在战争初期执行了一条“革命失败主义路线”，但许多基层干部和党员在德国入侵后，仍然自发地开展了反对纳粹侵略者的斗争。但从总体上说，直到 1941 年 6 月德国入侵苏联，共产国际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争取战胜和消灭法西斯的号召后，法共才摆脱了严重的内心矛盾，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反法西斯战斗中。他们成立了由夏尔·狄戎领导的游击队，同参加抵抗运动的各派力量并肩战斗，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同入侵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sup>①</sup> 《法国共产党史》第 1 卷第 207 页。

法共以其英勇斗争的不妥协态度和领导抵抗运动的卓越组织能力，成为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中最富有牺牲精神和最有战斗力的队伍。

法共在积极进行抗德斗争的同时，主张法国抵抗力量实现联合，不仅恢复了同社会党的合作关系，而且积极参与筹建成立了国内抵抗运动各派的领导机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组织了 50 万内地军，其核心是法共领导的 25 万义勇军游击队。为了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法共承认戴高乐是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并参加了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到法国解放前夕，71 个省的解放委员会中，法共控制了半数以上。法共在抵抗运动中，为捍卫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尊严，牺牲了数万名党员，因而以“被枪杀者的党”赢得了法国人民的尊敬和赞誉，法共的威望也随之大大提高，吸引了大批爱国人士入党。此外，“红军抗击德国入侵的英勇行动，在广大工人和知识分子群众中唤起了拥护苏联的激情。在这种激情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共产党。”<sup>①</sup> 二战结束前夕，受到苏德条约沉重打击的法共，力量已恢复到接近战前水平，达到 30 万。1945 年底，党员人数发展到 75 万，1946 年超过 80 万，成为法国第一大党。

“由于共产党有良好的纪律和严密的组织，它成为唯一的在占领期间保持了本色和内部团结的战前政党”<sup>②</sup>。“就其成员来说，共产党是最勇敢的队伍之一；对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反对纳粹活动时期是他们战斗生活最美好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的革命意识终于为祖国服务了。”<sup>③</sup> 当时，“共产党已不再是长久以来被人谴责的‘外国的民族主义党’。它为共同的事业做出了极大的牺

① 《国际史》第 2 卷第 623 页。

② 《斯大林和法国共产党》第 82 页。

③ 《1940 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第 13 页。

牲，因此，不允许怀疑它的党员的爱国精神。人们已不再公开谈论反共主义了。社会党人都十分清楚地懂得，抵抗运动的动力不是来自他们自己，而是来自共产党人。”<sup>①</sup>

美国历史学家 R·里贝尔在《斯大林和法国共产党》一书中也承认：“在盟军登陆前夕，共产党人在自由法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一切重要中心机构中都占有巩固的地位，共产党有史以来第一次承担了内阁职责。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一致承认该党在抵抗运动中的中心地位。共产党人已经在统一行动的口号下，取得了胜利，增加了在工会、军队和各种组织中的势力。”<sup>②</sup>这种有利的形势为战后法共同其他抵抗力量一道参政和寻求法国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提供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法国社会党在战争爆发后，支持政府进行抵抗法西斯的战争，谴责法共的革命失败主义政策，有 6 名成员参加了主战的“民族团结和行动”政府。1942 年 6 月贝当政府投降德国，成立了维希伪政权。社会党 90 名议员投票赞成将全部权力交给贝当的宪法草案。此后，社会党四分五裂。一部分领导人支持伪政权，堕落成法奸，原总书记保尔·富尔出现在贝当指定的“全国顾问”名单之内，社会党议员弗朗索瓦·萨赛涅当上了维希政府部长，《人民报》社长欧仁·加亚尔办了一份《奋斗》报，为投降派张目。也有为数不少的党员在德军占领初期和以后投入了抵抗运动。直到 1943 年 6 月，一些社会党人才在巴黎成立了全国执行委员会。达尼埃尔·梅耶当选为总书记，开始重建法国社会党，领导抵抗运动。社会党与共产党一起参加了由各抵抗运动党派团体组成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并开始恢复两党接触。1944 年 3 月，梅耶在他起草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共同纲领的总纲中写道：“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以同等的

<sup>①</sup> 雅克·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第 326 页。

<sup>②</sup> 《斯大林和法国共产党》第 111 页。

态度欢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全体勇士，以及置威胁和危险而不顾继续为自由而战的其他抵抗组织成员。”<sup>①</sup>

1943年8月到1944年1月，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往来信件5封，阐述了各自的立场，社会党提出建立一个由两名共产党人和两名社会党人组成的“调解委员会”，而法共则提出两个工人政党实现合并的建议。尽管两党未能达成一致，但在反法西斯战争后期并肩作战的战友关系为在大战结束后两党的进一步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 三、两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合作与斗争

解放初期，鉴于当时国际形势的要求和国内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为了避免发生内战，迅速取得反法西斯的最后胜利，法共顺应了多数法国人渴望和平、厌恶战争的心理，也配合苏联欧洲战略的需要，决定从武装斗争转向和平的合法斗争。1944年9月，法共参加了由戴高乐组成的有社会党人参加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积极投入选举运动，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参政实践以及第一次同社会党在政府一级的合作。从1945—1947年，在法国举行的三次议会选举中，法共有两次所得选票和议会席位均居各政党之首，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另一次位居第二位。在此基础上，法共先后参加了五届政府，有8位领导人先后担任了副总理与部长职务。与此同时，法共还提出了“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工会”的口号，致力于实现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合并和工会运动的统一。

在共同斗争中实现工人运动统一，推动法国社会进步，也是社会党当时的愿望。解放之初，法国社会党领袖勃鲁姆指出：“在法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同各个阶层和不同信仰的其他法兰西人共同参加抵抗团体，共同斗争、并肩战斗和共同牺牲，使一些人和

<sup>①</sup> 《社会党第三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第23页。

另外一些人都认识到他们有共同的崇高目标：改造社会。他们坚信，解放应当理解为坚定地沿着实现这个共同目标和实现这个伟大革新的道路前进。实现这个伟大革新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必要性已经显示出来。他们完全协调一致的行动正成为必要的条件。”<sup>①</sup>

1944年11月9日召开的法国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声明：“关于两党统一行动的正确性，已经在抵抗运动初期开展的地下斗争中得到体现。”<sup>②</sup>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中说：“社会党开诚布公地向法国共产党再次郑重建议实行在地下斗争中已经形成的两党的统一。”<sup>③</sup>

1944年11月27日，刚从苏联回国的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立即对社会党的建议表示欢迎。他在11月30日的一次演说中宣布：“为了加强所有劳动者之间的联系，为了确定当前为反对重又咄咄逼人的反动势力而必需采取的共同行动，也为了奠定一个伟大的全国性的工人党和一个伟大的法兰西人民的党的基础，法国共产党政治局非常乐意地响应了最近社会党提出的建议。”<sup>④</sup>为了讨论两党的统一问题，两党商定成立一个“常设协调委员会”，以使两党之间形成谅解、诚挚和友好合作的气氛。协调委员会首先拟定了两党关于惩处和清洗投敌叛国分子的共同声明，于1945年1月9日分别发表在《人道报》和《人民报》上。不久，又发表了两党关于要求实行大银行、大工矿企业、大保险公司、电力公司和交通运输公司国有化，以及没收叛国分子财产的共同声明。关于组织上统一的问题，协调委员会决定，每个党分别提出关于统一的条件、建党原则、指导思想、行动方法等问题的方案，再进行协商。

① 《社会党国际》第14页。

② 同上。

③ 《政治年鉴》(1944—1945)第32页。

④ 《多列士言论集》第9页。

1945年1月21日,法共召开中央全会,明确提出了两党在组织上合并,建立一个单一的“法国工人党”的设想。多列士在全会报告中说:“我们正在朝着建立一个伟大的全国性工人党的方向前进。这个法国工人党的原则、方法和组织形式,当然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制订的依据;我们以为,同时也要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后来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良好影响下所获得的发展。”<sup>①</sup>

1945年6月12日,《人道报》发表了法共提出的法国工人阶级“统一宪章”草案。从这一草案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还是组织原则的提法都是以法共的党章为蓝本的,与社会党的一贯立场有很大距离。草案中还多次提到苏联和斯大林,这是社会党最反感的事。显然,这样一个草案很难为社会党所接受。

社会党对《人道报》在事先未作通报的情况下就发表“统一宪章”草案的做法表示不满。7—8月,勃鲁姆在《人民报》上连续发表了题为《统一问题》的一组文章,阐述了社会党的态度。他认为,共产党提出的统一宪章草案是社会党无法接受的,如果按照这一草案统一,未来的党就会“几乎完全落入目前共产党窠臼”。所以,两党行动上的统一是绝对必要的,但是组织上的统一则是不可能的。他坚决反对“统一宪章”草案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主张实行“人道社会主义”。

1945年8月12日,社会党召开第三十七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同共产党的统一问题。会议决议说:大会重申社会党对实现工人阶级统一的愿望并将竭尽全力争取重建工人阶级的统一。但是,在统一之前,两党必须各自遵守以下行动准则:一、开诚布公地阐述自己的学说,禁止使用任何损害人道精神的手段或宣扬什么只要目

<sup>①</sup> 《多列士言论》第49页。

的是好的,可以不择手段;二、在党内遵守全面的民主准则,并在民族和世界范围内维护民主制度;三、不应受一个外国政府的约束,也不应受它的影响,要保持充分的批评自由和判断自由。这条显然是影射法共同苏联关系的。社会党认为,目前上述条件在共产党方面远没有得到实现,所以,它拒绝接受法共关于建立统一的法国工人党的建议,而只同意行动上的某些统一。社会党的这种态度同当时国际社会党对共产党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所以勃鲁姆说:“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不取决于我们互相善良的愿望,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取决于斯大林和社会党国际组织。”他强调,由于未来的社会民主党国际组织可能对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联合提出反对,因此,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领导人根本无权解决关于两党联合问题,即使这种联合是以满足法国社会党的要求为条件的<sup>①</sup>。

当时,共产党无论从力量 and 影响方面都远高于社会党。在这种有利的力量对比中,法共对出面领导国家事务充满信心。但社会党对法共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它不能接受法共在左翼中占支配地位,更不能接受由法共来掌管国家事务。因此,社会党一方面不能无视强大的法共存在,并与之进行有限的合作;另一方面却又联合其他力量力图削弱和遏制法共力量的增加。这种态度必然导致两党在联合政府中既合作又斗争的局面。1945年秋天,法国举行了战后第一次制宪议会选举,法共获得500万张选票,在议会中拥有152个席位;社会党获得459万张选票和145个席位;人民共和党获454万张选票,141个席位,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大党的地位。在议会545个席位中,法共和社会党的席位合起来超过半数。法共根据左翼政党拥有过半数席位的胜利和优势,向社会党建议结成议会多数派,组织两党联合政府。但社会党担心自己会在两党联合政府中处于不利地位,断然拒绝单独同共产党合作,主张建立共产党、

<sup>①</sup> 《第三条过路》第191页。



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三党联合政府，以便与人民共和党一起牵制法共。法共最后接受了这个方案，组成了由戴高乐担任总理的新的临时政府。新政府成员中，三大党各占 5 名。

不久，戴高乐因在制定宪法草案、安排军事预算等问题上与议会发生重大分歧，宣布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法共凭借第一大党的地位，建议由多列士担任总理，社会党虽然表示赞同，但要以人民共和党入阁为先决条件，而人民共和党坚决不同意多列士任总理。最后，法共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立场，同意三党联合执政，由 8 名共产党人、8 名人民共和党人、9 名社会党人组成了新政府。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 1947 年法共被赶出政府。

在 1945 年 10 月到 1946 年 10 月两届制宪议会期间，由于社会党和共产党议员共同努力，使新宪法草案比 1875 年的宪法有了明显进步，赋予人民较为广泛的民主权力。如规定人民享有劳动和休息的权利，获得工作的权利，参加集体确定的劳动条件的权利等等，确定实行多党议会制政治体制。1946 年 10 月 13 日，新宪法获得通过，10 月 27 日，第四共和国正式诞生。

在 11 月 10 日举行的第四共和国首次国民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赢得 169 个席位，人民共和党获得 158 个席位，社会党仅得 101 个席位。根据这一选举结果，法共政治局发表声明：表示准备履行作为法国第一大党的责任，要求组成以多列士为总理的政府，宣称“对法国的第一大党，此后不得再有任何禁令！共产党要广泛地参加政府工作”<sup>①</sup>。

当时，已有两年多参政实践，从党员人数、议会力量和和群众中的影响均属第一大党的法共似乎认识到，它完全有能力根据本国的情况独立自主地开展斗争，并在斗争中壮大自己的力量。面对有可能组阁的形势，多列士把这一时期的参政实践及议会斗争经

<sup>①</sup> 多列士：《人民的儿子》第 146 页。

验从战略高度进行了总结，在 1946 年 11 月 7 日答《泰晤士报》记者问时，首次明确提出了法国可以通过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走过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多列士说：“民主在世界取得了进展，使得人们在俄国共产党遵循的道路之外，能够考虑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其它道路。无论如何，每一个国家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具有光荣传统的法兰西人民一定能够找到更广泛的民主、进步和社会主义道路”，并阐明了法共的施政纲领。多列士说：“我们不要求人民执行一个建立在对现今所有制和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进行彻底改革基础上的非常共产主义化的纲领。我们制定了一个国家复兴的民主纲领，这是参加共和运动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sup>①</sup>

法共纲领的基本内容是：实行国有化，支持中小工业和手工业企业，保护农民财产不受托拉斯侵犯，降低物价，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法共认为，“在现阶段，使国家掌握大型垄断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进步。国有化能够打击金融寡头的势力，合法地限制了剥削他人的可能性，把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交给民主政府用于国家经济和社会振兴。”<sup>②</sup> 从多列士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共试图借助自己的实力，取得对政府的领导权，将法国民主和共和力量联合在法共周围，依靠国有化和企业委员会实现反对托拉斯的民主纲领，建立一个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或两党统一行动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民民主制度，通过新的人民民主进入社会主义。这就是法共设想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在 1946 年 12 月举行的法共中央全会上，多列士引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进一步阐述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人民民主的优点是，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过渡到社会主义也是可能

<sup>①</sup> 贝·瓦利：《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第 134 页。

<sup>②</sup> 同上。

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事件和这场战争所引起的变化。”<sup>①</sup>可以说,当时法共提出的这些观点和主张还是很大胆的,也具有一定的新意。

面对共产党提出的施政纲领,社会党提出了一个财政方面的反纲领。这是继 8 月份解散两党协调委员会后,社会党又一次与法共拉开距离。在组阁问题上,尽管法共已答应支持社会党人担任议长,以换取社会党支持共产党人担任总理,但社会党在是否支持多列士作为总理候选人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后来经过党内的激烈争论,终于同意支持多列士的候选人资格。但由于其他党的反对,多列士未能在议会获得多数票实现组阁的愿望,其施政纲领也只好束之高阁。此后,法共于 1947 年 1 月投票支持社会党人拉马迪埃任总理,加入了两党共同参加的第六届,也是最后一届联合政府。这届政府共有 5 位共产党人担任部长,直到 5 月被解除职务。

法共和社会党在政府一级的合作持续了三年,两党在联合中始终贯穿着斗争。由于社会党在一些问题上与法共唱反调,使法共很难在议会和政府中发挥第一大党的作用。尽管如此,两党的有限合作仍对战后法国的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起了积极作用。如两党部长都致力于医治战争创伤,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一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和信贷机构的国有化,通过了有利于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险法和企业委员会法,颁布了恢复 40 小时工作周法令和三周带薪休假法令,在法国实现了比当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较为进步的社会保险制度,维护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推动了法国的民主进程。两党合作的这些成就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法共短暂的参政实践对它后来寻求在左翼联盟的基础上与社会党建立联合政府起了重大的作用。

<sup>①</sup> 贝·瓦利:《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第 136 页。

### 第三节 冷战时期社会党的“第三种势力”政策 与共产党的孤立处境

#### 一、“冷战”爆发与法共被逐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东欧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战后初期苏联和西方大国的同盟关系由于社会制度的对立日益紧张。英国前首相丘吉尔 1946 年 3 月在英国富尔敦发表的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序幕，而 1947 年 3 月出笼的杜鲁门主义和不久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则标志着“冷战”的全面爆发。西方对苏联的政策由合作转向“遏制”。

杜鲁门在 3 月 15 日的演说中公开宣布，美国希望欧洲国家把共产党人赶出政府。同年 4 月，美国驻法大使告诉担任总理的社会党人拉马迪埃，“如果法共不再是政府的成员，法国和美国的关系就会得到改善。”<sup>①</sup> 当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法国急需援助，而“美国手中握有战后建设工作所必需的美元。美国准备提供这些美元，但不向有共产党人参政的欧洲国家提供”<sup>②</sup>。所以，当 1947 年初勃鲁姆代表法国政府到美国要求贷款时，美财政部长艾森“正式要求勃鲁姆促使社会党人配合反共联盟，排斥目前在法国议会中占有重要席位的共产党”<sup>③</sup>。

面对“马歇尔计划”的诱惑，社会党人认为，“马歇尔计划”可以

① 雅克·凯尔戈特：《社会党》第 18 页。

② 丹尼斯·麦克布恩：《弗朗索瓦·密特朗传》第 43 页。

③ 威尔特：《1940—1955 年的法国》第 275 页。

帮助他们摆脱经济灾难和社会混乱，提高工业生产水平和消除大量失业现象，为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创造条件。这有助于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并保证在选举中取得成功。而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前提条件就是与共产党决裂。当时，其他西欧国家，如意大利、比利时等都先于法国驱赶了内阁中的共产党部长。反共已在西欧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勃鲁姆也认为：“在一个孤立国家的有限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造不可能不破坏经济和冒崩溃的危险，并会招来世界经济严厉的贸易、金融和由此而来的政治制裁。”<sup>①</sup>所以，社会党只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改良，并同西方世界合作。

法国历史学家曾评论说：西方工人运动出现新的分裂，乃是组成集团的结果。共产党人奉行有利于苏联的政策，社会党人奉行大西洋政策。而正是大西洋政策迫使他们接受了美国的领导，抛弃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人。此外，东欧各国当时普遍采取把社会党完全并入共产党，并镇压社会党领导人的做法，在西欧社会党内引起了恐慌，增加了他们对共产党的猜疑。他们害怕共产党力量强大后也会把自己吃掉。这就使两党对立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又增加了实际的利害冲突和强烈的感情色彩。

可见，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大阵营的对立对两党关系的发展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影响。战后初期法国社会党尽管主观上想以中间力量的姿态出现，但是当时的国际形势迫使他们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做出选择。而他们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他们必然在政治上把主要矛头针对苏联和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划清与共产主义的界线。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社会党开始放弃法国的中立政策转向同西方结盟。

<sup>①</sup> 《莱昂·勃鲁姆论文集（1940—1945）》第 473 页。

1947年3月，法国政府与英国签订了英法同盟互助条约，并与英国外长签订了煤的协定。这些做法遭到了政府中共产党部长的反对。与此同时，在雷诺工厂罢工和殖民地等问题上，法共支持雷诺工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坚决反对政府在印度支那和北非推行的侵略战争和殖民政策。由于共产党拒绝支持政府内外政策，拉马迪埃要求议会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法共议员和部长投了180多张不信任票，但支持政府的信任票有360多张。拉马迪埃以共产党部长违背了内阁团结一致的原则为借口，于5月5日解除了共产党人的部长职务这标志着两党第二次合作的终结。4天后，美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就宣布给予法国2.5亿美元的贷款。

当时，法共并未看到从1946年底法共要求组阁被拒绝后，各党已出现了孤立法共的迹象，也没有看到法共被逐出政府与世界性的反共高潮密切联系，对国际国内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认为国际国内的力量对比并非不可逆转，仍然声明要作为执政党来行动，幻想社会党人会允许法共重新回到政府。在1947年6月召开的法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多列士正式向社会党发出建立左翼联盟和左翼联合执政的呼吁。直到9月，多列士在与英国记者的谈话中还再次表示：“共产党是一个政府的党……，我们过去、现在都要求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法国最大的政党有权根据它所获得的选票的比例分得相应的席位。”<sup>①</sup>

1947年9月底，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波兰举行。会上，法共中央书记杜克洛在代表法国作报告时，依然津津乐道于法共的参政成绩和遵守共和秩序，并说：“我们要告诉人民，我们要同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保持友好”等等。杜克洛的发言，遭到了与会者的尖锐批评，日丹诺夫问杜克洛为什么法共要“像多列士在十一大上一再声明那样，把自己说成是执政党”。杜克洛很快作了自我

<sup>①</sup> 《人道报》1947年9月22日。

批评,他说:“我们刚退出政府后,的确出现过某种摇摆现象,犯过机会主义、合法主义和对议会的幻想等错误。”<sup>①</sup>

会议结束时发表的情报局声明说,世界已分成两大阵营,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的根本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统治和扼杀民主,右翼社会党人是帝国主义的忠实附属。声明要求,无论在政府内还是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各国共产党都必须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计划,同右翼社会党作坚决的斗争。日丹诺夫在总结报告中,针对法共和意共的“机会主义”和“议会主义”说:“问题不在于做些细小的修修补补,而是要彻底改变两党的政策。”<sup>②</sup>

情报局会议后,法共于 10 月底召开了中央全会。多列士在会上指出:法共所犯“错误的根源在于中央委员会本身对国际形势的突然变化之性质和规模认识的太迟,明确地阐明此点也太迟。因此,我们没有从开始起即用一切必要的力量,强调我们被排斥出政府是美国反动派的命令,而我们暴露的弱点,给了勃鲁姆和拉马迪埃以可乘之机”<sup>③</sup>。并按照情报局文件精神,彻底改变了参政及合作政策,开始以在野党的身份同从社会党到戴高乐派的“美国党”展开激烈斗争。

11 月中旬,法共及其领导下的总工会号召举行总罢工,数百万工人参加的总罢工使国家陷于瘫痪状态。社会党政府把罢工说成是共产党企图接管政权的反革命罢工,调动数千军队和警察粗暴地镇压了罢工。此后,社会党政府日益右转,议会通过了镇压法,加强了反共攻势。在国有化企业董事会,占有重要职位的共产党人被调开了,公务人员被解职了,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和积极分子遭

① 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第 49—50 页。

② 同上,第 51 页。

③ 《世界通史参考资料》(现代史部分之五)下册第 6—7 页。

到迫害。共产党的处境艰难，与社会党关系日益恶化，两党关系又重新回到了全面对立状态。

## 二、社会党的“第三种势力”政策与法共的孤立处境

社会党将法共逐出政府后，积极奉行“第三种势力”政策，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戴高乐派的法兰西人民联盟。1947年11月21日，勃鲁姆在议会中发表演说，阐述了“第三种势力”政策的内容。他说：“现在有两个危险：一个是国际共产主义已经向法兰西民主公开宣战；另一个是，在法国已建立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的目标——也许是唯一的目标——是剥夺国家主权的基本权利。”<sup>①</sup>为了维护第四共和国政治体制，保障国家和平民主的发展，对付两个强劲的反党派，社会党开始寻找新的结盟形式。它已不能再采取“人民阵线”的形式，更不能组成清一色的社会党政府。于是，社会党另辟蹊径，提出“联合所有忠于法国的共和主义者”，组成一个以“不可分割的多数派”为基础的新政府。社会党的“第三种势力”政策的特点是：第一，拥护第四共和国宪法和政治体制；第二，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戴高乐主义，但重点是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第三，它以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为主体，联合激进党和温和派等。这也正是1958年前法国政治格局的主要特点。从1947年到1952年，社会党与其他党派组成的第三种势力形成议会多数，主宰内阁，先后参加了10届政府。1952年后，第三种势力中中右势力加强，社会党因学校问题、社会问题与其他党派尖锐分歧，不再参加由中右政党组成的多数派，成为在野党，并在议会中就维护工人利益、解决学校问题等同法共采取过共同的立场。但在总体上，一直坚持反共态度。

这一时期，法共在国内外的反共浪潮中，在苏共的压力下，执

<sup>①</sup> 《1946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第167页。



行的政策日益脱离法国实际。特别是 1948 年 6 月,情报局会议将南斯拉夫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道路,抵制苏共的压力,维护本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努力,作为“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国际主义”“反苏、反共的狭隘民族主义”加以批判,进一步促使法共在政治方面依赖情报局和苏共所做的政治分析。“铁托主义错误”的核心既然是“民族主义”和“对于苏联的不友好态度”,那么,共产党人的正确态度就应当是对于苏联的忠诚。既然谁不照搬苏联模式,谁就会遭到批判和开除的厄运,那么,各国共产党就只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听命于苏联的指挥棒。

在这种情况下,法共政治局完全接受了苏共代表对国际形势和南斯拉夫状况所做的分析,毫无保留地支持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批判,重复对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攻击,从而使法共最终放弃了有关各国“以不同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想法,重新回到了追随苏联的立场上来,宣传口号和路线政策出现了全面倒退。

1947 年后,法共的理论宣传主要依据甚至完全照抄情报局文件及其观点,在关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上,遵循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的报告,完全按照“战争经济”和“法西斯化”的思路进行,把“法西斯化”和“美国党”的概念扩大到从戴高乐党到社会党及一切非共产党的政治势力,于是,在批判社会党时重新采用了 30 年代初“阶级反对阶级”的说法,把社会党议员比作戈培尔、戈林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于苏联现实毫无保留的颂扬代替了法共对自己奋斗目标的阐述和说明,强调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特点取代了对法国具体情况的分析。法共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国际力量的对比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当国际力量对比产生持久变化后,才有可能谈论社会主义问题。因此,法共的首要任务不是在法国实现社会主义,而是捍卫民族独立和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具体说来,就是终止马歇尔计划,反对欧洲一体化,保卫和平,阻止国家的法

西斯化，把无产阶级专政和现有的社会主义模式摆在第一位。为了实现这些任务，党要致力于活跃“基层委员会”和群众组织，而不是加强党本身。

1949年11月，情报局会议强调保卫和平和反对战争是各国党的首要任务，要求各国共产党人发展世界规模的有组织的和平阵线，扩大政治行动，“使一切活动都从属于这一当今的核心任务”，“各企业中的工会必须在企业和行政部门中建立保卫和平委员会，使这些委员会成为争取劳动者全面团结的斗争核心”。据此，多列士在1950年4月召开的法共十二大上，提出了“和平，保卫和平的斗争是当今的决定性问题”，“共产党人的一切政治活动都必须从属于保卫和平运动”的著名口号，强调要从事政治性的罢工，并加剧了对“经济主义”的批判。1950—1953年，法共将主要精力放在开展保卫和平运动，支持苏联提出的各种和平倡议上，包括通过各种委员会征集签名，开展请愿活动，组织各种保卫和平的示威游行和政治罢工，拦截运送军火的军车等政治活动，而对于法国的政治动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国家作用的分析和各阶级的变化、经济及社会问题却很少提及由于这些活动脱离广大群众的现实要求，带有纯粹的政治性质和浓厚的亲苏色彩，因此，得不到其他工会组织的支持。甚至苏联也承认：“这些活动在尚未觉悟的群众中往往得不到广泛的响应”<sup>①</sup>。1952年2月，法共以“反对法西斯主义”“不能让戴高乐掌权”为口号组织的政治罢工，5月以反对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威任北约组织总司令为口号组织的总罢工和示威游行都以失败而告终。法共和总工会的许多领导人，包括党中央书记杜克洛在内被指控为犯有“组织阴谋活动罪”遭到逮捕。

这一时期，法共追随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宣传基调，不断调整自己的口号和政策，片面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和保卫苏联的重要性，甚

<sup>①</sup> 《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与理论问题》第6卷第50页。

至说“即使红军占领巴黎，法国工人也不会反对”<sup>①</sup>，被其他党派说成是“外国党”。社会党总书记摩勒“使劲地把共产党描绘成苏联的特洛伊木马——是东方的党而不是左派的党”<sup>②</sup>。特别是法共把一切非共产党的政治党派都说成是美国党，“尽管部分地符合各个不同政党当时奉行的政治路线，然而，却把政治多样化的实际过程弄模糊了，同时也排除了更深入地分析每个政治组织的策略根源、连续不断的一些短暂调整以及这些调整对于政治局势的影响”<sup>③</sup>。把奉行第三种势力政策的社会党与戴高乐派相提并论，就扩大了打击面，使法共在争取群众问题上陷于被动。在组织问题上，法共根据情报局会议精神，主要致力于活跃“基层委员会”和群众组织，而忽视了党组织本身的建设。法共的口号和政策越来越不适合法国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党的力量削弱和影响的下降，党员人数由战后的 80 多万锐减到 50 万。

正如党的领导人指出的：“冷战时期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最严重的时期，法共不可能置身于这些年代的矛盾之外。”<sup>④</sup> 在 1947—1953 这些年代里，法共政治思想方法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缺点最为明显，当时采取的一些决策和作出的一些评价后来都被法共自己积极地推翻了。所以说，这一时期是法共政治上的倒退时期。

### 三、1953年后法共政策的积极变化

在经历了 1952 年的沉重打击后，从 1953 年春开始，法共的政

① 《密特朗传》第 45 页。

② 《西欧共产党》第 18 页。

③ 《法国共产党：阶段与问题》第 397 页。

④ 雅克·尚巴兹：《马克思主义与法国革命运动》，《思想杂志》1987 年 3—4 月号。

策随着多列士从苏联回国，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在 1953 年 6 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法共用“为了面包而斗争”的口号取代了“为了和平而斗争”的口号，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工人阶级为了面包而进行的各种请愿活动上，并重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口号。之后，法共在言论方面也出现了明显变化：对于 30 年代初期“阶级反对阶级”提法的引述开始减少；人民阵线又重新开始成为卓越的政治模式和各种范例的源泉。

1953 年 6 月召开的法共十三大提出了成立人民阵线，争取恢复民族独立、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纲领。法共的目标是：“重新开创与 1934—1936 年间存在的相似的形势，向着新的人民阵线前进”，力求稳定地保持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并由此加剧社会党内部的矛盾。政策的调整使法共停止了衰退的趋势，力量逐步恢复。在 1956 年 1 月的议会选举中，法共得到 25.6% 的选票和 150 个席位，重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议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法共提出组织人民阵线，成立一个没有排他性的左翼政府。而议会中的第二大党社会党却不理睬法共，他们同激进党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将共产党人排除在外的左翼政府。这一时期社会党始终未改变“第三种势力”的政策，但共产党仍对利用议会中的地位促使社会党政府向左转抱有信心，提出“坚持一切有利于联合的因素，避免一切可能分裂的因素”，并表示在议会中支持社会党政府。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对法共产生了双重影响。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提出的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可能性，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向社会主义过渡形式的多样性和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等新思想，部分地适应了世界形势和国际共运变化了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为法共所接受。另一方面，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又给了一贯把苏联经验当作效法样板和以“斯大林主义者”为自豪的法共领导突如其来的打击。在 1956 年举行的法共十四大上，多列士根据苏共二十大精神，着重强调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

能性和法国议会斗争的独特作用，指出在社会主义阵营扩大及其威望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不经过武装起义和内战而建立人民政权的可能性，一般说来是增大了。假如工人阶级坚持实现正确的路线，工人阶级眼前就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依靠着群众革命运动来使反动势力遭受失败，在议会中掌握稳定的多数，并且把议会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机器改变为真正的人民意志的机关”<sup>①</sup>。并在冷战后首次明确提出法共的目标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法国”。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主观条件，则是“工人阶级的统一”。只有在排除了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实现统一道路上的障碍的情况下，才可能谈论法国社会主义远景，统一战线是根本问题。

在十四大上，法共一方面谴责了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却回避秘密报告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对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持保留态度，不愿意深入讨论斯大林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后果，竭力强调斯大林的功绩，力图掩盖苏联模式存在的严重缺陷，以缓和因秘密报告所引起的党内思想混乱，强调承认不同的道路，绝不意味着修改我们的理论……怀疑已经证实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法共在苏共二十大后，尽管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向前迈出了几步，但由于对苏联模式的弊病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独立思考的自觉性，在摆脱苏联模式上依然是犹豫不决，摇摆不定。随着波匈事件发生后反共浪潮的出现，法共又一次受到政府的镇压，党中央所在地和《人道报》所在地受到破坏性的袭击。法共从波匈事件的危机中消极地吸取教训，认为二十大后波匈开始的民主化进程是波匈事件的主要原因，结果使自己的观点又回到原来僵化的传统概念上去了。

1956年11月，法共举行中央全会。多列士在讲话中说：“事实上，形式的多样性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没有必然联系，无产阶级

<sup>①</sup> 《法共十四大文件》第181页。

专政在内容上将不可避免地是共同的。没有什么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的内容。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过去是，而现在仍然是十月革命所提供的。我们党将永远牢记列宁的党所取得的光荣经验，而这些经验能够使世界上一切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都受到启发。”<sup>①</sup>此后，对斯大林的颂扬和对苏联模式的神化又代替了对法国社会主义前景的具体阐述，“法国式”的道路被共同性的概念否定掉了，围绕二十大提出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被中断。

法共认为，强调和平过渡会使人产生幻想，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反动派上台准备条件，于是，把批判“民主幻想”的危险放在首位，强调“党不能允许某些人借口民主化来试图以反对派纲领建立宗派和派别，从而在党和党的领导正在受到阶级敌人和被阶级敌人利用的人们猛烈攻击的时候来破坏党和党的领导的信誉”<sup>②</sup>。并对意共提出的通过结构改革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提出了批评，认为过分夸大各国的民族特点和传统就会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有效的真理。由于没有确定一个真正与国情相符合的战略方针，除了借用榜样和模式的解决方法外，还可能有另外一种解决方式吗？因此，法共得出了结论：只有一个社会主义中心或模式。这种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一直持续到 1968 年，并使法共在“五月风暴”中蒙受了重大损失。

从社会党方面看，自 1952 年 3 月中断了与右翼和中右翼政权的联系后，影响略有回升。在 1956 年的立法选举中，法共、社会党、激进党等左翼的席位总共 322 席，超过组成议会多数派的数量。但由于社会党无意与共产党结成左翼联盟上台执政，故社会党总理摩勒提出了以社会党和激进党为主的中左内阁名单，并得到了法共的支持。其后，法共投票赞成摩勒有利于劳动人民的经济和社会

① 《法共和意共论当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第 37 页。

② 同上，第 45 页。

改革政策。时隔不久，由于社会党政府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强化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法共又一次成为坚定的反对派。这一时期，社会党总的立场是坚持奉行第三种势力政策，拒绝与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从以上对 1920—1958 年两党关系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大致概括出这一时期两党关系发展的主要特点：

1、由于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根本分歧和分裂后形成的历史积怨，对立和斗争是两党关系的主流。

2、由于两党同为工人阶级政党，同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这就决定了两党在特定的国内外形势下，为了实现某些具体目标和任务能够进行有限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只能是短暂的。

3、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两大国际的对立斗争对两党关系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4、两党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如何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是两党政策和政治活动的中心问题，两党的兴衰成败，无不与此有密切关系。

两党关系的上述特点在第五共和国时期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来，并对两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 and 实践产生了双重影响。

## 第二章

# 左翼联盟的酝酿

1958年5月，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军和极端殖民主义者发动军事叛乱，接管当地政权，并扬言要向法国本土进攻。在法国国内，极右分子和极端殖民主义者在巴黎举行游行示威，与叛乱集团遥相呼应。部分警察、宪兵以及保安部队也蠢蠢欲动，准备配合叛乱者。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长期隐居的戴高乐打破沉默，发表声明，称他已经做好“承担共和国权力”的准备。多党政府面对政治危机束手无策，在戴高乐派的积极活动和主动行动的压力下，只好辞职。于是法国总统提议由戴高乐出面组阁，并获得议会多数的支持。6月1日，戴高乐正式组阁。



随着戴高乐重新上台和第五共和国的建立，法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加速了法国社会的两极化趋势。与此同时，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国际形势的缓和，国际共运中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潮流的兴起，使两党活动的政治舞台发生了重大变化。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法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历程，并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路线和政策：从全面追随苏联转向一定程度的独立思考；从照搬苏联模式到寻求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同社会党的关系则由笼统地谈论统一战线到提出“左翼联盟”战略，以期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发挥第一大党的作用。而社会党面对第五共和国体制改革后的不利环境和党内的分裂，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考虑放弃“第三种势力”政策。由此，两党开始了重新接近的进程。

## 第一节 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 法国社会的两极化趋势

### 一、从多党议会制到半总统半议会制

战后建立的法国第四共和国，基本上保持了战前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格局，其重要特征就是以国民议会为国家权力中心的多党制。在历次选举中，一般都有 20—30 个党派参加竞选，根据选票多少分配议会席位。由于选票分散，任何一个政党都难在议会中形成单独多数。所以，历届政府都由几个政党联合组成。由于参政各党派代表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一旦发生意见分歧，

或是有关政党撤回阁员酿成内阁危机，或是通过不信任案推翻政府。在第四共和国存在的 12 年中，一共出现了 18 位总理和 25 届政府，这还不包括难计其数的内阁改组。在这 25 届政府中，任期最长的仅 16 个月，最短的只有两天。由于各党意见分歧，总理人选很难确定。在两届政府交替之际，常常出现一两个月的权力真空，表面上由议会代行政府职能，实际上国家处于半无政府状态，以致一位外国元首前来谈判，却因为内阁空缺而不得不在巴黎等 3 个星期。

针对原有体制的弊病，戴高乐在自己主持制定的第五共和国宪法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要旨在于扩大总统和行政权力，削弱议会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调整总统、政府和议会的关系，以加强和巩固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总统权力的加强体现在总统的权力、总统的选举等方面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监督遵守宪法。他通过自己的仲裁，保证公共权力的正常活动和国家的持续性。共和国总统是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遵守共同体协定与条约的保证人，也就是拥有国家最重要的权力和做出最后决断的人。总统除了拥有如赦免权、统帅三军权、主持部长会议、任免高级文武官员、颁布法律、负责谈判和签署条约等一般性的传统职权外，还拥有任免总理和批准政府组成的权力、解散议会、举行公民投票的权力以及“根据形势需要采取必要措施的非常权力”。通过改革，戴高乐把组织政府的权力从议会转到总统手中。

从总统的选举看，第四共和国总统由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共同选举产生，因而深受议会的牵制和约束。新宪法则将总统选举改由选举团进行。选举团不仅有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议员，还包括省议会、海外领地议会的议员以及由市议会选出的代表，共 8 万多人。议员只占选举团总数的 1%，这样，总统就较少受到议会的牵制和约束。特别是 1962 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总统由普遍的、直接的选举产生，这样，总统的地位就由人民确认而不是由选民代表认可，

完全摆脱了议会的牵制，大大加强了总统的地位。

总统权力的加强必然是议会权力的削弱，议会权力的削弱表现在议会的职权受到限制。立法权、预算表决权和监督权是议会的三大职权。宪法在赋予议会立法权的同时，对立法内容和范围进行了限制，赋予总统和政府发布命令和制定条例的权限。在财政预算表决权方面，规定如果议会在 70 天内还未通过财政法案，政府有权以发布命令的形式实施财政预算草案中的某些条款，从而大大减少了来自议会的阻力。在对政府进行监督方面，宪法对议会的监督方法和手段作了限制。弹劾是议会对政府监督中最厉害的手段，为了避免第四共和国时期议会动辄利用不信任案和弹劾案推翻政府的情况再度发生，宪法对弹劾动议和信任问题进行了改革。首先，对弹劾动议作了严格的规定，如弹劾动议要有 10% 议员签名才能生效，弹劾动议需要绝对多数票才能通过（只计赞成票，弃权和缺席者视为反对弹劾动议）等。这些极为苛刻的条件迫使议员不敢贸然提出弹劾动议。其次，取消可能导致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的质询，议员如要向政府了解情况，可以用口头或书面的“提问”方式，而提问者对政府的答辩无论满意与否，都不得要求议会对政府进行信任表决。另外，如果政府提出要求，议会应就讨论中的法律草案或政府所能接受的修正案进行“一揽子”投票表决。这种“一揽子”表决程序，避免了议会投信任票问题。最后，当总理就政府的施政纲领、或一项总政策声明、或某项法律草案向议会表示承担责任时，如果 24 小时内无人提出弹劾动议，均视为已获得议会通过。这就把对政府的信任与弹劾挂钩，从而大大增加了推翻政府的难度。

除此之外，宪法还对议会的例会和特别会议、工作程序和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如规定议会全年会期不得超过 6 个月，特别会议必须根据总理或议员多数的要求才能召开，并且不得超过 12 天等等，使议会不能终年开会，为所欲为地干扰政府工作。

可见，第五共和国宪法确立的政治体制，尽管明显地保留着许

多议会制的因素，但由于改革大大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使总统取代国民议会成为权力的源泉和中心，而议会的地位则大大下降，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中独特的半总统半议会制。其目的主要是排挤和削弱议会中进步党派和进步势力的作用，以有利于垄断资本的统治。同时也使争夺总统职位成为法国政党参加选举活动的最重要目标。

## 二、从比例代表制到单记名多数两轮制

在确立了总统、政府和议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后，戴高乐又把选举法的改变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重要手段。尽管第五共和国半总统半议会制已经使权力相当集中，但总统权力的行使和总统地位的巩固不仅要靠总统选举中所形成的总统多数派和立法选举中所形成的议会多数派的支持，而且也要以一个相应的党派格局为前提。而要建立这样的党派格局，选举法的选择至关重要。第四共和国时期基本上实行比例代表制，即每个选区按人口比例分配若干议员席位。参加竞选的各个政党分别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选民按自己的意愿将选票投给某个政党，根据选票多少按比例分配议席。各党得票数与其所拥有的议席比例大致相当。其结果是常常在议会中出现“群雄割据，产相逞威”的局面，无法组成一个稳定的多数派。为了改变原来的议会结构，建立新的议会政治基础，形成一个必要的、稳定的议会多数，克服第四共和国党派林立和变化无常的弊端，使第五共和国党派保持相对的稳定，保证政治体制正常运转，也为了减少左翼政党、特别是法共的议席，戴高乐一反过去坚决抵制多数选举制的态度，决定选择这一制度。戴高乐清醒地认识到，法共拥有  $1/4$  的选民，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如果采用比例代表投票制， $1/4$  的议会席位就会落到一向反对戴高乐和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的法共手中，再加上社会党等其他左翼政党的席位，那将会对戴高乐派构成极大的威胁。如果采用相对多数投票制，即

一轮选举法，也可以推动第五共和国党派格局向两极化和简单化方向发展。但由于法共实力强大，在一次性投票中会取得相当比例的选票和席位，从而构成左翼的中心。相反，成立不久的戴高乐派新党——保卫新共和联盟则可能在一次性投票中受到挫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中右政党有可能乘机发展起来，取代戴派在右翼中的地位。因此，戴高乐决定选择单记名两轮投票制，以减少法共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取胜的机会，然后在第二轮选举中和其他政党组成反对法共联盟，战而胜之。与此同时，新选举法还重新划分了选区，相应地增加了右翼选民较为集中的农村和小市镇议员的数量，处心积虑地取消和合并法共可能取胜的选区，减少法共选民比较集中的大城市议员数量，在许多地区人为地改变了力量对比状况。

根据新的选举制度，每个选区只能选出一名议员。候选人当选在第一轮选举中须获得绝对多数票。由于候选人众多，选票分散，能在第一轮中当选者屈指可数，往往要在第二轮角逐。在第二轮选举中，某一政党的候选人只要取得相对多数，如 30% 即可当选，而其余政党的 70% 的分散选票就全部作废了。从全国范围看，某党就可能以较少的得票数获得较多的议席。这种选举制度迫使一些政党结成选举联盟，在第二轮选举中为使获得较多票数的联盟党当选而撤掉自己的候选人，共同支持一个候选人，以使选票相对集中，赢得更多议席。这种选举制度对于孤立的党是很不利的。在 1958 年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和共产党因对戴高乐政权和第五共和国宪法意见相左而各行其是。法共虽然获得 19.9% 的选票，但由于孤军作战而难以取得相应议席，在国民议会中仅得 10 个席位，占全部议席的 2%，平均每 38 万张选票才能换得一个议席。而根据比例代表制可获议席 87 个。社会党议员 44 名，按比例代表制应为 72 名。新的选举制度使两党议席由 235 个下降到 54 个。戴高乐派在第一轮选举中仅得票 19%，但由于在第二轮选举中同所有

反共力量结成联盟，竟以 26% 的选票获得 198 个议席，占议席总数的 40% 以上<sup>①</sup>。而按比例代表制应为 82 名。实行这种选举法的结果是产生了戴派和拥护戴派的温和派议员组成的强大的多数派，左翼政党则沦为少数派，难以构成对戴高乐政权的威胁。这充分反映了以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取代比例投票制的政治效应。正如法国著名政治学家博拉雷所说：“所有的专家都认为，第五共和国的这次投票旨在孤立共产党和其他投反对票的党。”<sup>②</sup> 戴高乐改革选举制度的目的就在于此。

### 三、从党派林立走向左右两极对抗

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政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党派林立。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法国享有盛名的乳酪有 200 多种，而第四共和国政党数也同法国乳酪不相上下。这些党派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在实行比例选举的情况下，很多都能够进入议会，但没有一个能够赢得单独多数，只得联合起来。所以，第四共和国的历届政府往往是由“第三种势力”各党派勉强拚凑的结果。这种政党联盟和联合政府只是执政党在争夺权力和瓜分肥缺中暂时妥协的产物，无论哪个党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根本立场。因此，各个政党之间的观点分歧必然直接影响内阁的组成、政策的制定和政府的命运，随着政局的发展，各政党不时调整政策更造成政府更迭频繁，加深了政局动荡。

单记名多数两轮制的实行，特别是 1962 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总统选举也使用这一选举制度，并规定第二轮选举只能在第一轮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之间进行。这就从根本上推动了原有政党格局的改变。一些政党为了能进入第二轮，往往在第一轮选举时

<sup>①</sup> 《1940 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第 363—364 页。

<sup>②</sup> 《今日法国政党》第 6 页。

就达成竞选协议或提出共同候选人。这种做法在客观上促使各个派别纷纷向左翼或右翼集结，使党派数量减少，中间派势力削弱，形成对立的两大阵营。而在竞选中结成的选举联盟，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选举结束而消失。它们往往维持下来，改头换面成为政党联盟，在第五共和国议会和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促进了第五共和国党派格局朝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容易在议会中形成支持政府的多数派。

1962年11月的议会选举，充分体现了两极化的特点。在这次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各个党派为了加强自己在议会的影响，纷纷结成选举联盟。执政的保卫新共和联盟和劳工民主联盟从一开始就结成选举联盟。而法共和社会党鉴于上次选举的教训，也在反对戴高乐政权和反对总统由普选产生的共识下，达成了在第二轮选举中互相让票的协议。在第一轮投票中，右翼两党联盟共获得600万张选票，而左翼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则获得630万张选票，大体上势均力敌。在近1800万张选票中，2/3的选票集中在右翼和左翼政党联盟。在第二轮投票中，由于执行了让票协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两极分化现象。两轮投票的结果表明，戴高乐派夺得233席，构成了多数派的核心。法共和社会党获得107席，比上届议会增加了一倍，左右阵线更加分明。这预示着未来法国政党格局的主要特征。

从1962年到1969年，在多数两轮投票制的作用下，每经过一次选举，法国党派都要重新分化和组合，而每次变动都是中间派政党势力的削弱和瓦解。这些人一部分转向右翼，成为戴高乐的支持者；另一部分则向左靠，参加了左翼反对派，使左右翼两大派力量增加，加速了法国政党格局由繁杂林立向两极化转变的进程。

由此可见，“第五共和国制度是一个有两个主要的‘极’的制度。每一个‘极’都由好几个政党组成。这些政党为了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并与作为这一‘极’延伸的议会多数派一起执政而不得不互

相谅解。在这两个‘极’之间，中间派的第三种力量是注定要分裂的，大部分将加入保守派营垒，少数人将被左派吸引过去”<sup>①</sup>。

第五共和国时期两极化的结果是法国政党数量锐减，形成了四大政党(共产党、社会党、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争雄，左右两大派对峙的新的政党组合。这种两军对垒的局势为左翼联合创造了条件。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法共“自 1958 年起，特别是从 1962 年开始，把围绕一项政府共同施政纲领建立左翼政党联盟作为中心任务来对待”<sup>②</sup>。

## 第二节 社会党的在野与联盟政策的变化

### 一、社会党从参政到在野后政策的变化

第五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法国从政党繁杂林立、政府更迭频繁的多党议会制到半总统半议会制的政治体制的转变。政治环境的这种变化，不仅使法共遭到了沉重打击，也使社会党奉行“第三种势力”政策的社会政治条件遭到了破坏。在第四共和国政治体制下形成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政治力量格局，曾使社会党的“第三种势力”政策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它凭借同各种中间力量不同形式的组合，在议会和政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第四共和国的主要执政党或参政党。在第一届国民议会期间(1946—1951)，社会党就因同其他政党在某一问题上意见分歧而宣布退出政府，导致六届政府垮台。

① 《今日法国政党》第 16 页。

② 《法共二十五次政治报告》，《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第 281 页。



“第五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社会党人参政的机会和必要性。1958年制定的宪法大大地削弱了议会在组成和支持政府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到了1962年,由于宪法规定通过普选进行总统选举而进一步削弱了议会的权力……这样,社会党借以组成和拆散政府、并取得部长肥缺和施加影响的议会环境便遭到破坏。由于议会已不再起经纪人的作用,社会党议员便陷于孤立,一直处于反对党的地位”<sup>①</sup>,议员人数大大减少。

从社会党自身看,由于其领导人摩勒在1956年执政后推行殖民政策,1958年又支持戴高乐上台,引起了党内相当多党员的不满,导致了社会党的分裂,以阿·萨瓦里等为首的少数派退出社会党后成立了独立社会党。1960年4月,因不同意该党的右倾化,又有一些著名人士退党。后来,这些人同独立社会党一起,组成了统一社会党。多次分裂大大削弱了社会党的力量,党员人数从1946年的40多万减少到1962年的10万左右。社会党力量的衰减和两极化趋势的发展,迫使它不得不改变对共产党的态度,从左边寻找盟友。此外,1959年,社会党因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上与戴高乐发生分歧而退出政府,总书记摩勒不再担任国务部长。1962年,社会党从1958年以后“建设性反对派的立场”转向坚决地反对戴高乐政权,由此与共产党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在1962年国民议会选举前夕,摩勒号召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临时选举联盟,如果戴高乐派反对他当选的话,则在第二轮投共产党人的票。尽管他宣称:“这种联盟只是为了反对戴高乐的防御性联盟”,但毕竟在同共产党联合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法共对社会党的态度表示欢迎,同时也号召自己的选民在共产党的候选人没有希望获胜的情况下,投其他左翼候选人的票,并在许多省与社会党签订了竞选协议。统一行动、签订协议和相互让票的策略,使法

<sup>①</sup> 《西欧社会民主党》第19—20页。

共的议席由 10 席增加到 41 席,社会党议席由 43 席增加到 67 席,大大加强了两党在议会中的影响。两党走向联盟,一方面是由于面临强大的政敌,迫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也深刻说明两大党在重新考虑调整政治战略。这种战略调整在数年后就显示出其巨大意义。

1962 年的议会选举,无论对社会党的政治演变,还是对它同共产党的关系,都是一个转折点,它促使社会党内部开始讨论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并形成了两种主张。以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德费尔为首的一派主张建立类似第四共和国时期的第三种势力联盟;以摩勒为首的一派则主张同法共进行谨慎的“意识形态对话”,探讨合作的可能性。1963 年 5 月,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策略问题决议指出:“在目前选票分配的情况下,民主左翼如果得不到共产党群众的支持,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纲领。”<sup>①</sup>

根据这一分析,社会党一方面继续反对同共产党签订任何政治协议,另一方面又不排除同共产党采取共同的策略性行动的可能性。社会党认为,在戴高乐主义成为直接危害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法国民主,“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可能不得不进行防御性的共同行动。”<sup>②</sup>

这说明,社会党开始放弃把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量齐观的“第三种势力”政策,寻求同共产党接近。

1963 年 9 月,摩勒在社会党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建议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就双方有分歧的问题进行讨论。1963 年 10 月底,摩勒率领法国社会党代表团访问苏联,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公报,呼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

共产党热情欢迎社会党的这一积极变化。法共副书记罗歇

<sup>①</sup> 《社会主义评论》1963 年第 165 期第 211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116 期第 322 页。

1963年2月在中央全会致闭幕词时，以赞赏的口气引用了摩勒在前不久的一段讲话：“我们社会党人应该重申：必须有一天重新实现团结，而且必须做到。如果我们固执下去，就有受右派利用，并使右派获胜的危险”。“共产党人的战争可以避免的新论点具有使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彼此靠拢的性质。”并说：“我们对这些讲话感到满意。因为，我们共产党人也认为：愈早实现团结，就愈有利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sup>①</sup>。社会党政策的变化使两党的合作前景进一步明朗化。

## 二、大联盟计划的破产与左翼统一候选人的产生

然而，这时社会党的转变只是初步的。他们一方面意识到在新形势下，没有共产党的支持和合作，绝对不能形成议会多数，夺取政权。另一方面，他们对第三种势力的留恋也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同共产党进行有限合作的同时，社会党仍在试图恢复同中间力量联盟，害怕同共产党联盟会有损于自己力量的发展。所以，1963年底，主张以社会党和中间力量联盟为基础参加1965年总统选举的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德费尔被社会党提名为正式的总统候选人。他提出了建立一个不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由社会党、激进党、人民共和党组成的“大联盟计划”。他在竞选演说中说：在他看来，共产党候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有机会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既然如此，那么，他们即使没有热情也还是应当投票支持社会党的候选人，因为这样做坏处最小。因此，他提出“左翼一个候选人”的主张，想得到共产党的选票。但他同时又明确宣布：“我决不会同共产党谈判，不会和他们协商，也决不接受共同纲领。”<sup>②</sup>

他本以为法共会采取“不得已求其次”的策略，支持自己当候

<sup>①</sup> 《法国共产党论点 摘录》第 66 页。

<sup>②</sup> 《1940 年 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第 540 页

选人，因而决定不与法共事先达成协议，以便争取中间派选民。法共对德费尔的傲慢态度十分恼怒，认为这一计划带有反共色彩，声明只支持一个预先就共同纲领达成协议的非共产党候选人。摩勒则认为这是第三种势力政策的翻版，他从反教权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同人民共和党联盟。人民共和党则拒绝在为支持德费尔竞选而成立的任何组织名称上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并要求德费尔完全断绝与共产党的一切联系。由于遭到来自三方面的反对，德费尔只好放弃大联盟计划，于 1965 年 6 月宣布退出竞选。德费尔的失败，至少证明了一个关键性的政治事实，即社会党和中间派政党在非宗教化、与法共关系、内政和外交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是无法克服的。如果说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社会党还能同中间派政党暂时达成协议、联合执政的话，那么，在法国政治两极化的今天，想在中间派中寻找盟友是不会有结果的。从这以后，对付戴高乐的一个有效的竞选人只能以左派为基础。

在同德费尔建立“第三种势力联盟”的企图进行斗争的同时，法共在一些地方成功地与社会党结成了竞选联盟。德费尔退出竞选后，法共为了避免中断与社会党人的合作进程，采取不提出自己候选人的策略，以便最大程度地促进能够最直接地使联合成为现实的各种因素。法共认为，推翻戴高乐政权需要远远超过通常投共产党选票的 1/5 人口的广泛阵线，这样一个广泛阵线只能提出一名总统候选人。

那么，谁将担当左翼的统一候选人呢？1965 年 9 月 9 日，共和制度大会党主席密特朗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提出建立将人民共和党排除在外的“小联盟”计划，主张把共产党以外的左翼力量联合起来。此举得到左翼政党的积极响应。9 月 10 日，社会党、激进党和共和制度大会党组成“社会民主左翼联盟”，推举密特朗为主席，并作为联盟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

密特朗是法国政坛上颇为活跃的政治家。二战期间曾参加抵

抗运动，战后在第四共和国的十一届政府中，先后担任过海外部长、司法部长等职，1958年因反对戴高乐上台而成为坚定的反对派。密特朗从反对个人专权、争取社会民主开始，吸收了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主张，政治立场逐渐左转。他领导的共和制度大会党作为左翼政党，影响不断扩大。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建立后，在参加联盟的各党支持下，密特朗公布了以反对戴高乐政权，进行有利于劳动人民的社会民主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竞选纲领，并寻求共产党的支持。对此，法共副书记罗歇表示：“我们不想提候选人，假设左翼提出一个共同候选人也不是不现实的”，“我们不反对密特朗，尽管我们政治局里有几位认为他是第四共和国的政客，认为他老是念念不忘‘第三种力量’，但我们不会忘记，自从1958年以来，他一直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戴高乐的个人专权。”<sup>①</sup>

密特朗是非共产党左翼中最早接受和承认两极化的现实，并以此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积极倡导左翼联合的法国政治家。早在1963年密特朗就说过：“我对于共产党人的态度很简单：举凡有助于反对趋向个人专权和建立一党专政的事都是好的。四、五百万选民，普通老百姓和工人投共产党的票，忽视他们的支持和他们的选票将是不可饶恕的，或者说是极为愚蠢的。我始终反对那些想把共产党人封锁在政治贫民窟里，并且把他们当做二等公民看待的人。”<sup>②</sup>9月21日，密特朗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虽然没有谈判，也不存在共同纲领，我将向共产党提供一切情况”，向法共伸出了友善的手。尽管密特朗为了不得罪其他党派和争取中间派的选票，拒绝了共产党要求左翼各派力量制定一个共同纲领的条件，但鉴于密特朗的基本主张“在许多主要问题上同我们党历来的主张和建议是一致的”，法共也不再坚持过去以制定共同纲领为前提的僵硬

① 弗朗兹—奥利维埃·吉埃斯贝尔：《密特朗传》第262页。

② 麦克希恩：《弗期索瓦·密特朗传》第89页。

做法。9月23日,法共中央正式宣布支持密特朗为“左翼的共同候选人”。法共的这一决定,得到所有政治评论家和公众的广泛赞赏。

左翼的联合行动,使密特朗在12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第一轮便得票31.7%,成功地阻止了戴高乐不经二轮选举就入主爱丽舍宫的计划,迫使戴高乐因得不到绝对多数票而参加第二轮角逐。在第二轮选举中,密特朗得票44.8%,获得了第五共和国以来左翼最好的选举成果。密特朗虽败于戴高乐,但由此获得了较高的声望,成为公认的法国左翼领袖。而统一候选人取得的可喜成绩,也为左翼联合取胜展示了光明的前景,推动社会党摆脱“第三种势力”的诱惑,比较坚定地走上了左翼联合的道路。1966年12月,摩勒在社会民主左翼联盟执委会上批驳了同中间派联合的主张。他说:“同中间派进行磋商,就会使我们冒同共产党绝交的风险。不能这样做。”<sup>①</sup>

### 第三节 法共建立左翼联盟的努力与 《共同宣言》的发表

#### 一、国际形势的缓和与国际共运新变化对法共的影响

50年代后期,在赫鲁晓夫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思想指导下,苏联频频向西方发动和平攻势,使东西方关系开始松动。以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奠定基础的缓和,标志着国际局势发生转折的开始。此后,尽管两大军事集团继续对立,

<sup>①</sup> 《密特朗传》第301页。

不时出现紧张和危机，但作为总的发展趋势，战后形成的冷战局面，出现了解冻的趋势。

随着美苏关系的松动，西欧国家对苏联的政策也作了一定的调整。特别是戴高乐奉行的独立外交政策，导致了法苏关系的改善，这些都为法共的探索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

从国际共运方面看，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夺取政权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形式的多样性，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通过掌握议会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思想，以及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打破了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神话，使各国共产党从对苏联模式的盲目崇拜中警醒，极大地促进了各党的思想解放。二十大后，各国共产党从无条件服从苏共的挫折中吸取教训，破除对苏联的迷信，掀起了独立自主地探索与苏联模式不同的、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潮。这种探索尽管由于波匈事件一度受到影响，但总的来说，这股潮流到 50 年代末已经势不可挡。

在 60 年代初的中苏大论战中，中国共产党不屈服于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打破了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一统天下，为各国党树立了反对“老子党”的榜样，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共运中独立自主倾向的发展。

在中苏大论战的影响下，“欧洲共产党人对许多过去一直当作禁区的问题开始了一次全面的，在那以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讨论”<sup>①</sup>，提出了国际共运要不要有一个领导中心，走向和建设社会主义是否只有一个模式等问题。特别是意共以“结构改革”为中心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意共八大明确指出：“机械地移植苏联的伟大经验，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证明是有害的。”<sup>②</sup> 在 1960 年的九大上，意共公开

① 《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挑战》第 129 页。

② 《意共八大文件汇编》第 48 页。

声明：“容许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多党制”，并重申：“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式将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有可能通过民主与和平道路向社会主义前进”，“避免武装起义和内战的残酷性”<sup>①</sup>，提出各国共产党都应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意共的这些理论探索，对法共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于同社会党的关系，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指出，由于许多社会党人赞成进行积极的斗争来反对战争危险和军国主义，主张同社会主义各国接近，因此共产党人应该采取同社会民主党人接近和合作的方针。1960年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声明指出：生活的进程把许多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些问题不仅要求所有工人阶级队伍接近和合作，而且创造了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迫切要求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国内和国际采取联合行动。”<sup>②</sup>这就为法共采取主动行动寻求同社会党的合作开了绿灯。

正是在国内政治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形势出现缓和和二十大后国际共运独立自主潮流的推动下，西欧共产党中与苏共关系最为密切，对苏联模式最为崇拜的法共，在1958年后，也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问题，走上了缓慢而谨慎的探索之路。难怪法国学者说：“法共意识形态转变的两个最伟大的推动者既不是多列士，也不是他的继承人罗歇，而是赫鲁晓夫和戴高乐。”<sup>③</sup>

1959年和1961年，法共分别召开了十五大和十六大，对当时的国内形势作了分析，并对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问题有了新认识，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主要内容是：

1. 对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提法。法共认为，“只有在

① 《意大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提纲》第12、13、21页。

② 《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文集》第36页。

③ 让·杜尚：《法国左翼》第337—338页。



结束现社会种种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中，才能消除人民群众的日益贫困化，使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得到满足。”因此，“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根据各国人民的特点和民族传统，根据历史条件和国际规模上阶级力量的对比，过渡的形式可以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法国共产党丝毫没有放弃通过和平途径，包括利用议会民主制度，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希望”<sup>①</sup>。然而，由于戴高乐建立了代表大银行家和垄断资本家的个人专权制度，“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取得任何进步的首要条件，就是取消垄断资本家强加于人的个人专权制度”，恢复和革新民主制，只有这样，才能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法共十五大指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的危机更加深了。“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扩大了自己的基地。社会主义发射出前所未有的光芒，树立了空前的威望。对于至今还处于资本主义桎梏下的国家来说，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加了。因此，采取和平途径来进行革命就成为可能的了。”<sup>②</sup>法共认为：“像我们这样具有强大的议会传统的国家，有可能采取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所组成的民主议会，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议会制的途径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特殊情况。在议会斗争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强大人民运动相结合的前提下，将议会从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转变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这一可能性在我们的时代里并非不存在。”<sup>③</sup>

但法共在承认目前具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仍然认为，“资产阶级永远不会自动放弃政权。如果资产阶级在革命期间没有使用暴力，那不是因为它本性改变了和变得更人道、更和善；这纯

① 《法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第 89—90 页。

② 同上，第 48 页。

③ 同上。

粹是因为它感到占压倒优势的力量反对它”<sup>①</sup>。“即使议会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被用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一过渡仍然将会是一个革命的大变化。它将永远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先锋队领导的群众在议会以外的强大运动的结果。”因此，法共认为：虽然和平过渡“是可能的，但并不是肯定的。无论是我们历次代表大会的提纲，还是 1957 年的宣言，都没有把和平道路说成是唯一考虑的道路。工人阶级应该永远预见到资产阶级的态度将迫使它采取最尖锐的斗争形式的状况”<sup>②</sup>。这说明，当时法共对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能否实现是持怀疑态度的。

1961 年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法共对和平过渡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起来。法共十六大指出：“由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剧，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加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正在加大，而且将继续加大”<sup>③</sup>。为了说明法共主张和平过渡的立场，法共总书记罗歇在 1963 年 3 月撰文驳斥了各种反共势力散布的“共产党人毫无例外地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和内战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谬论。罗歇说：“对共产党人来说，暴力本身不仅不是目的，相反，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一切劳动者都对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社会主义感兴趣。和平途径能够避免混乱和生产组织的破坏”；“暴力的使用从来不是劳动者选择的结果，而只是取决于剥削者对人民意志的反抗程度以及他们采取的斗争形式”<sup>④</sup>。法共指出：“我们法国共产党人要坚决地充分利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深信，这是完全符合我国人

① 《法共文件选集》第 258 页。

② 同上，第 289 页。

③ 《法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第 118 页。

④ 罗歇：《土地上的人们》第 290 页。

民和民族本身的愿望的”<sup>①</sup>。

在 1964 年召开的十七大和 1967 年的十八大上,法共都强调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并提出,法共的“全部活动旨在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有利条件”<sup>②</sup>。

与此同时,法共也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和平过渡中的作用。法共认为,“政权和平地转入工人阶级手中必然是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变动。不可能像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不知不觉地从资本主义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过渡始终是一种革命的飞跃。这种飞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结果”<sup>③</sup>;“这必然意味着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然意味着大生产工具的社会主义化”<sup>④</sup>。法共指出:“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能提供的以‘最小的代价’和平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同工人阶级可能被迫采取的非和平手段丝毫不矛盾,也并不取消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建立全体劳动人民最广泛的民主。取消旧的国家机器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如果逃避这点就必然堕入机会主义。这点对过渡到社会主义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种过渡,虽然始终需要激烈的斗争,但并不意味着发生内战”<sup>⑤</sup>。因此,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与主张取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资本主义会逐渐演变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sup>⑥</sup>。

① 《法国共产党论点摘录》(1960—1963)第 29 页。

②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 182 页。

③ 《法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第 48 页。

④ 《法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第 117 页。

⑤ 《法国共产党论点摘录》第 38、40 页。

⑥ 《法国共产党文件选集》(上)第 289 页。

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前提下，法共也力图寻求适合法国特点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法共引用列宁的话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sup>①</sup>。法共总书记罗歇在引用这段话后指出：自从这几行字写过之后，实际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同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可以使人预计到一些新的形式。“我们坚信，在新的国际力量对比之下，今后有可能在法国考虑不那么粗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至少是缩短无产阶级专政的时间”<sup>②</sup>。法共十七大在重申“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所永远必须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可以根据历史条件和国家特点而变化。对法国来说，鉴于民主传统和当前条件，它可以具有新的形式，即“具有暂时性，不太粗暴，期限较短”<sup>③</sup>，以此来与苏联模式相区别。

法共对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新认识。长期以来，法共与整个国际共运一样，在对民主的认识上存在着“左”的倾向，其主要表现就是把争取民主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割裂开来，似乎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强调民主就会使人们脱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或者表现为轻视民主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意义，批判所谓“民主幻想”，例如 1956 年波匈事件后法共就把反对“民主幻想”放在首位；或者表现为把当前争取民主的斗争与未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截然分开，使群众看不到社会主

① 《列宁全集》第 22 卷第 64—65 页。

② 《法国共产党：阶段与问题》第 512 页。

③ 《法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第 46 页。

义前途，例如在冷战时期。这两种偏向都不利于法共动员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随着戴高乐上台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和 60 年代国际共运中独立自主潮流的兴起，法共在承认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同时，对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多列士在法共十五大报告中谈到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时说：“马克思主义者一向斥责所谓提出民主要求会使群众产生种种‘幻想’的观点，指出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宗派主义态度。与此相反，争取民主的斗争使无产阶级获得权威和力量，能够把最广泛的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sup>①</sup>。法共认为，“在我们的时代里，民主变革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再有漫长的历史间隔了。工人阶级对于人民政治斗争的领导，缩短了两个阶段之间的距离，并把他们衔接起来。”因此，必须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寓于争取民主和民主制不断进步的斗争之中，寓于争取事态发展向法国提出的重大问题之中”。但这时，法共并未将民主与未来社会主义目标联系起来，仍坚持认为：“不论由于群众运动使民主变得多么广泛，民主本身并不包含社会主义。然而，民主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获得广泛的开展，也可以对经济发生影响并推动对它的改造”<sup>②</sup>。也就是说，仅仅把民主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而不是它的目标。

法共十六大进一步把恢复与革新民主制作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提出“在一定条件下，争取一般民主权利的斗争，在客观上可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争取民主的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不可分割的部分”。法共认为：“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共产党可以密切同群众的关系，帮助群众提高政治觉悟，帮助他们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这一革命所要求的任务”；从而“能够大大增加后一阶段和

① 《法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第 47 页。

② 《法共十六大文件选辑》第 64 页。

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机会”<sup>①</sup>。这样,法共就把争取民主的斗争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1964年召开的法共十七大是法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深受苏联影响和赏识的、领导法共30多年的多列士因重病离开了领导岗位,罗歇当选为总书记,实行比较民主和开放的政策,为法共实现变革提供了条件。会议通过的决议“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摒弃了一党制的观点”,用“真正的民主”代替“恢复和革新民主制度”,以表示法共所主张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权。“对一党制理论的批判最终会产生一些和苏联制度根本不同的东西”;“既然一党制不存在了,就必然有多党主义,既然有多党主义,就必然有公众自由”<sup>②</sup>。

从那时起,法共初步提出了与苏联模式不同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并缓慢地走上了与苏联拉开距离、谨慎地对苏联违反民主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的道路。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突然下台后,法共特意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要求苏共澄清赫鲁晓夫是怎样被解职的。法共认为,通过政变的做法决不能被认为是民主的典范。基于这些事实,法共决定一方面不要过分批评苏联;另一方面,对苏联模式的谈论越来越淡薄,对苏联经验的议论也不多了。

此后不久,法共作家阿拉贡在《人道报》正式发表文章,为苏联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希尼亚维斯基和达尼尔(他俩因撰写和在西方发表自己的著作受到指控,多年被监禁在集中营里)进行辩护,批评了苏联侵犯民主与自由的做法。这是法共与苏共之间发生的第一次明显的意见分歧。

1967年1月举行的法共十八大,重申不能把“一党制作为社

<sup>①</sup> 《法共十六大文件选辑》第66页。

<sup>②</sup> 贝·瓦利:《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第70页。

会主义革命的必需条件”，对民主和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法共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即从把民主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发展到开始将它纳入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中，充实和丰富了民主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内容。

## 二、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建立左翼联盟

如前所述，第五共和国确立的政治制度对法共比其他政党更为不利。为了改变选票多、议席少，难以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状况，就必须与其他政党结成联盟，而社会党则是法共争取的主要对象。实际上，1953年后，寻求与社会党的统一行动，一直是法共理论和实践的中心问题。但由于国际形势的紧张和社会党的抵制，收效甚微。1958年后，法共接受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以及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使两党的分歧进一步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法共将对戴高乐政权的分析与通过和平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考结合起来，从理论上阐述了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一步坚定了与社会党实现联合的信心。

法共认为，1958年戴高乐上台后建立的个人专权制度，是为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当时法国的形势类似30年代中期。为了打倒个人专权制度，阻止法西斯的复活，单靠共产党不行，单靠社会党也不行，必须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联盟。联盟问题是反对戴高乐主义斗争的核心。只有建立广泛的联盟和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统一斗争，才能恢复和革新民主，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法共十五大指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要求工人阶级、农民群众以及城市中等阶级向大垄断资本和反对派展开广泛的斗争，要求实现人民力量的广泛团结”；“法国的民主和民族复兴，跟走向社会主义一样，不可能是一个党的事情。这种复兴要求工人阶级、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城市中等阶级之间建立忠实而持

久的联盟。这种复兴以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之间建立联盟为前提”<sup>①</sup>。因此，法共十五大提出了“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的团结”的口号。

法共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因为工人阶级在团结一切民主力量方面应起决定作用，所以，工人阶级队伍本身的团结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因此，我党一向十分关心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结成统一战线”<sup>②</sup>。法共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统一行动”。

法共副书记罗歇在 1963 年 10 月中央全会上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过渡要求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具有很大的优势力量。为了走向社会主义，必须争取千百万劳动人民支持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结成工人阶级、农民和一切关心民主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战斗联盟”；“只有当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拥有足以制止大资产阶级诉诸暴力和内战的强大优势力量时，才会出现和平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sup>③</sup>

两党合作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有实现联合的可能性呢？法共认为，在所有的政党中，“正是共产党与社会党共同点最多，根本分歧最少”，“在现在的根本问题上，包括国际上争取和平的问题上，社会党和共产党间存在着共同行动的真实基础”<sup>④</sup>。罗歇说：“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劳动者已经手挽手地进行着争取工人权利和反对加强个人专权的斗争。两党对于采取某些反对垄断资本，反对戴高乐核打击力量，保卫学校和国家非教会化的措施的必要

① 《法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第 48、88 页。

② 《法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第 67 页。

③ 《法国共产党论点摘录》第 30 页。

④ 同上，第 58—60 页。



性，认识是接近或一致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对社会主义有共同的愿望。因此，法共认为：“同社会党的合作不仅在反对个人专权，争取真正民主制度的斗争中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而且在以后，考虑到我们时代的一切条件和法国的民主传统，在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也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法共还说：“我们甚至考虑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必要合作”<sup>①</sup>，把与社会党的联盟和合作同实现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从当时两党的力量对比看，共产党无论从组织和思想的统一程度，还是党员和选票数都大大优于社会党。在这种情况下实现联合，必然对共产党有利。摆脱孤立的迫切愿望和力量对比的优势地位使共产党成为联合的积极倡导者。他们一方面从理论上论证在反对戴高乐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斗争中同社会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在“可为各民主党派接受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现联合。早在 1959 年的十五大上，法共就建议，“必须制定一个革新共和制度和国民生活的纲领，作为工人阶级、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中等阶级之间联盟的具体纲领，作为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之间联盟的具体纲领”；“我们所主张的联盟，应该以由大家讨论，大家接受的民主和民族革新的纲领为基础”<sup>②</sup>。

1962 年后，社会党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据此，法共在 1963 年 10 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同社会党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建立左翼联盟的建议：“我们主张由各民主党派和团体共同制定一个纲领”；“这个纲领包括取消个人专权，进行旨在限制垄

<sup>①</sup> 《法国共产党论点摘录》第 58—60 页。

<sup>②</sup> 《法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第 41、87 页。

断组织的力量和建立新民主的深刻的经济民主改革”<sup>①</sup>。法共指出，如果纲领目前能给各方带来好处，就可为“用和平的方法对社会进行更全面的改革打开道路”；“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纲领，但是其所包含的民主改革的实现可以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sup>②</sup>。

为了能够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和谅解，法共多次重申了“求同存异”的口号。法共认为，尽管社会党劳动者和共产党劳动者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分歧，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有着反对大资本家和反动势力的共同利益。法共认为，“假如我们在一切问题上都意见一致我们就不谈统一战线了。我们谈统一战线，恰恰是因为有分歧。但在有这些分歧的同时，却有着共同点”<sup>③</sup>。在这些共同方面，共产党和社会党可以达成协议来采取行动。为此，“法共要比以往更加努力消除分歧的东西，保留一致的东西，同时，在表达总政策时完全消除任何狭隘性”。“无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首先重要的是，使我们党的政策确实成为完全符合人民和民族利益的积极政策”<sup>④</sup>。法共还修改了过去的一些提法，如承认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暂时性等，努力缩小两党的分歧，表现出极大的诚意。针对社会党认为共产党主张“一党制”和“无条件听从苏共”是联合的障碍的说法，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在 1963 年 5 月的中央全会上明确表示：“‘唯一政党’的观点——即法共是使法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政治力量——是错误的斯大林主义”<sup>⑤</sup>。明确承认社会主义也将存在多党制，这是法共立场的一个重要变化。

① 《法国共产党论点摘录》第 37 页。

② 同上，第 36 页。

③ 《法共十六大文件》第 153 页。

④ 《法国共产党：阶段与问题》第 512 页。

⑤ 《人道报》1963 年 5 月 14 日。

1964 年召开的法共十七大被称为是“大力宣传共同纲领的大会”。会上,法共把建立真正民主和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并提出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是“在符合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共同纲领下,实现同社会党的联合”、“大大加强和扩大群众运动。运动的力量来自工人阶级的团结,来自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行动的一致。这种一致,将远远超过 1934 年和 1945 年”。法共认为:“共产党和社会党人一起致力于联合所有的民主和民族力量,就能够消除个人专权,建立真正的民主并走向社会主义”<sup>①</sup>。可见,法共是把争取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社会党建立联盟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步骤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共更多地强调和宣传两党之间的一致性,而很少根据社会党在社会结构中的特定地位及其基本的战略方针来揭示它与共产党的本质区别。这样做固然有助于促进两党的接近和达成谅解,但也为后来社会党利用共产党急于实现联合的愿望及其方法上的弱点,达到削弱法共、壮大自己的目的埋下了隐患。

### 三、从两党竞选协议的签订到《共同宣言》的发表

1965 年,两党在竞选总统的联合行动中取得的成绩,使法共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在 1966 年 1 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罗歇对选举作了总结,提出了两点,即围绕纲领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和共同纲领的制定是未来时期的主要问题。法共力图按照自己的意图把“统一候选人资格”的概念发展为制定作为变革手段的共同纲领,以与社会党结成持久的联盟。为了促使两党尽早实现谅解并达成共同纲领,法共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自己的形象,1965—1967 年党内出现了民主讨论和理论探索比较活跃的时期。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洛德·维拉尔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法共时说:“法国共产党终于从

<sup>①</sup> 《法国共产党:阶段与问题》第 541—543 页。

长期教条主义的昏睡中苏醒过来，开始进行对话和思想交锋，加深了党对本国实际和社会现实的分析。”<sup>①</sup>

1965年，法共出版了政治局委员加罗迪的著作《从革出教门到对话》，主张实行向天主教徒“伸手”的政策。1966年，在法共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主持下，出版了《法国走向社会主义》一书，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近几年来法共的探索和实践。在此基础上，法共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探讨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战略策略问题。

一次会议是1966年3月举行的专门讨论思想和文化问题的阿尔让特伊中央全会。会议允许各种不同观点交流和讨论，要求尊重每个人的意见，反对限制研究人员进行探索的权利。会议决议说：“科学的发展要求争论和探讨。共产党既不想妨碍这些争论，也不试图规定真理的优先权。没有各种倾向的争论，艺术创造是不可想象的。”<sup>②</sup> 这次会议的内容及其产生的民主讨论气氛，表明法共对民主认识和实践的进步，为1970年提出对官方哲学的批判和70年代形成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理论打下了思想基础。

另一次会议是同年5月召开的历时三天的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会议。会上，法共经济学家分析和讨论了法国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从国家和垄断资本日益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以及各个不同阶级和阶层地位的变化分析了法国的现实，“用一种更严谨、更多样化的关于资本运动的分析，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代替了以普遍危机、贫困化和军事化为主要内容的对法国资本主义分析的旧的理论模式”<sup>③</sup>，为法共建立反对垄断资本的广泛联盟，通过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

① 克洛德·维拉尔：《法国社会主义简史》第154页。

②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181—182页。

③ 《法国共产党：阶段与问题》第521—522页。

从社会党方面看，1965年总统选举后，社会党继续推进非共产党左翼的团结。在筹备1967年新的立法选举过程中，支持成立了由密特朗任主席的“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密特朗促成联盟中各党达成协议，由联盟在每个选区提出统一的候选人名单。1966年7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详细列举了非共产党左翼在政治体制、自由、经济和社会政策、对外政策等各个主要问题上的抉择。密特朗认为，联盟和中间派政党毫无和解和妥协的余地，因而拒绝了部分人向中间派开放的要求，确定了左翼联合的策略。

根据这个左翼联合策略，密特朗表示了要同法共谈判的意向。他的建议立即得到法共的积极响应。

1966年10月，罗歇写给密特朗一封信，要求他同意在第二轮选举中两党互相支持，得到了密特朗的赞同。经过多次会谈，罗歇同密特朗在12月20日就1967年的立法选举问题签署了一项竞选协议，规定：在第二轮选举时，所有左翼党派的成员应投票支持第一轮获票最多的左翼候选人。竞选协议还提出要修改宪法，废除有利于总统个人专权的条款，实行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给予地方自治和罢工权，承认企业的工会组织。在经济领域，规定将军备工业和银行收归国有，对国有化企业实行民主领导，进行税收改革，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等。协议还提到在选举结束后，双方继续协商和合作。这是1946年以来，共产党和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其他左翼政党签署的第一个选举协议。

1967年1月举行的法共十八大，批准了这一协议，并以1966年党的两次会议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了更为详细的建立争取变革的左翼联盟政策，更清楚地表达了群众要求统一的愿望，强调左翼各党的共同利益，强调了重新回到法国政治生活中去的前景。

实行选举联盟的结果,使法共在议会选举中获得 22.5% 的选票,议席由 41 席增加到 72 席,社会民主左翼联盟获得 18.7% 的选票,议席由 89 席增加到 120 席,左翼力量的选票和议席有明显的增加,但离绝对多数还有较大的距离。为了协调左翼政党在议会中的行动,法共和社会民主左翼联盟的代表于 1967 年 5 月 11 日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定期举行会谈,以寻找统一行动的基础。对此,社会党内部出现了分歧,德费尔坚持在与共产党联合之前必须加速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左翼力量,迫使共产党承认并被迫相从;摩勒主张慢慢来。而法共领导人则认为,如果实现联合付出的代价合理的话,他们就下决心加入左翼政府。为此,法共代表提议制定一个共同施政纲领。在 6 月 15 日的会晤中,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工作小组,以便澄清经济、社会和国际政策等问题的基本观点。这个工作小组于 1967 年底起草了《法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共同宣言》,并于 1968 年 2 月公布。这项协议除了阐明两党共同的政策目标,肯定了 1967 年底竞选协议中提出的共同主张外,还明确记载了双方的分歧点,如在国有化问题上,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同意对商业银行、军火工业和宇航工业实行国有化,而共产党则主张实行更广泛的国有化计划,其中包括所有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电子、汽车、石油、核能、化学和钢铁等工业部门;在对外政策上,联盟赞成法国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和英国加入欧共体,主张建立欧洲共同市场,是强烈的欧洲派;而法共则同苏联站在一起,反对“旨在加强西方反共阵营”的北约组织和实现欧洲一体化。共同声明还宣布,双方同意就“排除各种有碍左派政府实现其纲领的企图所采取的措施”进行进一步的讨论。这就具体开辟了围绕共同纲领进行谈判的道路,迈出了达成共同纲领的第一步。

《共同宣言》发表后,得到共产党和其他左派群众大多数的积极支持,并进一步推动了工会的统一行动。“1968 年 5 月 1 日,工

人阶级斗争达到了这样的水平：许多年来，第一次迫使政府无法禁止在巴黎举行传统的‘五一’节示威游行。”这使法共对左翼联盟的前途持乐观态度，“共产党人相信，联合起来的左翼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多数派。”

## 第三章

# 左翼联盟的建立

1968 年的“五月风暴”和 8 月苏联用坦克对“布拉格之春”的扼杀，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对法共及其同社会党的关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事件促使法共在前一时期初步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自己的路线和战略，深入思考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符合法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目标，终于在 70 年代中期形成了建设法国色彩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标志着法共对社会主义目标与道路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五月风暴”同样也对法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左翼联盟造成了很大冲击。由于非共



产党左翼在“五月风暴”中策略失当,密特朗的威信急剧下降,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宣告解散。社会党从此开始了缓慢的重建过程。法共法国色彩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社会党的重建,为两党在新的基础上实现联合奠定了基础,终于在 1972 年达成了共同纲领,建立起左翼联盟。

## 第一节 “五月风暴”与法共法国色彩

### 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 一、“五月风暴”和“苏联侵略捷克”事件对法共的冲击

1968 年,正当法共同社会党的联合行动取得明显进展之时,一场“彻底打乱法国政治局面,差一点推翻整个制度的政治风暴”来临了<sup>①</sup>。

1968 年春季以来,法国一些高等院校接连发生学潮,其中巴黎大学农泰尔文学院以科恩——邦迪为首的学生团体最为激进。他们于 3 月 22 日因抗议政府逮捕 6 名反对美国侵越战争的学生而举行集会,并占领了学院办公楼。面对学生运动的日益高涨,校方于 5 月 2 日宣布关闭农泰尔文学院,由此引发了学生与警察的冲突。5 月 3 日,警方逮捕了 500 名学生,激起了更加强烈的抗议活动。5 月 7 日和 8 日,数万名学生参加了游行示威,要求释放被捕者,被政府拒绝。学生与警方再次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5 月 10 日,愤怒的学生同阻挠他们进入巴黎大学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学生们占领了拉丁区,焚烧汽车,建筑街垒,用铺路石块同大批

<sup>①</sup> 雅克·夏普萨尔:《1940 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第 594 页

警察搏斗，使巴黎陷入了极度混乱。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工人参加到斗争的行列，学生的造反运动得到法国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法共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同社会党上层达成共同纲领上，对法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尖锐化程度缺乏足够的研究和清醒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群众斗争的作用，因而对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毫无思想准备，感到不知所措。本来，“五月风暴”表达了广大法国人民群众对戴高乐政权的不满情绪，也反映了大多数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抗议，具有进步性，理应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和引导，并把它提高到政治斗争阶段。但在学潮爆发后，法共未能对学潮的原因、性质和作用做出正确的分析。5月3日，法共中央书记马歇在《人道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学生运动领袖是“为戴高乐政权和大垄断资本家效劳”的“假革命”；“德国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等等，把少数极“左”分子的煽动性言论同广大学生希望改革的正当要求混为一谈。不是对学生运动的积极方面给予正确引导，而是采取了否定立场，使自己游离于运动之外，处于被动境地。5月11日之后，当法共看到学生运动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同情时，才开始转变态度，由观望和批评转向参与和支持，站到了学生一边，宣布支持工会的总罢工号召，但此时已错过了领导群众运动的最好时机。

5月13日，四大工会组织发起了有一百万工人参加的支持学生运动的总罢工。法共领导人和摩勒、密特朗等一起参加了巴黎示威游行，对学生运动表示声援。以后，农民也投入到斗争行列。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使法国经济生活瘫痪，陷入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戴高乐政权似乎“摇摇欲坠”。

面对这种形势，法共总书记罗歇于5月17日提出与社会民主左翼联盟领导人会晤，讨论能够取代戴高乐政权的共同纲领。5月20日，法共政治局发表声明说：“形势既不允许我们维持个人专权制度，也不允许进行起义性的罢工……而是要求建立一个真正的

共和制度,以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sup>①</sup> 并号召人民为建立民主联盟政府采取共同行动。5月22日,法共议员同社会民主左翼联盟的议员们一起,在议会提出对政府的弹劾案,但未获通过。5月27日,罗歇致函密特朗,建议用一个人民政府来替代戴高乐政权,并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建立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民主联盟。但密特朗拒绝了共产党的呼吁。在5月2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密特朗代表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宣布,“现政府已无力解决它所挑起的危机,它已穷途末路。”并表示,一旦6月6日戴高乐在公民投票中败北,他将愿意肩负起国家元首的重任。并建议成立一个由10人组成的处理日常事务的过渡政府来填补权力真空。

法共一方面对密特朗事先不与法共商量就提出成立临时政府的主张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积极准备参与政府事务,要求共产党在临时政府中的代表能与25%的选票相当。密特朗则认为,法共缺乏在政府工作的经验,只能有一个代表。两党为此互相攻击,争吵不休,给戴高乐派的反击提供了借口。

5月30日,戴高乐通过到西德的秘密之行,做好调动军队以“拯救国家”的准备后,回到巴黎,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渲染国家受到“颠覆”和“专制”的威胁,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同时,他利用少数极“左”分子的过激行为,把社会动乱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大造舆论说,如果动乱再继续下去,法国就会出现“共产主义极权独裁”。似乎几个星期的动乱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造成的,而是共产党人煽动的。戴高乐一方面针对法国人的“恐共病”和害怕动乱的心理,用武力做后盾,号召支持政府恢复秩序的力量上街示威;另一方面答应举行公民投票,满足了人民对扩大民主、参与政治的要求,并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将罢工斗争引向了议会斗争。6月1日后,参加罢工的工人陆续上

<sup>①</sup>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188页。

班,工运和学潮逐渐平息下来,到 6 月 20 日,法国的政治局势完全恢复正常。左翼政党利用危机夺取政权的希望破灭,“五月风暴”走向低潮。

在 6 月的大选中“政府把人们对五月混乱的一切仇恨和指责转嫁到共产党人身上”<sup>①</sup>,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尽管进行了联合竞选,但仍遭到惨败。两党比 1967 年各减少 60 万张选票。在新的议会中,法共的议席由 73 席降为 34 席,社会民主左翼联盟由 118 席降为 57 席,退回到 1962 年的地位。而戴高乐的保卫共和联盟则得 293 票,获得绝对多数,实力和地位大大加强。

五月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左派力量的分裂和缺乏明确的民主政治纲领取代戴高乐政权,都对选举结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正如法国政治学家雅克·夏普萨尔所说:“左翼政党因过迟向革命运动表示支持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走的太远了,以致不能回到原先的审慎立场;但却又走的不够远,以致于不足以阻挡国家元首扭转局势,也不足以阻碍国家元首以公认的民主合法的卫士自居。”<sup>②</sup>因此,五月风暴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共在选举中的倒退表明:法国的国内形势促使法共发展新的思考。

1968 年促使法共改变政治战略的另一个事件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 年 4 月,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改革派在党内确立了领导地位后,急于摆脱现实社会主义模式和苏联控制,走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改革捷克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建立一个十分民主的新社会主义模式”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公布后,法共同西欧各党一样,曾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并赞赏捷共的改革。法共总书记罗歇在 5 月同记者谈话时说:“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改组党的领导和根据原则发展社会主

① 《弗朗索瓦·密特朗传》第 116 页。

② 《1940 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第 599 页。

义民主，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表示积极的赞赏”<sup>①</sup>。捷克的改革“在法共一些领导人特别是法共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们认为，捷共的改革“是要恢复共产党的全部传统和捷克斯洛伐克民主的发展，纯属社会主义性质”。然而，捷共的改革却遭到苏共的强烈反对，苏共指责捷克的改革“越出了社会主义范围”，并借改革中出现的一些自由化现象，大造苏联要帮助捷共控制局势的舆论。7月，苏共和捷共关系日益紧张。面对这种情况，罗歇先后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和杜布切克，对改革可能发生的种种后果表示了忧虑，说明法共反对军事干涉捷克的立场，建议召开欧洲共产党会议讨论捷克问题，并对勃列日涅夫说：“如果你们断然行事，我们将对你们提出批评。”<sup>②</sup>

为了防止捷共的改革蔓延到东欧其他国家，动摇苏联模式的榜样地位和苏共的领导党地位，苏共断然拒绝了法共和其他西欧共产党的建议，于8月21日以华沙条约组织的名义悍然入侵捷克。这一行径不仅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反共阵营的大肆攻击，而且受到包括法共在内的2/3以上的欧洲共产党的坚决反对。法共政治局“对军事干涉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惊愕和谴责”，并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考虑到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支持下，在工人阶级和人民中间寻求保卫和发展本国社会主义的力量，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必须坚决遵守下列原则，各国党应当在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政策，自己的行动方式和斗争方法。因此，必须反对对其他兄弟党事务的任何干涉”<sup>③</sup>。

尽管法共对苏联的谴责与其他共产党相比，措词要温和得多，

① 《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第178页。

② 同上，第180页。

③ 同上。

而且在批评这一“严重错误”的同时,仍强调“要为加强同苏联共产党的团结一致和合作关系而努力”<sup>①</sup>,但毕竟法共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地、公开地、明确地谴责苏联,同苏联的政策唱反调,这对于长期以来受苏共影响最大,跟苏联最紧的法共来说,是非常不易的。法共的态度遭到党内亲苏派的强烈反对,在政治局声明发表后,多列士的遗孀——法共政治局委员让·维美徐宣布退出政治局以示抗议。而法国右派、中间派和左派则都因苏联入侵而对法共群起而攻之,掀起了又一次反共浪潮。“法共又一次由于苏联的镇压活动而遭受耻辱。”<sup>②</sup>它为恢复在五月事件中丧失的威信和弥合左翼分歧的努力也付之东流。

## 二、法共对两大事件的反思

“五月风暴”和“苏联入侵捷克”事件后,法共对两大事件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以下几个方面加深了对法国社会现状的认识和各阶层群众愿望的了解,进一步明确了法共应当亟待解决的问题。

1、“五月风暴”的失败使法共认识到,应当把对社会主义战略目标的理论思考提上议事日程。“五月风暴”作为一场自发地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表示抗议的广泛群众性运动,使整个法国社会制度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戳穿了新资本主义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神话。尽管当时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力量都不具备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形势,但“广大群众所表达的在社会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进行变革的愿望,也暗含着社会主义的要求”<sup>③</sup>。这就需要共产党人考虑到西方社会中新的革

① 《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第 180 页。

② 同上。

③ 《弗朗索瓦·密特朗传》第 119 页。

命因素，提出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制定一个具体的、有充分根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纲领，从整体上反映被卷入斗争中的各阶层的要求和愿望，为人民指明斗争方向和长远目标。而法共在此之前，探索的重点主要放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对于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目标则很少做具体阐述，同时却对苏联的现状和成就大加赞扬，似乎苏联模式就是法共所要实现的目标，因而难以激发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热情。所以，如何阐明法共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远景，将广大群众对资本主义弊病进行抗议的眼前斗争同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而斗争结合起来，就成为法共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2、“五月风暴”使法共更加坚信，法国实现社会主义变革必须走和平的、民主的道路。“五月风暴”最后走向低潮，一些极端无政府、无秩序的行为在运动后期得不到支持的事实说明：广大群众尽管对垄断资本政策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病不满，但积极加入到斗争行列的广大劳动阶层并不能接受通过非法的、暴力的手段推翻现存政权的做法，也不能接受极“左”派主张的反对一切权威的无政府社会。反动势力将青年学生的过激行为说成是“极权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宣传之所以奏效，戴高乐派在恢复秩序的口号下用军队和警察做后盾，取缔各种激进组织的做法之所以没有遭到群众的反对，原因均在于此。正如英国学者所说：“毫无疑问，在现代法国，任何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企图都不能指望得到群众的支持，或甚至保持中立”<sup>①</sup>。“五月风暴”后，法共不仅确立了通过和平、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开始考虑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是否适用于法共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曾经是法共思考的禁区。

3、“五月风暴”使法共开始注意新的社会阶层和知识分子在反

<sup>①</sup>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 192 页。

对垄断资本斗争中的作用问题。五月事件中的一个新现象就是各种新阶层同工人阶级一起参加了战斗。这不仅使运动的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而且提出了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如何对待新兴社会阶层和如何处理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五月风暴”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受雇佣的脑力劳动者的广大阶层、青年学生和职员在反垄断斗争中的作用不断提高。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不仅坚决反对国家垄断政权，而且有能力为实现具有广泛社会性的、远远超出其狭隘利益范围的社会政治要求而斗争。运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水平上尖锐地提出了民主化问题，从而显示了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中同盟者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表明了在建这种联盟道路上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五月风暴”使法共认识到，应当重视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新中间阶层中开展工作，全面考虑这些阶层的作用及他们走向革命斗争道路的特点。这样才能使受到失业威胁的青年学生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改造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4、“五月风暴”的失败使法共更加感到建立左翼联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快了调整政策的步伐。“五月风暴”中左翼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左翼的分裂。因此，法共进一步认为，统治阶级虽然面临重重矛盾和危机，但它仍然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丰富的统治经验和庞大的国家机器。没有左翼及其影响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合作和统一行动，要实现民主替代是不可能的。所以法共提出：“只有在民主反对派的主要政治组织共产党和社会党统一行动的基础上，才能在法国具体条件下建立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民主政府”<sup>①</sup>，和平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尽管由于“五月风暴”和捷克事件，左翼联合的进程暂时中断了，但法共却从失败中更深刻地认识到联合的作用，进一步坚定了建立左翼联盟的决心。

①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 193 页。



5、苏联侵捷使法共看到苏联模式的消极作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苏共的关系。苏联对捷克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使法共认识到：“如果法国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模一样的话，许多法国共产党人是不会喜欢这样的社会主义的”<sup>①</sup>。法共理论家爱伦斯坦指出：“1968年的震动是非常深刻的，这使我们对苏联的看法以及在同苏联关系方面产生了间接影响。我们探讨了这些问题，加深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结果我们和苏联发生了冲突，并且最终促使法共把同苏联的分歧因素同自己对法国社会主义前景的理论思考联系在一起”<sup>②</sup>，抛弃了把苏联模式作为法国社会主义样板的做法，极大地推动了法共对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及社会主义战略目标的理论思考。

### 三、从“先进民主”到法国色彩社会主义理论的形式

对上述问题进行新思考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香比尼宣言》的发表。1968年12月，法共召开中央全会，进一步讨论了“五月风暴”和苏联侵捷的后果和教训，发表了题为《争取先进民主，争取社会主义的法国》的香比尼宣言，作为开辟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民主改革的全面纲领，力图回答1968年事件中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次会议的特点是法共首次完全没有提及苏联模式，首次表明法共决定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宣言提出，建立“先进民主”政权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这一政权的特点是普选产生的议会拥有权力，保证思想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工会活动自由和罢工权利，以及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通过结构改革一步一步地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实现先进民主的途径是“建立能够担负起领导国家重任的左翼联盟；其基础是“工人阶级在其中起领

<sup>①</sup> 《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第68页。

<sup>②</sup> 同上，第73页。

导作用的广泛的反垄断联盟”：“赢得人民的多数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提。”<sup>①</sup>

这一宣言的新意在于，法共提出了“先进民主”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阶段”，还在于长期以来在党的思考中占居统治地位的照搬模式的概念完全不见了。后一点不仅是对“五月事件”的回答，而且也是法共在与苏联关系上和对苏联态度上采取独立自主立场的一个明显标志。其意义正如研究法共党史的学者指出的：“毋庸置疑，香比尼中央全会是法共自 1962 年以来战略步骤发展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时刻”<sup>②</sup>。“正是由于法共持有这个观点，才有可能于 1972 年 6 月 27 日订立两党共同施政纲领。”<sup>③</sup>

《香比尼宣言》作为法共的纲领性文件，对和平民主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做了全面的阐述，并在民主自由及联盟政策等问题上进一步实行“开放”。这对于恢复法共在群众中的影响，使人民进一步了解法共的主张起了积极作用。

1970 年 2 月召开的法共十九大，主要讨论了“先进民主”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等问题。法共认为：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先进民主政权的首要目标；“把法国设法变成可以忍受的资本主义不是我们的目标，尤其不是先进民主的目标。恰恰相反，问题是要建立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新关系，通过国有化，最重要的是通过一切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使社会主义成为必需和可能”<sup>④</sup>。法共强调，为了建立先进民主政权，将继续加强同其他左翼力量的合作和统一行动。

① 《香比尼宣言》，《人道报》1968 年 12 月 7 日。

② 《法国共产党：阶段与问题》第 488 页。

③ 威廉·J·戴维肖弗：《法国共产党的演变》，《西欧共产主义和政治体系》第 93 页。

④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 2 卷第 415 页。

1971年6月,马歇在《人道报》发表了《法国处于危机之中》一文,把1966年以来法共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讨论和理论探索推向新的阶段。文章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法国陷于全面危机之中,一方面,由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生产现代化,使得越来越多的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大量工厂关闭导致了失业的增加。集中和垄断使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垄断资本和其他非垄断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无力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因此,通过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的斗争改变社会的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

为了给法国目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法共于1971年10月通过了题为《改变航向》的人民联盟民主政府施政纲领,就政治体制民主化、国有化、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一系列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以此作为法共同社会党讨论共同纲领的建议,并第一次在党的正式纲领中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

1972年11月17日,马歇在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法国将实行多党制。他说:“我们认为,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来说,虽有某些普遍原则,但并不存在一个可以从一国搬到另一国的模式。”<sup>①</sup>1973年,马歇出版《民主的挑战》一书,再次论证了左翼联盟的正确性,提出法共必须走独特的道路,建设“法国式的社会主义”。

在1974—1975年欧洲共产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高潮中,法共通过与意共和西共领导人的多次会晤和讨论,正式接受了欧洲共产主义主张,更加坚定地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终于在1976年2月的二十二大上,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一转变又反过来推动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使法共成

<sup>①</sup> 《泰晤士报》1972年11月17日。

为主张和推动欧洲共产主义的三个重要政党之一。

法共二十二大批判了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正式宣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而代之以“劳动人民的政权”，阐述了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前景和与之相适应的民主道路。马歇在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今天的法国既不是 1917 年的苏联，也不是 1948 年的捷克。阶级斗争的民族条件和历史条件是很不相同的。因此，法共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时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sup>①</sup>。这次大会标志着法共法国色彩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形成。

1979 年，法共二十三大大肯定了二十二大上提出的奋斗目标和政治战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改为“科学社会主义”，并将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目标概括为“民主和自治的社会主义”，力求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以适应法国社会的变化，更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

此后，在 80 年代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法共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自身力量的消长，对一些口号的提法有所调整。但是，通过民主道路走向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和建设法国色彩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始终未变。

<sup>①</sup>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第 364 页。

## 第二节 法国色彩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 一、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目标

法共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目标，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建立全体劳动人民的政权和新型政治民主体制。确立民主和自治的社会主义目标，标志着法共从推崇和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到根据法国现实，独立自主地制定社会主义社会蓝图的转变。长期以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一党制和单一国家所有制的苏联模式，一直是法共的奋斗目标。60年代后，随着苏联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事实不断被披露，法共看到，“这些国家对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损害，过于频繁地用新闻检查和镇压来取代思想斗争，劳动者和公民不能充分民主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领导”<sup>①</sup>等消极现象，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法共认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长期低估社会主义应有的普遍的民主要求。鉴于苏联的教训，法共二十二大坚决摒弃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唯一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提出“每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它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并不能遵循一个到处适用的模式而把本民族的特点仅仅作为点缀”。因此，法共宣称：“我们把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在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看作是对我国具体需要的具体回答，是法兰西民族根据它独特的、基本的、与别国及与任何样板都迥然相异的特点，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发展的结果”<sup>②</sup>；“在我国，

<sup>①</sup>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第 125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348 页。

社会主义应该与保卫和发展我国人民通过广泛和顽强的斗争所获得的民主成果相一致，否则就是空谈”<sup>①</sup>。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法共在自己对社会主义目标的构想中，特别强调民主和自由的重要性，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和自由，即彻底民主的最高阶段”；“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它既是要达到的目的，又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所以，法共“把民主、自由作为我们想要在法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尺和基本特征”<sup>②</sup>；认为“一切社会结构和所有社会关系的逐步民主化是社会主义的普遍必要的组成部分”<sup>③</sup>。建立充分发展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民主制度，这就是法共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目标。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产阶级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sup>④</sup> 1920年，正是由于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才出现了社会党的分裂，并产生了法国共产党。在50余年的时间里，法共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自己为之奋斗的首要目标。60年代，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法共已感到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不适合具有议会民主传统的法国，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不那么强制的和较短暂的”。70年代中期后，法共把法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政权概括为“工人阶级和城乡各类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政权”，即“大多数劳动人民

①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第 110 页。

② 同上。

③ 《法共二十五大政治报告》，《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 315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200 页。

的政权”<sup>①</sup>，用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法共认为：政治民主就是要保证工人阶级和全体公民真正参加国家的领导和管理，真正拥有参与制定国家重大决策和监督执行这些决策的权利；为了实现政治民主，必须建立以多党制为基础的真正的议会民主制，“尊重普选制，尊重轮流执政，尊重政党、工会、协会和宗教的存在”<sup>②</sup>，而决不能以一党制为特点的“无产阶级专政”来规定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法国的政权：“这是因为它包含不了我们政策的实际情况，包含不了我们向国家提议的实际情况。”<sup>③</sup>这是法共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法共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法共认为：“在 1917 年的俄国和后来年轻的苏联所处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胜利进行曾经是必要的。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苏联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就不能进行和保卫他们已经实现了的、前所未有的解放事业。”然而，“在最近一段历史时期中，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掌握自己命运，在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道路上前进的巨大可能性。”<sup>④</sup>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要依靠同占社会大多数的其他民主力量联盟开展共同斗争，而无需使用暴力和专政就能够迫使大资产阶级后退，迫使反动派尊重大多数人民自由表达出来的选择。

其次，法共认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为自由进行了上百年的战斗，因而它比别的国家更普遍地肯定了人权和公民权，更强

①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第 343 页。

② 同上。

③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 315 页。

④ 同上，第 345、350 页。

烈地要求实行非宗教化、多元化制度和个性独立。”<sup>①</sup>而“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在本世纪已经历史地同苏联一党制的政权形式联系在一起,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而且“专政”使人很自然地想到希特勒、墨索里尼、萨拉查和弗朗哥的法西斯制度,也就是否定民主”<sup>②</sup>。由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与专政问题上的严重失误,无产阶级专政在西方名声很坏。如果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照搬到法共的社会主义目标中,肯定难以被为享有普选权、舆论、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罢工权、工会权以及拥有自己的政党等权利进行了长期流血斗争的大多数法国人民理解和接受。

再次,法共认为,“无产阶级今天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内核、核心,起着主要的作用,但它不能代表整个工人阶级,更不能代表全体劳动者。而我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权将来自全体劳动者。因此,显然不能把我们向劳动者和我国人民所建议的政权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sup>③</sup>。

法共中央委员雅克·德尼在阐述法共政策时解释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不适应我党政策的实际情况。我国应该根据民主手段特别是普选的方法表达出来的绝大部分人民的意愿通向社会主义。我们不怕选举时多党制,不怕意识形态较量,不怕行动上相互竞争,也不怕辩论。我们争取这条路线,是基于对当今实际情况的要求进行深刻分析:民主与最大程度的参与负责是我们时代的强烈要求。这是经济、社会、人道的需要,我们从今天我国阶级斗争的条件出发,考虑到我国及我们时代的现实,吸取了历史的和其他国

①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第 111 页

②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第 348 页。

③ 同上,第 344 页。



家的经验教训”<sup>①</sup>。

在放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后，法共根据法国的社会现实，把以多党制为基础的真正的议会民主制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法共认为，多党制是政治民主的主要内容，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保证。“法国共产党主张多党制——包括反对党的存在和进行活动的权利，主张自由组织多数和少数派，主张多数派和少数派可以民主轮换执政”<sup>②</sup>；“如果大多数人民撤销他们原先给予我们的信任，那么，我们将尊重普选的结果而离开政权。没有人民的支持，就不可能为人民造福；在违背人民的意志时，更是如此。”<sup>③</sup> 多党制还意味着多党联合执政。法共认为，在法国，除了共产党外，还有其他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政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利益。因此，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政治联盟不仅表现为为实现左翼替代在议会选举中的竞选联盟，而且还表现为取得政权以后的多党联合执政。法共指出：“在迈向社会主义和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党也赞同左翼党——首先是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持久合作。”<sup>④</sup> “我们既不希望在民主运动中，也不希望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任何垄断。”而是要在承认各党派存在和自由活动或多党联合执政的基础上，“使每个人都能成为独立自主的公民，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参与决策、执行已作出的决定并进行监督。”<sup>⑤</sup>

法共还主张：“为了使代表劳动人民的国家能努力满足全民族的需要和愿望，必须建立由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的真正权力，政教

①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第 152 页。

② 同上。

③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第 26 页。

④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第 358 页。

⑤ 同上，第 148 页。

分离以及反对个人专权”；“使各级权力的行使都有人民群众的干预，能使工人阶级担负起最高的责任，发挥领导作用。”<sup>①</sup> 鉴于苏联党政不分，高度集权的弊病，法共提出，政治民主还包括实行党政分开。法共 1975 年发表的《自由宣言》的第一条就是“不允许党政不分”。法共认为，政党作为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必须在尊重宪法的前提下进行活动。“任何政党都不能统治国家，不能把自己和国家等同起来”<sup>②</sup>，用党来取代国家机关，凭借国家机器干预社会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克服官僚主义弊病。

2、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以自治管理为基础的经济民主体制。经济民主是法共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法共主张“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应全部归社会本身所有。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之一，不实现这个条件，就没有社会主义。”<sup>③</sup> 法共认为：只有“使整个经济生活民主化，通过实行新型的、民主的、自治管理的国有化以及本身就是民主的计划化，使劳动者、公民掌握大的生产和交换工具”，参与整个社会生产的管理、监督和分配，才能结束大垄断资本的统治，确保全体劳动人民和整个人类的根本利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实行国有化”，也不是像我们的反对者所说的“法共要在法国搞剥夺个人财产，实行千篇一律和强制的集体化”<sup>④</sup>。法共在强调实现国有化的重要性的同时，还指出：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根据这个目标，“除了发展公营部门以外，还要发展其它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如合作社所有制，市、

①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 315 页

② 同上。

③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第 348 页。

④ 同上，第 342、388 页。

省、地区所有制),尊重中小工业的私有制,以及尊重那些不需要集中和社会化的农业、手工业和经营者的私有制”“保障个人拥有的各种消费资料——例如:汽车、住房或乡下住宅的所有权和对这些消费资料的继承权。简言之,这同实行全面的国家化截然相反;是建立一种新的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之下,民主、各行业劳动者的干预和参与决定将得到发展。”<sup>①</sup>

法共认为,在现存制度中,垄断资本家企业实行真正的专政,技术官僚在发展,企图统治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因袭这一套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经济民主“要的是国有化企业拥有管理的自治权,要的是在劳动者和用户的参加下民主地制定计划,要的是企业管理本身的民主,即劳动者——工人、职员、工程师和干部——越来越积极地参加企业管理。同样,我们要的是市镇、省、地区成为真正的决策和民主管理的中心。”<sup>②</sup>法共还强调,在进行所有制和国家政权改革的同时,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来改变社会关系,把高高在上、为少数人效劳的政府,过渡到由劳动者、公民对整个社会进行日益广泛的管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实行自治管理和彻底民主,将为每个人和所有的人开辟更为不容置疑的可能性。法国所需要的,我们想建立的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就是如此。”<sup>③</sup>

3、发展自由、公正的社会民主。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法共同整个国际共运一样,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口号采取了不正确的虚无主义态度,以资产阶级自由或形式上的自由为理由,笼统地否定和批判各种关于自由的口号,似乎共产党主张的社会主义与自由无缘。这就为资产阶级攻击社会主义破坏

①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 293 页。

②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第 348 页。

③ 同上,第 388 页

自由提供了借口，自觉不自觉地把自由的旗帜让给了资产阶级。诚然，资产阶级所宣传的自由是带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并且主要是保护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的自由，但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工人阶级和劳动者通过几百年的斗争所争得的普选权、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权、罢工权、工会权等自由权利。把一切自由权利都当成形式上的自由加以批判，是为自由而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不能理解和接受的。这种做法必然影响法共争取群众的大多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在探索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法共逐渐认识到，“在法国，凡自由的获得，无一不是以我国人民的痛苦、斗争，有时是以鲜血为代价的”<sup>①</sup>；“正是由于法国的知识分子为思想和言论自由所进行的无数次震惊法国和全世界的斗争，才使群众的人道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sup>②</sup>法共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所有这些自由都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愿望”，所以，“我们非但不蔑视这些自由的存在，以免助资产阶级一臂之力，反而要恢复和更新他们。”“当资本主义力图破坏和玩弄自由以挽救它的特权时，我们要像在破坏者面前维护劳动工具那样地维护这些自由，甚至包括那些人们有时称之为‘资产阶级的自由’，我们要维护他们、充实他们，用新的自由和权利来发展他们。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sup>③</sup>。

因此，法共明确宣布：“共产党人现在是，并且有志于永远更好地成为多少世纪以来在我国为自由而战的所有这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普通公民、国务活动家的继承人”；“我们每日每时在各地所进行斗争的意义，正是为了使每个人都能过上更公正、更安定、

①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第 348 页。

②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第 111 页。

③ 同上，第 349、25 页。

更自由、更美好的生活,并实现一个更自由的社会'<sup>①</sup>;法共强调:“法国式社会主义应当为各种自由和民主揭开新的纪元”<sup>②</sup>。马歇1976年在欧洲共产党会议的讲话中说:“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极民主的,不仅仅是因为它将消灭剥削,从而确保劳动者具有享有自由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也因为它将保证、发展和扩大我国人民已取得的各种自由,诸如思想和言论自由、创作和出版自由、宗教和罢工自由、示威游行、集会和结社自由、国内外人员交往自由、尊重工会的独立和自由活动、尊重司法独立,拒绝任何官方哲学”<sup>③</sup>、“以使各种观点得以发表和交流,使一些新的见解尽管还不很成熟也能够提出来并得到发展”,为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实现创造更好的条件。

法共的社会民主还包括公正和平等。“公正是当代的头号要求。”公正和平等就意味着充分就业,人人都享受平等的劳动权,有稳定的满意的工作和自由更换工作的权利。所有劳动者都应该享有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他们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公平应该结束。每个人都应该根据所提供的劳动的量和质获得能使他过上体面生活的收入,人人都享受机会均等的学校教育,享受在医疗、体育和文化设施方面真正的平等权利。当然,公正并不意味着绝对均等。我们拒绝一切抽象的平均主义。主张保障人们享有个人之间有差异的真正权利,包括有收入差异的权利。

以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为主要内容的、与自由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就是法共设想的法国未来社会主义目标。

①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 24 页。

②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 293 页。

③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第 32 页。

## 二、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道路

法共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和平的、民主的、联盟的道路。

1、通过和平民主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在确立了社会主义目标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法共提出：“为了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我们愿走一条本身也是民主的道路。目标和手段是协调一致的。”<sup>①</sup>法共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以及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条件，提出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民主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认为这是“一条实现社会主义最好的路，最短的途径”；“是唯一的现实主义的道路”<sup>②</sup>。这条道路既不是武装起义和暴力革命的道路，也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道路，而是一条联合的道路，斗争的道路。其核心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与代表各阶层劳动群众的左翼政党结成联盟，在宪法范围内通过议会内的合法斗争和议会外的广泛群众斗争，逐渐取得议会多数夺取政权。

法共认为，列宁的暴力革命学说使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了1917年革命的胜利，“但却不适用于法国现在的情况。”<sup>③</sup>在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专制制度下，没有合法斗争的余地，只能采取攻打冬宫的突发性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而在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法国，议会民主观念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种思想、文化观点都可以自由表达，各党派都可以合法活动。这种与革命前的俄国截然不同的斗争条件，使得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在一个像我国这样的国家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问题上，教益甚少”<sup>④</sup>。这就

①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第 393 页。

② 同上,第 350、447 页。

③ 乔·乌尔班:《欧洲共产主义》第 118 页。

④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第 134、145 页。

“使我们重新考虑西方革命的整个概念。”在我国和我们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改造应该、并且可能通过明确地、民主地表达出来的协议，通过我国人民多数的积极干预而实现<sup>①</sup>，“并非一定要经过夺取冬宫不可”<sup>②</sup>。

在西方国家，广大群众既渴望变革，但又害怕激烈的暴力行为，所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变革就成为人民的要求和选择。这就要求法共“必须考虑到一种决裂的过程，一系列能实现不断向前推进的民主改革的群众斗争，这种民主改革将为过渡到本身作为民主化最高表现的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而不要追求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改造那种类型的决裂”<sup>③</sup>。“法国的革命只能是和平的、民主的、合法的和逐步的。”它将是一种文明的革命，一种不采取暴力行动的革命。它将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将改变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改造人民的意识——这是一种法国式的文化革命。”<sup>④</sup>法共认为，在存在和平发展革命的政治条件下，在一个可以根据宪法用民主形式进行社会改革的民主制度中，暴力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正如西欧革命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也不是现实的道路。共产党如果放弃和平革命，就会使自己同广大群众对立起来，失去群众的支持，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也就无从谈起。

2、开展议会内外各种形式的合法斗争。在主张和平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同时，法共也指出：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和平的道路，并不意味着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人物会突然放弃权力，也不意味着它会自动离开和甘心退出政治舞台：“民主的和平的道路同认为向社会主义的演变是直线的、安静的、平坦的观点，或者同认为

①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第 449 页。

② 马歇：《民主的挑战》第 78 页。

③ 乔·乌尔班：《欧洲共产主义》第 145 页。

④ 同上。

在资本主义范畴内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绿洲的幻想毫无共同之处。社会主义的改造要求消灭资本对经济和国家的统治。因此，它要同现有的制度决裂，在激烈阶级斗争的范畴中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为了使我国的民主变革胜利，为了使人尊重普选的裁决和挫败反动派借助于非法手段与暴力的企图，必须进行斗争。”<sup>①</sup>

因此，民主的道路是除内战以外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没有激烈的阶级斗争，就不能前进。只有联合群众的多数，将议会内的斗争同议会外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才能逐步扩大民主的成果，改变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使之有利于人民。这样，才能迫使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对付人民运动。在这一前提下，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才有可能通过议会选举，获得稳定多数，用新的民主政权代替垄断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3、建立以左翼联盟为基础的多数民众的联合。法共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多数人民的大革命。单靠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斗争，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为了确保民主道路的胜利，必须依靠群众的大多数，把所有决心变革社会的工人阶级、各类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力量动员起来，联合起来。法共指出：“没有我国人民多数联合的存在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民主变革。我们希望建立人民联盟，一切在社会、政治、精神、意识各方面受资本政策之害的人的联盟。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不可改变的抉择”<sup>②</sup>；“对我们来说，联盟并不是权宜之计，因局势而变化的手段。联盟是贯穿我们全部行动的指导思想。其原因很简单，因为联盟是保证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唯一手段。事实证明，工人、民主和民族力量的分裂总是意味着正义、民主以及和平的倒退。相反，联盟一旦实现，总

<sup>①</sup>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第 449、33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447 页



是对我们的人民和国家有利。”<sup>①</sup>

正是基于这个根本的理由，法共把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与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最广泛的联盟，争取一切受垄断资本之害的社会力量，作为实现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和主要条件。它强调：“在我国，如果没有一个由绝大多数人参加的，由一切要求变革的男女所结成的强大联盟，任何真正和持久的变革都是不可能的。”<sup>②</sup>

法共联盟战略的依据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社会越来越表现为统治经济和国家政权的一小撮垄断资本同人民绝大多数的对立。不仅工人阶级遭受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而且职员、农民、工程师、技术员、教员、艺术家、商人、手工业者也深受大资产阶级政策的严重危害。这就为联盟政策提供了社会基础。尽管不同的社会阶层渴望变革的理由不一，其自觉程度也不同。然而，一旦他们联合起来，并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主要敌人，这股力量将是不可抗拒的。

法共强调：为了实现人民多数的广泛联盟，必须首先“建立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牢固、持久的合作”，即左翼联盟。“各左翼政党在共同纲领基础上达成一致是我们竭力推动建立的这个大多数人联合的轴心”；“这种联盟是各人民力量联盟的政治体现，是以各人民力量联合为基础的；反过来，它能够并且应该成为各人民力量联盟的推动力量。”<sup>③</sup>法共长期以来为争取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实现同社会党的联盟而斗争，原因就在于此。

那么，如何实现联盟，并使之健康发展呢？法共认为，联盟和合作必须尊重参加联盟的各个党的特性，尊重各党的独立自主，必须

<sup>①</sup> 《让我们说实话》第 73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88 页。

<sup>③</sup> 同上，第 73 页。

在符合而不是超越运动实际状况的条件下达成协议并在此基础上合作。强调共同点、寻求一致点时丝毫不掩盖在双方联合起来的背后所存在的不同点。不同组成部分的独立性，不仅不成其为取胜的障碍，相反，当这些力量为了实现共同承担的义务而共同行动时，它将成为联盟力量发展和胜利的一个因素。

法共指出：保证联盟得到顺利发展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法国共产党。这是因为共产党是在任何情况下，唯一拒绝替大资产阶级管理事务的党，是唯一不断号召劳动者进行斗争，反对向大资产阶级屈服、退让和进行阶级合作的党，也是唯一为实现和推动左翼联盟发展而不懈努力的党。如果共产党的力量遭到削弱，缺乏足够的影响，社会党就有可能迫于右翼的压力，回到与大资产阶级搞合作的老路上去，使左翼联盟右转，使人民的力量陷于放弃改革的绝境和失败之中。因此，共产党影响的扩大，其行动和组织能力的加强，是实现联盟、保证民主变革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为了一个强大的联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党。”

上述建设法国色彩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及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内容，为法共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依据。

### 第三节 社会党的重建与

#### “扎根左翼”战略的确立

##### 一、1969 年的总统选举与社会党的重建

在法共调整政策的同时，受到“五月危机”强烈震撼，陷于四分五裂的非共产党左翼，尤其是社会党，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也开始

了重建过程。

“五月风暴”以及其后的选举，使左翼政党的联合进程突然中止。法共一方面对密特朗在“五月风暴”中的做法非常不满，另一方面也对选举中非共产党选民没有向法共候选人让票十分恼怒；而社会党则因苏军入侵捷克对法共进行了严厉谴责，两党关系又趋紧张。密特朗作为非共产党左翼中联合的主要倡导者，因在“五月危机”中宣称准备接管政府而使其政治生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苏联侵捷事件发生后，密特朗又在反共高潮中受到牵连，于 11 月 17 日辞去了社会民主左翼联盟主席的职务。非共产党左翼联盟瓦解。

联盟解散后，社会党于 1968 年 12 月下旬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同共和制度大会党、争取革新左翼力量俱乐部联盟、社会主义团体和俱乐部联盟等组织合并，成立新社会党的决议。

1969 年 5 月 4 日在阿尔福维尔召开的新社会党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党的原则声明，宣布今后只使用社会党的名称，而不再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副称。面对因戴高乐在公民投票中失败而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左翼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势。在社会党内部，摩勒派主张推举一位可能击败蓬皮杜的中间派候选人，而德费尔则留恋 1965 年流产的大联盟。为了使左翼取得选举胜利，法共曾向社会党提议密特朗作为左翼的候选人，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开展竞选活动，但遭到社会党的拒绝。于是，社会党推举德费尔为社会党的候选人。以密特朗为首的共和制度大会党由于不同意德费尔作为总统候选人，没有加入新社会党。

继社会党提出总统候选人后，法共也指定杜克洛作为“工人和民主力量联盟”的总统候选人。统一社会党和极左派也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候选人。

分裂导致左翼在 6 月的选举中出现了 4 个候选人 代替 1965

年统一候选人的局面。选举结果，法共候选人杜克洛得票 21.5%，基本上恢复了 1968 年前的水平，而社会党候选人德费尔仅得到 5% 的选票。这是法国社会党参加选举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这一失败也宣告了社会党“第三种势力”政策的彻底破产。

在这次选举中，法共选票从 1968 年的 18.7% 增加到 21.5%，而社会党候选人的选票从 15.6% 下降到 5% 的事实证明，“只要社会党顽固地坚持拒绝统一的态度，法共选择的方针就会在选举方面获得益处。”<sup>①</sup> 社会党的失败还表现在党员人数在 1969 年下降到战后最低点，仅为 7.1 万。

竞选的失败和实力的下降使许多社会党人认识到，同中间派的联盟已“使社会党衰退到死亡的边缘。”<sup>②</sup> 于是，党内出现了一股要求摆脱摩勒控制，加速社会党思想现代化的潮流。

在 1969 年 7 月 11—13 日举行的新社会党成立大会上，社会党、争取左翼复兴俱乐部联盟和社会主义俱乐部联盟合并为统一的党。原争取左翼复兴俱乐部联盟主席阿兰·萨瓦里当选为新社会党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了社会党的任务以及同共产党的关系。各派领导人在发言中都认为，为了同主要的敌人——垄断资本开展斗争，必须恢复同共产党的对话和合作，争取左翼力量的统一行动。会议声明：社会党的战略方针毋庸置疑是以左派团结为纲，并决然不同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结成联盟，其中包括和中间派寻求合作。根据摩勒和萨瓦里的建议，会议通过了一项着手和共产党讨论《关于反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形式问题和关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途径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问题》的决议，宣布立即开始同共产党以及共和制度大会党、统一社会党进行会谈。

然而，由于萨瓦里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原社会党总书记摩勒的

① 《法国共产党：阶段与问题》第 565 页。

② 《社会主义简史》第 160 页。

影响和控制，缺乏革新的威望和魄力，也由于他不切实际地提出，讨论联合的前提是共产党必须就政治民主和自由问题作出书面保证。这就决定了萨瓦里领导的新社会党既没有能力克服老社会党的危机，也不可能左翼联合上取得重大进展。

## 二、密特朗的崛起与扎根左翼战略的确立

就在非共产党左翼联盟步履艰难，徘徊不前之时，长期以来坚持左翼联盟思想的共和制度大会党主席密特朗出版了两本著作。书中阐述的社会主义主张对社会党内的许多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我之管见》一书中，密特朗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经历和思想发展，公开宣称接受马克思的思考。他在书中写道：“我曾经以为可以使资本主义社会实行自我改造……但是，我终于发现了某种真理”：“现在我所说的左翼，就是指的社会主义。自由派的左翼同资本主义结合太紧，其所代表的政策是我要反对的。”<sup>①</sup>密特朗认为，每当法国发生大的分裂，资产阶级总是集合在保护他们特权的势力背后。每次政权转变时，人民群众都被剥夺了获得公道的可能性。因此，毛病不是出在用来统治国家的具体政治制度，而在于根本制度。“问题不是要在第四和第五共和国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进行选择。”在谈到共产党时，密特朗说：“共产党表示愿意去斗争并且在斗争中表现出其他左翼政党所没有的团结。……法国工人阶级投共产党的票，这并非偶然。工人将支持那些支持他们的人”<sup>②</sup>。基于这种考虑，密特朗认为，法国左派的未来在于同共产党合作。

在1970年出版的《可能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密特朗较为系统地提出改变生产关系、民主计划化、收入再分配和实行混合经济等

<sup>①</sup> 《密特朗传》第328—329页。

<sup>②</sup> 《弗朗索瓦·密特朗——一部政治史诗》第122、123页。

主张，并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定义、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手段，在一定意义上为 70 年代社会党社会主义理论的革新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通过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密特朗加紧了对社会党各派的说服和争取工作，以扩大自己在社会党中的影响，为共和制度大会党和社会党合并创造条件。通过同社会党领导人及其党内各派的多次私下会晤和公开讨论，密特朗领导的共和制度大会党和社会党一致同意实现合并。1971 年 6 月 11—13 日，在埃皮内召开了法国社会党人统一代表大会，宣布两党合并。

会上，社会党的不同派别提出了 4 个动议：第一个是摩勒—萨瓦里动议，即卸任领导的动议，它要维护现存机构，并重申要对现代派和右派保持警惕。第二个是波普朗动议，它强调与共产党人的附有“意识形态保证”的共同施政纲领。第三个动议是由皮埃尔·莫鲁瓦和加斯东·德费尔联合提出的，它不主张与法共达成协议，而特别强调革新组织。最后，左倾的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提出所谓“具体的、协调一致的”共同纲领：“在纲领中，应该提出和解决所有的问题，同时迫使共产党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和当前的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共和制度大会党的主张，似乎和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的动议异曲同工，他们都认为与左派联合是组成未来社会党的必要条件。

在围绕代表大会动议的政策辩论中，密特朗为了使主张以左翼联盟为基础，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动议获得通过，发表了“富有魅力和社会主义激情”的演说。他说：“我们所需要推翻的是垄断集团的权力，我这里所指的是腐蚀人民、收买人民、毁灭人民、屠杀人民、摧垮人民并且会腐蚀人类良心的资本的权力。”“对我来说，争取彻底改造现有结构的日常斗争，都具有革命性质。这意味着决裂。我必须说，谁不同意同既定的制度，同资本主义社会决裂，谁就不能成为一个社会党党员。”然而，“这只有在我们争取到我们

同胞的心之后才能做到。”<sup>①</sup> 社会党必须把眼下支持共产党、极左派或自由派立场的人争取过来。“我们的基础是阶级阵线。”<sup>②</sup>

在谈到与共产党建立左翼联盟问题时,密特朗认为,与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论战已不合时宜,工人阶级两个党各自的哲学是如此悬殊,以致要使他们和解,简直是枉费心机。现在已到了停止无休止地寻求澄清思想意识分歧,并且开始着手拟定共同纲领的时候了。他说:“与共产党对话不应当从意识形态论战中模棱两可的问题开始。对话要涉及肩负改造社会使命的政府将会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谈判这样一项协议是放眼未来,严肃地提出有关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唯一途径”<sup>③</sup>。摩勒也认为,实行左翼联盟是革新的根本。尽管“左翼联盟是困难的,但是应当继续坚持不懈地探索,不讲情面,在根本问题上不让步。要以持之以恒的意志去克服困难。”<sup>④</sup> 经过激烈的辩论,密特朗的主张得到党内多数的拥护,会议最后通过了立即与共产党谈判并签订共同施政纲领的决议。这标志着社会党从“第三种势力”政策向左翼联盟政策的决定性转折。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召开的社会党指导委员会上,密特朗得到莫鲁瓦派和舍韦内芒派的支持,当选为社会党第一书记。至此,社会党的重建最终完成。

为了恢复和振兴社会党,密特朗为社会党制定了正视强大的共产党,扎根左翼,通过左翼联盟与法共争夺群众,实现对左翼联盟的领导,最终夺取政权的战略。密特朗认为,左翼的团结与社会党的改革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它是与党的建设联系在一起,不采取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战略、不搞左翼联盟,缩

① 《弗朗索瓦·密特朗——一部政治史诗》第 130 页。

② 《密特朗传》第 339 页。

③ 乔治·阿耶歌等:《法国社会党及其领导人物》第 7—8 页。

④ 同上,第 9 页。

造社会党是不可能的。这是一项决定性的方针，因为它从组织上把一个新党的存在与联盟的战略联系在一起。

为了争取共产党影响下的群众，密特朗提出了许多激进的口号。在会后不久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密特朗指出：“社会党必须出现在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阵地上，并尽力在政治上表达工资收入者在国内事实上所占的优势，表达工资收入者同广大农民阶层和中间阶层团结在一起的阶级阵线的发展。”<sup>①</sup>

根据埃皮内大会“先理内，后理外”的原则，密特朗着手组织起草新的政治纲领，以使用新的战略统一各级社会党组织的思想，迎接共产党提出的施政纲领的挑战，使社会党得以作为强大的力量同共产党进行共同纲领谈判。1972年3月，社会党通过了自己的题为《改变生活》的施政纲领。就国有化、自治管理、工人监督、宪法改革、防务与欧洲政策等问题阐明了社会党的立场，并提出要在卫生、教育、体育、社会福利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改变生活”。这就为同共产党讨论共同施政纲领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 第四节 共同纲领的签订与

### 左翼联盟的建立

#### 一、法共为建立左翼联盟而斗争

1968年的危机对法共为之奋斗10余年并已取得初步成果的左翼联盟战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6月选举失败和苏联入侵捷克后，法国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内部各个成员围绕是否断绝同法共

<sup>①</sup> 《密特朗传》第344页。



的一切联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分歧进一步加深。1968年11月7日，密特朗辞去联盟主席的职务，社会民主左翼联盟破裂。社会党领导人摩勒在12月宣布：“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和共产党实现联合。”<sup>①</sup>

面对这种被动局面，法共不得不拿出新的事实证明自己对法国社会主义的承诺，不得不设法在政治体制内重新建立信任和恢复名誉。正如党所意识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得在更深层次上确立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变的更为迫切<sup>②</sup>。研究法共历史的西方学者指出：“对法共来说，1968年的教训是：如果它想在法国取得执政地位，那么，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在国内，必须重新努力巩固与社会党的联盟并扩大在选举中的选民基础；在国际事务和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必须在做出决定时坚持自主和独立。”<sup>③</sup> 为了恢复同社会党的联合和争取早日签订共同纲领，法共在1968年后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和积极的工作。它改变了以往在旧模式的框架中进行缓慢变革的做法，大幅度地调整了自己的纲领和政策，在民主、自由、多党轮流执政等长期与社会党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上，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1968年12月举行的法共中央全会上，法共更加深入地研究了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和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在会议通过的《香比尼宣言》中重申了党对于尊重自由和人权、向所有反对垄断资本的政党开放和通过和平、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承诺，使两党的立场和策略进一步靠拢。

宣言指出：“正如1968年5—6月强大的群众运动有力地证明的，受垄断资本损害和威胁的所有阶层共同行动的条件日益成

① 《世界报》1968年12月22日。

② 《转变中的法国共产党》第28页。

③ 同上，第148页。

熟”：“党的目标就是用先进的政治和经济民主政权取代戴高乐的垄断资本政权，以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法共号召：“所有劳动和民主力量，不论他们的哲学观点，宗教信仰属于何种党派，都应当联合起来，为推翻垄断资本政府和建立先进民主政权而斗争。”在宣言中，法共虽然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与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能否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有关”；但它同时也声称：“党承认需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各个政党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在这种关系中，共产党将不再寻求扩展自己的势力，相反，它通过自己诚实的行动，它的科学理论和严格的组织保持对国家的影响。”<sup>①</sup>

香比尼会议后不久，因戴高乐辞职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法共为了使自己的联盟政策付诸实施，于1969年5月4日致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建议左翼共同制定一个对经济社会与政治进行深刻改造的纲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共同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虽然法共的建议遭到社会党的拒绝，但法共候选人在选举中取得近500万张选票和社会党的惨败，使法共受到极大的鼓舞。此后，法共一方面不断提出各种联合的建议，向社会党施加压力；另一方面逐步通过自我革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寻求与社会党接近。

在1970年2月举行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法共指出：“法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已充分说明必须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工人队伍和民主力量的分裂历来有利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敌人。相反，每当实现了团结，就能取得重大的成绩”<sup>②</sup>。所以，法共强调：“团结是决定性的任务。”为了实现团结，法共声明，它并不强求人们承认自己的先锋队作用，而是要通过自己的英明和忠心耿耿，通过自己引导全体人民坚定地

① 《人道报》，1968年12月7日。

② 《法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第69页。

走上不断提高社会福利和完善民主的道路上的能力，在群众思想上和内心里起到这个作用”<sup>①</sup>，以便打消社会党对法共垄断领导权的顾虑。

1971年10月，法共发表了自己的施政纲领——《人民联盟民主政府纲领》，作为同社会党讨论共同纲领的建议。该文件除阐述了法共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政策，指出了变革的前景和目标外，还首次确认“定期组织普选是使人民能对各政党的活动作出评判的基本方式之一。各政党应当尊重人民的裁决”<sup>②</sup>。这表明，法共不仅承认多党制，以及本着平等的精神各党有进行活动的自由，而且承认反对派的政治权力也将得到保证。这在法共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纲领的发表以及法共为宣传纲领展开的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00万份文件在几周内就全部卖出”<sup>③</sup>。法国著名政治学家F·博雷拉评论说：“采取这样一个举动在法共及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第一次。”<sup>④</sup>为使社会党对法共的建议做出积极反映，法共在纲领的最后部分声称：“法共提出的这一纲领并不是不容讨价还价的一揽子交易，而是在左翼中进行讨论的基础。”<sup>⑤</sup>法共的这一举措为社会党同法共就共同纲领的具体内容开展进一步的讨论铺平了道路，法共在推动实现左翼联盟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诚意也赢得了民心。

① 《法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第60页。

② 《改变航向》第128页。

③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201页。

④ 《今日法国政党》第160页。

⑤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201页。

## 二、两党关于共同纲领的谈判与左翼联盟的建立

早在 1969 年后半年萨瓦里担任新社会党第一书记并决定同共产党恢复对话后，共产党代表团和社会党代表团就开始了接触。通过多次会晤，于 12 月 18 日发表了共同声明，其中强调，只有左翼力量的联合才能以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代替保守派的政府。声明宣布，“两党决定将就达成一项政治协议的基本条件进行谈判。这项协议的目标是以新的政治和经济民主制度代替现存制度，并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道路，从而在考虑到法国人民的传统、特点和愿望的情况下共同建设社会主义”<sup>①</sup>。两党于 1970 年 5 月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其任务是根据 12 月 18 日的声明原则研究政治协议的条件。法共总书记罗歇在他于 1970 年出版的《法共的前途》一书中，阐明了法共对两党谈判的态度，指出两党谈判小组“将会仔细地制订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同时他们将以讨论和有益的妥协来取代冲突。在某些问题上，也许不可能达成协议，那么，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多数决定，少数应服从多数”<sup>②</sup>。

经过几个月的谈判，两党于 1970 年 12 月 12 日公布了《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关于政治协议基本条件谈判的初步结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它详细地记载了两党的共同点和分歧点。两党一致主张必须为反对资本主义、争取新的政治和经济民主制度而斗争；一致同意对银行和重要的工业部门国有化，在社会政策方面也有较多的共同点。分歧点则主要表现在对外政策，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领导权及反对党的权利等问题上。

在关于欧洲一体化和北大西洋联盟问题上，共产党认为北约

① 《人道报》1969 年 12 月 19 日。

② 《法共的前途》第 123 页。

是一个由美国控制下怀有侵略目的的政治军事组织，欧共体是大西洋联盟的经济支柱。因此，它反对扩大“超国家主义”的欧洲共同体，反对北约，主张采取“使法国退出大西洋公约的措施”，以维护法国的民族独立与主权。而社会党则主张法国留在北约内，保持与美国的联盟，支持采取积极的欧洲政策，扩大与欧共体及其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

在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法共重申忠于“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已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建设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建立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阶层的政权”；“法共认为，受到大多数人民支持而存在的民主政权，将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当作它的任务，而劳动人民将给予这个政权以更多的信任，这将使它不断得到加强”<sup>①</sup>。法共强调：“一旦结束资本主义政权后，必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将是一张不可能恢复资本主义政权的单程票”。也就是说，法共不认为建立人民政权后会因选举失败出现政权的“更迭”。而社会党则坚持说：“如果国家以自由的意志表明它不再信任多数党，那么，多数党就应该交出政权，在野继续斗争。”<sup>②</sup>这反映了两党对“多党制”的不同理解。法共尽管在 1963 年后就承认多党制，但它指的是与那些在推翻垄断资本，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同它合作的民主党派在夺取政权后继续合作，并不包括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也就是说法共是把作为合作伙伴的社会党的政治权利与反对党的政治权利区别开的。社会党则认为多党制就意味着承认一切政党，包括反对社会主义政党的平等权利。

由于存在上述分歧，也由于法共总书记罗歇患病，谈判共同纲领的问题被搁置下来。1971 年后，随着马歇总书记地位的确立和密特朗完成对社会党的重建，就共同纲领达成协议的谈判又提上

① 《西欧共产主义和政治体系》第 104 页。

② 同上，第 103 页。

议事日程。法共在 1971 年《改变航向》的施政纲领中,改变了原先对于多党制的态度,宣布尊重普选结果,承认反对党的权利,这就扫除了两党联合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对促进达成共同纲领的协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社会党在埃皮内大会后的立场左转和对左翼联盟态度的变化,也使两党的立场进一步接近。

埃皮内代表大会后不久,密特朗就给马歇写信,向他通报了大会关于建立左翼联盟的决定,并让书记处发表了正式声明。1972 年 3 月,社会党公布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后,两党代表团于 4 月 27 日恢复了就共同纲领的谈判。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谈判,双方达成了一份长达 90 页的共同纲领草案。“这是图尔代表大会之后 52 年来,由加香的继承人和勃鲁姆的继承人达成妥协的产物”<sup>①</sup>。从 1959 年后,法共已为共同纲领奋斗了 10 余年。法共认为,共同纲领将使它得以彻底摆脱 1947 年以来在政治上的孤立状态,改善自己在人民中的形象,提高政治地位,为分享政治统治权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此,它准备做出重大让步。而社会党则认为,签订共同纲领,“就会从一个被称为‘革命的’党那里得到保证,重新获得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信任。对密特朗来说,《共同纲领》不是别的,而是一把使社会党人得以打开占领新的阵地的钥匙”<sup>②</sup>。所以,做出一些妥协是值得的。这就使得谈判过程既充满了激烈斗争,也表现出妥协让步。

在谈判中,共产党要求,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达成的立法协议,因弹劾案被通过而遭到失败时,国民议会应随之自动解散,重新选举。这样,法共就可以根据自己选定的时间结束左翼联盟,重新回到选民中去,向政府施加压力。密特朗反对议会自动解散论,他主张,当国民议会对政府表示不信任时,国家元首有权利任命一

① 《密特朗传》第 348 页。

② 同上。

位新总理,这位新总理可以立即向议会提出信任投票问题。其用意在于使共产党承担联合政府破裂的责任并改变议会多数。最后,法共做了让步,社会党的观点写入了共同纲领。

在防务政策上,两党都表示反对核武器,但法共要求法国所有的核武器都应立即销毁。密特朗拒绝了这一点。他说:“在一个没有解除武装的世界上,让法国解除武装,我绝不承担这个历史责任。”<sup>①</sup>法共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固执己见。在对北约和欧共同体态度问题上,法共也做了较大让步,基本上接受了社会党的主张,在共同纲领中写入了“赞成同时解散北约和华约,并同意在继续扩大欧共同体及其机构方面进行合作”。

在国有化问题上,社会党鉴于法共已在核打击和欧洲问题上做出让步,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对 9 个大的工业垄断公司国有化的方案。这一战后规模最大的国有化计划“大大超出了社会党人所愿意接受的程度”。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两党终于在 1972 年 6 月 27 日签署了《共同施政纲领》。纲领宣布,必须对法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深刻变革,以结束现存制度的不公正和无序状态,为实现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具体主张有对金融、保险和大垄断企业国有化,实行企业的民主管理和经济的民主计划化,实现国家机构民主化和保障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利;扩大议会权力,实行比例选举,承认多党制和自由联合,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必须尊重普选的裁决。纲领还提出了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如最低月工资不得少于 1000 法郎,缩短每周工作时间,降低退休年龄,实行免费医疗等等。同时,纲领也阐述了左翼政府的外贸、货币、财政、外交和国际政策等。

尽管共同纲领带有妥协性,尽管两党仍然存在意见分歧,但是纲领得到通过这一事实本身,对于加强左翼力量的团结,争取民主

<sup>①</sup> 《密特朗传》第 354 页。

与社会主义斗争的发展，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共同发表一个完整而又具体的施政纲领，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sup>①</sup> 甚至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一名宿敌，托派领导人阿兰·克里文也说：共同纲领表明“工人阶级中有新的活力，无论人们如何看，共同纲领是工人阶级战斗精神的成果”<sup>②</sup>。

共同纲领的公布，标志着法共为之奋斗十余载的左翼联盟正式形成。它向人民指出了取代右翼垄断资本政权、实现社会民主改革的光明前景，展示了左翼力量联合执政的现实可能性。因此，法共认为：“一项由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签订的共同纲领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具有巨大意义的政治事件。”<sup>③</sup>

① 《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挑战》第 255—256 页。

② 《弗朗索瓦·密特朗》第 136 页。

③ 《法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选编》第 109 页。



## 第四章

### 两党关系的曲折发展

### 与左翼联盟的瓦解

左翼联盟的建立以及两党以共同纲领为基础的合作，在 1972—1977 年间取得了重大成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而且对当时的西欧共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国际工

人运动的宝贵财富。两党为发展左翼联盟，动员人民群众推翻右翼统治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成为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最重要、最有意义、最具有特色的实践。然而，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并未因建立左翼联盟而消除。随着左翼力量的发展，社会党的选票和影响不断扩大，而法共的选票数 and 党员人数逐渐下降，这使两党的矛盾分歧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了 1977 年左翼联盟的瓦解和 1978 年议会选举的失败。

## 第一节 密特朗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与法共的分歧

### 一、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理论”

密特朗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 1968 年“五月风暴”失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在“五月风暴”中，密特朗试图取代戴高乐的努力遭到失败，其声望跌到了最低点。之后，密特朗辞去了一切社会职务，暂时退出法国政坛，隐居家乡，开始系统思考法国左翼的未来。在 1969 年发表的《我之管见》一书中，第一次阐述了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1970 年发表的《可能的社会主义》一书，提出了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定义，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手段，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雏型。1972 年 3 月，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了题为《改变生活——可能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提出了对法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案。这标志着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构想基本形成。此后，密特朗通过一系列文章、讲话、演说以及《政治》、《此时此地》、《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法国的 110 条主张》等著作和竞选纲领，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政策主张，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其主要观点如下：

- 1、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历史使命。密特朗的社会主义

思想是各种学说的大杂烩。他主张把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革命哲学与传统,如自由、平等、博爱原则、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学说结合起来,而不是把某种单一的学说与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密特朗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所代表的东西,甚至也不赞成它的辩证法。”<sup>①</sup>但他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思想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认为马克思主义“可能是产生今天荷载着我们前进的社会主义洪流的最深刻的根源”。在社会党的纲领性文件中,依然保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用语,如承认国家的性质和作用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承认必须夺取政权,才能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密特朗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缺乏对人本身的关心,缺乏人道主义,而且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过于简单。他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从经济到政治”,而列宁则是“从政治到经济”。列宁主张用暴力革命促成革命爆发,然后解决经济任务,在政治上推行一党制和中央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这种制度只能导致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行使绝对权力;使人的自主权以及下层群众的发言权毫无保障”。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明确宣布反对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社会主义有两个家族:列宁的和勃鲁姆的,我属于莱昂·勃鲁姆的传统,所以我不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妥协。”<sup>②</sup>密特朗称他所继承的遗产“全部包括在勃鲁姆在图尔代表大会的演说中”。可见,密特朗对社会主义的阐述和论证带有明显的伦理社会主义色彩。

密特朗从抽象的人的角度解释了社会主义的使命。他指出:社

① 《法国社会党及其领导人物》第 24—25 页。

② 《问题》杂志 1981 年 7 月 20—26 日第 39 页。

会主义“是在一种其本身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道德和伦理之上，是在尊重民主、自由、平等的基本价值之上建立起来的”，其“使命就是组织社会以解放个人，此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使命”<sup>①</sup>。“资本主义领导国家控制经济，获得利润，其唯一目的，是把被迫出卖劳动力来满足生活需要的亿万劳动者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希望解放这些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唯一敌人”。社会主义的宗旨是把人从压迫和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确保男人、妇女、儿童在以平等、博爱为基础的社会里，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同时恪守自己对集体应尽的义务。但是人的解放不仅取决于正式承认应享有某些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而且取决于充分行使这些权力的经济条件是否具备。社会主义创造了这些经济条件。因为社会主义以共同财富，而不是以私人利润为目标，它逐步使投资手段、生产资料以及交换手段社会化。为此，社会党呼吁劳动者组织起来采取行动，通过把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重新归还给社会的办法、民主地消灭剥削，从而消灭阶级。“社会主义无疑是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的充分发展。”<sup>②</sup>它“是一种思想运动，政治和社会斗争，其目的在于扩大人类的自由和人类的责任感，并使之具有充分发展的前途”。

密特朗认为，“法国式的社会主义”所要完成的这种使命是对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和继续。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如果社会主义者在自己领导的国家或改造的国家里提出不适合这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适合这个国家的文化和道德风尚的手段，那么，它只能是一种空想，只能为敌人所用”。而“法国式的社会主义”正是根据法国发展阶段、文化和道德风尚而提出来的，它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法国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所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密特

① 密特朗：《论政治（1938—1981）》第215页。

② 《密特朗传》第62页。

朗主张：“解放人类的最好办法就是忠于 1789 大革命和完成它没有完成的使命”<sup>①</sup>。

密特朗认为，社会党之所以要继承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 and 原则，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口号并没有付诸实施，资产阶级一旦取得了政权就把自己变成了反对这些原则的“统治阶级、压迫阶级、异化阶级”，写在“建筑物门额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等金色大字就“一点一点地被抽掉了内容”；“人权宣言的精神就消逝了”；“大革命时期产生的各种公民权利，在资本主义的语言中竟成了古老的弱肉强食的法则。”<sup>②</sup> 所以，社会党人必须根据社会现状发展和扩大民主自由，实现政治多元化，保障人民有充分的民主自由，尤其是思想、信仰的自由，取消单一的政治价值观，允许多种政治信仰、政治追求和政治目标并存。同时，在政治实践中，应使各党派、集团具有平等的机会，应该允许各党派交替执政。只有实现并保持了政治上的多元化，才能真正实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

密特朗认为：“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敞开着广阔的地盘，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如果希望为人类做出另一种贡献，而不是在两种制度间进行选择，就应在这个广阔的地盘上进行开拓，去播种。”<sup>③</sup> 1981 年，在法国总统选举揭晓前夕，密特朗在对法国《新观察》杂志记者发表谈话时说：法国社会党力图寻找一条“将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多元化同经济的某种集体组织形式结合起来的中间道路”，这就是“法国式的社会主义”。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比苏联模式更民主，比瑞典等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更先进。

2、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密特朗认为：“社会主义是在一

① 密特朗：《政治》第 516、433 页。

② 密特朗：《论政治》第 217 页。

③ 《政治文集》第 581 页。

定地点、一定时间中关于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的科学，或者说对待这些现实的科学态度。如果社会主义提出的方法不符合本国的发展水平的话，这样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的并且是没有成效的。”<sup>①</sup>而与法国现实相适应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是和平的、民主的道路。

密特朗认为，目前只有两条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条是一旦时机成熟，就突然而迅速地像 1917 年那样的流血的过渡道路，即暴力革命的道路；另一条是建立一个由社会党人领导的、得到群众支持的政府，并保留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政府继承特定的资产阶级社会、继承特定的工业国，继承特定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协议”，它不要用一种社会制度直接代替另一种制度，而是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起不可逆转的制度，通过在各方面不断施加压力的办法，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他反对在法国进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密特朗把资本主义社会喻为一堵墙，认为不光要在一个地方推倒它，而且必须从各处同时一齐推，这包括在议会里、在选举中、在企业内、大学和农村等地，特别是在凡有真正决策权的地方，都需要有各种压力集团。同时，应当采取多种多样的行动，在时机成熟时选择某一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这样做要比以革命的名义失去夺得的所有阵地，而最后让革命龟缩在巴黎第五区几百平方米的地方好得多”。密特朗提出，在法国当前社会里，认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与当前的法国社会突然决裂的道路，那是不明智的”。密特朗将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称之为“民主替代”。它“意味着在普选中遭到失败的多数派接受下台，被推翻的政府让位于胜利者”。“这意味着多种思潮和各政治组织可以自由地发挥作用”。因此，“民主替代必然同时意味着接受多党制，承认各党派的作用

<sup>①</sup> 《弗朗索瓦·密特朗传》第 172 页。

和保障它的权利”。他指出，社会党必须依靠人民的选票才会对资本主义进行“民主替代”，否则“左派宁可尊重人民的意愿而丢掉政权，也不能为了保住政权而违背人民的意愿”。这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权在违背人民意愿的情况下为人们谋求幸福”；“无论如何，社会党人不会按照这种逻辑行事，即以自由的名义来消灭自由”。密特朗还指出，“实现‘民主替代’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政治游戏的一种新花样，它将创建一种不可逆转的局势。一旦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各集团之间的关系，要恢复资本主义就不容易了”<sup>①</sup>。

尽管密特朗反对在法国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并不否认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他指出：“如果我在巴西或玻利维亚，我就会说暴力是健康的和必要的”。他认为，“革命无论是采取暴力的还是和平的，首先是决裂”<sup>②</sup>。

3、关于实现民主替代的战略。密特朗认为，为了实现“民主替代”，必须联合共产党，建立左翼联盟。1970年11月，密特朗在家乡希农堡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话。他说：“我们怎样才能推翻多数派，从而动员在数量上和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是多数派的群众呢？我们怎样才能提高政治觉悟呢？最后，我们怎样才能向全体法国人提供一个理想的社会前景呢？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认为需要有两个先决条件：左翼的联合及左翼内部的平衡。”<sup>③</sup>

关于同共产党结成“左翼联盟”的必要性，密特朗指出：首先，“由于六十年代重大转折时期排除了战争和遭受入侵的危险，资本主义再次成为社会党人的头号敌人”。虽然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的扩大，不断影响着社会阶级的内容，但是“无论各社会阶级的内容发生怎样的变化，统治阶级和劳动群众之间的冲突比过去任何时候

① 《密特朗传》第 69—70 页。

② 同上，第 60—61 页

③ 《法国社会党及其领导人物》第 5 页。

都具有更大的现实性”。在这场冲突中，“人们不是属于这一边，就是属于那一边。不存在无人地带”。面对统治阶级的专政，同属被压迫、被统治阶级利益代表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必须联合起来。其次，社会党与共产党“在确定新型的社会和实现这个社会的战略方面是一致的”，“因为它们的目标都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结构，把所有受资本压迫的人解放出来”。另外，“共产党与社会党都是扎根于工人阶级”。除了工人阶级之外，它们还面向受剥削的所有社会阶层和社会职业集团”。这些都是社会党与共产党组成“左翼联盟”的共同点和基础。“让人民的各种力量永远分裂下去，那肯定会失去改变事态发展的一切机会”<sup>①</sup>，社会党与共产党除了联合外别无选择。

密特朗热衷于同共产党联合，是同两党关系发展的历史分不开的。从第一章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党与共产党分裂的时候，往往恰是它衰退的时期；与共产党人联合的时候，往往也是它兴盛的时候。加之，战后法共在历次选举中的得票率都在20%以上，因而密特朗意识到只有通过同共产党联合，借助共产党的影响和势力，才能振兴社会党并上台执政。这种与共产党联合的战略明显地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取得政权的战略，这也正是密特朗“法国式社会主义”的独特之处。

密特朗“左翼联盟”战略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即通过与共产党的联盟，争夺对劳动阶级的领导权。密特朗指出，“左翼联盟”必须建立在一个强大的社会党的基础上。“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这就迫使我们更好地意识到我们的责任左翼内部的平衡主要在于组织上的统一只有组织上的这种统一才能使左翼实现平衡，才能使左翼联盟富有成效，才能使左翼成为多数派。”

① 《密特朗传》第75-76页

② 《法国社会党及其领导人物》第6页。



1976年,面对党内部分人要求放弃左翼联盟的倾向,密特朗在法国社会党社会主义研究所举行的关于“社会党复兴和左翼团结”的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既要反对那种认为社会党能够单枪匹马解决各种政治问题,从而抛弃左翼联盟的宗派主义观点,又要反对放弃以社会党为核心的思想。这表明,密特朗建立左翼联盟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社会党的纲领和政策,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以便在选举中取得议会多数,夺取政权。

4、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手段和目标。通过左翼联盟夺取政权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密特朗的回答是,依靠人民的力量,通过结构改革,实现“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目标。

密特朗认为:“现代世界上,人对人的剥削是从经济开始的。”因此,“要结束剥削,必须从改革经济结构入手。”<sup>①</sup>瑞典社会民主党虽然在福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瑞典模式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没有打击垄断资本及其利润来源,没有剥夺资产阶级的经济决策权。一旦保守党重新获得政权,就可能在短期内破坏社会民主党人多年执政的成果,迅速恢复大资本的垄断统治。所以,“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应有别于世界上其它形式的社会主义。我们不仅要实现制止人剥削人社会的愿望,而且也要大大触动经济结构,实现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化。”<sup>②</sup>

密特朗指出,半个世纪以来,资本垄断高度集中,垄断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结构、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而且由于它们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也越益集中,使议会丧失了许多权力,从而形成个人专断的局面。这种经济结构、生产关系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国家的“同一性”,已成为“发展自由和责任感以及人类个性的主要障碍”。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结构改革打击大资本及利润来

① 《新观察》杂志 1981年5月5日。

② 《世界报》1981年12月11日。

源，限制资本的经济权力，同时通过改革税收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等，以保证收入的转让，使工人有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实现工人自治管理，使公民更加接近决策中心，最终实现劳动者自己组织对生产的监督和对劳动成果的分配。密特朗认为：“自治管理扩大到全社会将意味着剥削的结束和敌对阶级的消失，使民主成为现实。”这就是“法国式社会主义”的目标。

可见，结构改革是密特朗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核心。在密特朗看来，这种触动经济结构的改革本身就具有革命性质。1981年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的《为了社会主义，争取变革成功》的决议中指出：“我们进行的是革命的变革，它要深刻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这种变革是‘平静的’，即没有暴力。”文件分析了在法国进行这场“平静的革命”的可能性：人民的大多数赞成变革，支持走向社会主义的政策；一个民主的社会党拥有强大的中央政权和强大的地方政权网；法国资本主义几十年来形成的结构性因素也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些都为“有步骤地、民主地（即通过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团结一致地同资本主义决裂”创造了可能性，使通过“平静的革命”进行结构改革成为现实。

社会党人认为，革命的变革尽管是“平静的”，但也是一场斗争。“争取政权是决定性的一步，但它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结束，它不是绝对制胜的武器”<sup>①</sup>，在某些情况下，必然会有冲突。为此，必须依靠人民力量的支持和参与，“在今天的形势下，只醉心于左翼政权与反对变革的力量之间面对面的谈判，不发动人民力量及其组织进行干预，是危险的和有害的”。“对任何政权来说，脱离人民力量而孤立是致命的弱点，对一个左翼政权来说尤其如此。”左翼政权的存在有赖于人民意志的活跃，因为“它的使命不仅是保住政权本身，不仅是管理和维持现成的东西，而且还要进行变革”因

<sup>①</sup> 《共运资料选译》1982年第5期第14—17页。

此,社会党人认为:“为了对付可能发生的事情,战胜现存结构和习惯势力的抵抗,把机构的活力同人民运动的活力结合起来是不过分的。”<sup>①</sup>

密特朗认为,这种以同资本主义决裂为目标的、依靠人民力量及其组织支持的深刻的结构改革,是他的“法国式社会主义”较之其它社会民主党更加先进之处。密特朗把自己的这种社会主义概括为:“阶级斗争和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优于市场法则的社会主义,对垄断资本实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实现基本权利要求的社会主义。”<sup>②</sup>

## 二、法共与社会党的主要分歧

上一章曾概要地介绍了法共法国色彩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这里又对密特朗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和特点做了概述。之所以在这方面花费笔墨,就在于我们只有从两党理论对比中,才能了解两党对社会主义认识和指导思想上的异同,才能弄清楚两党关系时分时合、时好时坏的深刻原因。

法国社会党属于社会党国际的左翼,其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具有比较激进的色彩,所以,两党的社会主义主张以及政策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如两党都主张通过民主的、议会的道路,建设符合法国特点的民主社会主义,都强调尊重民主、主张多党制、混合经济、对垄断资本实行民主改革,不要无产阶级专政;都主张通过建立左翼联盟,争取群众的大多数,赢得议会选举胜利,夺取政权;都主张维护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要求和平裁军,建立国际新秩序等,这些一致点是促使两党走到一起的动因但如果我们对双方的观点仔细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两党是有原则区别的。

① 《共运资料选译》1982年第5期第14—17页。

② 《密特朗传》第63页。

1、指导思想的基础不同。法共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揭示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而法国社会党则宣布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思想体系上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主张思想来源的多元化，把人本主义、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都作为理论来源，以抽象的人的价值、人的自由解放等观念为其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认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并不在于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而是人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映出来的要求实现社会公正、自由、实现人的价值的良好愿望的结果，是一种信念而不是一门科学。强调社会主义思想的伦理性。这种对立正如密特朗曾说过的：“在第二国际同第三国际之间，在共产主义和我们社会主义之间，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2、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不同。两党尽管都主张通过民主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并不一致。法共主张通过除暴力外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争取实现深刻的变革，由工人阶级和城乡其他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夺取政权，把主要的生产和交换资料收归国有，以结束人对人的剥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并以此作为向共产主义迅速前进的基础，最终目标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即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法国社会党则主张在不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度的国有化、计划化和自治管理，对法国经济进行渐进的结构改革，即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现存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取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某些局部改良。所以，这种社会主义不可能越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充其量只能是管理资本主义。很难设想，在资产阶级仍然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并控制着国家生活主要领域的情

况下，结构改革的社会主义能消灭剥削，给劳动者带来彻底的自由和解放。正如法共所说：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在任何地方实现社会主义，甚至没有考虑过和资本主义决裂。

3、对待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不同。法共承认列宁是伟大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列宁思想和某些教导至今仍有指导作用；肯定十月革命，承认苏联东欧是社会主义国家，肯定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并同苏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对其破坏民主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认为他们是并不理想的社会主义，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而法国社会党则根本否定列宁的历史作用，否定十月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国家，是独裁制度。指责共产党人利用社会的分裂建立自己的一党专政，社会主义国家无视人的尊严，消灭人的自由和破坏法制，侵犯人权。在国际上主张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

4、在左翼联盟的领导权问题上，两党立场截然对立。两党建立左翼联盟的目的，虽然都是为了推翻大资本的统治，建立左翼政权，但在左翼联盟的领导权上，两党却各有自己的考虑法共力图凭借自己强大的组织，取得联盟的领导权，利用左翼联盟削弱对手，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达到参政的目的。而密特朗则想建立一个以社会党为核心和主要力量的左翼联盟，通过联盟把法共的市民争取到自己一边，使共产党在左翼联盟中处于从属地位。

上述根本对立，使两党在联合参加竞选、夺取政权过程中，对取得领导地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也导致两党联合执政时期在经济改革方案、国有化、社会福利政策等方面发生严重分歧，这些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和观点对立，成为两党最终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

## 第二节 两党在左翼联盟期间的合作与斗争

### 一、共同斗争的进展与成果

以共同纲领为基础的左翼联盟的建立，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由于“共同纲领日益具体地反映了劳动者要求变革的愿望，日益唤起千百万法国人追求更加美好的新的生活的憧憬”<sup>①</sup>，并向统治阶级提出了有力挑战，因而受到了广大左派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遭到了资产阶级右翼的猛烈攻击。为了更好地宣传、捍卫和实现共同纲领，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采取了一系列联合行动，在组织群众同右翼势力的斗争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 1972 年底举行的法共二十大上，马歇“主要是详细阐述和评价共同纲领”。马歇指出：“我党和社会党一致赞同一个如此明确、内容如此进步和范围如此广泛的纲领，在两党关系史上这是第一次”；“共同纲领的胜利将建立并不断发展先进的经济社会民主，为使法国过渡到社会主义，为法国人在一个繁荣的国度里更美好地生活创造条件”；法共号召全党“投入更大的精力为争取共同纲领的胜利而斗争”；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加强并在行动中实行各左翼政党以共同纲领为基础的联合。一切为了纲领的胜利”<sup>②</sup>。

在法共的努力下，左翼联盟各党一致同意避免影响共同纲领取胜的争论，设立三党之间的党务联络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三党还经常联合召开群众大会，采取各种形式的统一行动和联合表

<sup>①</sup> 乔治·马歇：《让我们说实话》第 95 页。

<sup>②</sup> 《法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选编》第 47—50 页。

态，抗议物价上涨和课税加重，要求各民主党派有权参加法国广播事业局的全国性和地方性机构。三党议会党团还以共同纲领的条文为基础，共同起草联合提案，在各地、各基层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宣传和讨论共同纲领。1972年12月1日，巴黎10万群众响应联络委员会的号召，举行了声援共同纲领的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决心为共同纲领的胜利进一步加强联合。

为了巩固和加强同社会党的联盟，争取更多的群众支持，法共在为共同纲领的实现开展活动的同时，也努力使自己对未来社会的主张更接近法国现实和人民的愿望。马歇在法共二十大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行政党自治和多党制是必要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应该有正式规定的国家意识形态，法共决不会把自己的哲学作为社会和国家的“官方”哲学，也不想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变成整个社会组织的样板。在1973年出版的《民主的挑战》一书中，马歇写道：“我曾经指出，在我们工作的任何阶段，我们意在尊重全部自由，其中自然包括结社自由。当然也指政党成立和活动的自由，包括反对党在内在社会主义法国，少数党的权利将受到严格尊重，只要他们根据民主规则和法律范围活动。反对党由于具有与其它团体同样的自由，由于在所有选举中都实行比例代表制，这样，他们聚集新的多数的权利就能得到保证。”<sup>①</sup>马歇还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对我们有利或者不利，我们都尊重由普遍、直接、秘密和按比例投票作出的裁决。”这一承诺比共同纲领又前进了一步。

密特朗在共同纲领签署后，加强了对苏联内外政策的批评，以显示自己同共产党的区别。在与共产党保持距离的同时，密特朗也热心地为共同纲领进行活动。他同乔治·马歇和两个主要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举行了多次联合会议，讨论共同行动问题，大大促进

<sup>①</sup> 马歇：《民主的挑战》第129—130页。

了两党和两大工会组织的统一行动。左翼三党通过越来越频繁地开展联合行动“日”和行动“周”，支持和组织反对政府经济政策的示威游行和罢工，有力地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热情高涨的时期，两党党员人数都大幅度地增加了，出现了冷战以来所没有见过的新势头。

1972年12月1日，密特朗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说：“尽管有共同纲领，尽管我们有共同意愿，可是除非我们每个人愿意对我们的行动负起责任并且愿意为其他人分担责任，否则我们就不能改变生活。”<sup>①</sup>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密特朗说，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和北京，苏共在二十大后的非斯大林化，东西方和平共处的到来，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等等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在这个新纪元里，法国共产党享有充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密特朗强调，他准备同共产党一道掌权。

1973年，密特朗出版了《拳头和玫瑰》一书，为共同纲领作了有力的辩护。书中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他赞同国有化的理由，作为对右派攻击国有化的回击。他认为，国有化本身并非是一个可取目标，但是，由于一些大公司控制法国经济部门的权力太大，以至于只有公有制才能确保这种权力用于为整个社会利益服务。他写道：“有了所有权，就有权力大垄断财团、银行和大公司的所有权使几十个人可从5000万法国人身上捞取利润。剥夺他们的所有权就是剥夺他们的权力。……国有化不等于社会主义。但是，它是谋求改变权力结构的一个关键手段。不仅为社会党所追求，而且为所有想摆脱以人剥削人为基础并从中获利的制度的自由人所追求。”这种明确的态度和积极的行动，既有利于发展两党联合的势头，又大大改善了社会党在左派群众中的形象。

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左翼联盟的力量和影响在70年代中期

<sup>①</sup> 《弗朗索瓦·密特朗——一部政治史诗》第138页。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 1973 年的议会选举中,左翼各政党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参加竞选, 同上届立法选举溃不成军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果, 共产党得票 5063981 张, 占总票数的 21.3%, 社会党和激进党得票 4899965 张, 占总票数的 20.8%; 其中社会党 19.3%。法共议席由 34 席增加到 73 席, 社会党席位从 57 席增加到 106 席。分别比上届议会议席增加近一倍和一倍以上。选举表明, 法国政治生活的轴心明显左转, 原来支持戴高乐派的工人阶级选票又回到了左派一边。左翼政党以强大的阵容出现在国民议会中, 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并将从根本上改变法国的政治格局。

1974 年 4 月 2 日, 法国总统府宣布: 总统蓬皮杜因患癌症医治无效逝世, 法国将提前举行大选。这时, 法国左翼政党自上届总统选举以来, 情况已大为改观, 社会党实现了革新和统一, 并和共产党建立了左翼联盟。在这次总统选举前夕, 左翼联盟正处在蜜月期。4 月 4—5 日, 社会党、法共和激进党通过充分协商, 一致推举密特朗为左翼联盟统一的总统候选人。法国两家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工会联合会, 以及全国教师联合会都声明表示拥护。左翼统一候选人的顺利通过, 无疑地是对右翼多数派的严重挑战。在竞选过程中, 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左翼激进党人团结在共同纲领周围, 协力组织各种集会, 张贴宣传画, 散发传单, 热情地为密特朗拉票。而右翼候选人也充分利用集会、报刊和电视来塑造自己的变革形象。结果, 在参加第一轮选举的三个主要候选人中, 密特朗独占鳌头, 所得选票占有效票总数的 43.4%; 右翼的德斯坦和沙邦·戴尔马各得票占 33% 和 14.6%。最后的决战将在左右翼两名候选人密特朗和德斯坦之间进行。

为了争取中间派选民, 确保左翼的胜利, 法共发表声明表示, 如果左翼一旦掌权, 它将放弃原来一直想得到的内政部、国防部和外交部的职务, 以消除中间派选民的疑虑, 增加左翼的吸引力。 5

月 19 日，各党派在紧锣密鼓的气氛中举行了第二轮选举。投票结果揭晓，右翼候选人共获总有效选票的 50.6%，密特朗得票 12737607 张，占总票数的 49.3%，仅以 1.26% 微弱劣势败于右翼多数派候选人德斯坦，取得了 1946 年后左翼力量最好的选举结果。左翼在这次选举中的团结也是前所未有的。法共认为，这次选举是共同纲领和联盟政策的引人注目的胜利。同时，这一胜利也大大加强了密特朗作为左翼联盟旗手的地位。它标志着经过分化和组合后的左右两极政治力量的对比达到了一个新水平，最终形成势均力敌的两极。

总统选举后不久，法共和社会党在一些问题上开始出现了摩擦，但这并未影响两党力量的发展。在 1976 年的地方选举中，左翼得票 52.5%，第一次超过右翼多数派。在 1977 年 3 月的市政选举中，左翼联盟又获大胜，得到 51.5% 的选票。在法国 39 个人口超过 10 万的大城市中，左翼联盟控制的数目从 1971 年的 12 个上升到 22 个。在人口超过万人的 221 个城市中，左翼联盟执掌政权的城市从 1971 年的 89 个增加到 157 个。左翼联盟在各次选举中频频告捷，令人刮目相看。

除了联合竞选外，左翼各党还在保护劳动人民社会经济利益的各个方面进行共同行动。1974 年 4 月和 1975 年 4 月，左翼各党通过了减少失业、提高劳动人民购买力、扼制通货膨胀的共同文件。在 1975 年，左翼联合召开了上百次群众大会，为实现共同纲领提出的要求而斗争。

选举的胜利和左翼的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两党。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从 1971 年的 40 多万增加到 1977 年的 60 余万，社会党的党员人数从 1971 年的 8 万增加到 1977 年的 16 万。民意测验和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左翼联盟可望在 1978 年议会大选中获胜。

## 二、矛盾分歧的发展与加深

在左翼联盟力量不断发展的同时，联盟的内部矛盾，主要是社会党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日益尖锐化。

社会党和共产党无论从意识形态、指导思想、阶级基础，还是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上都存在着根本分歧。两党尽管在建立左翼联盟，反对垄断资本，通过议会多数取代右翼政权，实现社会主义方面有着共同愿望；但由于共产党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而社会党则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的以领薪阶层为基础的党，因此，他们在对社会主义的道路及所要达到的目标上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主张。共同纲领作为两党妥协的产物，只能使两党在为实现近期目标——推翻现政府，成为执政党，实行有利于人民的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暂时联合起来，而不会因此消除意识形态分歧和在原则问题上的对立。正如密特朗所说：“契约就是契约，它包含着相互保证，我们不是为了等着受骗而签署两党协议，我们也无意欺骗我们的伙伴。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社会党还是社会党。他们和我们都不会因为签署共同纲领而改变自己的哲学。我们是由纲领所写明的东西，而不是由它没有写的东西联系在一起”<sup>1)</sup>

那么，没有写的东西是什么呢？在共同纲领签订两天后召开的法共中央全会上，马歇说：“正如法国的全部历史表明的，社会党作为一个组织，代表着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倾向。埃皮内代表大会并未消除它的本来面目。……我们对于思想上的联合不感兴趣。……我们所寻求的不是这个。现在共同纲领已经达成，我党将忠实地遵守其条文。但是有必要非常密切地注视并且始终捍卫我党的真正立场它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独立性，并且努力争取在组织上的更大

1) 《弗朗索瓦·密特朗——一部政治史诗》第 138 页

影响。”<sup>①</sup> 马歇在法共二十大谈到 1973 年议会选举问题时说：“我们决心使我党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在我们尽可能获胜的同时，使整个左翼也取胜，这就是我们的目的。”<sup>②</sup>

从社会党方面看，密特朗在签署纲领的第二天，就在社会党国际执委会上说明了社会党的真实意图：“我们的基本目标是在被共产党占领的地方重建一个伟大的社会党，并且表明 500 万共产党选民中可以有 300 万人投社会党的票。”<sup>③</sup> 密特朗认为，由于社会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中产阶级，在社会党议员和领导人中没有工人阶级的代表，所以社会党只有通过共产党才能接近法国工人阶级。同共产党签订共同纲领将从组织上把社会党同法国工人阶级联系起来，并且开始把社会党看成是工人阶级权益捍卫者的进程，最终吸引共产党的选民，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使社会党成为左翼联盟的主导力量和法国“第一大党”，并通过左翼联盟促使共产党“自由化”。

《共同纲领》中反映出来的两党分歧以及共同纲领背后不同的出发点和动机，使两党在合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激烈的斗争。在左翼联盟的最初几年，法共力量强大，在联盟中处于有利地位，并不担心左翼联盟的发展会削弱自己，因而对社会党的妄言只是嗤之以鼻。而社会党在还不足以与共产党抗衡的情况下，也潜心努力，力图通过同共产党的合作发展自身。所以两党尚能互相支持，共同斗争，度过了三年的“蜜月”。

1974 年总统选举后，特别是 9 月份的 6 次补缺选举中，法共有 5 次得票落在社会党的后面。这使法共感到，密特朗关于使社会党超过共产党而成为法国第一大党的雄心似乎已不再是遥远的梦

① 《弗朗索瓦·密特朗——一部政治史诗》第 136 页。

② 《法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选编》第 75 页。

③ 《弗朗索瓦·密特朗——一部政治史诗》第 137 页。

想，法共为此非常不安。1974年10月举行的法共二十一大，讨论了新形势下的两党关系问题。马歇认为，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计划已使它忘记了更为迫切的共同纲领。社会党想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重新平衡左翼，而共产党则希望保持自己的第一大党地位，所以左翼联盟内部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是为了削弱一方，使其成为另一方的附庸。会上，法共提出：为了争取法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为实现民主改革创造更好的条件，必须扩大左翼联盟，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建立法兰西人民联盟。扩大了联盟应包括工人阶级，白领工人，中等阶层，知识分子，农民，中小企业主，妇女，青年，“甚至戴高乐主义者”，因为他们对法国独立的关心使他们能够反对德斯坦的“大西洋政策”<sup>①</sup>。但工人阶级要在联盟中起领导作用。法共试图联合除右翼执政党以外的所有政治团体，扼制社会党的发展势头，并避免与社会党单独交锋。

法共联盟战略的这种变化，遭到了社会党的强烈反对，由此引起了两党关于“人民联盟”和“阶级阵线”的论战。社会党指责共产党扩大联盟是“同民族主义右派实行妥协，以便使法国靠拢苏联的轨道”<sup>②</sup>，背叛左翼联盟。1976年1月，密特朗在社会党执行局会议上发言说：“共产党领导人被迫把我们当作他们的盟友。历史迫使他们这样做。但是他们不会坚持下去。他们更喜欢的不是左翼联盟，而是一种类似民族阵线的混合体。总之是一种范围更为广泛的同盟，让我们淹没在右派之中他们提出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口号，就有这种意图”。<sup>③</sup>“因此，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把这种图谋付诸头施”。<sup>④</sup>社会党指责说，法共设想的联盟是一个良莠不分的大杂

①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207--208页。

② 《密特朗传》第389页。

③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207--208页。

④ 《密特朗传》第389页。

烜”；“是没有明确目标的不满者的联盟”，它同法共长期以来坚持的阶级斗争必要性的信念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社会党坚持“阶级阵线”的口号，与法共“人民联盟”的口号对抗。

社会党认为，阶级阵线是一个“由绝大多数受剥削的雇佣劳动者组成的广泛阵线”，但非垄断阶层的保守部分不能列入阶级阵线。由于工人、职员、技术员、研究人员等靠工资为生的不同阶层受剥削的方式已逐渐同工人阶级趋同，“因而他们都正在同工人阶级汇合在一起。但不是作为工人阶级的同路人或盟友，而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伙伴。”社会党认为：“我们的事业在不久的将来能否获得成功，既取决于左翼联盟是否巩固、自治管理能否实现，同时也取决于阶级阵线是否能够得到加强。”<sup>①</sup>

而共产党则批评“社会党的阶级阵线观点有很多模棱两可的东西”；“似乎总经理在阶级阵线中也有他们的地位。”法共认为，这种否定社会先锋的概念会把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埋没在一个毫无区别的整体中”<sup>②</sup>。

由于法共的主张既没有得到左翼联盟内各党的支持，又未得到其他政党的响应，这场论战以共产党的失败而告终。而社会党在论战中坚持左翼联盟和阶级阵线，又为自己赢得了一分。

在法共提出人民联盟口号的同时，社会党于 1974 年 10 月召开了“社会主义者大会”，旨在扩大社会党的队伍并讨论工人自治理论，以使支持社会党的趋势继续发展，形成一个足以抵消共产党在工人中影响的、拥有强大基础的更加广泛的社会党。会上经过讨论，将“工人自治”的理论正式纳入社会党的思想体系中，成为其理论的三大支柱之一。同时吸收原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罗卡尔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总书记梅尔加入社会党，由此带动了一大批统一

① 《社会主义新杂志》季刊 1977 年总第 29 期。

②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第 352—356 页。

社会党党员和劳工民主联合会的成员加入社会党。社会党还发展了其他一些知名人士和经济专家，如法国驻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代表克洛德·谢松、经济学家德洛尔、前戴高乐派的政府部长埃德加·比撒尼以及勃鲁姆的儿子入党，大大加强了社会党的力量。

在 1975 年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社会党内与共产党观点最为接近的左翼“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的代表被赶出社会党全国领导机构。这一事件同罗卡尔和德洛尔进入领导班子以及对自治理论的强调，都使法共认为社会党正日益右转。因此，

《人道报》和法共领导加强了对社会党的批评。《人道报》总编勒鲁瓦撰文说：“社会党领导的态度是企图削弱共产党，而且必须说这种态度是与大资本家们有联系的，这些大资本家估计到左翼行将获得胜利，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要紧的事就是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法共总书记马歇也指责说：“米歇尔·罗卡尔又一次参加那些灾难的预言家的大合唱，主张采取打击人民群众的紧缩措施”<sup>①</sup>，并说密特朗正在变的过分自信和盛气凌人。左翼两大党的矛盾日益公开化。

1974 年后，两党的另一个重大分歧是对于法西斯政权垮台后葡萄牙局势的看法。葡萄牙民主力量联合斗争推翻独裁政权后不久，共产党和社会党就由于革命发展方向和应当采取的具体改革措施发生了争论。对此，法共站在葡共一边，支持库尼亚尔建立“人民运动和武装部队运动的联盟”，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主张。而密特朗则支持葡萄牙社会党制定的民主选举政策，并为葡社会党拒绝与共产党联盟辩护。葡萄牙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两党之间的分歧。1975 年年中，《人道报》发表了 1972 年共同纲领签署后马歇在中央委员会上关于社会党本性的秘密讲话，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

<sup>①</sup> 《弗朗索瓦·密特朗——一部政治史诗》第 168、169 页。

这一时期，尽管两党矛盾分歧不断加深，两党争吵时断时续，关系时缓时紧，但仍维持在联盟的范围内。左翼力量联盟仍然是国内社会政治发展的主导因素。在 1976 年的地方选举和 1977 年的市政选举中，两党的联合使左翼在第五共和国时期第一次获得了 50% 以上的多数票。而社会党的选票也第一次以 28% 比 21% 超过了共产党。“社会党在 1974 年至 1977 年的惊人跃进”，使共产党不得不面临着在左翼联盟中充当小伙伴的可能性。而密特朗则摆出了要在 1978 年议会选举取胜后组织政府的架势。左翼联盟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左翼联盟的发展出现了危机。

### 第三节 左翼联盟的瓦解

#### 一、修改共同纲领谈判的失败与左翼联盟的瓦解

1977 年 3 月，左翼联盟在市政选举中获胜对法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左翼联盟很可能在 1978 年 3 月的议会选举中获胜而组织联合政府，那么，是否以 1972 年制定的共同纲领作为执政基础？二是社会党在左翼联盟中占居第一把交椅已确定无疑，法共如何对待这一变化？

为了讨论 1977 年 3 月选举后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法共于 3 月底召开了中央全会。马歇在题为《走向民主变革》的报告中提出，距 1978 年 3 月很可能获胜的议会选举不到一年，面对法国社会的总危机，面对贫困、不平等、不公平、浪费和放弃民族自主的局面，一切都要求左翼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忠于已为广大劳动者认可的纲领，把改变法国事态进程的愿望化为实际行动。报告认为，共同纲领的总方针和重要目标今天依然完全适用。但尽管如此，1972 年以来在许多方面情况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必须根据 1972



—1977年间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失业的增加,生活费用的上涨,吉斯卡尔的紧缩政策和对外政策中对美国和大西洋联盟日益增长的依赖性,修订共同纲领。”<sup>①</sup> 马歇认为:“要使共同纲领在 1977 年能够保持其全部有效性,要使纲领的实施确实能够带来处境日益窘困的法国所渴望的变化,这样的修订是必不可少的。”<sup>②</sup> 因此,法共于 1977 年 3 月 31 日向社会党和激进党建议,着手修订 1972 年的纲领,其目的“仅仅是要使共同纲领的条款确能保证 1978 年能够实现它在 1972 年规定的真正的民主变革”<sup>③</sup>。

针对党的选举力量下降的趋势,法共在会上更多地强调自己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特性,以与社会党争夺工人阶级选民。马歇在报告中说:“共产党的形象应该越来越与这样一种事实相适应,即它是劳动人民的党,是从事劳动的普通人的党,是人们关心和寄予期望的党,是要结束贫穷、困苦、不公正和剥削的党。”<sup>④</sup> 会后,法共全力以赴地投入争取修订共同纲领的斗争中。4 月份,法共具体地提出了修改共同纲领的建议。其中包括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家庭和住房补贴,缩小工资差距,扩大国有化规模,征收高额财产税,将经济增长率提高到 6% 等等。5 月 10 日,法共在《人道报》上公布了实施共同纲领所需资金的预算,把“让富人出钱”作为实现改革的主要资金来源。5 月 11 日,法共政治局委员卡纳帕又宣布,鉴于常规力量正在日趋没落,不能有效地保证国防,法共决定放弃反对核武装的立场,“赞成法国拥有核打击力量。”<sup>⑤</sup> 这些激进的经济政策和支持核打击力量的主张一经提出,就在社会上引起轩然

①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 214—215 页。

② 《让我们说实话》第 96—97 页。

③ 《人道报》1977 年 4 月 1 日。

④ 《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挑战》第 279 页。

⑤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 215 页。

大波。右翼总理巴尔乘机说密特朗将以共产党宣布的不现实的经济预测作为共同纲领未来将如何实施的依据，使密特朗在电视辩论中陷于被动。

5月17日，左翼联盟三党领导举行会谈讨论共同纲领修改问题。密特朗宣称，整个事情在一小时内就可以解决，因为只需要几处细小的修改，“整个纲领将维持不变，不能有任何重大的修改或增订”。“法共则坚持，有问题的地方远不止这些细节。”最后，密特朗勉强同意，成立一个由15人组成的工作小组讨论共同纲领的修改。两天后，在社会党南特代表大会上，密特朗说：“社会党应该在左翼联盟取得支配地位。社会党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而不是花大量的时间修改已经达成一致的共同纲领。社会党人的首要职责是完成自己的纲领。”<sup>①</sup> 这表明了社会党对修改共同纲领的消极态度。

7月底，三党工作小组就已达成的共识和仍在争论的问题提交了报告，并决定9月14日举行高级会谈，讨论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国有化的程度、最低工资额、缩小收入差距的方法、社会保障措施、未来政府的组织，以及核政策。在国有化问题上，法共认为一定程度的国有化是实现变革的基本条件，主张除对9大垄断集团总公司实行国有化外，还要对这些集团中拥有51%以上股份的子公司共729个企业实行国有化。而社会党和激进党则只同意对拥有98%以上股票的共227个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共产党还主张对全部钢铁工业公司实行国有化，而其他两党则只同意实行公私合营，认为国有化过多会产生官僚主义和低效率。

在社会保障问题上，法共主张大幅度提高工资和增加福利，要求将最低工资从2000法郎增加到2200法郎，家庭补贴提高50%，通过建立新的工资等级制度和提高低工资，使工资差距缩小为1:5，提高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一系列福利待遇。密特朗则

<sup>①</sup> 《弗朗索瓦·密特朗——一部政治史诗》第184页。

以即使在苏联,1:5 的工资差距也是不存在的为论据,批驳法共的主张,反对大规模提高工资福利,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许愿,会损害法国经济,加剧通货膨胀,使左翼政府无法治理国家。主张维持共同纲领中的规定。

在核打击力量问题上,法共认为,核武器是“当前和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唯一有效的防务手段。放弃核武装,就等于放弃一切真正的防务”,“就不能保卫共产党和社会党政府对抗外部侵略”<sup>①</sup>,维护法国独立。密特朗则说:“尽管我们反对(核武器),但既然法国军队二十年来已围绕着核威慑来建设。因此我们应当尊重这一现实,否则就要放弃国防”“因此我们没有把卡纳帕报告作为决裂的理由”“但是我们并不因而赞同卡纳帕的主张。”密特朗认为,法共提出使用核武器的前提条件,如必须采取“全局战略”,必须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放弃针对城市的战略”“使用原子武器必须由各军的首领、政府部长和各党派一起决定”等,“实际上不是表示共产党支持自主国防,而是表明要毁掉这一国防的一种新的、更隐秘的、更巧妙的尝试”<sup>②</sup>。

在税收政策方面,法共主张对富人征收高额财产税和资本税,“使收入最高者交付的税收率达到 85%”,认为这样才能促使企业更好地利用自己的生产手段,更好地使用资本的开支。<sup>③</sup>而社会党则拒绝法共征收财产税和资本税的建议,认为这样会把中间派选民吓跑。

在政府的组织上,法共主张政府的组成应以各党在选举中的影响为基础,即根据得票比例分配部长席位,并要求当左翼联盟中任何一个政党决定退出联盟时,政府就应自动解散。而社会党则主

① 《西欧共产主义和政治体系》第 114 页。

② 密特朗:《此时此地》第 55 页。

③ 《让我们说实话》第 65 页。

张政府的组成应与议会选举一样，根据多数原则决定。

在政府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问题等方面，两党也存在尖锐的分歧。

由于双方各执己见，在会谈的第一天，激进党领袖法布尔就宣布退出会谈，抗议法共对《共同施政纲领》进行全面修改，反对“法国社会朝官僚集体主义发展”<sup>①</sup>，高级会谈中断。与此同时，密特朗抓住马歇在法共《修订后的政府共同纲领》宣传手册序言中写的一段话大做文章。马歇写道：“总之，正如我们提议的那样，应该做的是实施修订后的共同纲领。我们去年1月7日至8日的全国大会将它作为法国共产党全国纲领的，正是这份纲领。”<sup>②</sup>密特朗据此谴责法共要用自己的纲领代替共同纲领，提出“要共同纲领，不要共产党的纲领”的口号。

9月21日，三党恢复谈判。在谈判中，每一方都指责对方应对谈判破裂负责，自然地，也就花费大量的时间争论责任。从技术上说，双方都有责任，社会党和激进党不肯作出任何让步，而共产党则死抱住“最低限度”国有化不放。然而，更重要的并不是每个代表团在会谈中的表现，而是这些行为背后的政治动机。实际上分裂并不是政策上的，而是意识形态的，正是这些原因，使三方达成协议成为不可能。9月23日，三党宣布会谈破裂。左翼联盟陷于瓦解。

## 二、左翼联盟瓦解的后果与两党的论战

左翼联盟破裂后，两党都提高了指责对方的调子。马歇于1978年议会选举前夕，出版了《让我们说实话》一书，阐述了法共对左翼联盟破裂的看法及今后对联盟的态度。

法共认为：“关于修订共同纲领的讨论过程证明：从年初起，社

① 《1940年以来法国的政治生活》第666页。

② 密特朗：《此时此地》第57页。

会党已明显向右转。它拒绝就修订共同纲领达成协议,从而决心把共同纲领抛在一边。”<sup>①</sup>马歇指出:“为什么社会党决心要分裂左翼呢?这是因为:社会党的性质和它的全部历史,领导机构的社会成分,它在理论上缺乏连贯性,和它长期与右派进行合作相联系的”。“社会党仍然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党”,因此,“它极易屈从右派以及国际上对联盟的压力,特别是参加社会党国际的各社会民主党的压力”向右转。马歇揭露说:“一旦左翼的力量对比对社会党有利,一旦它能够驾驭左翼时,它将重新执行与大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的政策,这也不是凭空捏造,这只是历史的教训。”并说,社会党拒绝修改共同纲领,表明它“只是高谈阔论社会不平等,而同时却又拒绝纠正这些不平等的措施”。“社会党抛弃共同纲领的结果,不是向前迈一小步,而是向后退一大步。这是迎合大资产阶级愿望和图谋的一步”;社会党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根据大资本的利益处理社会危机”,其后果只能是“给人民和民族造成苦难的紧缩政策和忠实地管理大资产阶级的事务”<sup>②</sup>。

在批判社会党背叛左翼联盟的同时,法共也反驳了社会党指责共产党“一味抬价”“挥舞指挥棒”的论调。马歇说:“在谈判的每个阶段直到最后,我们都提出了一些符合现形势要求的具体问题的具体建议。提出了一些事先经过仔细斟酌并尊重人们称之为纲领的‘平衡’,即它所具有的妥协性的完整建议。我们从来没有将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也没有事先就否定我们伙伴们提出的任何建议。我们不辞辛苦地不断努力使谈判能够得到进展。对于一切有争议的问题,我们都提出了建设性的妥协建议”。“这不仅是为了在选举中切实打败右翼,而且尤其是为了保证今后实现真正而持久的变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坚持和迫切要求联盟的原因。我

① 《让我们说实话》第 101 页。

② 同上,第 91、90、35、103 页。

们选择了变革和联盟。我们选择联盟是为了变革。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没有放弃，今后也永远不会放弃这一目标。”<sup>①</sup>

针对社会党关于共产党为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不惜使联盟失败的说法，马歇表白说：“我们不是那种追求选票、荣誉、议员和部长席位并为此不惜一切的人。同社会党不一样，我们从来不把联盟和争取我们党处于统治地位联结在一起。我们之所以尽一切努力加强我们党的力量，并争取达到一百万党员，我们之所以号召劳动者、民主人士、爱国者和一切渴望联盟和变革的人支持我们，就是要把所有这些力量联合起来，仅仅为实现向我国人民许下的诺言服务，以便使千百万法国人对变革寄予的巨大希望不致落空。一个强大、坚定和有影响的共产党的存在，是拯救联盟和保证变革的决定性因素。”<sup>②</sup>

在共产党进行总结的同时，社会党也对左翼联盟分裂原因进行了分析。其主要观点集中反映在密特朗 1980年写的《此时此地》一书中。密特朗认为：“左翼联盟一直是艰难的事业。由于共产党拼命抬价，它自行结束了《共同纲领》阶段。”<sup>③</sup>密特朗分析说：联盟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为了左翼能够在法国取胜，社会党首先就得成为左翼的多数派。但是，共产党怎么能忍受降低并跟着失去自己的绝对优势呢？我们越是接近共同胜利，对抗的情况就越明显。我们的伙伴 40 年来习惯了既做有组织的左翼队伍的突击队，而同时又做它的主力军。而现在快要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放弃担当第一号角色。他们遇到障碍要大发牢骚，我是理解的。但我希望缩小这种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长时间拒绝修订《共同纲领》的原因。我预感，共产党之所以如此坚决要求进行这场新的

① 《让我们说实话》第 105—106、97 页。

② 同上，第 108 页。

③ 密特朗：《此时此地》第 46 页。

辩论,并不是像 1972 年那样为了巩固我们的关系,却是为了打破这种关系。”<sup>①</sup>密特朗认为,法共曾经希望在法国造成意大利那样的局面:共产党得 40% 的选票,而社会党则作为辅助力量。后来法共看到,《共同纲领》和左翼联盟极可能使它处于即使不是完全相反的境地,起码也使社会党居于支配地位,它便拒绝进一步走下去。密特朗指出,由于左翼联盟以削弱共产党为代价而加强了社会党,由于对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感到失望,“共产党不再想要左翼联盟。这是分裂的主要因素”<sup>②</sup>。

其次,社会党谴责共产党在修订共同纲领的谈判中,依赖提出毫无根据的“煽动性许诺来力图恢复自己的影响”,同时又“害怕掌权时要应付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困难”。

再次,密特朗认为,法共之所以对左翼选举胜利极不热心,是“因为苏联宁愿在西欧维持现状”,而不愿左翼胜利后的革新打破这种局面。“苏联不愿看到一种由共产党参加政府加以保证的,而性质上不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欧洲出现”<sup>③</sup>。害怕一个“社会主义、人权和民族独立共存共荣的国家会给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对于处在苏联控制下的国家将会产生令人担忧的后果。”<sup>④</sup>所以,苏联不欢迎左翼联盟的成功。密特朗指出:从 1977 年 1 月起,“苏联报刊的理论文章已经显露出对法共与其他政党结成联盟的敌视态度”,而“法共领导在巴黎作出的决定,常常和莫斯科所定的世界战略的主题相吻合”。因此,随着苏联共产党政策的改变,法国共产党的路线也变得强硬了。

左翼联盟的内部冲突使两党的积极分子感到惊愕和失望,并

① 密特朗:《此时此地》第 27 页。

② 同上,第 50 页。

③ 同上。

④ 《弗朗索瓦·密特朗——一部政治史诗》第 188 页。

在左翼选民中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社会党和共产党刚刚在许多市镇掌握了政权几个月，他们的领导人就抛弃了帮助他们获得这么大胜利的两党之间的团结。在左翼联盟瓦解数月后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和共产党自行其是，提出了不同的竞选口号。共产党的口号是：“投共产党的票以迫使社会党回到共同纲领”<sup>①</sup>，“让富人掏腰包”，“选举共产党部长进入左翼政府”<sup>②</sup>。社会党的口号则是“投社会党的票以实现共同纲领”，“决不接受共产党的纲领”<sup>③</sup>。两党的分裂和对立使左翼联盟功败垂成。第一轮选举结果左翼共得 48.6% 的选票，远远少于此前多次民意测验的结果。其中共产党得票 20.6%（580 万张），社会党得票 22.6%（640 万张）。这是战后在最重要的立法选举中社会党第一次超过共产党。

为了争取左翼在第二轮选举中获胜，第一轮投票结果公布的当天，三党领导举行了高级会谈，达成了在选举中互相让票的协议，并发表了《共同宣言》。宣言说：“左翼各党郑重声明：他们愿竭尽所能，实现达到以共同纲领为基础，以左翼共同政府为目标的共同多数。根据此种精神，一旦国家信任他们，它们将保证以 1972 年共同纲领已达到的成就和在 1977 年进行工作过程中已经同意的建议为起点，继续协商，以求澄清纲领内容，使之成为左翼联盟政府受信托执行的立法契约”<sup>④</sup>，试图促使尚未做出选择的投票人相信，左翼联盟是紧密团结的，足以有效地管理国家。协议没有追究左翼联盟破裂的原因，也未触及双方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①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 218 页。

② 《弗朗索瓦·密特朗——一部政治史诗》第 189、190 页。

③ 同上，第 188、189 页。

④ 《世界报》1978 年 3 月 15 日。



尽管左翼运用了这些策略，但并没有消除选民的失望感和不信任感，难以对刚刚目睹了两党互相攻击的人产生说服力。三党协议“显得是一个不讲原则和不严肃的选举花招，不值得人们支持”<sup>①</sup>。结果，在第二轮选举中，左翼以 49.3% 比 50.7% 失败。法共获 86 个议席，社会党 104 个席位，而执政右翼则得到 290 席的绝对多数。

选举结束后，双方都指责对方应对失败负责。特别是法共发现，在第二轮投票中，几乎所有共产党选民都支持社会党或激进党候选人，而社会党的成员却在大约 30% 的选区未投共产党候选人的票。这使法共非常不满。在 3 月 20 日的政治局会议决议中，法共指责“社会党把左翼引向了选举失败，对此，它应负完全责任”<sup>②</sup>。而社会党则认为：“由于共产党向社会党提出了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导致了左翼联盟的破裂，由此使左翼在选举中失败”<sup>③</sup>。

1979 年，两党都召开了代表大会，总结经验教训。法共二十三大决议说，社会党的联盟路线是：“使用左翼的语言，以使用损害我党的利益来壮大自己，从而找到一条走向执政的道路，以便在适当的时候，为执行资产阶级的政策效劳。”<sup>④</sup> 共产党的主要教训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围绕共同纲领达成的上层协议上，把主要精力放在选举活动上，而没有从下面得到群众行动的有力支持。这种做法使群众产生了消极情绪和幻想。所以，二十三大在申明党决不放弃左翼联盟的同时，更加强调在基层、在行动中的联盟，促进行动中的协议，而不能把人民运动限制在纲领的范围内，仅仅同社会党签订最高级协议。法共还提出，要加强党自身的力量，以正确的方向

① 《弗朗索瓦·密特朗——一部政治史诗》190 页。

② 《人道报》1978 年 3 月 21 日。

③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 219 页。

④ 《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三大文件汇编》第 49 页。

重新平衡左翼。

在 4 月举行的社会党梅茨代表大会上，以密特朗为首的多数派，击败了以罗卡尔为首的右翼欲把社会党拉向与反共的中间派联盟的企图，坚持共同纲领所确定的基本政策路线，强调“左翼只有以左翼联盟作为战略基础才有希望取得胜利”。他呼吁和共产党举行会谈，签订新的协议，宣称：“我的奋斗目标是使社会主义回到法国，使法国回到社会主义。”<sup>①</sup>

其后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把两党的争论推向高潮。两党在欧洲问题上的分歧根深蒂固。在议会选举期间，社会党谴责法共同保卫共和联盟沆瀣一气，反对欧洲联合，形成了“客观上的联盟”。法共则反唇相讥，说社会党企图搞“吉斯卡尔·密特朗同盟”。两党唇枪舌剑有加无已，关系进一步恶化，不得不拟定各自的候选人名单，独立参加竞选活动，结果左翼两党都未能在选举中取得进展。社会党得票率维持在原有水平，法共则有所下降。左翼分裂的恶果显而易见。

为了缓和两党关系，使双方争吵降温，以争取 1981 年总统选举胜利，密特朗于 1979 年 8 月建议重建左翼联盟。两党于 1979 年 9 月 20 日举行了双边会谈。但由于缺乏诚意，各持己见，致使谈判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只同意在基层实现广泛联盟。会谈后不久，发生了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波兰团结工会事件。法共表示支持苏联干涉阿富汗，并在 1980 年初访问苏联，发表了法苏会谈公报；对团结工会的兴起持保留态度。而社会党则坚决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并且表示无条件地支持波兰团结工会，两党为此相互攻击。对外政策的分歧使两党进一步分道扬镳，完全破坏了任何可能使左翼联盟复活的机会。在这样不和的气氛中，两党迎来了 1981 年的总统选举。

<sup>①</sup> 《弗朗索瓦·密特朗——一部政治史诗》第 202 页。

## 第五章

# 法共与社会党联合

## 政府的建立与破裂

在 1981 年的总统选举中，法共鉴于密特朗第一轮遥遥领先，为保证左翼取代右翼政权，在第二轮选举中全力支持密特朗，终于使密特朗登上总统宝座。其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尽管单独获得绝对多数议席，但出于各种考虑，仍接纳四名法共部长入阁，建立了冷战以来西方大国第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从 1981—1982 年，社会党政府在法共的支

持下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激进色彩的社会主义变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由于 1982 年后，经济形势严重恶化，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迫使社会党政府不得不放慢改革步伐，转而采取紧缩政策。此举遭到法共的严厉批评，使执政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磨擦日益加剧。1984 年，法共宣布不参加改组后的新政府，两党的第二次联合执政宣布破裂。联合政府从建立到破裂，留下了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经验和教训。

## 第一节 1981 年的总统选举与联合政府的建立

### 一、第一轮选举中两党的激烈竞争

这次选举是在法国经济衰退日渐加深的形势下进行的。多年来法国经济已陷入“滞胀”状态。1980 年第二季度开始，更进入衰退，到 11 月为止，工业生产下降 4.5%。除宇航、信息等新兴工业外，其他工业部门均不景气，汽车、纺织、钢铁等部门的问题尤为严重。同时，物价猛涨，失业增加。1980 年消费品价格上涨 13.6%，创 1974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到 1981 年失业人数已高达 170 万，其中青年和妇女比例甚高，分别占失业总人数的 45% 和 35%。外贸和国际收支逆差严重，1980 年分别达 604 亿和 300 亿法郎。这些经济困难直接影响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职工购买力停滞不前，农民收入下降 6%。倒闭的企业达 17375 家，也是创纪录的。多次民意测验表明，不满现政府经济政策的人增多了。

与此同时，执政的右翼两大派之间政见分歧不断加深，内部矛盾激化，关系日益紧张，分别提出本党的纲领和候选人彼此角逐。这种局面给左翼取代右翼政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与 1974 年大选相比，这次竞选的情况更为复杂。当年社会党与共产党结成

“左翼联盟”，推举密特朗为统一候选人。现在左翼联盟已不复存在，社、共两党，互相攻讦，势不两立。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使选举的前景较难预料。总的来看，四大政党实力相当，谁能开出较好的药方来医治法国经济的不景气，解决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谁就能赢得选民。

在左翼两党尖锐对立的情况下，面对 1981 年的总统选举，法共一改从 1965 年以来一直支持左翼统一候选人的立场，在 1980 年 10 月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率先宣布马歇为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随后，密特朗于 11 月 8 日宣布参加竞选。双方都开展了积极的竞选活动。

竞选活动一开始，马歇就把自己描绘为“唯一反对吉斯卡尔的候选人”。这包含着双重意思，即他既反对右派，又不同于社会党。并宣称，投他的票就是支持一项不仅要求选举，而且要求行动的政策。他把这一政策概括为 131 条建议，称之为“斗争的纲领”。其中提出四项主要目标：充分就业；更加公正的社会（提高低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征收高额财产税）；自由；为青年提供更多的机会。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有 3 个：振兴民族经济；和平的外交政策；深刻的民主改革（关键垄断企业的国有化、权力下放、民主的计划化），把着眼点放在满足最低层人民的广泛的社会政治要求上。关于如何解决失业问题，法共提出：减少对私人企业的投资，增加对公共部门的财政支持，以保证每年增加 50 万个就业岗位。

在竞选中，马歇一方面攻击密特朗说：“真正的危险是密特朗上台掌权并同右翼一起统治，继续推行现行的政策，甚至变本加厉”<sup>①</sup>，似乎社会党的胜利并不符合人们的愿望。另一方面，马歇从密特朗可能进入第二轮选举，恢复两党合作这一点出发，表示共产党并不拒绝在第二轮投密特朗的票。但又补充说，防止社会党和右

<sup>①</sup> 《弗朗索瓦·密特朗——一部政治史诗》第 214 页。

翼联合危险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第一轮选举中投共产党的票。法国的政治评论家把共产党的口号概括为：“如果你想使密特朗成为一个好总统的话，就在第一轮投共产党的票。”<sup>①</sup>马歇明确表示，在密特朗当选的情况下，法共将坚持要求由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代表组成政府，以使政府毫不拖延地采取一系列深刻的社会改革措施。当记者问道既然社会党人已经向右转，为什么法共还愿意与社会党共同执政时，马歇回答说：“当然是为了使他向左转。”<sup>②</sup>

为了迎接 1981 年的总统选举，社会党在 1980 年初发表了《法国八十年代社会主义纲领》。同年夏天，密特朗同《巴黎晨报》记者居伊·克莱斯进行了多次谈话，内容涉及法国政治、经济、科技、文教、外交等各个方面。不久，密特朗出版了根据这些谈话记录整理的《此时此地》一书，作为自己的竞选武器。密特朗在书中声称要建立一个“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要把全部大银行、保险公司和控制法国经济要害部门的 9 家工业公司实行国有化；主张权力下放，使地方有权分享国家的税收；进行税制改革，缩短工时，提早退休年龄。在对外政策方面，他认为苏联是“扩张主义”，但“不威胁法国的经济独立”，而美国则是“不可靠的伙伴”，“它不断对法国进行经济战”；主张通过无先决条件的谈判和裁军来保障欧洲和平。并对法共的一些政策和对社会党的态度提出了批评，同时表示要与之达成协议。选举前夕，密特朗把社会党的一系列政策概括为《对法国的 110 条主张》作为竞选纲领。110 条中不仅包括共同纲领中的主要内容，而且还采纳了法共在修订共同纲领中提出的一些社会经济要求，如增加最低工资，把家庭补贴提高 50%，征收累进财产税等，具有比较激进的色彩。关于如何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密特朗主张紧缩信贷，限制货币供应，减少分配中的不平等，

①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 257 页。

② 同上。

在生产环节中防止价格上涨，制止通货膨胀。还主张通过发展经济，减少工时，提前退休等办法来解决就业问题。社会党和法共的共同点是都主张用计划来指导经济。其不同点是法共要求国有化的范围大，社会党所要求的范围小。社会党的纲领较照顾中小企业利益，并注意解决失业问题。法共则更多地提出一些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法国报纸指出，法共的经济纲领像工会所提要求的清单。

在竞选中，社会党把斗争矛头指向主要劲敌吉斯卡尔派，同时，采取左右逢源的策略，一方面注意做法共影响下的基层群众的工作，力图造成左翼上分而下联的局面，争取在第二轮决战时尽可能多地得到法共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社会党表示在总统选举中不讨论密特朗取胜的情况下让法共参政的问题，以争取反对法共的右翼和中间选民的支持。同时通过批评德斯坦的国际政策，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在抨击马歇实行焦土政策、不择手段诋毁社会党的同日<sup>①</sup>，密特朗也表示，“随时准备同愿意在切实的基础上组成左翼多数派的人讨论执政协议。”<sup>①</sup>

在4月26日第一轮投票中，密特朗得票占25.8%，居候选人第二位。马歇得票占15.34%，居第四位。社会党赢得战后最高选票，共产党则跌至战后最低点。右翼的德斯坦和左翼的密特朗得票领先，进入第二轮角逐但密特朗与德斯坦所得选票相差甚微，难分轩輊。谁能获胜，就要看第二轮投票前竞选情况的变化，各派政治力量的组合和选民的最后抉择。而选民的最后抉择则取决于右翼的戴高乐派和左翼共产党的态度。

## 二、法共态度的转变与联合政府的建立

法共在第一轮选举失利后，为了保持自己的影响，实现参政的愿望，也为了避免承担不愿让左翼上台的恶名，改变了第一轮选举

<sup>①</sup> 密特朗：《此时此地》第41页。

中对密特朗的敌视态度，于 4 月 28 日宣布无条件地支持密特朗，号召共产党的选民在第二轮选举中投密特朗的票；并重申共产党要与社会党联合执政的要求。对此密特朗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表示“如果我当选为总统，我将成为一个推动和解对话和使我国人民团结起来的人”<sup>①</sup>，以求既不丢掉共产党的选票，又照顾许多中间选民害怕共产党的情绪。而右翼的戴高乐派只给予属于同一政治派别的候选人德斯坦以“消极的支持”，表示由它的选民自由选择投谁的票。结果，密特朗不仅获得法共的支持，而且得到一些戴高乐派人士的支持，在第二轮选举中以 52.2% 的选票当选为法国总统。这是法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社会党人担任总统职务。这一胜利是法国左翼力量同右翼势力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左翼联盟政策的胜利。从此结束了第五共和国成立后右翼独揽政权的局面。

选举结果于当晚公布后，20 多万巴黎劳动人民手持象征着社会党的玫瑰花，冒着狂风暴雨纷纷涌向街头和广场，欢呼雀跃，通宵达旦，出现盛况空前的感人场面。

密特朗能够在这次总统竞选中蟾宫折桂，决非偶然。首先，他和社会党在总统竞选中提出的纲领、口号和一系列政策，迎合了众多法国选民在国际局势动荡和国内经济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迫切要求变革的心理。70 年代中后期，法国的经济陷入滞胀，就连德斯坦总统在 1981 年新年祝词中也承认：“法国正经历着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最持久、最难以忍受的一次危机”。经济不景气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首当其冲，深受其害，而且也使以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公务员三大部分为主体的法国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下降，中小企业主大批破产。他们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因此，中产阶级选中了以他们的阶级为组织基础，以他们的愿望作为纲领的社会党及其领袖。而传统上投右翼选票的小资产阶级和中小企业主也纷纷倒戈，希望

<sup>①</sup> 密特朗：《此时此地》第 41 页。



通过总统易人，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把票投向密特朗。尤其是选民对德斯坦任期内官场上接二连三出现的丑闻十分愤恨，要求革新政治。这也是中产阶级的愿望所在。约占法国社会阶级人数 1/3 的中产阶级选民的转向，奠定了密特朗胜利的基础。

其次，密特朗在竞选中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既在纲领口号中包括了下层劳动人民的要求，避免过多地指责法共，以争取法共影响下的选民；又同法共保持距离，集中力量抨击右翼候选人，以争取中产阶级选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5月21日，密特朗总统走马上任，立即组织了以社会党元老莫鲁瓦为总理的过渡性政府，并于22日解散国民议会。显然，密特朗打算利用法国选民左转的势头，趁热打铁，通过立法选举建立一个以社会党为核心的新议会，来巩固其总统地位，实现向选民许诺的变革。

为了确保社会党在议会的主导地位，密特朗在就职的第二天就对意大利《时代》周刊发表了《我将这样改变法国》的谈话，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党的纲领政策以及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区别，以打消人们对“集体主义”的顾虑。密特朗说：“集体主义是我们过去共同的思想，我们社会党人过去曾经梦想、追求和致力于终止人剥削人的制度。要想终止人剥削人，必须开始改变经济结构，必须根除一种完全追求利润而忽视其它一切价值的社会。但是，进行这种斗争的方式和手段，随着内在力量、经验、民族特点和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大家现在都有了同一的目标：解放人。”密特朗指出：“关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我认为，比社会民主党更加‘先进’，更加负责；但是很明显，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同苏联模式没有任何联系。我刚才已经给你谈了我们对苏联模式的看法，任何人也不想使社会主义历史附属于苏联的模式。”在谈到与共产党的关系时，密特朗说：“人们不会忘记，1977年左翼由于自己的执政纲领告吹而分裂。我们现在还处在分裂状态。这种情况意味着有必要在左翼政

治力量之间进行一次讨论，以便弄清楚是否能够就一项执政纲领达成协议。直到现在，我仍然打算在我的选择基础上建立一个团结的、融洽的政府。对未来我没有关上大门。如果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给我一个我所希望的议会，而且法国人支持这个议会，那么我将从中得出我的结论，并且通过选举产生的多数派来治理国家。”<sup>①</sup>表明与法共达成谅解的愿望。

与此同时，为赢得议会选举胜利，以莫鲁瓦为首的过渡性政府一上台，就立即着手兑现密特朗竞选总统时许下的诺言，采取了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家庭、住房、老年人和残疾人补助等社会福利措施，将最低工资提高了 10%，退休金提高了 20%，家庭和住房津贴提高了 25%；作出了停建普洛科夫核电站和停止扩充拉尔扎克兵营等决定。这些措施和决定赢得许多人、特别是中下层人民和各工会的欢迎。为了安抚担心自己的利益会受到损害的中小企业主，莫鲁瓦总理宣布，政府将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决心实现变革，“对农场主、实业家、商业家和零售商，我要说，建立一个有抱负的和有成就的社会，同为争取正义和公正而作的努力是一致的。”并许愿要对中小企业增加援助，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社会措施的实施，对社会党赢得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法共在密特朗当选总统后举行了中央委员会。马歇在会议报告中指出：“我们都属于新的总统多数派……现在要做的事有两件，第一，让一个左翼的、符合这一新多数派联盟的多数派进驻国民议会；第二，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并向社会党提出了立即可以实现的共同行动纲领建议。内容有：增加各行业可增长的最低工资，增加抚恤金、退休金、家庭津贴和住房补助，暂时冻结大众消费品价格和对国家的经济和货币采取保护措施。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这些建议中没有任何内容为社会党所不能接受。

<sup>①</sup> 《参考资料》1981年5月27日(下)第21—22页。

考虑到将来议会选举中候选人的提名情况，法共中央明确地表示，它赞成在那些凡是现任议员是左派人士的选区里只提唯一的一个候选人。这对于共产党来说是维护它在全国声望的最好的方法。法共还表示：“我们准备在任何时候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共产党必须拥有足够的竞选影响和足够的发言权以便在新多数派里有发言权……应当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在左派中有良好基础的多数派……我们将作为关切事业的成败的主人翁而行事。我们不希望一些过渡的或者临时性的东西。”

乔治·马歇说：“社会党的改革应当在我们的人民明确地和民主地表示同意和积极参加的情况下来实现。我们曾明确地说过，为了掀起这一改革运动，应该考虑不要搞突然的和彻底的改变，而应考虑一个进程，考虑一连串旨在扩大劳动者的地位，旨在实现一步深入一步的民主改革的群众斗争……我们愿意竭尽全力，站在我们应有的地位上来促进国家所希望和期待的革新事业。我们的措施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

乔治·马歇解释说，国民议会选举应按照这种步骤进行。“在现任议员是共产党人的那些选区内，应该组成一个将同共和国总统一道积极从事变革的左翼多数派，也就是说，让那些已经参加新的多数派的共产党议员再次当选。”“我们准备本着为左翼的取胜提供最好条件的愿望和取得我们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的愿望进行讨论。”“这就是说我们不打算在进行谈判时要求社会党放弃他们的主张和他们的纲领，同样人们也不可能要求我们放弃我们的纲领和主张……”<sup>①</sup>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法共由于在总统选举第一轮中失利，而它的许多议席在这次选举中又受到威胁，处于被动地位，不得不降低竞选总统时的调门，以求同社会党在选举胜利后达成执政协议。

<sup>①</sup> 《参考资料》1981年5月18日(上)第58—59页。

两党在议会选举前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达成了初步的政治和选举协议，同意在第一轮投票时各党自提候选人，进行各自的竞选活动；第二轮时得票落后者要退让转而支持领先者，以便使左翼候选人取胜。并同意在第一轮投票后和议会选举后继续就选举和共产党人参加政府等问题进行会谈。左翼各党竞选的主要口号是：为了巩固和实现人民在总统选举中表现出来的变革愿望，必须要在议会争取拥有支持密特朗总统的左翼多数派。

6月14日，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揭晓。四大政党中，社会党(包括激进党)得票占 37.51%，共产党得票占 16.17%，保卫共和联盟得票占 20.8%，法国民主联盟得票占 19.2%，其他各小党派和环境保护主义者都得票极少。在第一轮就当选的议员共有 156 名，其中社会党(包括激进党)49 名，共产党 7 名，保卫共和联盟 50 名，法国民主联盟 46 名，其他各左派 4 名。

通过这次投票，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问题：

1 左翼继总统选举后继续取得重大进展，右派明显在后退。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是，左翼候选人密特朗得票占 48.24%，任满总统德斯坦得票占 51.75%。这次立法选举第一轮投票，左翼共得票占 55.73%，右派得票占 43.15%。这次投票更证实和加强了法国选民在总统选举中做出的政治选择。人民对德斯坦和前多数派的统治不满意，渴望变革，已成为不容否定的潮流。

2 社会党这次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在 1978 年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时，社会党(包括激进党)得票占 24.96%。本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时，社会党与激进党的两位候选人共得票占 28.05%。这次议会选举第一轮社会党(包括激进党)得票占 37.51%。社会党的大胜被认为是这次投票中最重要的事件，它超过人们的一般估计，甚至社会党自己也感到惊奇。这一胜利主要是依靠了密特朗当选总统的势头和社会党政府迅速采取福利措施进一步争取了民心。它使社会党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党。

3、这次投票证实了法共的失败不是偶然性的选举失败，而是政治路线和政策的失败。法共的国内外政策不但受到选民的怀疑，就是在党内也引起争议。关于 1977 年秋左翼联盟破裂以来党的内外政策和路线的争论以及总统选举的失败动摇了广大基层党员对现行政策和领导的信任，这次法共仅取得 16% 的选票，是自 1936 年以来得票最少的一次；议席由 86 个减少到 43 个。一些历史上完全是共产党天下的一些地区倒向社会党人。社会党在 401 个选区中领先于共产党，其中 109 个选区 3 年前还是共产党处于领先地位。在巴黎，共产党的候选人全部落选。在法共的一些牢固据点，如法国南部的加尔省、中部的上维埃省和巴黎大区的塞纳·圣德尼，每 9 个共产党议员中就有 4 个被淘汰。

对共产党来说，更为严重的是：46 位上届议员在第一轮投票中落后于社会党人。在这些人中有党的领导人，包括马歇的左右手、中央委员会书记夏尔·菲特曼。上述变化趋势在第二轮投票中可能还会有所发展。

面对社会党有可能在第二轮选举中单独获得绝对多数的形势，法共总书记马歇在评论选举结果时说：“共产党保持了它在总统竞选中的得票数目，甚至有所增加……我相信法共将恢复其应有的地位”。马歇同时指出：“现在应当彻底击败右翼，选出一个左翼的多数派。为了这一前景，法共将履行同社会党达成的要求相互转让选票的政治协议”<sup>①</sup>。并重申，法共准备承担全部责任，包括在法国政府中任职。

第一轮投票揭晓后的第二天下午，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代表团在巴黎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两党发表了一项公报。公报说：“代表团要求它们各省的选民联合会，它们的候选人以及党员在各有关选区都实行互让选票的协定。只要选民联合会提出要求，各级

<sup>①</sup> 《参考资料》1981 年 6 月 16 日(上)第 41 页。

就都能作出关于召开两党联合竞选大会以及采取其他主动行动的决定”。代表团呼吁选民们“动员起来以保持和扩大第一轮选举中的势头。呼吁他们在每一选区都以大量投票支持总统新多数派候选人的方式来打击右翼”。公报最后说：“6月21日左翼多数派的胜利将能使法国男女公民在选举密特朗时选择的新政策得以继续遵循和发展下去”。

第二轮选举于6月21日举行，社会党获得空前的胜利，议席比上届116席增加169席，达到285席，单独占据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法共获44席，比上届议会的86席减少42席，减少近一半。实力大为削弱，失去了与社会党就联合执政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在入阁谈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6月22—23日，两党总书记就执政协议举行谈判。会谈结束后，发表了《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关于共同施政的联合声明》。声明表示：决心推行法国男女公民通过选举弗朗索瓦·密特朗任共和国总统所选择的新政策。两党将在国民议会中通过刚刚组成的多数派这样做，在政府里团结一致地这样做。同时，还将在地方、大区政府和企业里，在尊重法制和政党各自职责的情况下这样做。联合声明除肯定了两党议会选举前在广泛的国内政策上达成的一致意见外，在原来存在分歧的对外政策方面，如阿富汗问题、波兰问题等方面也基本上达成了一致。“两党确认阿富汗人民有选择自己制度和政府的权利。两党主张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停止一切外来干涉。”两党希望“波兰国家及其人民能自己很好地完成他们正在进行的经济、社会和民主革新的进程”<sup>①</sup>。这表明，法共为同社会党达成一致，已放弃了原来在阿富汗和波兰问题上的立场。声明还同意尽快就限制和裁减欧洲军备进行谈判，积极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机构的活动，参与其共同政策的制定工作。在这些对外政策问

<sup>①</sup> 《人道报》1981年6月23日。

题上，法共都作出了重大的让步，改变了追随苏联的立场。

在共同施政方针的基础上，两党组成了第五共和国以来首届由社会党人任总理的左翼联合政府。其中社会党阁员 28 名，共产党人 4 名，分别任运输国务部长、卫生部长、职业培训部长及总理府负责人事和行政改革的部长级代表。这是 34 年以后法共首次参政，也是同社会党的第二次联合执政。它标志着两党在左翼联盟破裂后重新修好，在历史上第四次联合起来。

法共入阁使法国成了共产党参与执政的唯一西方大国，因而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各种倾向的新闻媒介对此发表了各不相同的评论。法共总书记马歇说：共产党参加政府证明它是“忠于左翼联盟的”，和社会党达成协议并不是“投降”，而是法共政治路线的继续，这样才能使法共“参与为使我们的国家摆脱危机，并朝着法国人所希望的方向迅速前进的工作”。

西德《法兰克福汇报》评论说，参政“使共一党人从三年半以前由于左翼联盟的破裂而陷入的孤立处境中解脱出来。变得具有执政能力，从长远看对法共好处极大”。

德国电台评论说：“让给共产党人的尽管不是政治上的关键性职位，但这件事对西欧民主国家来说仍具有历史性意义。尤其是因为被社会党总统同意分享权力的共产党人是亲苏的共产党人。”<sup>①</sup>

英国《每日电讯报》社论评论说：共产党进入法国政府是西方的一大祸害。我们非常喜欢用牵强附会的解释自我安慰，但是这次不能再用这种自我安慰来掩盖这一严酷的事实了。要是认为法共因为在选举中受挫，已经大伤元气，所以密特朗利用他手中控制的很大的多数票的威力可以长期迫使他们就范，让他们乖得像爱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那是幼稚的想法。要是认为如果共产党人惹事就可以把他们踢出去，这同样是幼稚的想法。社会党内一向支持

<sup>①</sup> 《参考资料》1981 年 6 月 27 日(上)第 68—70 页。

密特朗，反对温和派的非常有实力的左派不会答应，工会也会闹得一塌糊涂。共产党人将一面养精蓄锐，加强自己对政策施加影响的能力，一面等待时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

美国对法共参政一事反应强烈，声称美法盟友关系的“形式和内容”将因此受到影响，对法国施加压力。美国主要担心法共参政将会削弱北约组织联合抗苏的力量，以至影响美国与欧洲盟国的关系；还担心法国首创让法共入阁先例，会在意、西、希、葡等共产党力量较强的盟国引起连锁反应。

法新社评论说：虽然目前共产党打算通过某些党员参加政府来阻止它的威信下降，但在最高一级的言归于好，并不能立即消除自从 1977 年 9 月 23 日左翼联盟破裂之后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进行猛烈攻击所留下的后遗症。但无论如何，在内阁会议桌上又组成了左翼联盟，法国共产党摆脱了政治上的孤立。

德意志电视台说：在巴黎参加执政联盟的人的关系不同于联邦共和国的平等的联合执政伙伴的关系，内阁小伙伴从一开始就以书面形式被迫保持严格的政府团结。共产党人无论在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或经济政策问题上都将不能够有共同发言权。看来他们注定了要服从。

对于社会党的胜利和法共的参政，不论人们反映如何，或者对今后两党的影响如何，从客观上说，它加速了西欧保守主义思潮的衰退，促进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南欧国家中引起了连锁反应。左翼联合政权建立不久，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也相继出现了社会党政权。所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联合政府建立后，社会党在法共的支持下，根据自己的社会主义蓝图和在竞选中对选民做出的承诺，以极大的热情在法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开始了以结构改革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变革实践。



## 第二节 联合政府的社会主义变革主张及其实践

### 一、以扩大国有化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改革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已推行过两次国有化运动。第一次是在 1936—1937 年人民阵线政府时期。当时政府为了应付紧迫的战争形势，对铁路实行了国有化，并采用强硬的政策对一些军备工业实行国家管理，将施奈德军火工厂、蒙契吉军火工厂、雷诺坦克工厂收归国有，同时还控制了两家飞机制造厂。第二次国有化运动是在 1945—1946 年戴高乐临时政府时期。为了恢复战争破坏的经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国有化法律和法令，将一些关键部门收归国有，先后建立了国营雷诺汽车公司、法兰西电力公司、法兰西煤气公司和法兰西煤矿公司。在银行事业方面，收归国有的除了法兰西银行外，还有里昂信贷银行、兴业银行、国民工商信贷银行、巴黎国民贴现银行等 4 大存款银行和 34 家保险公司。此后，法国国营企业不断发展，截至密特朗担任总统时，法国政府拥有 84 家国营企业、49 家混合经济公司，并在 800 多家子公司中占有股份。国有化企业占全国固定资产的 2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占工业总投资的 15%，占工业营业额的 22%，占工业部门就业人数的 12%。国家银行掌握了全国存款的 59%。

密特朗及社会党政府上台后实施的以扩大国有化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变革实践，较之人民阵线政府或戴高乐临时政府的国有化，无论在广度上或深度上都有了很大发展。密特朗之所以把国有化作为“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是与他对于国有化在实现“法国式社会主义”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密切相关的。

密特朗作为一个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向主张对控制国

家经济命脉的大垄断资本实行国有化。他指出：我们坚决而明确地接受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否则我们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无论哪种社会主义实践都应当在某些部门(军事工业、航空、信贷等)实行国有化。”密特朗认为在法国实现国有化，有着两方面的目的：一是为了使社会党拥有建立社会主义的手段；二是为了保护法国的生产。这是因为，那些将被国有化的企业，正“按照它们自己的发展规律，在走向垄断并逃避在现代国家中它们应承担的责任。它们凭借自己的实力一直对规章制度施加影响，并破坏竞争原则”。密特朗指出：“恰恰由于它们对经济并对社会起着火车头的作用，所以必须改变它们的活动方向，使之用来改革我国的经济结构，纠正 20 年来在法国日益加剧的社会和地区的不平衡状况”。如果“听任社会主义的头号敌人——大资本占据我们社会的神经中枢，那是极其荒谬的”。因此，必须把掌握关键经济部门的企业变为国家集体单位，只有付出这个代价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密特朗认为，国有化“始终是一场政治社会改革，首先是粉碎大垄断资本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其次必然要为我们提供所希望的社会模式”。国有化的目的和手段是一个统一体：作为手段，它是“挫败那些反对一切社会变革企图的最好武器”；作为目的，它又是“为了给劳动者以被统治阶级所剥夺了的权力”<sup>①</sup>。

另一方面，密特朗指出，由于资本的积累和积聚现象以及资本在世界上的多国公司化现象，“对垄断的或正趋于垄断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使之与国家相结合，使之不拥有高于民族利益的和控制市场经济的，因而也是政治的权利，这都是正确的、必要的”。他认为，“国有化将为我们提供下个世纪的工具。如果这些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它们将迅速国际化。我们反对国际分工，反对由别人来决定我们的生产，以别国的利益而不是以我国的利益为转移。我们不是走

<sup>①</sup> 《密特朗传》第 92—94 页。

卒。国有化是保护法国生产的一种武器。”密特朗决心“要用国有化做戴高乐在原子战略方面所做的事，给法国提供一支经济打击力量”<sup>①</sup>。

密特朗上台后所推行的法国历史上第三次国有化运动，兼有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从经济上看，7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处于滞胀状态，低增长、高物价、高失业、高赤字、重重困难、累累问题，弄得历届政府焦头烂额，一筹莫展。密特朗及社会党政府正是利用了人民群众对法国现状不满和要求变革的心理，把推行国有化放在整个社会经济政策的首位。希望通过扩大国营部门来增加投资，提供就业机会，革新生产设备，对外防止外国资本的渗透和竞争，重新夺回国内外市场，以达到振兴经济、摆脱危机的目的。从政治上看，密特朗及社会党又把国有化视为变革经济、社会结构的手段，视为推行经济计划化和自治管理的前提条件。早在1972年3月社会党和共产党签订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地规定：左翼联盟政党一旦执政，就要“对依靠国家订货或在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的，或要求国家财政大量投资的工业实行国有化”<sup>②</sup>。以后密特朗在1981年4月竞选总统期间提出的社会经济纲领中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在保留现有经济制度条件下，扩大国有化程度，充分发挥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1982年2月政府总理莫鲁瓦在国民议会发表施政演说时也指出：“国有化将使政府拥有实施其经济政策的决定性手段。”国有化企业应成为“社会主义的试验场”<sup>③</sup>。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社会党政府上台不久，就起草了一份扩大国有化的法律草案，将社会党的主张和国有化的具体项目全部收

① 《世界报》1981年9月25日。

② 弗朗索瓦·博雷拉：《今日法国的政党》第138页。

③ 《参考资料》1982年2月14日。

入其中。此议案在议会中遭到反对派的百般刁难，经过激烈的斗争，才于 1982 年 2 月 11 日最后通过。

新国有化大体上按三种方式分成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通过 1981 年 11 月 27 日修正财政法，将常年亏损并接受了国家大量贷款的北方钢铁公司和洛林钢铁公司正式国有化。由于国家曾向这两家公司提供了大量贷款，因此对它们的国有化，采取的方式是将贷款逐步折成股票，使国家由贷款人成为股东。第二步是通过 1982 年 2 月 11 日的国有化法令，将 5 个工业集团、两家金融公司（巴黎荷兰和苏伊士金融公司）、39 家存款在 10 亿法郎以上的私人银行（其中主要有法国商业信贷银行、北方信贷银行）实行国有化，对已国有化的银行（巴黎国民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中保留的私股再国有化。国家采取对这些企业进行赔偿的方式予以国有化，由国家向企业原所有者支付赔偿费。第三步是在 1982 年内通过同另外 5 家公司谈判，采取国家购买的方式由国家持有多数或全部股份，使两大军火公司和两大钢铁公司国有化。

同前两次国有化相比，这次国有化的显著特点是：前两次国有化主要涉及公用事业和基础部门；此次国有化的对象则是新兴或尖端工业以及金融信贷部门。通过扩大国有化，国家控制的企业达 3500 家。国有化部门在全国工业总投资中的比重从 15% 提高为 40%，在工业营业额中的比重从 22% 提高为 30%。特别是一些重要工业部门国有化程度很高，如国家控制了航空工业的 80%，钢铁工业的 80%，人造纤维、纺织工业的 75%，军火工业的 75%，化学工业的 54%，电子工业的 44%，玻璃工业的 35%，信息遥控工业的 35%。国营部门的就业人数从 165 万增加到 240 万，增加 45%。其中国营部门职工增加近 3 倍，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从 7.5% 上升到 11%。国营企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 12% 上升到 21%。国有化银行在注册银行的存款和贷款的比重分别由 59% 和 49% 上升到 90% 和 85%。国营银行和保险公司在金

融信贷领域中已占绝对优势。在西欧诸国中，法国国有化程度名列前茅。

扩大国有化引起了法国垄断资本结构的变化，进一步提高了国家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私人垄断资本的势力。如法国最大的两家私人财团苏伊士集团和巴黎荷兰集团宣告解体，大大加强了国家对全国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干预能力。

但这次国有化毕竟是在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虽然触动了某些私人垄断集团的眼前利益，但并未损害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动摇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党政府表示要把国有化政策建立在“不带任何剥夺痕迹”的原则上。国家对实行国有化的银行和工业企业的股东给予了优厚的赔偿金，总额约 430 亿法郎，分 15 年还清，再加上利息，估计将达 3000 亿法郎之巨。社会党政府还强调，国有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化”，国有化企业实行“雷诺”式管理体制，服从于“竞争的市场法则”。也就是说，企业在国家指导性计划下有较大的自主权，企业的运转在市场经济的范畴内进行。归根结底，这种国有化的企业只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换形式或变相形式。

尽管如此，国有化的扩大也为社会党的其它经济结构改革，为经济计划化、自治管理创造了条件。密特朗指出：“对社会党人来说，计划化、国有化和自治管理是不可分割的”。“经济计划是控制经济活动的主要杠杆之一”，“计划是经济的总调节者”，“法国只有加强计划工作，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在理论上是相互促进的，“国有化对于一种真正的计划经济是不可缺少的。”<sup>①</sup>他强调，要把国家计划作为协调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杠杆，作为实现“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他说，只要市场还在经济

<sup>①</sup> 《世界报》1981 年 12 月 11 日。

中占统治地位，那样的社会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如果国家计划把市场机制用于达到社会目的，这样的制度则可“归入社会主义一类”。

1982年7月29日，社会党政府正式颁布“计划改革法”，对计划的机构、计划的确定，一直到计划的实施等各个环节都作了重大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计划合同制”。“计划改革法”规定，在计划过程中，国家要在由政府、劳动者代表和企业组成的部门或地区战略委员会订出的战略目标基础上，根据全国利益作出决定性的选择，然后交议会通过。企业根据这些战略性目标并结合自身情况，发动车间委员会讨论，最后由企业董事会作出计划，再与政府协商，签订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合同计划，对其中因承担国家任务所遭受的损失，由政府给予财政补贴。在此基础上，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其自治管理的作用，并根据市场规律，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主要负责确定国家未来的战略目标，企业则是在此基础上，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制订自己的短期计划。

社会党认为，这种经济计划化与法国过去实行计划化的区别在于：它是在更深刻的民主基础上进行的，过去的计划只涉及一些专家、政府官员或某些企业领导，现在由于和各企业签订了合同计划，这就使计划从制订到执行都涉及企业的每个人。因此，计划的可行性和精确性大大加强；国家和企业通过合同计划相联系，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起咨询、情报作用。国家从整个社会需要出发制订计划，相对来说会削弱资本主义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作用。他们还认为，经济计划是实现相互承担责任的重要手段，它“在经济方面体现社会集体的政治愿望”。密特朗特别指出：“企业应该考虑其社会目的，而不要为自己的私利去牺牲社会利益。”<sup>①</sup>

可以看出，密特朗及社会党政府把实行国有化与实行计划调

<sup>①</sup> 《世界报》1981年12月9日。

节结合起来，试图凭借国有化企业的实力和通过对财政金融领域的控制，按照整个国家需要，对经济发展进行调节，以协调各方面的需要，缩小地区差别和保证各部门的平衡，通过国家干预减少市场对社会经济产生的自发破坏作用，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

密特朗认为，这种以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改革，必然有助于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领域内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革，并在这种变革的基础上，改革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依附状态，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能较为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劳动者自己组织对生产的监督和对劳动成果的分配，最终组织社会实现人的解放，使民主成为现实。

密特朗认为，在私人企业里，资本家通过一定数量的参股控制了企业的现实经济权，再通过企业立法，例如将公司内的劳动组织由大化小，有组织地阻止工会代表在公司范围内的集中等办法，阻止工人正常地行使权力，并借此减少其福利待遇，实现分裂工人阶级、削弱工人阶级力量的目的。因此，“国有化的当务之急将是重建劳动权，使其成为劳动者的权力”。“企业社会关系的变革是新政权的优先目标之一”。<sup>①</sup>

密特朗及社会党所实行的“自治管理”主要是公有部门在国家计划内的自治管理。根据国有化法案，国有企业将由政府、职工、企业管理人员三方面代表建立企业董事会共同管理。这样，劳动者通过参加董事会以及车间委员会，对企业实行全面干预，改革那些不利于劳动者的法规，扩大劳动者的权力，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反过来，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也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同时，国家可以借助劳动者监督企业，使企业的发展更符合国家的需要。

<sup>①</sup> 世界报 1981 年 12 月 9 日。

## 二、以权力下放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密特朗上台之前，第五共和国沿用前几个共和国的做法，一直采取高度中央集权式的地方管理制度。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这种地方管理制度的弊病日益严重。主要表现在：

1、官僚主义作风盛行。由于掌握地方实权的官吏均由中央政府或中央部门任命和派驻，其职权也由中央政府或中央部门确定和授予，这些官吏对上唯唯诺诺，对下则使用“官僚化”的手段进行统治。他们不了解所辖区的民情，脱离实际，养尊处优，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妨碍了地方事业的发展。而民选的官吏和评议员，被迫听从这些人的指挥，有职无权，经常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地方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愈演愈烈。

2、行政手续繁杂，办事效率低下。由于中央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纷纷在地方设置对口的派驻机构，造成地方上的行政机构重叠，派驻人员激增，致使地方人员臃肿，人浮于事。这样，势必带来行政手续繁杂和办事效率低下的严重后果。前法国司法部长阿兰·佩雷菲特所写的《官僚主义的弊害》一书中，对这些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淋漓尽致的描述。

3、法律、法令和计划难以贯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因地区经济水平参差不齐以及自然资源、地理条件、文化、风俗习惯的差异，法国的法律和法令难以贯彻实施。第五共和国时期，这种现象日趋严重。尤其是中央政府在努力实施经济发展计划、调整全国经济结构和工农业布局，大搞领土整治时，高度中央集权的地方管理制度难以调动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了计划的实施。

这种局面，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发展，也使战后随着生产力和科技革命的发展日益强大的法国新中间阶层处于无权地位。高度中央集权的地方管理体制，已成为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政治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作为新兴中间阶层代表的社会党上台后，把权力下放作为“法国式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实现与“资本主义决裂的”强大杠杆之一。社会党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原则后来逐渐地“异化”了。所以必须以民主监督、自治管理、人民参政，亦即权力下放的方式，改变几个世纪以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地方管理制度，实现以地方自治、民众和民间团体参与地方管理的“新的公民制度”，以促进各级地方政权的民主化，使公民参与重大的社会变革，对决策施加影响。

法国社会党还一直主张保持和发展地方特性。密特朗指出，法国历代国王、雅各宾党人和波拿巴在接二连三地遏制地方的各种离心倾向的过程中，也使政权过于集中。从那时起，必要的权力集中变成了万马齐喑的划一局面。在法国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起来的战后年代，社会党必须考虑各社会集团、特殊集体的愿望和利益，充分尊重地方保持特性的权利。社会党还强调“永远不要忘记，当代人的第一愿望就是要恢复自己的特性……他们宁可推倒一切墙也不甘心被活活闷死”。“法国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来建设法国。法国也需要分权以避免解体。”

根据 1982 年 1 月 28 日通过的“市镇、省和大区的权力和自主权法案”，权力下放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增加了地方行政区划的层次。自第三共和国颁布省议会法和市镇法以来，法国地方行政区划一直是省和市镇两级。社会党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大区，从而组成了大区、省和市镇共三个层次的地方行政单位。

法国政府在实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领土整治时，意识到设置独立的经济大区的必要性。1959 年元月和 1960 年 6 月，中央政府确定在法国建立大区，每个大区由邻近的几个省组成。1964 年则将大区的协调机构规范化和制度化，总协调人改名为大区长。大区长负责实施政府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领土整治政策。但是

80年代以前，大区仍属于一个经济发展区。

社会党政府的权力下放法令正式确认大区为地方行政单位。该法令第一条规定：“市镇、省和大区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自行管理。”自此，法国地方行政区划由原来的两级变为三级。大区行政区划的建立有助于促进法国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繁荣，并使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逐渐均同化。

2、扩大了地方自治权限。改革前，地方议会的权力仅限于表决财政预算和负责税收事务，从事地方的“公用事业”和“慈善事业”。即使这些寥寥无几的权力也要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限制。而根据这次改革法案，中央将分期分批把职权移交给地方政府。1983年移交城市规划、住宅建设、职业培训、计划化和农村整治职权；1984年移交交通运输、社会活动和司法权；1985年移交教育、文化、环境保护和警察权，以使地方实现“民选民治”的原则。

改革法案将全国划分为 15 个大区，规定由选举产生区议会。议长是大区最高行政长官，他负责执行大区议会的决定，贯彻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大区经济的法律和政策，领导大区所属的行政机构和中央派驻大区的机构。大区议会则是大区的最高自治权力机构。它主要从事大区经济发展以及与此有关的工作，如执行国家的中长期经济计划，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发展；扶植本地区的中小企业，支持本地区所管辖的省、市镇的经济活动；推动公私混合经济的发展；制定本地区的经济计划；编制年度职业培训大纲，资助职业培训组织；分配和使用国家划拨的财政拨款，拥有广泛的行政和财政权力。

省是法国的主要地方行政单位。改革后，省议会议长成为省的行政首脑，处理省的一切事务，审核省的开支和确定省的收入，领导省内的各个行政职能部门，并有权动用警察。为了执行省议会的各项决议，议长必要时可以支配中央政府的派驻机构及其人员，协调地方部门与派驻机构的行动。省议会是省的最高自治机构。它

有权决定省的财政预算，负责地方税收，制定城镇规划，管理省内的公路、港口和运输，建设和装备中学教育设施，管理各种社会救济机构，拟订和资助农村的领土整治项目，讨论和分配中央调拨的津贴。

市镇是法国的基层行政单位。改革后，同区和省一样，市镇的自治权也有了很大的扩充。此外，法令还规定地方政权可以分享 $1/3$ 的国家税收，有统筹安排经济、自办工商业、制定地方就业计划，发展农业、手工业计划的权力。密特朗还提出在地方建立一些社会、文化、福利等团体，把它们作为中央权力下放的一种表现形式。当时法国约有10万个不同规模和活动内容的协会。这些协会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补充手段，其行动不受政党、工会和政权的支配。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使社会党所代表的新中间阶层更多地介入社会生活。

3、建立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前，省长是地方行政长官。他由总理和内政部长提名，部长会议通过，总统任命。他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在地方上集行政、治安大权于一身，对地方议会、行政和财政实行监护。他有权召开和参加省、市镇议会会议，审批和否决议会讨论通过的各项决议、决定、法令和它们签订的协定，有权向地方议会发布指令。他还直接控制和监督地方财政。总之，省长代表中央，对地方颐指气使，不可一世。

改革后，省长改称共和国专员。他仍是中央政府的代表，管辖警察和中央派驻机构，但不再兼任地方行政首脑直接插手地方事务。对地方议会、行政和财政只实行监督，如发现问题，他必须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不得直接采取行政干预。

社会党的权力下放改革，扩大了地方自治权限，调整了地方的行政区划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不很健全的法国地方自治形式逐步完善起来，改变了数百年来法国高度中央集权制度的某些内容与形式，有利于调动选民和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加地方

的生机和活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证法国经济和社会计划的实现。同时，它有助于缓解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减轻中央的行政负担，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具有积极意义。

社会党政府的权力下放改革，尽管步子较大，但如同其它经济和社会改革纲领一样，仍然属于在保存法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前提下实行改良主义的范畴，只不过对法国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和不适应部分动小手术，以缓解逐渐激化了的法国社会矛盾和冲突，稳定法国地方和整个法国的社会秩序。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党派斗争的影响，1983年，政府宣布延期实施权力下放法案，法案的很多内容后来并没有得到落实。

### 三、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税收和福利制度改革

密特朗作为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以“消除不平等现象”和“实现社会公正、分享财富”为口号上台执政的。1972年的《共同施政纲领》和1980年《社会主义变革草案》这两份重要文件，都把改革税收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变革”实践的内容之一，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公正”。密特朗在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对法国的110条主张》，也包括实行累进税，改革遗产税，减少低收入者的所得税，增加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并把这看作是贯彻社会公正的要求之一。

社会党政府上台后，立即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政策的改革。从1981年6月起，社会党政府先后制定了40多项有关社会政策方面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对税收制度、福利制度、就业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税收制度的改革。法国是西欧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5%的家庭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占全国69%的中下等家庭财产的总和。为了缩小贫富差别，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党对税收制度进行了某些改革。对富人和高收入者的课税有所增加，并减免部分低收入

者的所得税。具体措施是：①开征大资产税：对 300 万法郎以上的财产征收财产税，对 500 万法郎以上的资本征收劳动工具税，从而改变了法国过去只对收入和消费征税，而不征收财产税的状况。但是，税率从密特朗原来宣布的 0.5—8% 降为 0.5—1.5%。受大资产税影响的人只占法国人口的 2%，但这 2% 的人口拥有私人工业企业的大部分资产（80%）。政府从大资产税得到的收入并不多，只占全国税收的 2%。如果加上土地税和营业税的“资本部分”，法国富有阶层缴纳的资产税只占全国税收总额的 8%。②开征以救济失业为目的的特别税（大约涉及到 200 万纳税者，占纳税人口的 1/7），提高对高收入者课税税率，规定对年收入 32 万法郎以上的纳税者征收 10% 的附加税，年收入 37 万法郎以上者征收 15% 的附加税；月薪超过 4 万法郎的征收工资税。③减免部分低收入者的所得税，如年收入在 24000 法郎以下者免征所得税。这种对法国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有助于增加法国下层劳动人民的收入和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法国各阶层收入的差距，减缓了法国贫富悬殊的状况。

2、福利制度和就业政策的改革。福利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和补贴。从 1981 年 5 月到 1982 年 9 月，法国最低工资提高了 29.2%，扣除同期通货膨胀率，实际增加了 11.6%。最低养老金和伤残人员补助增加 40%；家庭补贴提高 50%；住房补贴提高 52%。这些措施使单身工人收入平均提高 15%（1981 年），5 个子女家庭收入提高 17.6%，几百万低收入者受益。劳动权是工人阶级最基本的权利。为了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社会党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①在国有化部门新增 65000 个工作岗位，计划从 1982 年到 1983 年增加 40—50 万人的就业机会，其中公共部门要增加 21 万人（1982 年为 9 万人）；②缩减工时。社会党政府认为：“不采取缩短工时措施，反失业斗争就不会胜利”。所以，社会党政府宣布：实行每周 39 小时工作制（1985 年缩短为每周 35 小

时),每年带薪休假从 4 周增为 5 周;③对 10 万名“地下外籍工人”进行注册登记,关闭国界,限制外籍工人流入;④限制临时工及合同工的使用,但承认不足工时在业劳动的合法性;⑤对 16 岁到 18 岁的青年加强职业培训;把退休年龄从 65 岁提前到 60 岁,并制定了有利于提前退休的规定。

为了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权利,社会党政府制定了有关劳动者权利的四项法律草案。法律草案规定给予劳动者参加本企业管理的某些权利,如建立有劳动者参加的企业管理委员会,加强工会在企业中的作用,发展劳资双方的“集体协商”,以“合作”取代劳资冲突,改善劳动者工作环境的卫生和安全条件。并规定企业委员会有权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在本企业财政困难时,享有提出警告和查封权。改革集体谈判制度,除了坚持每年劳资双方就工资和工时进行谈判外,每两年双方还要签订集体公约。

这些法律,扩大了法国劳动者的权利,提高了他们在企业中的地位,充实了职工的参与制,从而缓和了劳资冲突。

除此之外,联合政府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司法改革、城市住房租赁制度的改革和医疗制度的改革等。

这些税收和福利制度的改革尽管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贫富差别,真正实现社会公正,但毕竟有助于缩小贫富悬殊,改善劳动者生活状况,因而赢得了广大中下层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密特朗颇为得意地说,社会党政府“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所进行的改革和取得的社会进步,超过法国半个世纪以来所进行的改革和取得的社会进步”<sup>①</sup>。

社会党政府的这些“社会主义变革”尽管与法共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但毕竟扩大国有化、实行权力下放和增加社会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改革税制等措施,大体上适合法共的口味。因此,在联合

① 《法国总统密特朗》第 15 页。

执政的第一年里，法共对于改革的进展是比较满意的。两党基本能够在议会和政府里互相配合协调，共同抵制右翼的反抗，力促改革目标的实现。在法共的支持下，改革的第一阶段，社会党在竞选中提出的大部分改革项目已完成立法手续，许多已付诸实施。

### 第三节 “昂贵的改革”后果与联合政府的破裂

#### 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紧缩政策的实施

密特朗和社会党是以“变革”和“振兴经济”等口号获得广大选民支持的。因此，能否维持和巩固政权，关键是能否把经济搞上去。而正在进行的变革的成败，也要看经济能否好转。因此，社会党政府把社会经济的变革同振兴经济的措施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法国经济衰退和失业不断增长之势，摆脱严重的经济滞胀。

同其前任和大多数西方国家以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稳步增长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相反，社会党政府上台后重新采用凯恩斯理论，制定了高增长的经济膨胀计划。试图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增加财政赤字等手段刺激国内消费需求，达到振兴经济、增加就业的目的。为此，政府首先把扩大国有化作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社会党认为，只有国有部门才能保证较高的投资水平（从1974年到1980年法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加90%，而同期私人企业的投资却减少5%），因此，只有扩大国有化规模，由政府把重要的私人大公司控制起来，才能推行“社会增长”战略，保证投资的扩大，带动经济增长。基于这种考虑，社会党实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来扩大国有经济比重，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其次，政府用增加财政支出和扩大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发展。1981年夏追加了当年度的财政预算。10月，议会通过的第二年财政预

算又增加了 27.8%。这就造成赤字迅速上升,1980 年为 303 亿法郎,1981 年达到 809 亿法郎。最后,政府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来刺激人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膨胀”政策实施的初期,曾经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使法国国内市场繁荣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回升,失业增长速度放慢。但由于法国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矛盾长期积累造成的。社会党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具有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但总的来说并没有超出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反危机”措施范围,它只能暂时缓和一下消费与生产的矛盾,不可能医治危机的病根。

这些政策实行不久,主要靠扩大公共开支、增加财政赤字和企业负担造成的市场繁荣和经济回升犹如昙花一现,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宏观调节失灵。政府财政赤字两年间即增加了两倍半;通货膨胀加剧,消费物价扶摇直上,尤其是 1982 年前 6 个月,上涨率高达 14%;刺激消费引起了进口的大量增加,使外贸出现巨额逆差,1982 年逆差额高达 933 亿法郎,比上年猛增 85% 此外,法郎疲软不堪,对美元等主要货币汇价下跌不止。在 17 个月内,法郎接二连三被迫贬值,国际债务大幅度增加。总之,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社会党政府把经济引向了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联合政府制定的膨胀政策脱离了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从国内看,战后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带来 50 年代至 70 年代初法国经济的上升和繁荣。但是,实行凯恩斯理论造成的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和财政赤字,使法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更趋尖锐,终于在 1974 年秋爆发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75 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 0.2%,通货膨胀率增高到 11.7%,失业率上升到 3.9% 财政赤字 375 亿法郎。危机过后,形



成了“三高一低”(即高通货膨胀、高失业、高财政赤字、经济低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事实说明,凯恩斯主义已经走向反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右翼政府不得不同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改弦更张,实行紧缩政策和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方针。而社会党上台后,再次推行过时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理所当然行不通。

从国际环境看,当时社会党制定的“振兴经济计划”是建立在预期西方经济将在 1982 年复苏的基础上的。但事与愿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 1982 年非但没有复苏,而且危机进一步加深。多数西方国家在危机中继续实行减少公共开支的紧缩政策,与法国社会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大相径庭。

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紧缩政策,对法国有两个不利的影响:一是由于世界市场的萎缩,法国的出口商品销路不佳,使社会党政府拟订的“重新占领市场”的计划落空,这对于严重依赖外贸的法国不能不是沉重的打击。二是美国的高利率对法国经济的冲击。法国社会党政府原来打算降低利率,鼓励私人企业借贷投资,扩大再生产。但是,为了防止美国高利率造成的资本严重外流(在改革的第一阶段,美国利率最高达 21.5%,平均也在 16%左右),法国政府也被迫提高利率(1981 年 5 月 10 日以前利率是 12.75%,1981 年 7 月初提高到 15.9%,1982 年仍保持在 15%的水平),以致影响了私人企业投资的积极性。美国的高利率和美元对法郎比价的不断上升,还改变了“巴尔计划”以来法郎相对稳定的局面。法郎愈来愈疲软,外汇储备迅速下降,迫使法国于 1981 年 10 月和 1982 年 6 月两次宣布法郎贬值(总共贬值 18.5%),并在 1982 年借贷 145 亿美元外债用来维护法郎的地位,结果加速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

法国社会党进行的改革耗资巨大,被称为“昂贵的改革”。在各项改革中,以社会改革的开支最多。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预算,从 1980 年的 7440 亿法郎增至 1982 年的 9380 亿法郎。国家每年

还要拿出 40 亿法郎对被国有化的企业和银行进行赔偿。政府为解决失业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在一年内要新增加 900 亿法郎的开支；在公共部门新设立 12.5 万个就业岗位，每年也要增加 30 亿法郎经费。改革的巨额费用超过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1980 年法国财政赤字 303 亿法郎，1981 年上升为 809 亿法郎，1982 年达到 989 亿法郎，比 1980 年增加了 2 倍。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好转无望，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的国有化企业效益低下，缺乏竞争力，致使严重依赖外贸的法国经济增长缓慢，削弱了政府改革的经济基础。为了弥补高福利、高消费造成的巨额赤字，只好在国内外大举借债。从 1981 年到 1982 年，政府先后 4 次发行公债，总共借得 450 亿法郎。1982 年法国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总共从国外借债 250 亿美元，使法国全年债务达 500 亿美元，成为世界上除墨西哥和巴西以外的第三大负债国。面对国家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政府不得不考虑节约开支，紧缩赤字。

社会党的改革虽未触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但在某些问题上与大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例如，改革税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大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提高社会福利，增加了企业主的负担，减少了他们的利润等。因此，大资本家利用所拥有的经济实力，采取组织资金外逃、拒绝向企业投资、偷税漏税等手段，从经济上抵制和反抗左翼政权。

1974 年至 1980 年，法国经济虽然不景气，但工业投资年平均也只下降 2%，而法国社会党上台的当年却下降了 10%，第二年又下降了 7%。这种情况当然与两年来利润小、企业收入恶化和高利率密切相关，但主要是企业主感到前途莫测，采取观望甚至敌视的态度所致。据统计，1981 年外流资金约 500 亿法郎，1982 年偷税漏税总额达 900 亿法郎，几乎等于当年的财政赤字。大资本家的反对和抵制，进一步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危机，使改革试验步履艰难，人民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

当社会党取得政权时，法国人民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但在社会党执政一年之后，他们的这种热情开始冷却下来。社会党自身的社会基础——法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利益也受到程度不同的侵犯。中小企业主因社会负担过重和缺乏资金而不满；自由职业者因所得税和职业税增加而叫苦；小农场主因政府对农产品压价而恼怒；公务员和管理人员因工资增长过慢和社会分摊额高而表示抗议。中间阶层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在社会党执政一年后普遍下降，他们担心会被“无产阶级化”。因此，1982年初，占全国就业人口 1/3 的中间阶层改变了支持社会党的立场，纷纷举行罢工、罢市等，抗议密特朗及社会党的社会经济政策。与此同时，下层人民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在法国经济一蹶不振的情况下，他们在变革中得到的好处正日益消失，生活和劳动条件逐渐恶化。

法国人民的不满情绪还在选举中表现出来。1982年1月在4个选区国会议员的补缺选举中，选民投了反对党候选人的票，使左翼候选人全部落马。在同年3月的省议会选举中，选民又让右翼控制了大部分省级权力机构（右翼控制了59个省，左翼只控制36个省）。左翼在选举中的失败对社会党是极大警告。

面对经济政治形势的恶化，以经济增长为前提的“昂贵改革”的进程和效果必然受到影响。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密特朗不得不于1982年5月和1983年3月两次对莫鲁瓦政府进行改组，对变革的速度、方向、内容和措施都作了重大调整，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激进改革，转入以紧缩为主的第二阶段改革。

## 二、紧缩政策实施的后果与联合政府的破裂

从1982年5月开始，社会党政府大大放慢了改革速度，转向实行严厉的经济政策，以消除第一阶段改革的恶果，渡过经济难关。调整改革方向后，社会党政府除了颁布过“劳动者权利法”和“男女职业平等法”外，再没有采取其他重大的变革行动。对已经通

过立法程序的变革，有的重新修订（如经济政策），有的打了折扣（如大宗财产税），有的延期实施（如权力下放法案），这表明密特朗及社会党已从原来的立场上逐渐退了回去。在经济方面，社会党政府放弃了凯恩斯主义，从膨胀政策转向紧缩政策，从刺激消费政策转向鼓励投资政策，从以反对失业为主转向以反通货膨胀为主。在社会福利方面，密特朗及社会党从“慷慨大方”转向号召人民作出牺牲，要求人民放弃“过去的某些安逸和收入”，并作出几项决定：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如病人必须付伙食费和其他非医疗劳务费，提前退休者不再享受按折扣支付社会保险金的优待；冻结失业救济金；废除按物价指数自动调整工资的办法，把调资幅度限制在通货膨胀率以内，以此来抑制工资和收入的增长速度；提高煤气、电、电话和铁路的收费，一些日常消费品亦增税或提价；对法国人实行强制性储蓄，限制他们出国旅游的开支。1983年3月的紧缩计划规定，当年要通过发行义务公债140亿法郎，节约国家行政开支150亿法郎，增加石油产品税50亿法郎，削减公共工程项目40亿法郎等措施使全国的需求减少2%。

为了刺激投资，社会党放弃了执政前“同资本主义决裂”的口号，开始向资产阶级作出妥协和让步。在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后，密特朗把减轻企业负担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采取了降低利息率和营业税，对投资者减免税收，取消企业主对家庭补助的分摊额等措施，改善同企业主的关系。

1982年后半年开始实行的这些转嫁经济危机和社会负担，寻求同资本家妥协以换取经济增长的政策，使中下层人民深受其害，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出现了战后以来第一次下降，终于导致了“五月风暴”以来法国社会最严重的动荡。

1984年元旦，法国最大的私人汽车公司塔尔伯公司与政府达成协议，决定解雇1900多名工人，这引起了塔尔伯公司工人的全体罢工，并接连发生暴力冲突，数百人在冲突中受伤。2月16日，

法国东部的卡车司机阻塞公路，举行抗议活动。18日至19日，运动扩大开来，全国卡车司机采取行动，阻塞了大部分地区的公路。2月19日法国煤矿工人举行为期两天的罢工，全国50%至80%的煤矿工人参加了罢工。2月20日，来自各地的35万私营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和支持者在法国西部的教育中心城市雷诺市举行示威，抗议政府的教育改革方案。3月8日，近450万公务人员为了维护购买力，在法共的支持下举行罢工。这是左翼执政以来出现的规模最大的罢工。罢工使法国一部分地区陷入瘫痪状态。1984年4月，各大总工会的地方组织联合发动洛林地区5万钢铁工人“向巴黎进军”，反对政府调整钢铁工业和大量裁员的决定。

社会党的紧缩政策，也受到了法国总工会和法共的严厉批评。法共与社会党的关系又出现裂痕。1983年3月，当政府总理莫鲁瓦提出缩减开支的调整计划后，“法共一方面对政府的措施提出了批评，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免损害左翼的团结。”<sup>①</sup>马歇声称，法共原则上并不反对旨在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整个计划，但要求计划的制定要考虑到当前的现实和人民的长远需要和利益。在议会辩论时，法共对计划提出了5点修正意见，并号召劳动人民行动起来，迫使政府改变路线。最后，莫鲁瓦在一些细节上做了让步，法共议员对计划投了赞成票，同时，又表示保留他们提出修改意见的权利。

在左翼内部矛盾不断增长、右翼攻势日益加强的严峻形势下，社会党和共产党迫切需要协调立场，求同存异，采取共同行动，反击右翼进攻，重新制造舆论，为迎接1986年的大选做准备。因此，当马歇于1983年10月10日提出希望同社会党举行最高级会晤之后，社会党第一书记若斯潘即于10月底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积极响应。为促成两党会晤的成功，密特朗总统在此之前指示社会党

<sup>①</sup>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272页。

领导人务必达成协议。社会党领导人、国民议会议长梅尔马兹还充任中间人,安排若斯潘和马歇于 11 月 26 日在议长官邸晤谈,为正式会晤定下基调。

1983 年 12 月 1 日,法共总书记马歇和社会党第一书记若斯潘分别率代表团在巴黎社会党总部会晤。这是左翼执政两年半以来两党之间最重要的一次高级会晤,分外引人注目。经过 12 个小时的谈判,双方达成妥协,发表了联合声明。两党领导人均对会晤的结果表示满意,认为联合声明为两党今后更好地开展共同行动,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法共和社会党当初之所以能走到一起联合执政,是因为法共希望利用参政的有利条件,推动经济、社会、政治变革,恢复自己的影响。而社会党则想利用“政府团结”来迫使法共支持政府的政策,确保社会“安定”。在联合执政期间,法共尽管注意维护政府团结,但也不时发表对政府政策的不同意见,以表明同社会党的区别。它公开批评社会党政府的“紧缩政策”中不利于劳动群众的一面,认为左翼执政以来的成果虽然超过了人民阵线和二次大战后左翼政党执政时期,但是,1981 年 6 月共同执政协议中的一些目标,如减少失业、提高购买力等尚未达到,指责社会党对右翼让步太多,强调左翼政府必须充分履行自己的诺言,满足劳动群众的期望。在对外政策方面,法共主张在美苏日内瓦欧洲中程导弹谈判中计入法国核力量,建议所有欧洲国家都参加这一谈判。此外,还对法向黎巴嫩派驻和平部队以及出兵乍得的使命和作用提出过质疑。

社会党则强调左翼执政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社会党的政策不能不与之“相适应”,例如采取“紧缩政策”,实行零增长等;声称在取得了一些大的进展之后,目前需要有一个“巩固阶段”,社会党并未放弃提高购买力、减少失业等目标,但具体做法不可能是“直线型的”、“一统化的”。对法共在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上“不维护政府的立场”表示“遗憾”。

在两党会晤中，双方阐述了各自的立场。马歇指出，1981年执政协议有待进一步贯彻。若斯潘指责法共批评太多，有损总统和政府的威信，强调紧缩是唯一有效的政策。通过谈判，尽管双方的基本分歧仍未消除，但从团结对敌的大局出发，互相都作出了一定的让步。法共表示在黎巴嫩和乍得问题上采取的是同密特朗政策相吻合的立场；在导弹问题上，尽管它仍坚持要“在国际谈判中计入法国的核力量”，但它第一次提出在冻结现有导弹的基础上，“通过谈判销毁相当数量的 SS-20 导弹”，从而间接承认了苏美在欧洲战略核力量的不平衡状态。在国内方面，法共肯定了政府为“解决生产困难、资本主义浪费和持续的通货膨胀”而采取的“紧缩措施”，同意加强多数派的团结。

社会党方面则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加上“把平均购买力保持在 1981、1982 年的水平上”，实行“公正的税收”政策，“提高低工资”，在经济增长、就业和社会公正等“重要领域实现新的较大的进展”，以及用法共“国际性危机”的提法来取代自己“世界性危机”的提法。

法国一些报刊对法共和社会党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达成的联合声明评论说，这就像一场“打成平局的比赛”，由于双方使用了一些“含糊的提法”，因此各方都可以“保住面子”，既“保证了对政府的支持”，又能使各方“宣称自己未放弃任何目标”。也有的报刊认为，法共让步更大，社会党借此“捆住”了法共的手脚，得到了法共充分支持政府行动的保证。

在左翼执政中期举行的这次最高级会晤，使共、社两党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行动方向联合声明着重指出，左翼“团结起来”，支持政府“继续进行改革和贯彻 1981 年 6 月开始的变革政策”，是对右翼“最有力的回击”。强调两党应在政府、议会和企业中“加强团结”，在维护劳动者权益、通过新闻法案、发展公立学校、反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活动等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两党还商定成立工作

小组，定期讨论经济政策和就业问题。关于国际问题，两党在联合声明中强调，法国应当“促进解决黎巴嫩问题”和“稳定乍得局势”，应奉行“促使东西方紧张局势缓和的政策”，尤其要“制止军备竞赛”；“严格遵守力量平衡和各国的安全”；在美、苏大幅度裁减军备之前，法核威慑力量应“维持现有水平”。此外，两党还同意组成代表团，专门就和平、安全和裁军问题进行会晤。这些表态对加强左翼团结，巩固政府地位具有积极的意义，也为现行政策的实施和保持政局的稳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然而，两党达成的协议只是纸上的东西，何况各方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解释。只是在当时，执政的社会党还离不开法共及其影响下的总工会的支持，而法共为了留在政府，对社会党的批评也不能走得太远，这就使联合得以维持下来。

1984年3月底，政府公布了“工业结构改组计划”，要求关闭一些设备陈旧、长期亏损而又无法扭转颓势的钢铁、煤炭、纺织企业，优先发展新技术产业。这将使3万钢铁工人以及大批其他部门的工人失业。这一计划的提出和实施，进一步加深了政府和劳动人民、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分歧。马歇于4月2日发表电视讲话，批评政府的钢铁计划是“悲剧性的错误”，违背了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协议，没有履行1981年总统选举时的承诺。并表示法共坚决支持现代化，但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是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而不是严厉的紧缩计划。4月13日，马歇参加了由总工会和其他工会联合会组织的数万钢铁工人向巴黎进军的示威游行。4月18日，马歇宣布，法共参加政府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建立在一项更加明确的政策基础上的。

法共对钢铁计划的公开反对立场使两党关系陷入了危机。为了“澄清”与法共的关系，莫鲁瓦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提出在议会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如果法共支持政府，那么它就不能继续公开批评政府，如果反对或者弃权，法共的部长就必须退出政府。



在 4 月 20 日召开的议会会议上，莫鲁瓦总理发表总政策声明，重申了政府的“严厉政策”和工业调整计划，并且说：“政府现在和将来都坚定地支持它的选择”，强调“左翼的团结”是保证政府获得“成功的条件之一”。法共议会党团主席拉儒瓦尼在辩论中说：“不应夸大两党的分歧。”他要求政府听取法共的意见，倾听工人们政府对政府感到“失望和不满的呼声”。在解释法共议员对投票的态度时，法共代表说，政府的总政策声明并没有消除工人们保护购买力、对付失业和工业政策方面的“不满和忧虑”，法共对此表示“强烈遗憾”<sup>①</sup>。但出于珍视左翼团结的愿望，法共将对政府投信任票，但保持对政府的批评权，从投票的结果看，两党都力求维护团结，而不愿承担“左翼破裂”的责任。

然而，投票既没有消除两党的分歧，也没有缓解经济危机。随着失业增多和人民购买力的下降，左翼政府的威望也一落千丈。在 1983 年 3 月举行的市政选举中，右翼反对派取得明显的进展。在全国 36 个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左翼保住了 12 个，右翼控制了 24 个，其中有 7 个是新从左翼手中夺回的。在 221 个 3 万人以上的市镇中，左翼保住了 120 个，右翼控制了 100 个，其中有 34 个是新从左翼手中夺回的。法共丢失了 14 个城镇，是丢失市镇最多的党。在参加市镇选举的 34 名政府成员中，竟有 8 名落选。1984 年 6 月 17 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更鲜明地反映了左右翼力量对比的变化。在这次选举中，左翼两党的得票率从 1979 年的 43.3% 下降到 32%，其中法共得票仅占 11.28%。而右翼两党则抛弃宿怨，联合行动，在法国大资产阶级和垄断财团的支持下，利用他们控制的庞大的新闻媒介，抓住社会党政府的失误大肆渲染，夺得 42.75% 的选票，超过左翼 10%。就连极右的小党国民阵线，也获得 11.07% 的选票，与法共并驾齐驱。

<sup>①</sup>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 273—274 页。

这表明法国政局发生了不利于左翼的变化。如果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左翼就可能在两年后的大选中失去经过 20 余年奋斗得来的政权。

为了扭转局势，密特朗决定改组政府，于 7 月 17 日任命 38 岁的原政府工业和科学部长法比尤斯担任总理。新总理在向国民议会发表总政策声明时表示，鉴于紧缩政策是法国经济恢复一系列平衡的实际需要，而且执行以来已初见成效，新政府不可能半途而废，必须继续不懈地执行。法比尤斯是工业现代化的积极倡导者，1984 年 2 月政府提出的工业改组计划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作为精通经济的“专家治国论者”，他深知法国经济的根本弱点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落后，因此，他将大刀阔斧地进行这方面的改革，甚至不惜使失业人数在一段时间里有所增加。

法共代表团在政府改组后，紧急会见法比尤斯，要求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考虑执政三年的经验教训和欧洲议会选举左派失利这两件事。法共认为，“欧洲议会选举中左派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选民对失业加剧，购买力下降和工业形势恶化不满”，“如果政府不改变其政策，左派将在 1986 年议会选举中遭到失败。”法共要求新政府放弃紧缩政策，执行促使经济增长，减少失业，提高人民购买力的新政策。在这些要求被法比尤斯拒绝后，法共宣布不参加新政府。同时声明，法共将支持“任何符合过去做出承诺的措施”，“如果新的条件允许，它将重新入阁。”至此，1981 年 6 月以来，两党共同执政的局面宣告结束。9 月 6 日，法共宣布退出左翼多数派，左翼联盟彻底破裂。

法共退出左翼联合政府后，对左翼联盟期间的得失进行了总结，在 1985 年召开的二十五大会上，用“新的多数民众联合”的口号取代了“左翼联盟”的口号，并采取各种措施力图扭转 70 年代末出现的力量不断衰退的趋势，但并未收到明显效果。随着 80 年代末苏联东欧各国改革失败，法共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也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困难。

### 三、对左翼联盟最终破裂的几点思考

从 1972 年社会党和法共签订共同纲领、建立左翼联盟，到 1984 年 9 月法共退出政府，历时 12 年。两党在联合中充满斗争，在合作中经常争论，甚至出现 1977 年到 1981 年左翼联盟破裂、关系极其紧张的时期。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竞选合作也从未中断过。这种关系正如法国的一位政论家所说：“法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结合不是基于爱情的婚姻，而是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sup>①</sup> 这种比喻很形象，很能说明问题。基于爱情的婚姻是以互相爱慕、感情融合为基础的，一旦结合的双方感情破裂，他们的婚姻便顷刻瓦解。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却不同，它是以双方的利害关系为基础的，只要结合的双方还能从中得到好处，即使感情完全不能融合，婚姻仍能维持下去。共产党和社会党尽管互相之间勾心斗角，争夺激烈，但是只要联合对它们还有一点好处，它们就不会轻易放弃。两党力量不平衡的加剧，国内外政策处理不当，某一方对联合的态度的突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左翼联盟的破裂。

1984 年，当共产党意识到参加左翼政府非但没有扩大自己的选票和影响，反而失去更多的群众支持后，便退出了左翼政府，左翼联盟最终破裂，至今仍未有恢复的迹象。

当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左翼联合政府最终破裂的原因时，我们可以看到，左翼联合政府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分裂的因素。从当时的力量对比看，社会党占据绝对优势。就选票来看，社会党获近 38% 的选票，法共仅为 16%；从议会议席看，社会党获总共 491 席中的 285 席，而共产党仅得 44 席。为什么社会党在议会中单独拥

<sup>①</sup> 《世界报》1982 年 1 月 9 日。

有绝对多数并完全可以独家执政的情况下却向法共敞开大门呢？这是因为：

1、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接纳法共入阁，可以借助左翼联盟巩固自己左翼旗手的地位，继续争取法共的选民。

密特朗能登上总统宝座并取得议会多数，除了社会党自身的力量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借助于法共等左翼力量的支持。所以，密特朗强调指出：“投票支持法共候选人的选民有 450 万左右，他们后来又投票支持我，不能把他们排斥在法国政治生活之外”。

当时社会党有相当雄厚的实力，密特朗利用其多数地位接纳法共入阁，一则可以开创“左翼团结民主”的局面，便于团结和争取法共及其影响下的群众对付右翼，贯彻他一贯主张的“左翼联盟”的战略方针；二则接纳法共入阁对社会党内以罗卡尔为首的反对联盟的少数派是一个打击，有利于加强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2、有利于约束和限制法共。密特朗接纳法共入阁，是以法共同意签署两党“执政协议”为条件的。“协议”主要体现了社会党的内外政策主张，而法共作了重大让步。在国内问题上，法共原来指责密特朗的纲领“不适合变革的政治方向”、“目标模糊不清”，现在它表示决心推行法国男女公民通过选举密特朗任共和国总统的新政策”。在对外政策上，法共放弃原来支持苏联出兵阿富汗，转而主张“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并要求欧洲裁军谈判“特别是应当讨论苏联 SS-20 导弹问题和美国部署潘兴 I 式导弹问题”；在承认戴维营协议和欧洲共同体的发展问题上，法共也作了明显的让步。所以法共是“降低要价”而“自愿进入总统多数派”。密特朗在这样的条件下接纳法共入阁，可以利用在政府中占据绝大多数重要职务的有利地位，用执政协议制约法共，让法共按社会党的政策主张行事。而一个被削弱的法共对社会党没有多大约束力，他们完全可以不理睬法共的要求而自由行事。如果法共今后反对社会党向右转的倾向和政策，社会党就可以把分裂的责任推给共产党。此外，社

会党还掌握着法共去留的主动权,如果法共违背“协议”,随时可能被赶出内阁。这会使法共的处境更加孤立,并加剧法共内部的派别斗争。如果法共为了留在政府中,放弃自己的一贯主张,无条件地支持社会党的某些不利于劳动人民的政策,就会损害自己工人阶级利益维护者的形象,引起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的不满,进一步削弱自己的影响。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对社会党有利。

3、在实施改革中可以借助法共的力量。密特朗上台后,要实施经济和社会改革,困难很多,社会党不仅将受到右翼的反对,也必将受到法共力量的牵制。因此,密特朗为了较顺利地实施其改革政策,需要各方支持,特别是法共力量的支持。长期以来,社会党一直没有自己直接控制的工会,在劳工界缺乏牢固的基础。而法共在劳动人民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它控制着拥有 240 万会员的法国总工会。社会党政府吸收法共入阁,就可以通过法国总工会的力量对大企业主施加压力,以满足工人的部分要求;同时又可利用法共的影响,调节劳资关系,约束工人群众对增加福利、提高工资的过高要求,避免两翼作战,在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改革目标。如果不让法共入阁,社会党将会失去总工会的支持,并由此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正如瑞士报刊指出的,法共参政对密特朗来说,显然是“有一个拥护他的共产党总比有一个反对他的共产党要好”。

法共为什么要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委屈求全,参加政府呢?原因有三:第一,法共早已决意走议会道路,并从十八大起就明确表示要参加“民主政府”。在这次总统大选和立法选举前夕,它曾多次说“决不支持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并指责社会党企图撇开它单独执政。现在既然有机会入阁,它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再回到受孤立的状态中;第二,法共用“让步”换取入阁是为摆脱这次选举失利造成的党内混乱,稳住全党。法共在选举中遭到惨败后,党内矛盾加剧,强硬派主张不与社会党妥协,只在议会

里支持左翼多数派而不承担义务；革新派主张利用左翼上台的机会，通过参政实行“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加强对苏联的独立性。由于革新派力量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马歇同意参政可借助这派力量稳住自己的领导地位；第三，密特朗上台反映出广大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他在执政初期会采取一些争取民心的改革措施。法共入阁后，就可以直接参与这些改革，做些群众福利方面的具体工作，以恢复在选民中的影响，重振昔日雄风。因此，法共决不会甘心于充当社会党“小伙计”的角色，一旦实力增强，就有可能提高要价，寻机退出政府，以图东山再起。

所以，法共认为，签署反映社会党主张的执政协议并不是投降。法共《人道报》解释说：“如果按表面的政治上的计算方式来说，社会党不需要我们在议会中的选票支持。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事实是，首先我们的党在议会选举和在总统选举中对造成右派的失败都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其次是根据共和国总统的诺言制定的新政策的实施将不可避免会受到资方和右派的抵制，它们并未因失败而停止斗争。因此，所有左派力量的合作将是势在必行的。”<sup>①</sup>但这种解释并不能掩盖法共在政府中的“小伙伴”地位。

既要在政府中与社会党保持联合，又不能背离本党主张和选民利益，这种两难处境，对法共来说是非常棘手的。

两党的联合是以实现变革为前提的，两党在联合政府中同床异梦的局面能否维持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找到解决已经成熟了的社会经济问题的钥匙，是否有能力使国家摆脱右翼政策和经济危机，实现经济增长。

如前所述，两党联合政府是在非常不利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上台执政的。当时西方国家程度不同地陷入经济滞胀，复苏乏力，

<sup>①</sup> 《人道报》1981年6月23日。

纷纷采用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实行控制货币发行，削减公共开支的紧缩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实行的经济膨胀政策，面临着严峻考验。如果实施成功，将会巩固两党的团结和执政地位，增加法共政策的吸引力，改善其在政府中的处境，赢得更多的支持。如果失败，则会使法共的主张不仅在中间阶层，而且在下层群众中也更无市场。法共在政府中的回旋余地会更小。

三年多的执政实践表明，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通过“膨胀”政策实现经济增长的计划是不现实的，它只能加剧经济危机。而社会党后来实施的紧缩政策又同法共历来的主张相违背，在危机尖锐化并出现越来越多难以应付的社会问题的情况下，两党被暂时的胜利而掩盖的分歧必将进一步扩大。

在联合政府中，法共不时地抱怨社会党改革动作迟缓，许下的诺言不兑现，改革措施不彻底等；法国社会党则批评法共合作不够，例如把省议会和省议会议长选举的失败归咎于法共没有积极认真地配合。改革转向后，法共加强了对社会党的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国社会党“右倾化”，推动社会党把改革坚持下去。但由于在议会和政府中力量对比悬殊，法共很难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更不可能利用参政机会实现自己的主张。与此同时，法共还必须承担保持“政府团结一致”的义务，支持政府的内外政策。这样，法共不仅失去了批评政府的自由，而且还必须为一些自己反对但却无力改变的政府政策承担责任，其后果必然是事与愿违。法共参政期间的几次地方选举结果都说明，其影响和选票都在直线下降，而社会党接纳法共入阁的目的则几乎全部达到了。当法共意识到入阁对自己不利，宣布退出政府时，已为时过晚，只得吞下参政造成的恶果，同时承担左翼分裂的责任。所以，法共在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参政来争取群众，扩大影响，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

从社会党方面看，为了上台执政，它可以提出一系列激进的口

号和激进的政策同右翼争夺选民。但“批评容易，雕琢难”。一旦上台执政，就必须从幻想的天国回到现实的环境。由于密特朗为法国所设计的“法国式社会主义”蓝图，是在继承法国特定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即在保留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背景下进行施工的，因而必然要受到竭力维护现存体制的各种力量和国内外各种经济条件的制约。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试图通过实行国有化来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通过实行经济计划化来克服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作用；通过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和税收改革，在分配领域减轻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改变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和其他社会不公正现象；通过实行工人“自治管理”改变雇佣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依附状态；通过“权力下放”使更多的雇佣劳动者介入社会政治生活，这些愿望尽管很好，但事实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其结果，如同一切改良主义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在实践中遭到失败。密特朗的“社会主义变革”实践，不仅没有建立起“法国式社会主义”，实现与资本主义的决裂，相反，却将自己的一切纳入资产阶级既定的统治秩序和轨道中去，最后与社会主义相距越来越远。在 1986 年的大选中，社会党政府失去群众的支持被迫下台，“社会主义变革”的有限成果也几乎化为乌有。



## 第六章

# 左翼联盟期间法共力 量的衰退及其原因

纵观 1958 年以来法共寻求建立左翼联盟，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 and 实践，我们可以看到，1958 年后，法共力图根据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中出现的新情况和第五共和国建立后国内政治格局的新变动来调整自己的路线和政策，使其符合法国社会的需要和

人民的愿望，以争取更多的群众，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增加自己影响社会的能力，为在法国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法共的探索和努力在 60—70 年代曾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见下表：

1958—1993 年共产党和社会党选举力量变化一览表<sup>①</sup>

得票数 年 份	历次大选选票数(万票)		得票率(%)		议 席	
	共产党	社会党	共产党	社会党	共产党	社会党
1958	390	319	18.9	15.5	10	47
1962	400	230	21.8	12.7	41	67
1967	500	422	22.5	18.9	73	116
1968	440	365	20.0	16.5	34	57
1973	510	489	21.3	20.5	73	102
1978	587	645	20.5	22.6	86	104
1981	400	940	16.1	37.5	44	283
1986	270	880	9.8	32.0	35	209
1988	223	1000	11.3	37.8	27	276
1993			8.0	18.0	23	53

<sup>①</sup> 本表数字根据克·维拉尔：《社会主义简史》第 166 页、D. S. Bell：《法国社会党》第 279—280 页、《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第 100 页、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 391 页，以及 1988 年和 1993 年《人民日报》有关报道整理。其中 1967 社会党的数字为社会民主左翼联盟所得票数，1981 年社会党得票数中包括左翼激进党。

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党员人数变化一览表①

年 份	1958	1964	1968	1972	1976	1980	1984	1988	1992
共产党(万人)	25	30	37	39	9.2	70.9	60	60	40
社会党(万人)	11.8	8.8	8.1	55	15	20	22	20	10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 1958 年到 1978 年的 20 年间,法共的选票(除 1968 年外)和党员人数一直呈缓慢上升的趋势。选票从 1958 年 390 万张增加到 1978 年的 587 万张,议席从 10 席增加到 1978 年的 86 席;党员人数从 1958 年的 25 万增加到 1980 年的 70 万人。这些成绩是法共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用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活动的结果,也说明法共提出并推动实施的旨在推翻垄断资本,实现进步的社会经济改革的左翼联盟战略,是符合人民意愿的。法共左翼联盟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左翼力量的发展,直至推翻右翼政权,在西方大国建立起冷战后第一个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左翼联合政府。它既为法国劳动人民争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也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探索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对于法共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作者已在前面几章做了叙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肯定法共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法共的选举力量和党

① 本表根据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 291 页、《各国社会党手册》第 252 页、《西欧共产党》第 52 页、W·诺思卡特:《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第 13 页有关数字以及法共《人道报》1991 年 10 月 7 日的数字整理。1992 年的数字为有关部门的估计数。

员人数在经历了 20 年的发展后,从 70 年代末开始急剧下降,到 80 年代末已由战后初期的第一大党变为第五位的政治力量,不仅无法与右翼和社会党抗衡,还落在了绿党和极右翼的国民阵线之后。法共党员人数在 80 年代初达到 70.9 万的高峰后,又持续下降,到目前已不足 40 万人。这种令人担忧的现象自有其复杂的原因,如国内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变化,资产阶级政府为打击和限制法共的活动制定的歧视性法律,以及为缓解阶级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对国家的职能和管理方式所做的调整,社会党的激烈竞争,国际共运走向低潮,法共自身战略和策略的失误,等等,都对法共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我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必须既看到法共自身失误的消极后果,也要看到国内外环境的各种因素对法共活动的制约。

然而,从总结法共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教训出发,笔者认为影响法共力量消长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法共自身。法共长期以来未能从指导思想彻底摆脱“左”倾教条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束缚,对自己所处的客观环境缺乏符合实际的认识,在自己的纲领、路线、政策中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回答社会发展提出的新问题。所以,尽管法共在几十年的探索中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所取得成果与人民的希望和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还有相当的差距。本章将着重对导致法共力量衰退的各种主客观原因,特别是对各种客观因素成为既定的现实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法共自身的原因进行客观的、全面的、深入的分析。

## 第一节 对资本主义新变化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

### 一、低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缓解危机的能力

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引

共产党党员职业类别<sup>①</sup>

职业类别	1966年 (%)	1979年 (%)
工人	60.10	51.0
职员	18.75	
知识分子	9.00	13.5
农民	6.56	4.5
独立劳动者	5.77	
其他 (独立劳动者、退休者)		30

社会党党员职业类别<sup>②</sup>

职业类别	1973年 (%)	1985年 (%)
高级干部	12	27
中级干部(工程师、 教师、管理人员)	13	38
职员	13	10
工人	14	10
独立劳动者	19	6
其他及退休者	29	9

共产党和社会党选民职业类别<sup>③</sup>

职业	1973年(%)		1979年(%)	
	共产党	社会党	共产党	社会党
从事农业者	4	5	9	17
独立企业者	5	6	14	23
行政官员和专业人员	3	7	9	15
职员和低级管理人员	15	21	18	29
工人	52	35	36	27
无职业者(退休者)	21	26	17	26

①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 290 页。

② 《社会主义新杂志》1990 年第 11 期。

③ 根据《西欧共产党》第 99 页、《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第 31 页资料整理。

然而，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已大大不同于马克思所预言的发展趋势。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构成传统工人阶级主体的体力劳动者日益减少，脑力劳动者日益增多。战后，法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初广泛的工业化和 70 年代中期至今的现代化两个时期。在第一时期的 20 多年中，法国政府通过大规模扩大工业生产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使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急剧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持续上升。这期间，尽管第二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开始下降(见下表)，但由于绝对人数逐年增加，法共的社会基础也随之扩大。这使法共在政治上遭受孤立的情况下，基本上保持了 20—23% 的稳定选民。

1973 年开始的整个西方世界的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法国经济。为了克服能源危机，提高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法国工业不得不由扩大传统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转向发展低投入、低能耗、高产出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由此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新时期。特别是 1984 年政府公布的工业改组计划，规定在三年内通过关、停、并、转，缩减生产规模，裁减过剩劳动力，完成对煤炭、冶金、造船、纺织等传统工业和诺尔—加莱海峡煤矿区以及洛林铁矿等老工业区的全面改组和技术改造，把工业发展重心转向微电子、宇航、通讯、机器人、生物技术等有竞争力的高科技部门。这一计划，大大推动了法国现代化的进程，使产业结构和就业人口比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法共三大产业的发展和就业人口比重的变化<sup>①</sup>

项 目	1960		1970		1980		1984	
	万人	%	万人	%	万人	%	万人	%
全国总 人数(万人)	1893.7		2085.6		2134.9		2151.1	
第一产业 人数与比重	402.9	21.3	274.9	13.1	182.1	8.5	167.6	7.8
第二产业 人数与比重	722.4	38.1	784.1	37.6	750	35.1	670	31.4
第三产业 人数与比重	767.8	40.6	1027.6	49.3	1202.8	56.3	1307.5	60.8

从表中可以看出,70年代后,第二产业就业人口的绝对数和比例都呈下降趋势。1970—1984年,第二产业人口减少115万人,其中减少最多的是法共历来力量和影响最强的地区和部门。如以“红色地带”著称的巴黎地区,从60年代开始,由于实行领土整治计划和工业改组计划,企业外迁达2800个,相当于50万个就业机会外迁。许多工厂因外迁和关闭而消失。雷诺汽车公司和雪铁龙汽车公司外迁使巴黎地区汽车工业的就业人数从占全国的4/5减少为1/2<sup>②</sup>。洛林铁矿职工从1962年的22700人减至1983年的2700人,北方煤矿区矿工从50年代的20多万减少到1984年的1.9万,到1988年只剩1100人<sup>③</sup>。1984年实施工业结构改组计划的当年,仅雷诺汽车公司(为法共力量最大的国营企业)就裁员

① 《国外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第188页。

② 黄文杰:《法国宏观经济管理》第260页。

③ 《国际共运资料选译》1985年第5期第16—17页。

13500 人。建筑业也裁员 4 万人<sup>①</sup>。整个计划实现总共将裁减传统工业部门工人约 50 万。

与此同时，现代化的发展，已使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脑力劳动者正在逐步取代传统产业工人，成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在法国，脑力劳动者在雇佣劳动者中的比重已从 1961 年 31% 增加到 1984 年的 54.5%。以白领工人为主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1984 年已占全体就业人员的 60.8%。脑力劳动者人数的迅速增加已使他们丧失了以往的特殊地位，大多数脑力劳动者特别是普通职员、技术员和低级公务员，无论社会地位、劳动方式、工资收入都正在同工人阶级接近，成为马克思所说的“总体工人”的一部分，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

法国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这些变化，对于基本上以体力劳动者为党员来源和选民基础的法共显然是不利的。“由于法国共产党传统主要从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所以，现代法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就大大削弱了法共的社会基础。”<sup>②</sup>这种客观的不利因素由于法共长期固守传统的工人阶级概念而更为严重。在 60 年代，法共一直拒绝承认体力劳动者比例逐渐减少和脑力劳动者数量迅速增加的事实。当时，法国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通过研究、分析，预言阶级结构的变化将会对法共及其选举力量带来不利影响，而法共却把这种分析说成是政治宣传加以否定。1970 年，法共政治局委员加罗迪提出：科技革命已使“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正在成为主要的生力军”，所以，应当使“技术人员与传统的工人阶级享有平等的地位”，实际上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但这种主张遭到法共中央的批判。马歇指出，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84 年 10 月 17 日。

<sup>②</sup> 怀恩·诺思卡特：《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第 24 页。



这种提法之所以不正确，是由于“这种提法认为，广大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融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可是现在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在将来长时期内也不会符合。它使工人阶级溶解在一个大杂烩中，否定了工人阶级在改造社会中的先进作用和决定性作用”<sup>①</sup>；这种观点“以牺牲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为代价过分强调技术的变化，实际上等于损害党和工人阶级的特性”<sup>②</sup>。

直到 1976 年法共中央出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书中，仍然坚持：“不管情况如何复杂，不管在什么部门从事劳动，是否属于工人阶级基本上取决于三个事实：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生产商品，不参与收集剩余价值”；认为“体力劳动基本上仍然是一切生产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因素”；“因此，不能把总体劳动者的概念同工人阶级的概念等同起来。因为总体劳动者的概念不仅可以包括属于工人阶级的生产劳动者，而且可以包括职员、管理人员、研究人员等非生产劳动者。后一类人虽然是总体劳动者的成员，但总的来说，并不因此而成为工人阶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③</sup>“从阶级的观点看，职员、教员、技术人员、工程师、研究人员等处于越来越接近工人的中间地位。但是，除了一部分人以外，他们目前还不能同工人阶级混为一谈。这部分工资劳动者不直接参加创造剩余价值。因此，总的来说，他们还不具有生产劳动者的资格”。法共认为：“如果把两者混为一谈，就会使工人阶级融化在一个异质的总体中，削弱阶级斗争的意义，同时还会推迟一切受资产阶级剥削的社会阶层在明确的基础上实现联合。”<sup>④</sup>

法共固守传统的工人阶级概念，把工人阶级仅仅局限于直接

① 《法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第 45 页。

② 尼尔·麦金尼斯：《西欧共产党》第 104—105 页。

③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 166、172 页。

④ 同上，第 166 页。

创造剩余价值和从事物质生产的狭隘范围内，实际上就把占人口近 2/3 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职员和无产阶级化了的雇佣脑力劳动者排斥在工人阶级之外。在脑力化工人和知识分子思想上倾向于改良主义的情况下，法共对工人阶级概念的僵化理解和对于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变化认识迟缓，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同脑力劳动者的距离。许多知识分子由于不愿接受法共陈旧的纲领主张而远离了共产党，加入社会党的队伍。一方面是法共传统的支持者体力劳动者日益减少，另一方面法共又未能采取有力的措施争取到迅速增加的脑力劳动者，因此，法共社会基础的缩小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法共 70 年代后期选举力量的下降曲线，同体力劳动工人减少的趋势几乎是同步的。

### 三、忽视科技革命发展的成果

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另一方面，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无节制地发展工业，兴建巨大的工程项目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使人类正常的生存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同时，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一般生活需要的满足，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提高生活质量，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提高妇女地位，维护妇女权利等问题。于是，在 70 年代，法国同西欧各国一样，出现了种种方兴未艾的新兴运动，如自治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

这些运动针对科技革命发展带来的一些超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范围的全球性问题，提出了反对污染环境、扩大民主范围、实现男女平等口号。这些运动符合各阶层群众要求保护生态环境、使经济的发展更有益于人类的生存条件的良好愿望，反映了人民对生活质量的更高层次的追求，也表达了相当广泛的各阶层群众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各种弊病的不满和抗议，因而在社会上引起

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开始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发挥日益明显的作用。在 1988 年的总统选举和 1992 年的地方选举中，绿色运动和生态运动都得到 10% 以上的选票，这种新现象对所有的政党都提出了挑战。

法共对这些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新兴运动的意义和影响缺乏预见性，在最初只是把它们看成是小资产阶级乌托邦的要求和很快就会消失的现象。因此，仍然目光短浅地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满足最下层群众的工资和就业的需要上，对这些新兴运动采取了虚无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既不愿去研究和了解这些运动向法共提出了什么问题，对未来政治发展具有什么意义，也没有对其活动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绿色运动成为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并单独参加竞选活动，吸引了大批左翼选民后，法共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正如法共二十五大报告所说：“在改变生活和社会问题上提出了新要求，诸如自治管理、女权问题、生态问题或区域化等要求。社会党都能够及时抓住对它有利的时机，而我们自己却认为上述要求是乌托邦式的，认为他们不属于共同纲领的逻辑之列。……结果，社会党逐步地实现了自身的巩固，而我们党受到了损害。”<sup>①</sup>

科技革命的另一个成果是促进了经济的国际化和西欧的一体化进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远远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合，其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和发展。欧共体作为一个以国家集团形式出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联盟，以实行欧洲经济和政治的全面联合为目标。从 1958 年建立以来，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对内取消工农业产品关税，对外实行统一进口税率的关税同盟，并于 1992 年底建立了欧洲统一大市场。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成员国对外贸易和工

①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文件选编》（下）第 283 页。

农业的发展，加强了各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相互渗透和兼并，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扩展，对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起了较明显的推动作用，因而受到了法国大多数人的欢迎。法国历次的民意测验和主张西欧经济、政治、防务、外交实现一体化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全民公决中得到通过，都说明了这一点。

法共从一开始，就把这一既是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重要手段，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产物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看作是“美国大西洋帝国的附庸和西方联盟的经济基础”，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法共只看到欧共体为大垄断资本服务的一面，而看不到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客观上推动科技革命和社会进步的一面，不作具体分析地一概加以反对。70年代后期，在无法回避和不可阻挡的欧洲统一进程面前，为了寻求同社会党的合作，法共被迫承认了欧共体这一现实，但行动上仍然非常消极，未能及时提出相应的对策回答欧洲一体化进程向法共提出的挑战，陷于束手无策的被动局面。

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教条主义态度，阻碍了法共从新的角度、新的思维系统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运行过程，从中发现当代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及其结果（有利的和不利的），考虑和回答资本主义新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在资本主义较为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法共在很长时期内仍把自己的战略策略建立在资本主义即将爆发总危机、已经没有发展余地的基础上，由此出发提出的斗争方式和宣传口号也就难免脱离社会现实，影响法共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号召力。

由于对资本主义各种新情况的出现缺乏敏感性和预见性，所以，无论是法共的纲领路线，还是战略策略，都显得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法共往往是在事态发展产生的不良后果非常明显的情况下，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采取措施调整政策加以补救，但此时已错过了有利时机。缺乏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使法共

的路线和政策经常是在事后被动地迎合社会的变化，而不能科学地预测变化的趋势，采取主动行动去适应并影响事态的发展。法共在自治管理、生态运动、知识分子等问题上采取的态度都是如此，所以，法共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历史的党”“过时的党”，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这无可否认是造成法共衰退的重要原因。

## 第二节 用僵化的观点看待现实社会主义

### 一、把苏联模式作为法国的社会主义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并消灭商品货币。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后，根据马恩的某些设想和当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为特征，这种特殊国情下产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在实现工业化和反法西斯战争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明显的优越性。因此，苏联模式不仅被后来取得革命胜利的一系列国家，而且也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看成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模式，由此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

法共对社会主义僵化理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理想同第一个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划等号”<sup>①</sup>。把苏联在特殊情况下形成的带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烙印的一些社会主义特征作为法国未来社会主义的目标，认为“在别的地方已经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样板，我们只需把它搬用于法国

<sup>①</sup>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 280 页。

就行了”<sup>①</sup>。因此,法共在制定纲领路线时,不是根据本国的议会民主传统和现实状况确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目标,而是照搬照抄苏联模式,把暴力革命、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国家统一领导等,作为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目标,严重地脱离了法国的实际,很难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1982年法共在二十四大上指出:“当我们回溯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时,我们应该承认,在探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符合法国当前情况的社会主义形式方面,我们党动作太慢了。我们花了约二十年的时间,才在1976年对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做出全面的和恰如其分的回答。由于未及时做出回答,我们党在1968年以后,尤其是在1968年遭受了损失”<sup>②</sup>;“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或多或少地当了不符合我们国家和我们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俘虏...”<sup>③</sup>

当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法共的思想在20年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64年罗歇的十七大报告、1968年的《香比尼宣言》、1973年出版的《民主的挑战》一书,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正如法共二十五大总结的:“仅仅是在1976年2月我党的二十二大上,我们才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以表明在法国我们所希望的政权的特点,才提出一个通过走本国独特道路建设法国式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sup>④</sup>;“我们经历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变迁。当时我们确实考虑要紧紧抓住这些变化,但结果却丧失了时机,未能加以充分利用。由于长期受到一种陈旧的全局观念的束缚,我们的进展,即使是最显著的进展,也因为没有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党的总

①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第90页。

② 同上,第27页。

③ 同上,第5页。

④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281页。

体战略而部分失效”<sup>①</sup>。

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造成法共在摆脱外国模式思考法国社会主义问题，确立符合本国国情和当代条件的社会主义目标方面的战略延误，使法共既拿不出取得直接成果的方案，又描绘不出一个新型社会的前景，“这意味着党在争取新工人阶级方面无能为力”。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传统工业部门，我们的力量后退了；而对新的阶层，我们始终未能取得进展；在青年中，法共的威望扫地”；“对知识分子来说，我们曾是朗日万、毕加索、约里奥一居里（他们是法国著名的作家、画家和科学家。二战后加入法共）的党，今天我们是什么人的党呢”？“几十年前，法国社会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都在法共这里找到了归宿，现在却不再如此了”<sup>②</sup>。照搬苏联模式对于“过去和今后劳动人民如何看待我们，对共产党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理想，如何引导自己的行动，产生了重大的不利影响”<sup>③</sup>。

## 二、掩饰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问题

法共对社会主义僵化理解还表现在把现实社会主义理想化，似乎社会主义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完美无缺，在各方面显示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用夸大其词的颂扬代替了对社会主义现实的科学分析，用绝对化的观点维护苏联模式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形象的完美性。

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从根本上消灭剥削，使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崭新制度，从本质上讲，能为受资本主义私有制束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具有资本主义所不具备的优越性。这已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所取得的成就所证明。

①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第 27 页。

② 《国际共运资料选译》，1984 年第 12 期第 49 页。

③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第 281 页。

然而，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大多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在发达程度上有很大差距。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缺乏实践经验造成的失误，以及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极大地制约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使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与更为广泛和切实的民主制度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而法共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向往，往往只看到或者只愿看到社会主义的积极方面，而看不到或者说不愿正视社会主义体制中存在的弊病和问题。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斯大林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搞一言党，践踏民主和法制，侵犯人民的民主权利等问题后，“由于我们不愿我们的敌人利用赫鲁晓夫的揭露来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多年来，我们事实上一直缩小苏联共产党人本身对斯大林错误和罪行谴责的意义……把我们的批评只局限在一个问题上，即‘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上”<sup>①</sup>，因而不能正确地分析和说明苏联发生的问题，甚至为苏联一些与社会主义理想和观念格格不入的做法辩护。

1959年法共十五大报告说：“苏联不仅连一个政治犯也没有，而且越来越广泛地号召公民群众发挥主动和创造性活动。到目前为止一直属于国家的重要职能，例如公共秩序和司法方面的职能已移交给社会行使。”<sup>②</sup>1961年十六大在提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时则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与经济上的可能性已经消除。再过十年时间，拥有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体系，将提供世界工业生产的一半以上。苏联按人口计算的生产量，将超过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将保证它的人民有最高的生

①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181页。

② 《法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选编》第78页。



活水平。”<sup>①</sup>

1976年,在中国因“文化大革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苏联东欧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已日益明显暴露的情况下,法共仍颂扬说:“他们已经完成了多么宏伟的事业,他们已经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作了何等充分的证明!社会主义苏联取得了这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建设了一个没有危机、没有失业、没有通货膨胀的强大的经济,人们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劳动人民负起责任,在企业中有民主、机会均等,文化在整个社会的普及。”<sup>②</sup>尽管法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苏共践踏民主与法制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但显然缺乏深度和分量。甚至在80年代初波兰事件导致的悲剧性后果已经出现,戈尔巴乔夫已经承认苏联经济停滞不前,面临危机之后,马歇在1985年召开的二十五大上依旧大谈:“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他们正在证明,他们有能力解决诸如劳动权、饥饿、文盲和社会福利这类大问题。在他们那里没有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的危机。”“事实证明,同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能更好地对付20世纪末人们在文明方面所面临的下述问题:进一步驾驭自然,用知识满足人民要求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愿望。”<sup>③</sup>在谈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时则显得轻描淡写,非常肤浅。马歇在二十四大报告中说:“社会主义的发展当然不可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首先是由国际环境造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危机对他们的影响,如贸易条件恶化和货币混乱带来的后果,帝国主义强加的军备竞赛造成的限制。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家还担负着对正在为争取独立和发展而斗争的各国人民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所遇到的矛盾和困难也是,而且主要是

① 《法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第143页。

②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第364页。

③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316页。

他们的进步所带来的。”<sup>①</sup>

这种对社会主义现状和所存在问题的片面的、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同照搬苏联模式的错误结合起来，使人们把苏联不尽如人意的现状同法共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目标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一方面加深了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为右翼对法共的纲领和主张进行攻击提供了借口；另一方面，不能正视社会主义出现的失误和存在的弊端，并对其原因做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分析，也使法共党员和群众难以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当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80 年代末在各种复杂原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剧变后，许多人把这一切都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使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的法共受到了巨大冲击，许多党员也因此而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了信心。

可见，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教条主义态度和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使法共的战略和整个步调远远不能适应法国社会新的条件和特殊的政治形势。正如马歇在 1991 年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时所说：“我们经历的阶段是悲剧性的。一个根本错误使我们过去和现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就是在半个世纪里，法共同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一样，把苏联视为建设新社会的模式。”<sup>②</sup> 法共尽管声称要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但由于把缺乏民主和自由的苏联作为自己的榜样和模式，不能正确分析和看待“苏联和其他国家以社会主义的名义犯下的罪行和错误的教训”，使党在赖以根基的问题上不能取信于民。这些失误都给法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 三、从独立于苏共的立场后退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兴衰成败自然会对资本主

<sup>①</sup>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第 127 页。

<sup>②</sup> 《人道报》1991 年 9 月 23 日。

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运动产生重大影响。苏联在二战时期的辉煌业绩曾对法共战后初期的鼎盛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苏共二十大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 60 年代后苏共霸权主义和大党主义的发展以及国内践踏民主法制的做法，已使苏联的形象在西方广大群众中江河日下。如 1973 年《人道报》曾发表一个问题征答，要求读者对社会主义下定义。答复者中只有 1% 的人把社会主义的概念同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其余的所有人都出独立的想法，内容与苏联制度迥然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一向以西方国家最亲苏的共产党著称的法共，也意识到，如果仍像过去那样追随苏共，把苏联当作社会主义的样板宣传，很难得到群众的拥护。所以，50 年代以后，法共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开始尝试同苏联拉开距离，以改变一贯亲苏的形象。

但由于历史的影响和现实的考虑，法共对苏联的态度始终充满了矛盾。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左右摇摆，时进时退。例如，法共在 1968 年对苏联侵捷表示异议后不久，又表示赞成捷克的重新斯大林化，并在 1969 年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筹备会议上毫无保留地支持苏联的立场。法共的这种态度，使自己在与社会党的谈判中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法国《世界报》1972 年 6 月的一篇文章尖锐地指出：“法共自称拥护法国目前的各种机构，但只有当它反对那种无疑只有少数法国人才希望的，并被看作是社会主义模式的政权时，人们才会更容易地相信法共的保证。”<sup>①</sup>

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立性，1973 年 4 月底马歇在法共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对 5000 听众宣称：“苏联是苏联，匈牙利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是法国。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习惯是不同的。何况

<sup>①</sup> 《世界报》1972 年 6 月 30 日。

现在是 1973 年而不是 1917 年。最可靠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扩大民主。”<sup>①</sup>这一时期，法共与苏联的关系尽管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已允许党内开展揭露苏联神话，并对政治前景提出新看法的理论探讨和研究。

直到 1975 年 4—8 月，政治局中坚定的亲苏派杜克洛和弗拉商去逝后，法共才开始迈出了公开批评苏联国内政策的步子。1975 年 10 月，法共发表文章，声援被拘押在特种精神病院已达两年之久的持不同政见的数学家奥尼德·普留什奇。11 月，法共与意共发表共同声明，首次宣布它准备同欧共体合作，与苏联反对欧共体的外交政策唱反调。12 月 11 日，法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反映苏联集中营情况的影片。第二天，法共政治局发表公报称：影片显示了“这一劳动营生活中令人不忍目睹的景象”。并对苏联的做法“表示最大的惊讶，对这些不公正的事件表示最严肃的谴责”。“法共反对一切损害人权，特别是损害言论、出版自由和镇压活动”，认为“对政治信仰不同的人施加的审判只能损害社会主义”。法共的声明遭到了苏共的批评，此后两党关系明显疏远。

1976 年召开二十二大时，法共在赞扬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表示“同完成这种伟大事业的党团结在一起”，反对“反苏主义”的同时，也第一次在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对苏联侵犯人权、损害自由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并声明“共产主义运动不是一个教会，也不能是一个集权组织，让每个党服从它的强迫命令和统一规律”，表达了奉行独立自主路线的愿望。

在 1976 年 6 月召开的欧洲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马歇在所作的长篇发言中强调民主、自由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割，他说：“和平共处不能与我国的社会和政治现状相混同，也不能与世界瓜分为由最强大的国家所统治的势力范围相混同。”“我们不能容许以国

<sup>①</sup> 《世界报》1973 年 4 月 30 日。

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名义损害我们进行的反对大资本政权，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利益的任何做法。’<sup>①</sup> 含蓄地批评了苏共把发展与法国国家关系放在第一位，支持德斯坦，反对左翼联盟上台的做法，以及在苏联国内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与共产主义理想相违背的反民主政策。

1977年6月，当勃烈日涅夫应法国政府之邀即将访问巴黎之时，马歇宣布，法国共产党人决不会同苏共总书记共同商讨他们当前的政治原则，共产主义全部问题必须有一个统一口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78年7月17日，法共中央委员亨利·费兹班和议会党团副主席迪科洛纳甚至率领数百名共产党人参加了要求苏联法庭释放持不同政见者契萨昂斯基的街头示威，反对苏联对待不同政见者的迫害。

在这段时间里，法共与苏联保持距离并对苏联的一些做法持批评态度是同国内与社会党在左翼联盟中保持合作并争取选民的需要相联系的。这段时间也正是法共选民和党员人数增长较明显的时期。1978年左翼联盟破裂后，法共领导被迫逐步靠拢苏联。法共领导认为，不可能既反对社会党人，又反对苏联人。所以，从1979年后，法共在一系列问题上，特别是外交政策问题上，又回到追随苏联的立场上，这在阿富汗事件和波兰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1979年12月26日，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加剧了国际的紧张局势，因此遭到了国际社会包括大多数西欧国家共产党的强烈谴责，即使在法共的选民中也有60%以上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入道报》却为苏联辩解说：“一旦导致这一行动的起因——帝国主义对喀布尔的干涉——消失，苏联就会立即撤军。”法共还谴责美国威胁对苏联采取报复行动，并希望法国政府在此问题上表明

<sup>①</sup>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第366、35、39页。

自己的态度，而不要秉承美国人的旨意行事。一周后，在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一片谴责声中，马歇却率法共代表团飞往莫斯科，并发表电视讲话说，苏联出兵是由于帝国主义干涉阿富汗内政，是为了履行它与阿富汗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应这个国家的请求提供援助的。并声称，法共赞成这次行动与该党长期以来不赞成 1968 年对捷克的干涉并不矛盾在 1980 年 1 月 11 日发表的法苏联合公报中，法共声明两党要保持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合作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兄弟关系。在 1981 年 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的发言中，法共代表还“高度评价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为争取继续缓和、争取和平共处和国际主义团结而坚决斗争的苏联在维护和巩固和平中的贡献”<sup>①</sup>。

法共的这种态度，给国内的各种反共势力提供了攻击的借口。

“法苏会谈后，反动势力发动了一场猖狂的反共运动，试图离间法共同劳动人民以及其他民主力量之间的关系”。在 1981 年的总统竞选中，社会党抓住法共同苏联的关系大做文章，攻击法共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结果是所有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左翼选民自然而然地汇集到社会党的旗帜下，致使法共在选举中蒙受了重大损失。

1982 年，波兰在苏联的支持下实行军管并宣布取缔得到法国大多数劳动人民同情和支持的团结工会。社会党和其他左翼力量都强烈谴责这种镇压行为，尖锐地批判作为这种镇压理论根据的苏联共产党哲学。但法共却根据苏联的宣传调子，说波兰政府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团结工会发动内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可以理解的行动。在两党联合执政期间，法共迫于苏联的压力，在维护法国核力量的独立地位问题上后退，赞成苏联的“并入论”，也就是说在美苏关于裁减核武器的日内瓦谈判中将英法的核武器作为美国一方

<sup>①</sup> 《法国》第 325 页。

的核力量计算。这种盲目追随苏联的立场既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又不符合自己对民主自由的承诺，显然是不得人心的。

法共从努力对苏联保持独立到重新在一系列问题上扮演亲苏角色，极大地损害了自己在法国人民中的形象。正如法共默尔特·摩泽尔省委 1984 年讨论法共在选举中失利的原因时所指出的：“在青年人眼里，我们是古拉格群岛、阿富汗和竞选中舞弊的党。”在对待波兰事件和萨哈罗夫的态度上，“我们并不是根据我们要在法国实现的目标而去触及这些问题的。相反，我们维护的是来自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论点”“我们希望建立民主社会主义，而我们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听命于莫斯科的党”。苏联“实行一党制以及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反对派存在。这两点使社会主义民主在全球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产生了疑问”。“如果说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社会主义，那么，在劳动者的眼里，社会主义就是波兰。用这种社会主义解决法国问题，没有人会支持的。”<sup>①</sup> 这些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法共衰退的症结所在。

### 第三节 左翼联盟期间的策略失误

#### 一、低估社会党的竞争能力

法共从 60 年代起，就根据过去的经验，重新推动以人民阵线为杰出样板的联盟形式，确定了同社会党签订一项基本的、总的政治协议的目标，把争取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建立左翼联盟的斗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实践，围绕建立左翼联盟开展自己的活动。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

<sup>①</sup> 《国际共运资料选译》1985 年第 8 期第 15 页。

力,终于在 1972 年同社会党签订了包括一些深刻变革内容的共同纲领,实现了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

左翼联盟建立后,法共便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以为必要的变革内容这一重大问题已经提前解决,联合人民群众力量争取高水平的解决办法的任务已经完成。“在法共力量强大的情况下,共同纲领将会为群众接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解决方案和我们的目标创造最好的条件”,“改善法共的形象和政治作用”<sup>①</sup>。似乎签订了共同纲领就意味着社会党在人民的压力下改变了反共立场,消除了同共产党的分歧,没有看到在密特朗领导下获得新生的社会党并非仅仅出于法共的压力而同共产党合作,而是出于“从共产党人那里夺取或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的战略目标。由于忽视了社会党同共产党争夺选民的企图对其采取联盟战略所起的内在的、自主的作用,忽视了两党在阐述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和根源以及解决危机的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忽视了在联盟内部进行广泛的、艰巨的、顽强的思想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低估了社会党利用联盟削弱共产党的意志和能力。所以,对于密特朗要从自己手中夺取 300 万选民的狂言,法共只是轻蔑地说:“这种愿望,在我们看来是不切实际的幻想。”<sup>②</sup>

这种认为“只要左翼取得胜利就会自动导致一场深刻的变革”,对共同纲领签署后还需要进行复杂的斗争和艰苦的努力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状况,导致法共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共同纲领、维护最高层的联盟上,而“把满足群众重要的经济社会要求的斗争推到选举结束和取得胜利之后”。为了保持联盟,法共更多地强调共同纲领和两党的一致性,支持密特朗作为左翼的共同等选人。马歇在二十四大报告中说:“我们曾经是这样想的,我们党应该放弃其

① 《人道报》1972 年 7 月 1 日。

② 同上



特有的作用，以便胜利得以实现，变革的道路要求我们党为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党的利益而冲淡自己的形象。”<sup>①</sup> 我们“只想到要保证左翼在竞选中取胜，同共产党的部长们一起组成联合政府，然后变化就会出现，就好象民众运动的一切进步最终不是靠人民进行自觉干预和在共同的目标下联合起来去进行斗争一样”<sup>②</sup>。

这种做法使许多人认为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变革的内容和联合的愿望方面已不存在分歧了，以为社会党不仅支持同共产党人联盟，而且支持真正地实现社会变革，真正地同资本主义决裂了。特别是在法国各种活动都推动政治生活两极化，人民中的多数站出来拥护一个共产党人当国家总统的条件还不成熟的背景下，社会党被认为是多数选举制中第二轮最有能力赢得多数选票的左翼政党。抹煞两党之间差别更使许多选民，包括很大一部分共产党选民去投社会党的票，把这看成是“有用”的票，使政治体制中客观存在的对法共的不利影响更加严重。

由于法共没有正视左翼联盟从一开始就孕育的困难与问题，也就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有力的措施，如更新传统观念，制定能够吸引广大群众的具体纲领，加强在基层的群众工作，支持和组织群众斗争，保持自己的特性，同社会党开展必要的斗争等等，尽量避免共同纲领的不利影响，从而使自己在联盟中失去了主动地位。

与此同时，社会党却利用共同纲领给自己戴上的革命桂冠，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与共产党争夺选民。

其一，社会党一改过去一向偏右的形象，提出“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激进口号。密特朗认为，要同共产党争夺工人阶级选民，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必须靠革命的口号和纲领。因此，他在《此时此

<sup>①</sup>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第 94 页。

<sup>②</sup> 同上。

地》一书中写道：“我像列宁一样认为，一切根本变革都要通过夺得国家政权才能实现，没有摧毁保证统治集团的权力机构，没有建立另外的机构使变革得以持久，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并宣称“我们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回到法国，使法国回到社会主义”，以此吸引向往社会主义的工人群众。

其二，社会党完善了自己的战略和理论，把“左翼联盟、阶级阵线和自治理论作为其战略密不可分的三个组成部分”。密特朗坚信，“社会党只有通过左翼联盟才能执政。”“我们的事业获得成功必须具备两个相辅相成的条件：要有左翼联盟，但还要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党。左翼联盟不建立在强大的社会党基础上，它就会迅速萎缩下去。”<sup>①</sup>因此，密特朗把将社会党人集合和牢固团结在一个强大的、灵活的、多样化的然而又是有秩序的统一政党中，将党建成法国第一大政治力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联盟中，一方面利用共产党承认某些自由民主原则促进共产党自由化；另一方面，通过“在联盟中保持自己的个性，不接受重大让步”；“与法共争夺地盘，扩大自己的竞选潜力，逐渐壮大自己的力量”，使联盟“对社会党有利而不是对共产党有利”<sup>②</sup>。

“自治管理”理论是社会党与法共争夺中间选民和知识分子的一大法宝。密特朗认为，“自治管理是走向取缔雇佣劳动和消灭阶级斗争演变过程的第一步”，“是防止社会主义社会出现苏维埃化（权力高度集中和官僚主义）的防腐剂”<sup>③</sup>。它可以促进“公民关心政治事务，使劳动者关心经济事务，发挥个人主动性，防止滥用职权。实现自治管理的途径是国家机构的分散化、管理的民主化、提高国营企业的自主水平以及发展地区、城市、社区的自治”。这种理

① 《密特朗论左翼联盟》，《社会主义新杂志》1976年第2季度特刊。

② 《密特朗传》第394页。

③ 同上，第355页。

论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思想特点以及他们反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式和动机。因此，这一理论不仅把社会党和共产党区别开来，提高了社会党主张的思想性和理论性，也把最支持“自治管理”的新中间阶层(教师、知识分子、管理人员)吸引到社会党的周围，使主要由白领工人和科技人员组成的法国第二大工会成为社会党的支持者。而“阶级阵线”的口号则标榜社会党的基础是“被剥削者的阶级阵线”。1973年社会党的原则声明抛弃摩勒时期坚持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观点，宣布“社会党是不分哲学和宗教信仰，聚集着拥有社会主义理想和原则的城乡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党”，也就是面向包括传统工人阶级、脑力劳动者和新中间阶层在内的所有受雇佣的领薪者。这就使社会党既与右翼划清了界限，又同共产党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口号相区别。向除右翼以外的所有人开放的“阶级阵线”口号，扩大了社会党的基础。

其三，加强企业中的工作，同共产党在基层展开激烈争夺。70年代初，社会党只有不到200个工人支部。左翼联盟建立后，密特朗要求社会党加强基层企业工作，鼓励在工人的工作场所建立支部，到1978年已建立了1200个工人支部。同时密特朗还经常到工人受失业之害的中心地区召开会议，发表讲话，支持罢工斗争，“通过我们在斗争现场的影响，向群众，向劳动者显示我们行动的价值。”结果，“我在那些不久前社会党人不受欢迎，而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受到了热情的款待。”<sup>①</sup>

其四，提出实现社会党和天主教徒的会合。历史上，社会党以反教会的立场著称。60年代后，法国出现了左翼基督教的新潮流，教会向左转的趋势日益发展。密特朗及时抓住这一动向，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有权信仰上帝”，“让忠实于自己信仰的天主教徒在

① 密特朗：《此时此地》第48—49页。

我们党内得到承认，让社会主义的众多源头汇入同一条大江。”70年代中期，有大量的基督教积极分子涌入社会党内，加强了社会党的基础。投票拥护社会党的神职人员在1973年有25%，而投共产党票的只有2%。

社会党利用法共的失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向共产党发动攻势，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党吸引了巴黎郊区和罗纳—阿尔卑斯大区郊区的选民，在法国西部的城市地区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在东部地区也赢得了惊人的胜利。与此同时，社会党仍然保持了它在各个地区和部门的传统力量基础。

## 二、策略失当使自己陷入被动

1974年9月议会补缺选举失利后，法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社会党的确能够做到削弱共产党而发展自己。于是，采取了两项措施做出了反应：一是在《人道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指责社会党“向右转”，指责社会党把削弱法共当做他们的头号目标，揭露社会党的本质。二是提出“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口号，试图推行意大利的历史性妥协，用人民联盟代替左翼联盟，使自己成为反对派的核心。面对共产党的变化，密特朗始终坚持认为，左翼联盟作为人民力量的联盟，政治上体现为结束身受剥削而斗争的劳动者阵线，这是群众所十分向往的。所以，必须坚持阶级阵线，而不能使左翼联盟成为面向所有人的大杂烩。法共用“人民联盟”口号代替已深得人心，为群众所拥护的左翼联盟口号，给人以抛弃左翼联盟的印象，实为失策之举。

为了使对社会党十分有利的左翼联盟不致破裂，密特朗对于共产党不断发出的攻击和指责，采取了保持沉默的态度。密特朗认为，“要把共产党留在左翼联盟里面，最好的办法仍然是既要对付他们，又要紧闭嘴巴。”如果社会党领导人也同样尖刻地回击共产党人，用谩骂对付指责，用共产党‘斯大林化’对付‘社会党右转’，

就会出现分裂的辩证法。而如果社会党任人说长道短，那么，共产党势必要冒破坏联合协定的风险，从而在法国人面前长期丢脸。”<sup>①</sup>因此，密特朗于 1974 年 10 月领导社会党执行局做出决定：“社会党对共产党的攻击保持沉默。无论对于他本人还是对社会党政策的批判，一律不予答复”<sup>②</sup>。这样一来，密特朗在人们眼中便成为左翼团结的维护者，而共产党则成为争论的挑起者。所以，到 1975 年，法共改变了做法，决定放弃在原则上广泛批评社会党，而着重强调法共忠于政治民主原则，并通过批评苏联的某些行为，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加入欧洲共产主义行列等做法改善自己的形象，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左翼联盟也得到新的发展。

但法共的努力并未扭转力量下降的趋势。1977 年市政选举后，法共提出了修改共同纲领，以迎接 1978 年议会选举的建议，试图在谈判中迫使社会党做出一定的让步，扭转选票下降的被动局面。对此，密特朗发表了电视讲话，以共同纲领维护者的身份说：“我们代表的都同样是工人，同样是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我坚信我们两党都会认真考虑人民的团结，我们是会一步一步达成某种协议的。无论如何，那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奋斗目标。现在共同纲领已签订 5 年，如果行之有效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延长到 10 年。如果共同纲领行之无效，那就会提出一些其它问题。但是迄今为止，共同纲领是管用的，让我们把它继续维持下去吧’，<sup>③</sup>。表明了维持原来纲领的态度。由于在修改共同纲领的谈判中社会党拒绝对共产党的要求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致使谈判破裂。对此，法国舆论普遍认为，左翼联盟的破裂是由于法共提出的要求脱离实际，哗众取宠，大大超过了其他两党可以接受的程度。法共不仅没有从

① 《密特朗》第 385 页。

② 《弗朗索瓦·密特朗——一部政治史诗》第 171 页。

③ 同上，第 187 页。

修改共同纲领中得到好处，反而遭到又一次挫折。

在左翼联盟破裂后举行的 1981 年总统选举中，法共的策略也明显失当。法共知道，在目前法国的政治条件下，无论怎样努力，其候选人也毫无当选的可能。因此，法共把重点放在与社会党争夺选民上，力图在得票数上缩小同社会党的差距，而不是同右翼争夺总统位子。为此，马歇将密特朗和右翼候选人相提并论，把分配给他的大部分电视和广播时间用来攻击密特朗，说密特朗和德斯坦“一丘之貉”，社会党与法国政府“狼狈为奸”，密特朗上台后“将实行资产阶级政策”，这种指责确有偏激和片面之处。从密特朗竞选纲领 110 条的内容看，它基本上坚持了共同纲领的主要精神，提出了与马歇 131 条十分接近的社会经济政策，如实行 35 小时工作周，在国有化部门增加 20 万个工作岗位，提高最低工资和失业补助，加强工会在企业中的地位等等，并对右翼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表达了广大中下层群众要求改变现状，改善生活的愿望。把这样一个在社会经济政策上同法共大同小异，同右翼小同大异的纲领同右翼政策相提并论，显然难以为人们所接受。

与法共相反，密特朗在竞选中采取了灵活巧妙的策略吸引各种政治观点、各个社会阶级的支持者。除了采纳与法共相似的社会经济政策以吸引下层选民外，还声称要建立单一的社会党政府，力图冲淡法共参政问题，以争取既想变革，又害怕失去自己特权地位的中间阶层。为了吸引生态主义者的选票，竞选纲领更多地强调了“保护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并支持戴高乐派对德斯坦对外政策的攻击。在投票前夕的电视讲话中，密特朗强调：“我是社会党的候选人，但是你们也清楚地知道，我是唯一的一个能在第二轮选举中获胜的左翼候选人。投给其他候选人的票尽管可能很有价值，却会使我的胜利招致损害。我在第一轮得票越多，我就越有可能当选

并实现人们所希望发生的变革。”<sup>①</sup> 这种争取选民的策略，不仅使密特朗得到大多数左翼选民和中间选民的支持，而且得到一些左翼戴高乐派的支持，取得了大选胜利。

法共原以为采取贬低密特朗的策略会为自己赢得选民，而实际上，法国舆论普遍认为，马歇对密特朗的各种攻击和两党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恰恰有助于密特朗。因为这使右派攻击密特朗上台后会成为共产党的傀儡，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和部长的说法更不可信，也使过去担心社会党上台后会受共产党的束缚，把集体主义引进法国的犹豫不定的中间选民打消了顾虑，转向支持密特朗。

当第一轮选举失败后，法共为了参政，又宣布无条件地支持密特朗，并在共同施政声明中宣称要在政府中执行前不久还被自己批得一无是处的密特朗政策。这种变化让人觉得法共毫无原则，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负责任，极大地降低了自己的威信，丧失了更多选民。

此外，法共在两党联合政府期间追随苏联外交政策的行为同密特朗推行的独立于美苏的内外政策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密特朗在当选总统后，不顾美国的反对，接纳法共入阁。在强调大西洋联盟团结、忠于北约的同时，也表示要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他说：“法国的国际政策拒绝美国人、苏联人的任何命令。我们的行动不接受任何人的指点。”密特朗既坚持拥有独立于北约的核防务，也反对苏联的“并入论”，既表示承担作为美国盟国的义务，也对美国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如在对苏经济关系上，美国要求盟国紧跟它对苏联进行经济制裁，但法国率先抵制，反其道而行之，同苏联签订供应天然气管道设备合同和为期 25 年的天然气供应合同。在对第三世界政策上，法国支持尼加拉瓜人民的反美斗争，在中美洲推行解放运动西方化，公然在美国后院煽风点火。法国还要求美国增

<sup>①</sup> 《弗朗索瓦·密特朗——一部政治史诗》第 218 页。

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为此得罪了里根。密特朗奉行的独立政策使社会党在提高威望，赢得民心方面受益匪浅。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共从 70 年代末期以来的力量衰退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利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法共自身指导思想和战略策略的失误以及社会党利用法共的弱点同法共展开激烈斗争的结果。这些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左翼联盟虽然促进了左翼力量的发展和左翼联合政府的建立，推动了法国社会变革，但却损害了法共的利益。1981 年，法共的选票下降到 16%，为 1936 年以来法共得票的最低点。到 1988 年总统选举时，已下降到 6.7%，这不能不引起法共自身以及一切关心国际共运的人们的热切关注和深入思考。



## 第七章

# 两党关系的现状与 社会党面临的挑战

左翼联盟的破裂以及“社会主义变革”的失败,使社会党的执政基础受到很大的削弱,在 1986 年的议会选举中,社会党丧失了议会多数席位,沦为在野党,开始了法国政治史上左翼总统和右翼

总理的共处时期。经过两年的艰难共处,在 1988 年的总统选举中,密特朗凭借个人的形象及高超的竞选策略,再次荣登总统宝座,并任命社会党主要领导人罗卡尔为总理,组成了新政府,采取“向中间势力开放的政策”。在社会党的这届任期内,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苏东剧变的冲击和右翼的进攻下,社会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纲领和政策日益失去选民的支持。在 1993 年议会选举中,社会党遭到惨败,仅得 18% 的选票,再次失去执政地位。这一结果迫使社会党对自己的理论和纲领政策进行反思,开始了重建社会党和重建左翼的进程。

## 第一节 左翼联盟破裂后的两党关系

### 一、左翼的分裂与社会党政府的下台

法共 1984 年 7 月在自己的主张得不到采纳,选举亦一再失利的情况下,痛定思痛,作出了退出政府的选择。法共总书记马歇于 9 月 8 日在《人道报》活动中更加明确表示,鉴于“执政协议只是一纸空文”,“我们不再属于最终不奉行多数法国人在 1981 年主张奉行的政策的联盟。”法共领导人改变左翼联盟的政策得到 1985 年 2 月举行的法共第二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认可。大会确定用“新的民众多数联合”的路线代替左翼联盟战略。从此,法共既不属于执政派,也不属于反对派,它游离于这两派之间,在议会中根据自己的意愿独立自主地行动。

法共退出政府后,社会党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力量孤军奋战,其执政的政治基础便大大削弱了。为了迎接两年后的立法选举,社会党新政府继续执行已使法国经济稍有起色的紧缩政策。7 月 19 日,新政府宣布减少职业税和对企业投资的征税,减税幅度为

8%，旨在刺激投资的积极性，争取法国经济明显好转，改善社会党的形象。

与此同时，社会党政府看到在左翼分裂的情况下，继续沿用多数两轮投票制势必对联合起来的右翼有利，而对执政的社会党不利。于是，社会党政府经过精心策划，于 1985 年 4 月将多数两轮投票制改为省级一轮比例代表制。

省级一轮比例代表制以省为选区，全国共选出 577 位议员，按人口比例分配到省。各省参加竞选的党派则根据法定分配下来的议员数量提出本党的候选人名单，选民按名单投票，然后再按各党派在一个省所获选票的比例取得相应的席位。但参加竞选的政党至少达到 5% 的选票方能参加席位的分配。至于谁当选，则视其在名单上的次序而定。由此可见，新选举法固然对大党和单独参加竞选的政党有利，同时也给予小党（只要得票率达到 5%）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就开始了法国党派格局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进程。

1986 年 3 月国民议会换届选举时，法国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通货膨胀率下降到 4.7%，外贸赤字下降到 210 亿法郎。但是失业现象仍很严重，有 240 万失业者。同时，紧缩政策也造成一些消极后果，它使工业生产投资不足，工资购买力下降，社会购买力萎缩。选民们对社会党政府从满怀希望到大失所望，不满情绪仍普遍存在。特别是 1985 年 9 月被新闻界曝光的“彩虹战士”号爆炸案丑闻，被喻为法国情报部门的“水门事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损害了社会党总统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社会党的信誉和它在左翼及中间派选民中的威信，使社会党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左翼联盟分崩离析后，社会党单枪匹马参加竞选，更使获胜蒙下了阴影。

与左翼的分裂相反，传统右翼两党吸取上届议会选举失利的教训，在反对社会党政府这一共同目标下，竭力捐弃前嫌，协调立场，加强联合，早在 1985 年 4 月，两党就签署了联合执政协议。6 月，右派的三个主要代表人物，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前总理

巴尔和巴黎市长、前总理希拉克一起出席了反对派组织的自由派大会。反对派利用三巨头自 1981 年失败以来第一次聚会之机，大力宣传右派为赢得大选联合起来的决心。此后，经过反复协商，两党在 2/3 的省里提出了共同候选人名单，1985 年 1 月 16 日又签署了共同竞选纲领。纲领以经济自由化为中心内容，在政治方面，主张取消一轮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恢复两轮投票制，控制移民等。力争赢得议会大多数议席，重掌政权。

作为左翼力量之一的法共，自退出社会党政府后，处境仍较困难。根据当时的民意测验，法共在这次选举中单独作战，得票率将保持在 10—11% 的水平，估计不会有明显的回升，因为在争夺左翼选民方面，执政的社会党拥有更为有利的条件。

随着投票日期的逼近，竞选运动也日趋白热化，各党派在紧锣密鼓声中，进行最后的争夺。右派的目标是加强联合，避免分裂，巩固阵地，不给左派以可乘之机。执政的社会党的策略是分裂右派和鼓动左翼选民士气。它利用人心思定的心理，揭露右翼要充当“摘桃派”，提出“左翼播下的种子（指紧缩政策）应由左翼收获，拚命渲染右翼上台将给法国带来混乱和动荡，争取可能弃权的左翼选民和动摇于左、右派之间的选民，以期获得尽可能多的选票，使左右派之间的力量对比趋于平衡，为社会党总统选择新总理提供更多的回旋余地。密特朗也亲自介入竞选活动，极力宣扬执政党 5 年来的政绩，为社会党撑腰打气。但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党在这次议会选举中充其量也只能保住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决不会继续单独赢得议会多数议席，除非与法共或中右势力结盟。

3 月 16 日，3000 多万法国选民按省级一轮比例制的新选举法投票。投票结果表明，社会党获得 32.8% 的选票，分得 216 个席位，实现了保住第一大党头衔的既定目标，但丧失了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右翼两党获得 44.7% 的有效选票，分得 277 席，一跃成为多数派，实现了上台执政的宿愿。法共只获得 9.7% 的选票和 35

个议席，再次跌到历史最低水平。

这次选举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极右的国民阵线异军突起。国民阵线成立于 1972 年 10 月，有党员约 2.5 万人，代表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主张制止并遣返“非法”移民，实行非国有化等。该党主席为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勒庞。在这次选举中，国民阵线获 9.9% 的选票，超过法共，首次进入议会，得到 34 个席位，几乎与法共持平。国民阵线的崛起，打破了法国 10 余年两大派、四大党控制政局的局面，成为第五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它既不属于左翼，也不属于右翼，因而对左、右两大派的对立和左、右四大政党的结盟策略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 二、从左右翼政治“共处”到密特朗蝉联总统

1958 年成立的第五共和国，一直都是以总统的多数派同议会的多数派相一致，或者说任期 7 年的总统能够同 5 年一任的国民议会相一致，而本届选举打破了同属一个政治派别的总统、总理和议会多数派共同治理国家的传统格局，形成了左翼总统与右翼政府共同执政的局面。议会中支持左翼总统的是强大的少数派，支持右翼政府的则是微弱的多数派。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必须接受新多数派存在这一事实，并与之共事；而右翼多数派在议会中只是微弱多数，难以逼走总统。这就把左翼总统和右翼多数派推上了一条“共处”的航船。

3 月 20 日，经过各方频繁的磋商，左右两党终于取得谅解，达成“共处”协议。密特朗总统接受社会党总理法比尤斯政府辞呈，任命希拉克为新政府总理。新总理组成了以右翼两大党头面人物为主体的新政府。

新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法国政治史上开始了罕见的左翼总统和右翼总理政治“共处”的过渡期。然而，这种政治“共处”十分艰难和微妙，必然充满了权力和政策的明争暗斗。密特朗总统随时可以使

用宪法赋予的任免总理、解散议会、直至提前大选等几张牌，来对付欲要分庭抗礼的右翼总理及其政府；而希拉克也会挥舞自己的武器，如议会两院的多数，来要挟总统。由于双方的政治力量对比相差无几，双方又都着眼于两年后的总统选举，谁也不敢贸然采取针对对方的过激行动，深怕承担破坏共处的罪名而失去更多的选民，给自己参加 1988 年的总统选举造成不利影响。

对于社会党来说，尽管法共在议会中只占 35 席，但它毕竟依然是拥有数百万张选票的左翼政党。社会党要想在议会中对付右翼，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与共产党的关系。社会党与共产党这个议会小党相互协调，无疑会增加左翼的力量，对右翼造成威胁。否则，社会党就无力阻止右翼提出的任何动议，从而使左翼总统更难有所作为。所以，两党虽然不会达成任何协议，但社会党无疑会重视和拉拢法共，以便在议会中采取一致行动。

希拉克政府上台后，依靠议会多数和选民多数的支持，进行了比较深入和广泛的自由主义改革。改革重点放在选举法、经济和社会方面。

1、恢复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恢复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是新政府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戴高乐曾一语道破了选举法修改的动机：“任何政党都是仅仅从其本身的利益来看待选举法的修改的”，执政派也越不出这个窠臼。鉴于右翼目前在议会中只是微弱多数，使用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就能够在议会中造就一个稳定的多数派，从而加强右翼执政的地位，保持政局的稳定。执政派声称，恢复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最符合第五共和国宪法的精神。

选举法的改革牵涉法国各个政治力量的切身利益，自然引起各方的关注。总统与总理之间、朝野党派之间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选举法改革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是恢复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本来，希拉克政府曾获得议会授权，准备以最简便和迅速的

法令形式，废除比例代表制和恢复多数两轮投票制。但是，密特朗总统以比例代表制“最民主”为由拒绝在法令上签字。希拉克政府欲速而不达，被迫以“承担政府责任”方式要求议会不经实质性辩论通过。社会党为了维护改革成果，于5月23日对政府提出弹劾，并得到法共国民阵线的支持。弹劾案因票数不足未获通过，恢复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法案得到批准。

下一步是划分选区。希拉克政府审慎地处理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它用了几个月时间，由内政部精心设计，经过专门成立的“贤人委员会”的多次咨询，还在行政法院从法律角度论证，最终于9月24日由部长会议讨论通过。政府为了尽可能减少与反对派的磨擦，在划分选区时照顾了社会党的利益。在立案过程中，法令又一次遭到总统的拒绝。由于新选举法和新选区划分法对法共极为不利，法共采取了坚决反对态度。而总统采取与法共同一立场，就有可能在下届总统选举中获得法共的同情和支持，赢得更多的选票，增加同右翼抗衡的资本。政府不得已于10月13日第六次以“承担政府责任”方式强行让议会通过。社会党也如法炮制第七次弹劾政府，未获成功。自此，选举法的改革完成立法程序。

新选举法有利于结成联盟的右翼，而不利于四分五裂的左翼。如果按新选举法举行新的选举，则必将出现执政派所希望的那种局面，造就一个稳定的多数派。所以新选举法在客观上削弱了密特朗抗衡新多数派和希拉克政府的手段，使他动用解散国民议会和提前大选的权力来要挟右翼的可能性变小，这就反过来巩固了政治“共处”，加强了新多数派和政府改革中的地位。

2、大力推行私有化。私有化是右翼政府经济改革的重点。鉴于法国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亏损严重，债台高筑，已成为国家的沉重包袱。执政派根据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减少国家干预、加强法国产品竞争力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准备反其道而行之，将国有企业私有化。

希拉克政府上台不久，立即出台了私有化方案。方案计划在 5 年内分期分批将 65 个国营企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私有化，总资产高达 2750 亿法郎。它包括 1981 年以来国有化的工业公司和银行，还包括战后初期国有化的三家大银行。方案还采取了稳定私有化企业的措施，如在私有化企业中由投资者组成一个“硬核”，确保在一定时期内私有化企业的资本不变；把企业 10% 的股份以优惠条件出售给本企业职工等等。密特朗总统于 4 月 9 日又一次拒绝在法令上签字，而希拉克政府也再次动用宪法第四十九条。社会党议员以“廉价出售国家财富”为由，再次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但未获多数。私有化法案被议会强行通过，从而完成了私有化立法手续。

从 1986 年 11 月开始，法国政府抛售了国家所有的圣戈班工业集团、巴黎荷兰银行、法国电力总公司、苏伊士金融公司等 13 家企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份。约有 600 万法国人积极踊跃地抢购，形成了一股热潮。通过两年的私有化，法国政府增加了约 1000 亿法郎的收入，缓解了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

此外，希拉克政府还以法郎贬值为起点，改革税制，减少税收；废除 1945 年物价管制政令，完全放开物价；放宽外汇控制；降低利率。以私有化为中心，辅之以这些措施，鼓励了自由竞争，增强了法国企业的活力。1986 年法国经济增长率为 2.5%，达到 80 年代以来最高水平；通货膨胀率为 2.1%，降至 23 年来的最低点；外贸收支显著改善。1987 年经济增长率为 2.1%，通货膨胀率为 3.1%。当然，法国经济日见起色也同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和美元利率下降等国际经济因素有关。但是，政府与失业斗争的成绩欠佳，1986 年法国失业人数继续上升，达到 250 万。1987 年仍然居高不下。

3、社会改革。右翼执政派懂得，社会问题与法国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不能像经济改革那样用大刀阔斧和雷厉风行的方式，更不能对社会党的社会改革主要成果实行“反攻倒算”。它谨言慎行，保



留了左翼社会改革的一些成果，如每周 39 小时工作制、五周带薪休假、“奥鲁法”等等。但希拉克政府上台后要求取消关于企业须事先得到政府同意才能解雇工人的规定，并提出取消巨富税。此举遭到左翼各党的强烈反对，密特朗总统明确表示“不同意”，认为这项政策有利于雇主，不利于保障工人就业，并会对总的就业情况产生消极影响。对于取消大宗财产税，左翼认为它只利于最富裕阶层而抛弃了广大选民。社会党、共产党和工会组织的这种态度，使右翼的政策难以顺利实施。

尽管“共处”期间左、右翼之间不时地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甚至是激烈的斗争，但由于右翼政党和社会党在当前的内外政策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例如都主张执行“紧缩”政策，对物价管理实行自由化，减低税收，进行经济结构（主要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新技术，加速实现“现代化”，都赞成“尤里卡”计划。在防务问题上，都主张维护和加强独立核威慑力量；在一些主要的外交行动上，也有不少共同点，如支持在西欧部署美国导弹，同美国保持盟国关系，加强欧洲建设，加强法国在非洲传统势力范围中的地位等。既使在一些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上，双方也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让步或妥协。

经过近 20 个月的实践，这种共处局面竟然绕过了一个又一个暗礁，经历了种种磨难和考验，在风雨飘摇中奇迹般地延续下来了。比如，由谁代表法国出席重大国际会议的问题，最后是这样解决的：在大会举行开幕式和由各国首脑单独举行会议时，由密特朗代表法国出席；在会议进入实质性阶段讨论具体问题时，或在举行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时，则由希拉克代表法国政府参加；在最后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则由密特朗和希拉克共同主持，以示对外一致。

造成这种妥协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由于双方都着眼于 1988 年的总统选举的缘故。双方都深刻地认识到：在这场未来的总统竞选中，谁如果能获胜，谁就能彻底改变局面；谁如果失败了，谁就很

难在短期内东山再起，挽回败局。因而必须慎重地对待每一项行动。与其轻率冒险进行摊牌，不如稳扎稳打，尽量争取时间多做些讨好选民的工作，以便能在两年后的总统选举中赢得更多选票，一举击败对方，使政局从根本上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这是两派的根本利益所在。所以双方在做法上都采取比较谨慎克制的态度，不到紧要关头，没有确切把握，决不轻易摊牌。

左右翼共处这种罕见的政治局面的形成与维系，冲击了法国长期以来左右翼的对立，强化了“政治中间化”的趋势。它给人以两点启示：一是过去由总统独揽的权力似可部分地与总理分享，显示了包括总统权势在内的政治体制根据需要也可以调整。二是对立的政治力量可在两年内共管国家，它们之间合作的余地比人们想象的要大。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反映到总统选举和今后的政局中，但左右翼共处毕竟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立派别之间的一个暂时性妥协，难以成为长期的固定格局。

总理希拉克曾公开表示：“共处并不是我的政治理想，尽管它是顺理成章和合乎宪法的。我也希望共处能存在到下次总统选举，但我更希望下次选举时能从目前的多数派中产生一位总统。”社会党当然也不甘心失败，力图东山再起。可以说，1986年的立法选举结束之日，就是双方开始为1988年的总统选举进行积极准备之时。如果说共处的初期阶段还只是双方在相互观察、试探，带有某种“前哨战”的性质，那么从1987年秋国民议会复会以来，双方就开始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

1987年10月7日以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兰西民主联盟为主的右翼多数派在议会动议，要求将社会党前合作部长努西的营私舞弊案交由最高司法法庭处理，以打击社会党的威信。社会党也不示弱，立即反戈一击，对现任右翼政府的内政部长帕斯瓜给努西案中的主要角色、原努西办公厅主任夏里埃签发“假护照”一事，提出严厉质询。另外，社会党还准备对与现任司法部长夏朗东有牵连的肖

梅珠宝行敲诈勒索案进行追究。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制造声势打击对方，为自己赢得选票。

为了重新夺回失去的政权，社会党除了与右翼进行斗争、妥协、维持共处局面外，还于 1986 年 6 月和 1987 年 4 月，分别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和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党自身的革新和与法共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新的口号和措施，动员全党积极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准备参加 1988 年总统竞选。

在 1986 年社会党下台后不久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社会党第一书记若斯潘在讲话中表示：“社会党是一个多元化综合的党”，需要“多方面的因素来丰富它”，以使党既“具有活力”，又避免党的“分散”和“动乱”。他还指出，社会党作为右翼政府的反对派，面临十分复杂的政治局面，既要反对右翼政府采取坚定的反对立场，又不要做任何事情影响信誉不断上升的密特朗总统的地位，同时要积极准备社会党下届总统竞选的纲领。

若斯潘认为，“在法国和在国外仍继续存在剥削、异化和统治”，国家和左翼需要一个强大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进步力量。之所以说国家需要，是因为如果保守派卷土重来，再次长期执政，那它将把我国的生产机器禁锢在过时的结构上，并加剧法国社会的紧张、掠夺和冲突，我们的国家将无法完成它所面临的变革。并说，左翼需要的这个强大力量能够建立并充分发展起来。因为目前的政局已不同于过去，现在已不是共产党与社会党在选民中、甚至在社会上的影响旗鼓相当的年代，法共正在无可救药地衰落下去。如果社会党不抓住这一历史时机，向劳工界和法国人民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和能够替代保守派主张的切实可行的政策，那么我们就将大大地倒退一步。

若斯潘指出：党的使命是建立一个“现代化左翼群众性大党”，“现代化的含义是：不僵化、不否定自己、适应变化中的现实”。“要考虑法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包括五年执政的历史”，同时“要考虑当

今世界的科学、经济、政治、人口学和社会学等各种因素”，要“根据现实看问题”。当一些“观念过时”时，应改变我们的语言”，但条件是不能脱离“社会主义价值观”，这是“今天政治斗争的中心”。要使左翼不仅在“社会结构上”，而且“在思想上成为多数派”，就要为此而斗争。他建议成立“全国左翼委员会”这样“灵活”的联盟机构，定期开会，在社会党领导人周围把从左翼到反对右派政府政策的所有力量联合起来。若斯潘解释说，这一委员会“团结左翼中的一切实体而不排除任何人，除非自己排除自己。对于社会党领导人来说，这也是超越法共领导机构向共产党选民讲话的一种方式。从理论上讲，这个组织也并未向法共关闭大门。

经过讨论，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决议接受了若斯潘的主要建议：成立全国左翼委员会，在社会党领导人周围把“主张团结的共产党人、左翼激进党人、进步戴高乐派、生态学派、地方主义者、中左翼民主派各种倾向的人团结起来”；修改党的原则声明，提交下届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敞开党的大门，吸收同情者参加省委和基层党委的会议和活动”；成立专门的工作组，深化全国代表会议提出的革新党的结构和运转方式的建议，以实现党的现代化；起草党的竞选纲领，征求工会、社团、互助合作组织等各方面意见，在纲领周围把左翼和左翼以外拒绝右派政策、愿同社会党共同行动的十分广泛的阶层团结起来，为大选胜利创造条件。

对于同法共的关系，多数人认为法共坚持教条主义和反社会党的立场，决心向“死胡同走到底”，它的衰退是“不可逆转的”。罗卡尔派认为“左翼联盟”已经“死亡”，主张在战略中把同法共结盟“彻底抹去”。但莫鲁瓦派认为法共仍可能“重新振兴”，法共有它应起的作用，它的“重新振兴对整个左翼有利”。舍韦内芒派主张对法共选民使用“他们可能理解的语言”，以迫使法共转变立场。社会党第一书记若斯潘认为，长期的历史在法国形成两大潮流（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大派），法共的错误并“不能抹煞这一潮流存在的事实”。

他认为法共的衰退是“决定性的”，但还“不是不可逆转的”；“法共面临社会学方面、思想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三重危机”，如法共坚持错误方向，那它的衰退“就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党全国会议已放弃再同法共结成左翼联盟的政策。

1987年4月社会党在里尔举行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1986年3月左翼在议会选举中失利进行了反思，通过了“为了胜利，联合起来”的决议，号召全党在密特朗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以便夺回政权。决议指出：在1986年3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左翼失败，社会党下野，其原因是左翼的分裂、法国社会的状况和社会党的行动同群众的期待之间有差距。在许多方面，群众所期待的超过社会党实现的东西，很多群众感到失望。社会党执政时进行的改革遇到了阻力，有些东西，如关于劳动者的新权利法就没有完全贯彻。社会党低估了群众情绪的力量，如群众对移民和安全问题所感到的不安，就被极右翼利用了。

大会认为，由于希拉克的机会主义和戴高乐主义合为一体，反动的“自由主义”上升，反共和主义的极右翼发展，右翼对社会党5年执政反攻倒算，计划、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公共部门的概念、对金融集团的管制、劳动者的权利和社会保险都受到威胁。面对当代的挑战，法国有两种态度可以选择：或者衰败下去，闭关自守；或者站起来，向世界开放。法国社会党人要把法国人联合起来，实现新的社会蓝图，为此，社会党必须改变联盟战略。

决议指出：社会党自1971年以来一直是左翼力量联合的动力。左翼联盟的战略使左翼取得了1981年选举的胜利。自1983—1984年起，法共逃避自己的政治责任，选择了破坏左翼联盟的做法，使整个左翼力量受到削弱。今天，法共不想与苏联模式明确地划清界线，没有能力真正考虑到经济形势和社会的变化。它的衰落可能是持久的。它毫无道理地攻击社会党，使一部分左翼选民感到茫然。法共领导拒绝同社会党和党内的“革新派”进行真正的对话。

它同它的选民之间的裂痕扩大了，法共选民越来越不理解它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不现实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成为联合一切追求政治变革的“党”。

决议在谈到社会党未来的联盟战略时指出：社会党愿同整个左翼合作，也愿同一切由于自由、民族独立和欧洲建设受到威胁而感到不安的人合作。左翼联合的活力应能导致形成一个进步多数，这个进步多数向一切拒绝右翼反动政策的人开放。不可能通过同当前右翼联盟中的某个党谈判来组成这个进步多数。1986年3月以来，社会党坚决反对希拉克政府及支持这个政府的党派。社会党要以自己的政治计划为基础，去联合今天尚在犹豫的选民，去组成明天的总统多数派。如果社会党依靠打破各政党选民的传统界线，形成新的联合并取得总统选举的胜利，那么它将联合一切政治力量，以便能在议会中组成一个以社会党为中心的进步多数。

对于社会党建立“全国左翼委员会”和“进步多数联盟”的新建议，法共表示断然拒绝。在1987年5月召开的法共中央全会上，马歇提出，法共的目标是建立“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和主张变革的多数派”他还指出：“密特朗、罗卡尔和社会党其他领导人的政治选择，使得资本政策和新政策之间的界线已不再是右派和左派的分水岭，而是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分水岭。”<sup>①</sup>为了准备1988年总统选举，1987年12月法共在圣多昂召开了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决议认为，社会党人奉行的政策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同右翼的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兰西民主联盟是一致的。因此，大会决定不再与社会党缔结1972—1983年那样的左翼联盟。大会推举政治局委员安德列·拉儒瓦尼为法共总统候选人，并号召在第一轮投票中实行基层大联合，把更多的社会党选民争取到法共方面来。在第二轮选举中，将“根据谁最能促进我们的纲领或最少为其设置障

<sup>①</sup> 《世界报》1987年5月20日。

碍”的原则决定投票意向，不排除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社会党候选人的可能性，也没有完全排除参加政府的可能性。

进入 1988 年后，法国各个政治派别都积极地行动起来，酝酿和决定候选人。希拉克一马当先，于 1988 年 1 月中旬正式宣布参加竞选。他提出要把法国建成“欧洲第一大经济强国”。为此，他主张增加企业竞争能力，继续私有化进程，减轻企业税收，加强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社会福利，振兴法国经济。巴尔也于 2 月 8 日宣布参加竞选，提出要把法国建设成为“高工资、高就业和有坚挺货币的国家”。为此，他要改革税制，减少和调整增值税、公司税；扩大就业，发展科技。密特朗迟迟于 3 月 22 日才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他在《致全体法国人民的一封信》中提出要通过经济投资优先、教育投资优先、欧洲投资优先和社会投资优先的战略振兴法国经济，为实现这些战略，必须减轻选民和企业税收，创造就业机会，增强企业竞争力。

4 月 8 日，经宪法委员会审定，有资格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为 9 名，其中包括法共的拉儒瓦尼和法共“革新派”的皮埃尔·朱坎。但民意调查表明，有可能问鼎总统宝座者只有右翼的希拉克、无党派人士巴尔和密特朗。从总体看，三位总统候选人在法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都无法提出泾渭分明的竞选纲领，左右翼对内对外方针大同小异。因此，这次大选，主要不是对左右翼的纲领、政策的选择，也不是要否变革法国的选择，而是对人的素质的选择。因此，候选人的素质、形象、政治影响成了决定因素。密特朗作为现任总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两年的政治共处中，他顺从民意，顾全大局，深孚众望。在竞选中，他竭力淡化社会党的色彩，努力树立“超党派”的“全民总统”的形象，这有利于他以全体人民的“联合者”的身份争取选票。在竞选策略上，他扬长避短，专攻希拉克的弱点，着重分化和瓦解右翼多数派，争取中间派的选民。他在竞选中明确宣布当选后不再搞国有化，也不会将这两年右翼政府已经私有化的

企业重新收归国有，以消除广大中间阶层的疑虑。

在 4 月 24 日的第一轮投票中，密特朗获 34.11% 的选票，遥遥领先于其他对手。希拉克获 19.95% 的选票列第二位，进入第二轮选举。总统的宝座最后角逐还是在左右翼两名候选人之间进行。总的形势对左翼候选人有利。法共和法共“革新派”在第一轮选举后，都表示在下一轮选举中支持密特朗，大部分他们的选民也将投密特朗的票。绿党等三个小党让选民在第二轮中自由选择如何投票。据民意测验，这些人半数以上投了密特朗的票。第二轮投票结果，71 岁的密特朗终于以 54% 对 46% 票的绝对优势击败希拉克，一举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普选连任两届的总统。

在第一轮选举中，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烈·拉儒瓦尼作为法共推举的候选人参加了竞选。不久前被法共开除出党的革新派领导人、原法共政治局委员、党中央的发言人皮埃尔·朱坎也作为他那一派的候选人参加了竞选。曾经是法国第一大党的共产党候选人在这次选举中连 10% 的选票都未保住，只获得 6.87% 的选票。在 9 名候选人中名列第五，甚至大大落后于新崛起的极右组织——国民阵线的候选人勒庞（得票占 14.62%，名列第四）。朱坎这次也只得了 2.13% 的选票。朱坎的行为造成法共的分裂，加剧了法共政治地位下降的速度。法共的信誉遭到空前的损失。

密特朗战胜希拉克再次当选总统以后发表讲话表示，他将按照法国人民的意愿，团结全国人民继续完成人民赋予他的重大使命。他说：他将忠于自由、平等、尊重别人和不排除他人的人道精神，强调社会团结。就任总统后，密特朗任命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米歇尔·罗卡尔为法国新总理，结束了左右共处的局面。随即他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当时，所有民意测验机构和报纸都认为，密特朗借辉煌蝉联之余威，必定会使社会党的玫瑰避开，以 300—400 席的绝对优势控制国民议会。但 6 月 12 日选举结



果并非如此，社会党仅获 276 席，未能取得议会绝对多数，必须寻求与法共及其他政党的合作。共产党得票占 11.32%，在议会中拥有 27 席。法共总书记在选举后声明，在目前的条件下，法共不准备参加总统多数派。

总理罗卡尔上任后宣布，新政府的构成要体现“开放”和“全国团结”。“开放意味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次议会选举结果表明，由于左右两大派皆已登台施政，均无显著建树，选民对党派纷争已经厌倦。大众心理越来越趋向中间化，选民表现出不把全部权力交给一个党派的意向。由于极右派的发展打破了国家的政治平衡，左派和右派实质上都未获胜。因为密特朗虽然以领先的票数再度当选，但这并未说明左派在其纲领和政治行动方面获得成功。总统对这种局面只能采取人为的解决办法，即联合——有限度的联合。他的蝉联可能意味着法国政治同左右翼的对立告别，开始向“温和的法国”过渡。

根据密特朗的施政计划，重新上台的社会党为适应法国政治中间化的趋势，将不再提所谓“革新”、“变革”和“与资本主义决裂”之类的激进口号，而是强调法国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安定团结”；不再强调国有化，而宣布将使“私营化和国有化的芭蕾”都停下来。正如若斯潘所说，社会党今后“不会像 1981 年那样治理国家了”。也就是说，不再通过“平静的革命”、“与资本主义决裂”了。罗卡尔说：总统任期的一个基本任务是实现法国的“政治现代化”，振兴法国经济。这意味着“法国式的社会主义”至此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由于选举制度的变化和左右两大派地位的削弱，一个新的多元化的党派格局已取代 70 年代以来的左右两派对立格局。在法共力量削弱的同时，极右翼、绿党和中间派的影响正在加强。如在 1989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左右两派只获得 60% 的有效票，分得 55 个议席，而国民阵线、绿党和中间派共获得 30.73% 的有效票，

分得 26 个议席。两大派地位的下降势必导致它们对法国政局控制能力的削弱。为了扩大左翼执政的政治社会基础，加强与右翼抗衡的力量，在左翼中占绝对优势的社会党不得不在法共之外寻找新的盟友，愈来愈重视、依赖和争取游离于两派之外的政党及其选民，在制定自己的纲领和政策时也不得不考虑这些政党及其选民的要求和情绪。这种相互制约的状况必然会对社会党的施政方针和政策的变化方向产生长远的影响，促使它向中间思想和路线靠拢。

## 第二节 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两党关系的影响

### 一、苏东剧变对两党的冲击

当密特朗蝉联总统、社会党再次上台正欲集中精力重振法国经济之时，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的事件，特别是东欧国家的剧变和苏联的衰落解体，导致了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的瓦解，东西欧对峙局面被欧洲一体化趋势所代替，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些因素对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苏东 9 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色，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毁灭性打击。西方资产阶级乘机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胜利，力图搞垮共产党。这使身处资本主义国度的西欧共产党受到极大的冲击，各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队伍涣散，力量锐减。

随着欧洲共运出现历史性的倒退，“欧洲左翼联盟”的构想成为泡影，而右翼则由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而力量大增。在这种背景下，法国右翼和极右翼向左翼政党发起咄咄逼人的进攻，扬言

要在法国铲除共产主义。法共党内的“革新派”也利用国内国际的政治气候多次向党发难，要求改变党的性质，放弃民主集中制。右翼政党领导人希拉克得意忘形地声称：“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也深深陷入意识形态危机，我们的理想取得了胜利。”<sup>①</sup>

苏东剧变不仅使共产党的力量遭到严重损失，而且也使社会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当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在社会民主党的浪潮中逐渐蜕变时，法国社会党人曾欣喜若狂，希望他们所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能在东欧演变中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并为此做出了各种努力。然而事与愿违，不仅苏东“皈依”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纷纷落马，有的溃不成军，有的销声匿迹。而且在右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猛烈攻击下，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也大受牵连。右翼为了将社会党赶下台，利用近年来社会党执政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福利国家”陷入危机的事实，攻击社会党无力治理国家，无力克服经济危机，大肆宣扬新保守主义政策的成就，在竞选中连连得分。

近年来，法国社会党实行经济紧缩政策，虽然控制了通货膨胀，但却引发了失业人口增加和经济增长缓慢。在经济衰退的冲击下，1990年法国有46170家中小企业倒闭。各大企业为了应付危机，纷纷冻结工资，裁减职工。1991年，法国经济增长率仅为1.5%而失业人数则上升到290万，居西欧之首。因此引起的群众性罢工和示威游行，大大冲击了社会党政府。右翼领袖希拉克和德斯坦以及极右翼头目勒庞也走上街头，参加抗议活动，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火上浇油，对处于困境的社会党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争取选民，为重返政坛做准备。

在右翼的进攻下，法国社会党在1991年3月的地方议会选举中遭到惨败，仅获得18.3%的选票，创1971年重建以来地方议会

<sup>①</sup> 《参考资料》1991年9月12日第28页。

选举中得票的最低纪录。右翼联盟得票 33%，接近社会党的两倍。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则得 13.9% 的选票，成为法国第三大政治力量。面对这一不利形势，左翼两党不得不对今后的政策，尤其是联盟政策进行重新审视。

## 二、国际形势剧变条件下两党联合的可能性与艰巨性

1988 年总统选举和社会党上台后，共产党因力量衰落，无力与社会党抗衡而拒绝联盟，社会党自恃力量强大也无意与共产党结盟。但由于社会党在议会中差 13 席未能达到绝对多数，为了实施自己的政策，经常需要法共议员在议会中与其合作。社会党政府在议会中也需要依靠 27 名共产党议员的支持才能免遭被右翼弹劾的命运。正因为如此，法国舆论认为，“共产党人将继续在克勒松政府中发挥关键作用”<sup>①</sup>。社会党要实现“左翼联合”，扭转选票下降 17% 的趋势，取得 1993 年议会选举的胜利，没有共产党及其选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法共则奉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为了反对右派，在各级议会活动中，仍就某些具体问题投票支持社会党，进行有限的合作。

早在 1987 年的里尔代表大会上，社会党就认识到，尽管“对今后来说，老的左翼联盟战略由于下面两个原因受阻：一是社会党加上法共已不再能构成多数；二是法共不再愿意结盟。这种破裂了又恢复，恢复了又破裂的联盟在群众中也丧失了威信”但是，社会党不可能单独构成政治替代力量，所以，社会党愿与整个左翼合作。不管联合有什么困难，它永远不会放弃这个阵地它的宗旨依然是联合左翼力量。而法共总书记马歇在 1987 年 8 月 31 日答记者问时也说：“我们一直声明法共不打算靠单干获得政权，不打算靠法共独家解决问题。我们始终主张结盟。首先是与社会党结盟。在社

<sup>①</sup> 《参考资料》1991 年 6 月 2 日。

会党现行政策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反对右翼政策的条件则是到处存在的’<sup>①</sup>。这表达了法共为反对右翼与社会党共同行动的愿望。

苏东剧变后，移民问题与严重的失业和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成为法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之一。极右翼把本国犯罪率上升、住房紧张、失业增加等统统归因于外国移民，提出“民族优先”、“民族纯正”等蛊惑人心的口号，鼓吹要用“铁的手腕”治理国家，对付共产党和社会党等等，迎合了许多人对执政党不满和失望的心理，吸引了大批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选民，成为西欧最大的极右翼势力。国民阵线主席勒庞甚至扬言要力争当选下届总统。

为了扭转右翼步步紧逼的态势，重新赢得人心，迎接 1993 年大选，两党都意识到双方进行磋商对话，协调立场，采取共同行动的必要性。1990 年 3 月法国社会党领导人通过了题为《左翼联合》的政治方针，主张动员所有左翼力量来赢得 1993 年的大选。这个文件建议在今后两年举行“左翼和进步力量的全国三级会议”。文件还提到“不应当忘记共产党的存在”。1991 年 6 月，社会党第一书记莫鲁瓦提出与法共领导人对话的建议。对此，法共总书记一改过去拒不接受的态度，做出积极的反映。6 月 6 日，马歇在巴黎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的办公室与莫鲁瓦共进午餐，实现了 1988 年后两党的首次最高级会晤。两党讨论了“世界上和我们的社会中所发生和正在进行的巨大变革，以及我们每一方对此的看法”。双方商定，今后加强两党情况交流，在年底以前组织一次两党负责人的讨论会，并准备就 1992 年 3 月地方选举达成某些协议。法国社会民主人士中心主席皮埃尔·梅埃涅里在法国报纸上发表谈话认为：“实际上，左翼联盟正在出于一些战术考虑重新组成”。马歇也认为，这次首脑会晤说明“社会党对我们的态度发生了某种变化”。莫

<sup>①</sup> 《人道报》1987 年 9 月 1 日。

鲁瓦在会谈后说:要“谨慎地、现实地、满怀信心地前进,而不是高喊联合、联合。我们在进入对话,尽管我们进行了这次对话,但是,还得走着瞧。在一定时候这种对话将可以成为代表团之间的会晤,为什么不行”<sup>①</sup>。

此后不久,莫鲁瓦在回答《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说:“社会党人从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这是持续70多年的斗争。但是社会党人同共产党人之间的这种根本分歧从来没有使我们放弃利用各种机会团结法国左派的必要性”。“无论如何,昨天和今天的需要还将是明天的需要,即团结一切左派和进步的选民。”<sup>②</sup>

法共总书记马歇也发表谈话说:“代表左翼观念的力量必须找到通向另一种社会的道路。让我们会晤、讨论、交换意见,共同寻求填补这一空白的方法,以满足法国男女公民的愿望,满足他们对未来的期望”<sup>③</sup>。在1991年地方议会选举中,法共的选票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略有回升,基本上制止了下降趋势。这对鼓舞全党士气,同心协力,渡过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促使社会党认识到企图把法共排除在左翼联盟之外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从而重视法共的存在。

1991年12月15日,法国社会党在世界形势发生剧变后举行的特别代表大会上强调,社会党要“阻挠右派和极右派,继续经济现代化、社会正义和欧洲建设方面的行动”。“重申团结左派的战略”,“希望同承认自己同情共产主义的所有人对话”。

1991年3月地方议会选举后,法国总理克勒松夫人和社会党第一书记法比尤斯呼吁社会党向其他“进步力量开放”,“奋起阻挠国民阵线得逞”。法国舆论评论说,地方选举后,法国“许多人又开始谈到了‘信任协议’,‘共同纲领’等问题。这都是一些老的概念,

① 《参考资料》1991年6月10日第81—82页。

② 同上,9月24日第68页。

③ 《人道报》1991年9月24日。

现在又成了时髦的现实话题”<sup>①</sup>。可见极右翼的崛起,既给两党带了挑战,又为两党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

尽管两党领导人都表达了加强对话的愿望,但要真正实现联合行动,仍然困难重重。

首先,社会党和共产党在一起已不能构成多数。由于生态运动的选票已大大高于法共,社会党将把重点放在争取生态运动和中间势力上,它所说的左翼联合,是指包括共产党革新派、生态主义者、开放人士在内的所有反对右翼力量的联合,而对单独与共产党合作并不热心。共产党对于社会党在左翼联盟期间夺走其大多数选民仍记忆犹新,近年来一直奉行“新的人民多数联合”的方针,对于同社会党联合存有很大戒心,行动也不会太积极。

其次,两党在关于经济问题和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分歧很大。苏东剧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大大加速。继欧共体建立内部统一大市场取得决定性进展后,1991年10月,欧共体12国又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7国就建立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基本自由流通的欧洲经济区达成协议,并决定于1993年1月1日正式生效。12月10日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召开的欧共体首脑会议上,通过了欧洲政治和经济货币联盟条约,并在制定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方面形成若干共识。这标志着欧共体开始从经济一体化朝经济、货币、外交、防务以及社会一体化方向发展。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成为大势所趋。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对欧洲左翼、特别是各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问题,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对此意见分歧很大。社会党作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主张出让一部分国家主权使欧共体成为超国家机构。而共产党则主张维护民族利益,反对共同体作为超国家机构,将违反人民选择的决定强加于它。这些严

<sup>①</sup> 《世界报》1992年3月25日。

重分歧也使两党很难达成一致。

再次，目前社会党的力量远远超过共产党。社会党试图依靠本身的“强大”和“扩大”，以社会党为中心建立所有左翼力量的联盟，使社会党成为整个左翼的代表，并通过联盟，加强同共产党内“革新派”的联系，促使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最终瓦解共产党。莫鲁瓦在 1990 年 2 月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同共产党人之间的历史性冲突正在以对我们有利的方式结束，因为对于社会党来说，试图以它的党员人数的增加，以它活动的多样化以及它同劳工界的密切联系来消除由图尔大会上的分裂带来的软弱状况的时候已经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实现联合亦非易事。

### 第三节 处于政治低潮的社会党面临挑战

#### 一、党内长期“内耗”使社会党丧失元气

国际形势的变化固然使法共处境艰难，但社会党也已走过了其春风得意的极盛时期，面临着经济危机、道德危机、领袖危机，跌入了 20 年以来的政治低潮。危机使社会党 1971 年重建后在思想组织上的弱点暴露无遗，党内派别斗争、争权夺利进一步加剧，政府官员失职腐败现象严重，社会党形象黯然失色。

1971 年由密特朗推动重建的新社会党，是由原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共和制度大会党以及统一社会党等不同党派组合而成的。在重建社会党的埃皮内大会上，密特朗派与原社会党内以舍韦内芒为代表的左派，即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结盟，并得到占党员总数 30--35% 的莫鲁瓦、德费尔派的支持才得以掌握社会党的领导权。但这三派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动机：密特朗急于要在党内掌权，以便为实现他的政治雄心取得活动地盘；社会党的



元老莫鲁瓦和德费尔想要最后摧毁摩勒统治并阻挡“人民阵线主义”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与研究中心也想插手可以使其生存下去的政治组织,以便实现激进的社会主义目标。只有一点三派是共同的:就是坚决支持实施旨在和共产党达成施政协议的左翼联盟政策。所以,埃皮内代表大会一方面标志着社会党形式上的统一,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社会党成分的复杂性。

根据党章规定,社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每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的领导机构是指导委员会,下设执行局和书记处,负责日常工作。指导委员会和各级领导机构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每一个派别只要在该党组织中拥有代表总额的50%都可以推举自己的代表参加各级领导机构,直至党的指导委员会。各个派别按实力大小在各级党组织中有相应的代表权,这被视为党的组织结构“民主性的主要体现”。但书记处则按多数票产生,因此代表了多数派的观点和立场。社会党强调党的代表大会及其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拥有绝对的权威,但由于党内派别斗争十分严重,我方党组织的独立性较大,党的中央机关对全党的控制力事实上很弱。党的真正权威既不来源于中央委员会,更不取决于议会党团,而是由相互竞争的派别领导人和独立性很强的地方党部所决定的。埃皮内代表大会上形成了以密特朗、莫鲁瓦和舍韦内芒为领导的多数派,根据多数中的三派力量对比,新成立的10人书记处力,密特朗派占4名,莫鲁瓦、德费尔派占4名,舍韦内芒派占2名。

社会党明确宣布反对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允许各种派别存在。1981年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对党内民王和思想多样化问题进行了专门的阐述,并从组织上给予保证,认为这是它成功的经验。代表大会文件指出:社会党内一直存在着各种思潮这是由于党的性质和它的组织形式决定的。与共产党关于党的观点相反,社会党人一直认为——并且证明——仅仅在党内自由表达个人意见

不足以确保民主，只要人们需要民主，就要承认各少数派有存在的权利，有转变成多数派的权利，从而有在党内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和手段。上述权利和手段是由党章和党内的规则确定的。在这样的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之间没有中间道路。

文件指出：“从埃皮内代表大会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思潮。这是因为，首先，党是由各种宣布主张社会主义的不同组织和团体组成的；其次，党内在政治问题上的辩论是频繁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党的这种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和劳动群众多样性的反映，它已为法国人民所接受”。“尽管存在着某种过分多样化的危险，法国人还是喜欢党的多样性而不喜欢其他党派铁板一块似的一致性。当然，不应该要求人为地保持各种不同倾向。如果在方向上能够达到真正的一致，那就毫不迟疑地予以欢迎。但是要防止表面上保持一致而实际上隐藏着各种不同倾向。无疑，宁可在各种不同派别阐述了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后公开地、光明正大地聚集在一起，而不要思想混乱和自梅斯代表大会以来仍旧存在的各种团体长期化的情况下，在确定各省委和全国领导机构成员的问题上，发生斗争。”

“所有社会党人应该毫不掩饰地、轻松自在地生活在党内。党属于全体党员而不属于任何个人。每个党员应该能够在党内保持各自的本来面目。从而我们就会取得又一个成就，这就是使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组成部分民主地生活在一起，把铁板一块和分裂、专横和涣散这些恶魔一并消除，而这在法国左翼的历史上是很少能做到的。”<sup>①</sup>

这种允许各种思想流派及派别领袖的存在，向信仰各种主义的人开放的态度，使社会党获得了“开放党”的称号，也使大批观点各异的人加入了社会党。1974年10月，在密特朗主持下召开了

<sup>①</sup> 《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第401—402页。

“全国社会主义者大会”，出席大会的 1500 名成员分别代表社会党、统一社会党以及由各工会会员和各个团体、协会的知名人士所组成的“第三种成分”。会上，许多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加入了社会党，其中包括以罗卡尔为首的 3000 名统一社会党人。

在组织进一步扩大的同时，社会党内成分混杂、思想混杂、派别林立的特点也更加明显。社会党右翼代表罗卡尔甚至说：“社会党不打算要求它的党员具有同一种哲学。党的每一个成员和上帝——如果他信上帝的话——保持怎样的关系有充分的自由，他们在宗教以及哲学、教派、共济会的或其它方面的选择也是完全自由的。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是踏踏实实的。我们计划的宗旨不是造福于人类。我们听到这样的话就感到害怕，因为这是独裁的开端，从而也是法西斯的起点。”<sup>①</sup>

就某种意义而言，现在的社会党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妥协的基础上的。这种妥协表现为长期对意识形态问题避而不谈。既然不存在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因而各种思潮在党内都是允许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党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各种派别、倾向、流派、支派、情感在党内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繁荣现象。统一社会党转来的党员、脱离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们、继承摩勒主义的老社会党人、中间派和自治管理分子、改良主义者、“新派”和老派一律在社会党内平起平坐。

据此，一些法国学者认为：社会党并不完全是个政党，而是一个联盟。使社会党、特别是使它的领导班子得以维系的真正纽带不是某种学说或意识形态，而是一条明确的策略路线，即联合左翼，全力以赴地尽快达到上台执政的目的。这就使社会党成了一个既是对社会开放的党，但同时又是一个内部争吵和麻烦不断的政党。社会党的这种“大杂烩”特点，是它的力量所在，又是它的薄弱所

<sup>①</sup> 《法国社会党及其领导人》第 26 页。

在。对社会开放使社会党得以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夺取了政权，执政 10 余年之久；而派别林立又使其内耗不断增加，在建立 25 年后的今天又一次提出重建的任务。

如前所述，社会党建立之初，就分为密特朗派、莫鲁瓦派和舍韦内芒派。1974 年罗卡尔加入社会党后，又出现了罗卡尔派。1979 年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形成了四个派别：若斯潘派、莫鲁瓦派（这两人在密特朗卸任后，先后担任总书记）、舍韦内芒派和罗卡尔派。1987 年后，若斯潘派和莫鲁瓦派联合组成拥戴密特朗的主流派。之后，又出现了法比尤斯派。这一派与主流派在政治、经济主张方面并无太大差别，他们之间的争吵更多是个人权力之争。

从这几派的基本主张看，舍韦内芒属社会党中的左翼，以“学习、研究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心”为核心。这一派比较接近法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和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理论，是社会党中最坚决主张与资本主义决裂和长期与法共结盟的一派。舍韦内芒拒绝社会民主主义，要求社会党进一步向左转。认为“没有共产党，社会党就靠不住；没有社会党，共产党就无能为力”。为此，他曾被敌对者指责为“准共产党人”，或“披着社会党皮的共产党狼”。他一方面指责法共对内缺乏民主，对外追随苏联政策，不赞成由法共掌权，认为那会使政权变成更加官僚主义的、极权的政权。另一方面，舍韦内芒又避免“反共”，也不像罗卡尔那样“憎恶”法共。他主张同法共持久联盟，认为这不只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且是为了改变两党性质：一方面加强社会党内抵制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法共同更民主的伙伴结盟将促进其党内民主化；如果两党联盟破裂，法共会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社会党会更加社会民主党化。1984 年，当共、社两党联盟破裂，法共拒绝再度结盟，社会党内大多数人主张放弃左翼联盟时，舍韦内芒在主张建立包括法共在内的新的“进步多数派”的同时，仍强调法共

的削弱对整个左翼不利，并认为法共力量可能恢复。

在同密特朗的关系方面，舍韦内芒有为他做出贡献和合作的一面，也有同他观点分歧和斗争的一面。在 1971 年的埃皮内大会上，舍韦内芒运用自己的影响同莫鲁瓦结盟，支持了密特朗派提出的政治动议，挫败了摩勒派。舍韦内芒成为党内多元制组织中的左派代表人物，他的不少观点得到密特朗的赞同。1972 年在同法共讨论建立左翼联盟和签署两党共同纲领的谈判中，舍韦内芒是社会党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此后，舍韦内芒派有时加入密特朗的多数派，有时退出成为少数派。1974 年，当法共与社会党展开论战的时候，舍韦内芒批评社会党向右转的倾向，反对同共产党论战，主张维护和加强左翼联盟。密特朗批评舍韦内芒的观点过左，指责他要把社会党变成共产党。最后将舍韦内芒派的四个全国书记都赶出了领导机构——全国书记局，舍韦内芒也未参加支持密特朗的竞选运动。1981 年，他又转而积极支持密特朗做总统候选人，挫败了罗卡尔做总统候选人的企图。密特朗当选总统后，舍韦内芒又为促成法共参政起了重大作用。

若斯潘派为社会党的中间派，其主要成员是原共和制度大会党的党员。该派的主张主要体现在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理论中，其内容在本书的第五章已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罗卡尔派为社会党内的右翼。这一派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理论，反对与共产党结盟，主张与中间阶层联盟。

这些观点各异的派别在同一个党内共处，每次代表大会上，各派都提出自己的动议，并进行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不能形成简单的多数。这就必然会对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以及统一行动产生影响。

1978 年，在左翼联盟破裂和议会选举失败后举行的社会党梅斯代表大会上，四个派别都对党的政策提出了自己的动议，其中以

密特朗派与罗卡尔派的斗争最为尖锐。自从罗卡尔加入社会党以来，其地位影响节节上升。立法选举失败后，一些法国舆论和社会党派系指出，密特朗应对左翼联盟破裂和选举失利负责。罗卡尔还多次在公开场合攻击密特朗本人及其政策，明显地流露出自己想取代密特朗的地位，做总统候选人的企图。同时，党内支持罗卡尔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密特朗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

会上，两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同共产党结盟和与资本主义“决裂”。密特朗坚持认为：社会党若不与共产党联合就无法在全国选举中取得多数而上台；在与法共的联合中社会党必须居主导地位；在左翼联盟已经破裂的情况下，要靠革命的口号和方针来同法共争夺工人阶级，扩大社会党的基础。罗卡尔则认为：左翼联盟的战略使社会党失去了一大批中间派选民，在当前条件下社会党应改变战略，安抚中间阶层，把争取潜在的中间派选票作为战略目标。密特朗认为国有化、计划经济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是治世良方，也是争取对现制度不满的选民的王牌；罗卡尔却对大规模的国有化和计划化持怀疑态度，认为经济改革只能慢慢来，搞快了会使整个国民经济遭受破坏，强调市场经济在法国起主要作用。为了挫败罗卡尔，密特朗同昔日的对手舍韦内芒重归于好，实现了联合，终于使密特朗派的动议勉强获得通过。在总数 122 人的指导委员会中，密特朗派占 62 人，在执行局中占 13 人，取得了多数。在 1981 年的总统选举前，尽管罗卡尔先声夺人，宣布要参加竞选，但 1981 年 1 月密特朗在党代会上获得多数同意，被正式提名为社会党唯一的总统候选人，罗卡尔不得不退出竞选。类似的派别斗争在历次代表大会上都能看到，这不能不影响社会党的形象。在社会党执政期间，尽管党内各派对于国有化、工业结构改革、紧缩计划等问题看法不一致，但为了一致对外，应付危机，各派之间的分歧趋于缓和。

1986 年，社会党在失去政权后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各派

围绕革新党的组织结构和实现党的现代化问题，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论。温和派罗卡尔强调要少谈意识形态，更多地适应法国社会现实。提出必须修改 1971 年社会党埃皮内大会所制定的原则声明，“放弃过时的语言”，使社会党成为“社会妥协的党”，而不再是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党”。党必须实现现代化，并向更加广泛的左翼选民开放，以使社会党的选票达到 40%，能较稳定地单独执政。为使社会党成为真正的替代力量，罗卡尔主张建立一个接近美国式的民主党，同时更多地建立政治俱乐部，以活跃思想和政治辩论，扩大党的影响。罗卡尔的观点虽然在社会党内还不能构成主流，但却反映了未来社会党发展的基本方向。

左派舍韦内芒派认为，统治阶级的“自由化思想”目前仍然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左翼并未获得“葛兰西所说的思想领导权”。法国多数人的思想是“共和主义”思想，因此，要成为右派的“代替党”，“进入 40% 的选票圈”，就必须提出有动员力的纲领，这就是“现代共和国”的纲领。其核心内容是：民族独立、经济增长和民主扩大。在党的周围发展思考性俱乐部和各种社团，特别要在劳动地点扎根。它提出走“新的道路”，建立 20 世纪末“社会主义共和党”的主张。党的基础是工薪阶层，同时，团结左翼及超过传统左翼如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天主教派以至戴高乐派在内的各种人士。该派反对“美国式民主党”的主张，认为那将是社会党和“法国式社会主义的终结”。

老社会党的正统继承者莫鲁瓦派宣布，它继续的仍然是社会党所维护的“法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莫鲁瓦认为不仅要“适应社会”，而且“要改造社会”，“不能否定自己”。他同意修改原则声明，但“不能超过限度”。认为社会党的“天然阵地是左翼”，是“劳动世界的党”，要扎根于自己的历史传统，通过“团结全体领薪阶层”重新掌权，反对俱乐部的无政府主义泛滥。提出党必须“开放”，团结“工会世界”并争取共产党人的支持，主张建立“瑞典式”的或“法国

式的社会民主党”。

构成党内实权派和主流派的若斯潘派则提出，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党”，但强调实现“党的现代化”。伴随着“全面开放战略”，修改纲领中的陈旧观点，一要坚持“法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二要考虑“新的因素”，同“现实保持接触”；“不是削弱我们的信念，而是维护社会党的特性”。要建立“真正的左翼”，代表“劳动世界的愿望”，团结从“中左直至共产党的政治空间”。既不赞成把党改造成英美式的民主党，也不认为社会党可以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工运和党互相渗透”的社民党。若斯潘在会上说：法国工会的分裂状况及其有限的人数，加之工会与社会党之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这些都使我们不可能成为德国式或瑞典式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要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就必须更注重选举道路，主张建设“现代化的左翼大党”。

社会党四大派别的斗争，从表面上看，常常是因政策、主张或意识形态的分歧，但在这些分歧的背后，往往是党内争夺权力的斗争。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在 1990 年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1989 年，密特朗第二任期刚开始不久，因若斯潘进入政府，第一书记出现空缺，党内四大派代表人物围绕密特朗的接班人问题开始角逐。根据社会党的传统，谁能当选党的第一书记，谁就有可能被指定为竞选总统的候选人。虽然距下届总统选举（1995 年）尚远，但能否现在就登上第一书记的宝座对未来至关重要。若斯潘依仗莫鲁瓦派的帮助，法比尤斯派自恃有总统支持，罗卡尔派有民望作后盾，舍韦内芒派踌躇满志……总之，这四位都认为接班人非己莫属。他们之间如“敌对的兄弟”，虽生活在一个家庭里，却貌合神离。此外，前议长梅尔马兹也跃跃欲试，真可谓群雄逐鹿。社会党下届代表大会将于 1990 年初召开，主要任务是解决各派矛盾，统一全党思想，保证密特朗 7 年任期内顺利执政并为下届总统和社



会党继续执政做准备。谁有可能成为未来党的主流派和总统接班人届时将露端倪。

1990年1月，社会党召开中央指导委员会讨论下届党代会议案。会上，四派各持己见，莫衷一是。莫鲁瓦试图维持派别现状和轴心派的团结，主张各派提出统一议案。但派系之争激烈，“团结”“流一”谈何容易！前总理法比尤斯表示要提出自己的议案，决心另树旗帜，与若斯潘、莫鲁瓦分庭抗礼。莫鲁瓦和若斯潘提出了代表主流派的提案，得到国民议会社会党党团主席路易·海尔马兹的支持。法比尤斯的议案则得到财政部长皮埃尔·贝雷戈瓦、内政部长皮埃尔·若克斯、文化部长雅克·朗等社会党头面人物的支持。这意味着主流派事实上的破裂。法比尤斯比若斯潘年轻8岁，1984年38岁时便被密特朗任命为总理，颇得他的信任。1988年密特朗蝉联总统后，有意让法比尤斯当第一书记。但是党内主流派若斯潘并没有听命于密特朗，而是支持选举莫鲁瓦为第一书记，使法比尤斯壮志未酬。这一事件暴露了主流派内部发生分歧的迹象。

在1990年3月于雷恩举行的社会党十大上，法比尤斯仍认为自己是第一书记的最佳人选。在密特朗的幕后支持下，想同若斯潘决一雌雄。而若斯潘对1988年密特朗亲自举荐法比尤斯至倭耿耿于怀，这一次仍采取支持莫鲁瓦的战略，决心挫败法比尤斯，为自己今后走向爱舍丽宫扫除障碍。为此，法比尤斯与若斯潘、莫鲁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基层党员损票中，莫鲁瓦、若斯潘、梅尔马兹的联合议案，获得28.94%的选票；法比尤斯议案，获得28.84%的选票；前任总理罗卡尔的议案，获得24.26%的选票，但没有一个议案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法比尤斯的议案所得的选票几乎与莫鲁瓦、若斯潘、梅尔马兹联合议案的选票相等，接近30%。这样，密特朗的嫡系“部队”分裂成顷峙的两股力量，这两股力量旗鼓相当，好似鳌鱼和海豚，各有各的招数，谁也吃不掉谁。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主流派发生内江的情况下，非主流派罗卡尔

的地位和影响出乎意料地得到改善和提高。密特朗在会后表示，如果罗卡尔政绩显著，能使社会党在 1993 年大选中获胜，他在下届总统选举中将是最佳人选。

社会党十大经过 4 天的激烈争吵，在未能就该党今后的大政方针达成协议，也未能就党的第一书记人选取得一致的情况下草草收场。最后，在密特朗总统的强行干预下，各派才在嗣后举行的领导人会议上就权力分配勉强达成了妥协：原第一书记莫鲁瓦留任，其他几派都在党内得到了位置。经过艰苦磋商，各派通过了一个以“新的经济和社会阶段”为目标的文件。至此，“风暴”总算过去，社会党人为终于避免了党内分崩离析而松了口气。

但是，最后达成的协议并未能消除为争夺党内第一书记职位导致的深刻危机。过去，在社会党重建后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拥戴密特朗的主流派提出的政治提案均毫无例外地以优势通过，成为该党的行动纲领。然而，这次雷恩代表大会却出现了另一种景象：主流派内部发生严重分歧，两位由密特朗扶植起来的少壮派人物若斯潘与法比尤斯争权激烈。社会党的这种内耗，不但长期得不到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近年来，党内各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党的领导权、海湾战争、选举法改革、联盟战略、社会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等争论不休，使社会党大伤元气。随着 1995 年总统选举的日益迫近，党内就推举总统候选人的矛盾将再次凸显。罗卡尔、法比尤斯、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以及受法比尤斯排挤的若斯潘、舍韦内芒等人都有可能出来参加总统宝座的角逐，党内危机将进一步加深。

## 二、外部的左右夹击令社会党进退维谷

在派别斗争加剧、内耗日益加重的同时，随着苏东剧变和法国议会选举的逐日临近，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登台表演，组织阵容，准备与社会党较量。社会党在外部也遭到左右夹击，难以有所作为。

1988年社会党政府重新上台后，一直执行压缩预算赤字、抑制通货膨胀、保持法郎坚挺为特点的经济紧缩政策，造成了众多的消极后果：经济增长缓慢、生产性投资下降、工资增长停滞、社会购买力疲软、外贸赤字居高不下、失业队伍不断扩大，1993年突破300万大关。这种严重局势使法国社会从1990年以来始终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社会上抗议风潮此起彼伏，天天不断，几乎成为家常便饭。1990年，农牧民的抗议行动最终导致了当时的农业部长纳莱的去职。抗议浪潮不仅涉及工矿学校，连法院法官、监狱看守、消防队员、税务人员以及其他国家公务员也几乎全部卷进罢工的浪潮之中。全国性的罢工和游行，大大冲击了社会党政府。社会党政府面临着各阶层人民的压力，这是其一。

其二，右翼反对派利用经济危机的消极后果、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以及社会党内的政治丑闻，不断向社会党发起攻势。他们对现行经济政策进行了空前强烈的抨击和指责，否定社会党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要求经济部长贝雷戈瓦下台，要求改变经济政策。在议会讨论1992年预算的过程中，反对党提出了对政府的弹劾，只是因为法共的保留，弹劾才未获得通过。在20多项支出预算中，只有3项是获得多数通过的，其他各项支出预算都是政府引用宪法49-3条款未付表决强行通过的。对此，反对党和一些中间派人士极为不满。他们指出，政府丧失议会多数，总理已“失去合法性”。保卫共和联盟主席希拉克抨击政府说：“社会党政府毫无计划、毫无主张、丧失信任，几乎一事无成。”

社会党上台前标榜自己信奉道德、廉洁和公正，但近年来围绕政府官员失职、党的经费来路不明等丑闻不断被揭露。

1991年下半年，三件积压多时的沉案——“血液感染案”和两起假发票案先后“曝光”。“血液感染案”发生在80年代中期，造成全国7800人因接受输血而染上艾滋病毒、46万人染上各类肝炎病毒。司法部门和社会舆论在追究当时卫生部门具体负责人法律

责任的同时，强调要追究当时政府主管部门、政府总理和整个政府的集体责任。社会舆论抨击政府把民众的生命当作儿戏，反对党要求“彻底查清”。德斯坦派的法国民众联盟总书记弗朗索瓦·贝鲁称“密特朗当政的十年是充满丑闻的十年”，并进而要求总统辞职。

科热丹建筑公司和索尔马公司的两起“假发票案”发生在 80 年代末，分别涉及两公司数亿法郎的假发票，牵连朝野各主要政党的多名地方议员、地方负责人以及各党的竞选集资机构。当索尔马公司的假发票案被披露之后，密特朗总统不顾公众舆论的反对，赦免了一些涉嫌经济丑闻的社会党骨干成员，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人们认为社会党与右翼是一丘之貉。1991 年 5 月，密特朗启用社会党左翼人士克勒松夫人担任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但这一轰动效应没有持续多久，相反，却导致总统和总理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跌至第五共和国以来的最低点。

为了反击右翼的进攻，平息农民、医务人员、工人和血液感染受害者的不满，转移法国民众的注意力，密特朗宣布 1992 年下半年举行公民投票、修改宪法、缩短总统任期。

反对党针锋相对，提出如右翼在立法选举中获得议会多数，则要求密特朗提前退位；右翼两派还加强协调和联合，努力寻求中间派政党和绿党的支持，跟社会党争夺选民。

其三，极右翼咄咄逼人。社会党当政 11 年来，经济增长缓慢、贫富差别依旧、移民、社会治安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许多人对前途失望，精神空虚，为极右翼法西斯思想意识滋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极右的国民阵线，虽受到来自左右两翼政党的抨击，但在法国政坛上却显得十分活跃。在冷战结束后的社会动荡中，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可以趁机蛊惑人心，制造混乱，从中大受其益。大批选民在对原来的党派失望之后铤而走险，纷纷投向极端右倾的“国民阵线”。在 1992 年地方选举中，国民阵线赢得 14% 的选票。很多人认为，勒庞高声喊出了政界人物私下所想但不敢说出的

话来。勒庞的种族主义主张十分反动，但是他揭露社会弊端却迎合了不少对社会不满的人的口味，在选举中支持者的数量不断上升，成为牵制左、右两派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四，绿色运动和生态组织的蓬勃兴起是从左面对社会党的严重挑战。社会党原指望趁法共衰退之际，将法共的选民争取过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但从这几年的情况看，不仅法共失去的选票没有流向社会党，而且社会党本身的选民也有相当一部分投向绿党、生态组织和极右翼。在 1992 年法国地方选举中，生态组织得票率达 14.7%，比执政的社会党只差 4 个百分点。这两个政党的成员大量进入大区 and 省级议会，对传统党构成严重威胁。由于左翼绿色运动和生态组织针对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主张合乎世界潮流和公民愿望，因而从长远看，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为了争取绿党的选票，社会党在地方选举失败后召开的特别代表大会上明确表示，社会党的盟友除包括左翼激进党、法共革新派以及某些中间派人士外，特别包括生态学派。然而，面对日益遭到左翼选民抛弃的社会党，无论是中间派还是生态学派，都不愿明确与社会党发展联盟关系。生态学派决定单独参加 1993 年 3 月的大选，这必将分散一部分社会党选民的选票，导致社会党所获议席进一步减少。

此外，共产党也常常抨击社会党执行同右翼一致的政策，并在议会中对社会党的一些议案投反对票。1991 年 4 月，社会党就因无法得到多数议员的支持，从议会撤销了“地方选举改革法案”和“银行储蓄改革法案”。左右两面夹击，使社会党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除来自左右两面的夹击外，西方政治文化危机也对社会党赢得选民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新科技革命兴起，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阶级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小企业剧增，新中间阶层膨胀，社会

和个人财富迅速增加。日臻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高度发达的社会服务体系，工作、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使人们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大大减弱，独立性大为加强，出现了西方所谓的“个人化”、“原子化”的现象。这导致人们的阶级意识削弱，组织观念变得非常淡薄。西方政党文化，即人们对政党组织、政党活动和政党制度的价值判断、认同心理和评价取向等因素形成的政党活动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气氛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对政党的认同减弱，甚至对政党组织的政府丧失信心因而政治参与热情骤降。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西欧约有 3/4 左右的人声称对政党政治不感兴趣，对政党提出的各种改革方案和措施不予关注。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相当多的居民拒绝把自己列入左翼或右翼阵营，而持一种“不左不右”的中间立场。西方政党政治腐败，议会民主制度衰败，政党政治功能衰退等原因，更使人们对执政党产生逆反心理。这次法国议会选举中，弃权率高达 30%，特别是在普通百姓集中和左翼影响较大的地方弃权现象尤为突出。

西方政党文化危机还反映在选民力图挣脱相互争斗的政党影响，寻求自己独立的地位。特别是在大规模失业的压力下，个人主义意识急剧膨胀。这种社会利己主义心态削弱了对右翼保守主义思潮的批判态度，使人们能够容忍甚至接受不久前自己坚决反对的主张。特别是在长期失业痛苦折磨下的那部分人，认为社会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全他人的福利。这批人历来是极左或极右思潮吸引的对象，目前，极右思潮在这部分人中颇有市场。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执政的社会党形象一落千丈。继 1992 年地方选举大幅度倒退后，在 1993 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获票仅占 17.62%（比上届减少 15 个百分点），获议席 53 个（减少 200 多席），这是社会党建党以来的最低数。自 1870 年共和国建立以来，还没有一个执政党在选举中遭到如此规模的历史性惨败。

根据选票统计，在 1988 年投密特朗票的选民中只有 45% 的

人继续投社会党的票，社会党议员候选人无一人在第一轮当选，而右翼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竟有 80 人当选，形成强烈反差。在第二轮选举中，社会党参加竞选的 32 名现任政府成员中有 15 人落选，很多头面人物，包括外长迪马、前党的第一书记若斯潘，特别是前总理、社会党“当然的总统候选人”罗卡尔落选更加引起党内震动。它表示了公众对社会党政府的厌倦和惩罚。

与此相反，右翼两党——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组成的竞选联盟此次获得了 39.57% 的选票，加上其他右翼组织的选票，总计为 44.26%；在有 577 席的议会中获得了 84% 的席位，即 484 席，比上届议会增加了 200 多席。这是右翼自本世纪以来获得议席最多的一次，也使它掌握了除总统府以外的各级权力机构。此前，右翼已控制了参议院、全国 22 个大区中的 20 个大区议会、99 个省中的 75 个省议会，以及大部分市镇议会。

社会党的惨败使组阁权再次从社会党转入右翼政党手中。人称这次选举失败是社会党的一次“滑铁卢”。

当法比尤斯在 1992 年初接替莫鲁瓦出任社会党总书记时，曾许下诺言要更新党的组织，团结党内所有派别并革新社会党。然而，在他担任党的领袖一年后，社会党的处境却更加困难。由于选举的不断失利和党内派别之争，社会党士气低落，众叛亲离。议会选举前夕，许多社会党议员，包括一些现任部长在内为避免在选举中落马，纷纷宣布不参加竞选。这在重大选举中是前所未有的。大选失败后不久，社会党政府的最后一届总理贝雷戈瓦在各种精神压力下自杀。舆论认为，贝雷戈瓦的自杀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党的悲剧。“这是一次个人与集体的悲剧，一次失败，它以全国否定法国社会党执政 10 年而告终，也是以双重的自杀而告终”，“各种丑闻，特别是政治、财政丑闻，损害了以‘道德’自居的社会主

义形象，最后导致三月的选举惨败”<sup>①</sup>。

近年来，涉及社会党要员的政治丑闻和渎职案件接连曝光，前社会党司库、现法国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国民议会议长埃马纽埃利因涉嫌通过不正当途径为党筹集经费而受到起诉。特别是去年底，现任社会党第一书记、前总理法比尤斯以及另外两名有关部长因涉嫌在输血感染艾滋病事件中有渎职行为而被移交由议会指定的特别最高法庭审理。在种种打击下，社会党党员人数从 20 万减少到 10 万，一些议员和省委干部都宣布退党。甚至党内左翼代表舍韦内芒也宣布退党，准备建立自己的党。社会党已处于分化和重组状态。于是，在社会党重建 24 年之际，党的再次重建和左翼重振又成为社会党面临的迫切任务。

### 三、理论与纲领的更新是唯一的出路

1993 年 4 月初，社会党领导层聚集巴黎，就选举结果进行检讨。会议围绕党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斗争。前工业部长、若斯潘派成员卡恩提出罢免现领导、组建临时领导机构的动议。当时，第一书记法比尤斯断然拒绝，他认为他本人并没有在选举中失败，并把罢黜动议攻击为“政变”。后来，态度虽有所软化，但要求他的第一书记职务留任到秋季的党代表大会。由于追究选举失败责任的呼声高涨，由于罗卡尔派与若斯潘派的联合，终于使罢黜动议以 62 票比 49 票得以通过，罗卡尔当选为临时机构负责人。临时机构定员 21 人，但当时决定参加该机构的只有 11 人，其中罗卡尔派 5 人，若斯潘派 5 人，其他派系 1 人。法比尤斯派声明退出临时领导机构，作家加洛以及领导市民运动的左派领导人都明确今后不参加这一组织。各派对临时领导机构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使社会党面临着分裂的危机。特别是法比尤斯被罢黜、前总理罗卡尔

<sup>①</sup> 《参考资料》1993 年 5 月 5 日。



统揽大权，被舆论界称之为社会党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大地震”。

会议除建立了新的领导机构外，还提出要有组织地就党的重建问题举行全国范围的集会讨论，以此作为党重建的第一步。讨论采取由下而上、层次逐渐提高的方式，先由基层支部开始，然后到省和大区，最后举行全国级别的集会讨论。全国级别的讨论会于7月在里昂市举行，与会者约3000人，大会结束时通过了讨论会的最后文件。

从形式上来看，这次讨论会克服了一度存在的分裂危机，罗卡尔派和莫鲁瓦派等派别都参加了讨论。集会讨论的参加者除了社会党的成员之外，还包括社会党的支持者和其他党派的成员，这使讨论会具有一定的群众性。据统计，在各地集会的参加者中，非党员约占40%。在全国讨论会上，社会党对执政时期的失误作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认为社会党被群众抛弃的原因在于“对官僚主义和金钱政治的屈从，对他人的漠不关心”；“在野的时候是左翼，而执政的时候却是另外一种倾向”；“社会主义事业抛弃之时，也就是我们的末日到来之日”，可谓一针见血。

对社会党理论纲领调整迟缓，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指责，早在80年代中期就不绝于耳。社会党自1971年重建到1981年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胜利前后，提出的是“激进社会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这种战略的使命是通过逐步改变大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交换关系，通过改造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并使之民主化的途径，分阶段地实现“同资本主义决裂”。但是，这一路线招致了1983年的经济危机。在受到挫折后，社会党政府声称要放弃由于多年来处于在野地位所造成的那些“有害的幻想”，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表现出“现实主义”。以后，社会党逐渐改变了激进路线，愈益转向务实主义。

1987年法国的一位评论家甚至认为：“目前，法国人民不再认为社会党同法兰西民主联盟和保卫共和联盟之间存在着根本区

别”<sup>①</sup>。对法共来说,社会党和右翼之间的区别就更小了。1988年社会党重新上台后,用“谨慎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前进”的想法代替了“与资本主义决裂”的口号。在经济上,实行紧缩政策,控制公共和社会福利开支,提倡“企业精神”,减少国家控制和干预,扩大市场经济成分,中止了国有化进程。在政治上,社会党开始向中间势力开放,向右翼妥协,求助于整个民族而不是依靠左翼选民。这使曾对选民产生过强烈吸引力的玫瑰色在社会的漩涡中变得越来越苍白了。“阶级阵线”观点已完全丧失生命力。

然而,社会党并没有就经济和社会变革内容及方法的改变作出明确的解答,也没有对这一转折在理论上加以分析和论证,这必然会对社会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不良影响,造成党员和选民的思想混乱。他们不再相信那些改变了政策可又不愿承认的领导人。

1981年,社会党作为70年代后期经济危机的治理者和替代右翼的政治力量,把成份十分复杂的各种社会集团,特别是既不满足于现状却又害怕激烈社会变革的新中间阶级聚集到自己的旗帜下。这些社会集团所追求的目的是相互矛盾的,有时是截然相反的。在危机尖锐化和越来越难以应付社会问题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羁绊下,社会党无法满足这些社会集团的期望。为了在左右翼的夹攻中生存和发展,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影响,社会党不得不经常变化自己的竞选纲领和施政政策,以迎合选民的心理和需要。这就使自己的政策难以和宣布的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必然形成理论纲领和实践活动的一致——背离——协调——再背离——再协调的尴尬局面,使社会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和解决社会不公的程度同他们的理论和愿望大打折扣。

社会党意识形态的宽宏大度和政策的实用主义还导致了他们

<sup>①</sup> 《解放报》1987年4月2日。

对理论纲领的无所谓态度。正如德国社民党前干事长彼得·格格茨所说：“每个人都可以任意解释他的社会主义原则导致了这样一个极端：‘他为什么同我们在一起无关紧要，只要他同我们在一起’就行。这样，左翼不仅摒弃了科学的世界观，而且丧失了不断思考的探索精神。”<sup>①</sup>

80年代中期后，社会党与其纲领大相径庭的做法遭致党内越来越多的批评。有的指责政府“放弃了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战略”，使“富者愈富、贫者原地踏步”；有的批评政府行为是“管理经济”；许多高级负责人抱怨政府在制定政策前征求并听取党内意见不够。有人指出：“党背离了‘埃皮内’代表大会确定的宗旨和路线，阶级阵线沦为思想意识的装饰品”。有人惊呼，社会党目前出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真空，若仅依靠“人权”这个标签来维持社会党颜色，那么，不用多久，这个党就将变成一个普通民主党。

无怪乎有人说，社会党正成为“一个没有思想观点的政党”。80年代中期，社会党抛弃了原来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后，缺乏自成特色的理论体系，缺乏始终一贯的既定战略，缺乏稳定的政治盟友，缺乏牢固的组织基础等弱点，使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不再能够主宰社会。相反，社会的演变却在左右着社会党的意识和主张，在影响和改造着社会党，使它难以形成一个新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当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面对福利国家的危机及不断增长的生态价值观提出新的战略时，法国社会党人并未及时对社会民主主义进行认真的思考，只是在原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后，它才在1991年底召开特别代表大会，通过《2000年纲领》，试图弥补这一缺陷。2000年纲领对事实上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作了肯定，并把党规定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然而，在7月全国讨论会上通过的最后文件中，又从对其实行的“过度的自由主义”，即“纯粹的资本主义”进行

<sup>①</sup> 《左翼的困境》，《明镜》周刊1987年第51期。

反思的意义上谈论社会主义，结果给人们的印象是社会党仍没有明确的理论。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社会党执政后把大量有经验的干部调到各级政府机关里，党的官员被选进各级议会和为数众多的议会委员会（有学者估计，共计大约 1/4 的指导委员会成员和一部分执行局成员、地方联盟的成员离开了党的机关）。党的决策中心由党的高级机关——指导委员会、执行局和书记处——转移到国家首脑办公厅、政府和法国社会党议会党团。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党组织本身的建设，造成基层组织活动停滞和群众运动的退化，使党与群众疏远，党的战斗力削弱，党由活动家的党变为议员的党。党的领袖形象已过于陈旧，20年来几乎都是四大派的领导人代表社会党。缺乏以往那样经受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锻炼的青年一代活动家，也使社会党的重建面临着重大障碍。

1993年7月的重建社会党全国讨论会，并没有解决内部派别的对立。会上，虽然罗卡尔派、若斯潘派、法比尤斯派、莫鲁瓦派和“左翼社会主义者”，形成了协调体制，但实际上，以前长期存在的派系间的不和并没有消失，各派暗里各有图谋。特别是法比尤斯派于1993年9月单独举行了名为“研究会”的集会，入会人员超过700，比同期社会党召开的夏季正式会议参加的人数还要多，这无疑大大损害了社会党领导机构的面子。另外，党内的一些干部对罗卡尔也有着强烈的批评。原社会党议会党团团团长梅尔马兹指出，社会党现在的“全员一致主义”仅是外观，它没有活力。密特朗对罗卡尔掌握党的临时领导机构感到恼怒，一直断然拒绝罗卡尔的会见要求，这在社会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继7月全国讨论会后，社会党于10月22—24日，在巴黎郊外的布鲁日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派系首领在会上作了发言，选举了党的第一书记；通过了大会的《最后文件》。舆论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社会党向党的重建迈出的重要一步。

罗卡尔在大会开始时首先发表了演说。关于党的改革，他强调

“道德”上的建设,主张设置“伦理委员会”,以防止执政时部分自治单位党的领导人发生贪污渎职事件。他还强调要迅速加强党的团结,并指出:“如果实现我们的飞跃,完成大会赋予的任务,那么我们的努力所得到的报答就不需多久。”法比尤斯的发言集中于对巴拉迪尔政府的批评,指出需要追究的是极少数握有经济、金融、舆论等权力,决定着国家的命运的人,要求人们警惕巴拉迪尔政府统治下国家的危险性。若斯潘的发言在强调党内稳定的同时,要求社会党也要采取密特朗总统的手法,像他完成他本身的任务那样来完成社会党自身的任务。

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选举党的第一书记。第一书记候选人仅罗卡尔一人。大会第一次以不记名直接投票的方式(以往都是由社会党干部举手表决)对罗卡尔进行信任投票,结果他以占80.9%的多数当选为第一书记。这是引人注目的。社会党于1971年6月组建以来,一直处在首任第一书记、现任总统密特朗的强烈影响下。事实上,以往党的第一书记,或者是密特朗的亲信,如若斯潘、法比尤斯,或者是密特朗的同盟者,如莫鲁瓦。罗卡尔在1974年加入社会党后,与密特朗在思想观点及党的战略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对立,以他为首的派系在党内一直受到非主流派的待遇。这次罗卡尔当选为第一书记,意味着非密特朗派系首次正式掌握了党的大权。

《最后文件》提出了建设“共同之家”的新构想,号召尽可能多的团体参加这一组织,以实现广泛范围的左翼集结,并宣称建立“共同之家”不是为了选举,社会党也无意谋求“共同之家”的主导权。“共同之家”的运作实行协商制。

布鲁日代表大会避免了党内斗争的表面化,开始向党和左翼的重建迈进。重建效果如何,取决于罗卡尔的手腕。这次代表大会表明,同议会选举前夕罗卡尔发表关于社会党必须实行“政治大爆炸”的想法相比,他以前那种大刀阔斧的魄力正在降低。当时,罗卡

尔提出，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和党的概念已经过时，社会党应打破内部的派系划分，与埃皮内的旧模式决裂，建立一个包括社会党人、生态学派人士、共产党革新派的“开放和现代运动”，通过新的广泛性运动，来实现党的发展和壮大。同时，还提出要对以往构筑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全面的重新认识。由此看来，罗卡尔似乎大有与社会党的过去一刀两断、使社会党脱胎换骨的“魄力”。

罗卡尔此举是要排除他的劲敌、密特朗的亲信法比尤斯，与群众十分不满的社会党以及密特朗划清界线并另组新党，提高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淡化竞选议员失败造成的影响，重新赢得选民的信任，为两年后竞选总统做准备。他在大选后利用党内不满情绪突然向第一书记法比尤斯发难，一举夺得党的领导权，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然而，从罗卡尔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可以看出，当选第一书记后，他以往的那种“魄力”正在退化。他说：“未来只能从过去中产生，我们必须回到自身的历史”。这分明是一种地道的传统回归。罗卡尔主张的这一变化，必然直接影响到社会党的重建。

对罗卡尔来说，1995年的总统选举是他实现总统梦的最后机会，在右翼控制上下两院和大部分地方议会的不利形势下，罗卡尔必将为社会党保住总统这一孤垒而决一死战，由他所领导的社会党和左翼重建能否成功，现在尚难有定论。从目前看，社会党的发展有两种前景：一是党继续存在，但向社会民主主义演变的进程加快；二是社会党消失，代之以类似美国民主党或者是囊括社会党人、中间派和某些生态学派人士的松散联盟。无论向哪一方向演变，社会党都必须进行理论和纲领的更新，否则，它就难以在法国政治舞台上重振昔日雄风。

## 第八章

# 建设具有革新精神的群众性大党 是重建左翼联盟的关键

左翼联盟兴衰的历程告诉我们，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在 70 年代取得重大进展，左翼之所以能在 80 年代推翻右翼政权，是同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分不开的。而这种合作得以实现，就在于法国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当共产党力量强大的时候，或者说当

权所需要的多数时，与共产党联盟就成为社会党的必然选择。其结果是社会党向左转。当共产党遭到削弱，成为法国政治舞台上无足轻重的力量时，左翼联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社会党就可能抛开共产党，寻求同其他政党的合作，其政治态度也会不断向右倾斜。正如 1987 年 4 月 2 日法国《解放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的：“由于法共力量的不断下降，整个左翼在解决社会危机方面的能力不如过去了。”甚至社会党前第一书记若斯潘在 1987 年社会党里尔代表大会上也承认：“如果法共能恢复自身影响，整个左翼就会更加强大，不仅右翼将难以击败左翼，而且想使左翼失败也更加困难”。所以，重建法国左翼联盟，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关键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共产党。

法共总书记马歇在总结左翼联盟的经验教训时说：“当共产党能够表达它的声音时，左翼联盟就实现了，从而使整个人民运动占据上风。由于它坚持不懈的努力，1989 年，成功地保住了左翼联盟的市镇存在。但是，由于它的削弱，社会党领导人把联盟倒转过来，同一部分右派一道执政，奉行严酷的右派政策。要使左派共同领导国家并奉行左派政策，共产党必须比今天更有力量”<sup>①</sup>。

那么，法共怎样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重新成为一个强大的群众性政党呢？依笔者之见，法共当务之急是应当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回答和解决苏东剧变和新科技革命向共产党提出的新问题，如在整個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共产党能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在法国的前景如何？共产党应当如何回答资本主义新变化提出的挑战，制定出能够吸引广大群众的路綫政策？如何更新观念，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如何根据苏东剧变的教训和本国的现状确立未来社会主义目标？这些问题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向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提出的共同

<sup>①</sup> 马歇：《民主》第 8 章。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向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提出的共同问题。本章将通过总结法共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教训，结合近年法共对自己的路线和政策进行反思后，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和新动向，探讨上述问题的初步答案。

## 第一节 法共为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而斗争

### 一、自由、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理想

仍然是人民的向往和追求

法共 80 年代以来的衰落和苏联东欧剧变后西欧一些共产党，包括力量曾经最为强大的意共改名、分裂，使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西欧共产党将在历史性的衰退中自行消亡”的论调甚嚣尘上，不少共产党人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在法国是否还有前途产生了疑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果真会在西方走向灭亡和消失吗？回答是否定的。

众所周知，导致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危机既不会因科技革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而得到根本解决，也不会因社会主义出现挫折而消失。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存在着经济衰退、高失业率、贸易摩擦，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也在进一步扩大，这些都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并不断加深。

从法国来看，经济滞胀和持久的结构性危机已使失业者达到 300 万人，有 250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收入为最低工资的 1/2）以下，300 万外籍工人处境悲惨，“新穷人”不断增加。就连法国总统

密特朗也承认,在法国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sup>①</sup>。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现实。法国《星期四事件》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几百万法国人在物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贫困,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重又生活在一个正在制造两极分化的社会。随着西欧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将更为激烈,一些企业的倒闭、兼并和转产将造成更多的失业者,致使劳资矛盾更加突出。法国《巴黎日报》1992年3月6日发表的《法国的危机》一文中说:法国目前存在着7种危机:政府危机、政治危机、精神危机、社会危机、心理危机、不信任危机和法国地位的危机。

这种情况说明:“为私人利润而生产必然导致不平等、失业、贫困、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其它许多消极现象。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sup>②</sup>。科技革命尽管使资本主义物质财富日益增加,但经济发展并没有缩小贫富悬殊,也没有消除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填平劳资间的鸿沟。相反,却使工人阶级遭到日益严重的结构性危机的打击,享受不到科技革命的成果。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上和精神上各种正当欲望和权利受到极大压抑的现状,必将强化工人阶级的反抗心理,以新的方式孕育着资本主义自身的否定力量。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维拉尔教授1992年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简史》中译本序言中说:“伴随着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崩溃和苏联改革的艰难,法国共产党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因而未能为社会变革展示出一幅令人可信的前景;但它却继续保持着强大的斗争活力。不仅如此,而且在整个左翼内部,都在开展更多的思考、探索、辩论和会晤活动,试图开辟新的前景。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尽管有人低估其适应和变化能力)因其追逐利润的目的和对人力物力的浪费,是不符合人类的需要和愿望的。法兰西具有人民革命和

①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2年第2辑第77页。

②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2年第2辑第77页。

民主的丰富遗产，正在探索其后资本主义道路。”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仍然具有很大的革命潜力。

恩格斯曾经说过：“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sup>①</sup>。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科技革命引起的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都必然伴随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世界的面貌将会发生划时代的更新。现存的各种社会形态都要在新的文明浪潮中经受优胜劣汰的洗涤。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价值，就在于他们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中，发现了其自我否定的因素，揭示了只有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与生俱来的矛盾。本世纪历史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尽管现在的资本主义同马克思时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分析已不适用于当前的现实，但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无可置疑的。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在私有制范围内对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缓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延长其寿命，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改变其没落的命运，使其永世长存。相反，它却能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奠定物质和文化基础。所以，科技革命是使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最大动力之一。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80年代末，社会主义也遇到了危机，而正是社会主义的危机使资本主义的危机相对地减弱了。但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存在是合理的。正如著名学者贝尔纳所说：“技术的进步，进而计算机的合理使用所带来的集中控制，再也不可能适应这个支离破碎的，充满私利和剥削的社会结构”<sup>②</sup>。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② 约翰·贝尔纳：《二十五年以后》（上），《世界科学》1983年第11期。

技革命所产生的巨大革命力量，迟早要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

科学社会主义从 1848 年在欧洲徘徊的幽灵，变为 20 世纪 50 年代约占世界人口 1/3 的十几个国家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形成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抗衡的强大力量，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巨大生命力。苏联东欧剧变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而是一种不符合现代化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脱离人民实际需要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决不会因为这次挫折，更不会因为敌视社会主义势力的咒骂而改变。人类社会历史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它必然要为一个更高的、更合理的、更公平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一百多年来，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代表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作为富裕、理想、美好社会的象征，已深深扎根于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心中。这正是社会主义历经磨难仍在曲折前进的生命力之所在。

苏东剧变后，法国曾掀起三次激烈的反共浪潮，右翼试图一举清除“西欧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据点”，社会党为了洗清自己也乘机落井下石，叫嚷法共“要么改变，要么灭亡”。法共承受了自建党以来最大的压力，处境十分艰难，然而，它坚持不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改变党的名称。在资产阶级大肆叫嚷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之时，顽强坚持斗争的法国共产党，在 1992 年地方议会选举中仍获得 8% 的选票，制止了近 10 年选票持续下降的趋势。在 1993 年议会选举中又获得 9.2% 的选票，力量有所回升。法共总书记当选为议员，与社会党许多领导人在议会选举中纷纷落马形成鲜明对比。特别是法共保住了 23 个议席（仅比上届少 4 席），可以单独组成议会党团，享受物质和财政补贴，在法国政治舞台上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一事实说明：在法国这样一个贫富差别悬殊、失业不断增长

的社会中，劳动人民仍然需要法共来代表他们的利益，领导和组织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以迫使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考虑他们的利益。法国《巴黎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在《人道报》节上入党的人认为，没有法共，就会出现最严重的贫困。没有法共，社会保险会被取消，星期天必须工作，大批职工将被裁减。要么保留法共，要么出现世界末日。”<sup>①</sup> 法国劳动人民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正是法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具有重要性时，才能取得某些最有利于劳动人民的重大的社会和民主改革成果。如果法共遭到削弱，劳动人民争得的成果就可能被取消，社会贫富悬殊会更加扩大。这是法共能在法国社会中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继续保持影响，并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 二、共产党只有坚持斗争，才能使人民看到前途和希望

法共在苏东剧变后，并没有在严重危机和极度困难中倒下，也没有步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共产党改名解散、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否定自己历史的后尘，而是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明确提出“不能回到资本主义，也不能乞灵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响亮口号。法共指出，以东欧国家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危机，是“发展中的危机”，而资本主义危机则是“制度危机”。社会主义对有关国家的历史发展和整个人类作出了贡献，是有成果的；然而，由于近几十年来，“在苏联和东欧，执政的共产党不是把它们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推向前进，而是给社会设置了严重的障碍。这样一来，它们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损害了社会主义的事业。使得坚持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的斗争变得更加困难”<sup>②</sup>。马歇在 1991 年 9

① 《参考资料》1991 年 9 月 17 日。

② 《马歇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外社会科学信息》1991 年第 17 期。

月《人道报》节的讲话中说：“我们汲取苏联和其他国家以社会主义的名义犯下的罪行和错误的教训，那不是为了放弃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展开这场斗争。”<sup>①</sup>

马歇认为，“我们经历的阶段是悲剧性的。但是我继续相信我的观点。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前途，它不能保证人类的真正幸福，必须用另一个社会取而代之，这个社会应是社会主义。它同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为共产党员的称号感到自豪。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弃这个称号。”<sup>②</sup> 在国际共运陷入低潮的情况下，法共这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顽强的斗争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为了更好地坚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法共采取各种措施纯洁和巩固党的队伍，反击反共和反社会主义思潮。1991年10月至12月，法共在全国开展了党内政治大讨论，全国97个省委总共举办了760场讨论会（原计划为500场），共吸收了12万人次参加，其中1/3是非法共党员。这些人中主要有社会党人、生态学者、工会活动家，以及在不同时期退党的原法共党员。几乎每晚总有10余个或数十个省市在分别举办讨论会，每个讨论会参加者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中央委员大都深入基层参加讨论。讨论不定题目、不划范围，但基本上围绕当前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和许多日常斗争中遇到的问题，如世界向何处去？资本主义胜利能否长久？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还有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局势、法国宪法和选举法的修改、法共对弹劾政府的立场、法共的前途以及总书记马歇的去留问题等。通过讨论，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不能解决法国面临的所有问题，共产党应当继续存在。这次大讨论增进了党与群众的相互了解，密切了党群关系，对缓解国际局势对法共的冲击起到了一

① 《参考资料》1991年9月17日。

② 同上，9月19日。

定的作用。

法共还通过举办党报节，扎扎实实地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宣传党的路线和主张，解释法共与苏共的不同之处以及按照人民的意愿建设法国色彩社会主义的立场，赢得了不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1990、1991年法共举办的两次党报节中，每次都有60多万群众参加，超过最近10年的平均数。两次共吸收党员2万余人，新增《人道报》订户4万多户。连右翼的《费加罗报》也不得不承认，当苏联帝国最后几座列宁塑像被搬倒之时，《人道报》节上的共产党人却屹立不动。此外，苏联解体后，右翼和社会党不能再以“苏联代言人”为靶子攻击法共；法共可以彻底摆脱苏联模式和苏共影响，完全独立自主地探索法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也为法共的复兴提供了有利条件。

1994年1月，法共召开了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法国的国内外环境对法共相对有利的情况下举行的。虽然苏东剧变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共共产党的冲击余波未尽，但法共基本上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开始走出低谷。近年来，右翼政党上台后推行的紧缩政策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社会党目前处在涣散软弱的境地，这些都为法共积极开展工作、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提供了活动余地。党近几年来提出的“开放、革新”的主张日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此外，法国舆论界和知识界中的很多人也从前几年沉醉于苏联东欧剧变的喜悦中清醒过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给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带来奇迹，因此他们的反共喧嚣大大收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经过半年多的充分准备，开得比较顺利。大会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宣言、党纲和新党章三个文件，并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宣言再次明确重申法共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前景”和“建设民主的、自治管理的、使全体社会成员均能全面参与决策的社会主义”，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的口号并坚持党的革命性。宣言还指出，法共需要进一步革新，抛弃教条主

义，吸收各国人民的斗争经验和创造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大会基调是“团结、行动和变革”，会议进程中充满了民主、热烈的气氛，各种观点激烈交锋。所有大会讨论包括领导机构的选举都允许记者和外国代表团参加，这些对进一步树立法共开放民主的形象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由于党章放弃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生活的组织原则，党的领导机构名称也作了相应的改动：中央委员会改为全国委员会，政治局改为全国局，总书记改为全国书记。担任总书记长达 22 年之久的马歇去职，但为保证党的新老交替顺利完成，他应党内再三要求，同意留在全国局内 47 岁的罗贝尔·于当选为全国书记。党的三位老资格领导人未再次进入全国局。这些重要的人事变动标志着法共历史上一个时期的结束，法共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次大会作为法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大会，将会对党今后的发展以及它在法国政坛上发挥的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

法共经受考验、巩固自己的实践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出现危机和右翼得势的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并非不能有所作为，并非必然会由衰退走向灭亡，关键是看党自身是否能够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是否有在逆境中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信心，是否有吸取教训不断改革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法共以令人钦佩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逐渐成熟的党，是一个勇于正视现实、努力使自己适应社会变化的党。如果法共能够在此基础上解决好调整纲领路线和战略策略的问题，搞好党的自身建设，真正成为一支代表未来的力量，那么，摆脱目前的困境，重建左翼联盟，实现法国社会主义的复兴还是大有希望的。



## 第二节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回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

### 一、充分认识实现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纲领政策

一个革命政党的纲领，一种改造世界的理论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程度，它的生命力的强弱，完全取决于它能否客观地揭示当时社会发展的规律，能否正确地指导人民群众的基本实践。能够把握当时社会的最大实际，站在人民群众基本实践前列的政党，其经济政治主张，就会由少数人的声音变成强有力的社会意志和要求，其实践活动必然会由小到大变成不可抗拒的群众运动。总结法共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教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脱离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把同本国国情相去甚远的苏联模式作为制定纲领目标的依据，未能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担当起正确指导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重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法共长期对资本主义适应危机的能力估计过低，把实现社会主义的进程估计过短，把现实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和这些成就对西方国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估计过高。这不能不对法共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所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

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sup>①</sup>。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长时间的经济繁荣以及近年来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也表明：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仍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它在几百年的统治中，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丰富的统治经验，掌握了现代化的社会化生产力，控制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舆论工具，拥有强大的物质手段来维护和发展自己。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过某些调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能容纳一定生产力的发展，远未走到“垂死”的地步；资本主义危机尽管不断发生，但远非到了“社会主义已提上议事日程”的地步；广大人民群众尽管不满资本主义统治，但远未觉悟到能够奋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程度。法共曾经作为法国第一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在法国社会普遍存在反共、恐共的气氛下，其影响社会的能力和作用受到极大限制。加之苏联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未能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显示出优越性，致使社会主义在西方国家人民心目中更加失去吸引力。这种力量对比的现实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还比较缓和的情况下，要在法国这一资本主义的堡垒中打开缺口，实现社会主义，是一项相当长期和相当艰巨的任务。

因此，法共应当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重新估计自己的力量，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彻底抛弃急急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和目标的旧观念，以新的思维分析现实问题，制定符合实际的能够吸引和争取各阶层群众的纲领路线和战略策略。在着手这项工作时，有两个问题是法共首先需要重新考虑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3 页。

第一,需要对参政的得失重新估价。法共从 60 年代起,就把通过左翼联盟争取参政作为自己努力的主要目标,并为此不惜代价。似乎只要能够进入政府,就能“掌握有利条件,使我们的战略在实际中顺利实现”<sup>①</sup>。法共在左翼联盟期间的策略失误,与这种简单化的想法有很大关系。

目前,法国资本主义仍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国际国内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尚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民主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需要法共运用多种多样的手段来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斗争,其中当然包括在有利的条件下参政;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发动广泛的群众运动,组织人民开展反对垄断资本的强大斗争。如果法共低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参政实现社会变革的困难,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参政,不仅不能完成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变革的任务,反而会因参政带来的各种限制束缚自己的手脚,进一步拉大群众的期望值与现实可能性的差距,其结果必然会妨碍人们对变革的内容和条件的认识,加大组织和开展群众斗争的困难。当群众对法共参政所寄予的期望一次次落空,当共产党的部长对人民的许诺每每不能兑现时,特别是当法共为了留在政府中而不得不限制群众运动,支持与自己所宣布的宗旨背道而驰的政策时,法共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特性就会受到损害。而如果法共对政府采取批判态度,又会给人以一种无力发挥领导作用,只会提抗议的党的形象,背上分裂政府的罪名。

看来,今后法共制定战略策略的着眼点不应放在通过与社会党签订上层协议实现有限的参政上,而应该放在团结组织群众,进行各种日常的、具体的反对垄断资本,维护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的斗争上。通过这些斗争启发和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使群众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实现自己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sup>①</sup>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第 134 页

而斗争；以此争取群众的大多数，增强自己影响社会的能力，改变不利的力量对比，为将来的参政以及最终推翻资本统治创造条件。

第二，必须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及其实现手段。苏联东欧剧变说明，各国人民所需要的，决不是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在很多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而是适合本国历史和现实发展的、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前所未有的条件的社会主义。法共二十四大报告承认，我们过去和现在遇到的问题，实际上首先是由于我们党在确定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景和提出比较符合现时期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情况的社会主义制度方面所表现的迟缓，尽管“共同纲领曾经把广大领薪阶层吸引到左翼方面来，但由于我们迟迟不能制定民主和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远景，我们很难争取他们赞同我们的主张”。

70年代末，法共虽然确立了建立“民主的、自治管理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目标，但在具体做法上，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过分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对生产关系的作用，认为国有经济越多越大就越是社会主义。所以，法共把大规模的国有化作为实现民主变革和过渡到社会主义最主要的手段，而把除此以外的一切做法，都说成是阶级合作或者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某种形式。法共二十五大总结说：“我们为使银行和大工业企业实现国有化成为一项重大的权利要求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一旦劳动者接受了这一口号，问题也自然解决了”；结果使“许多人相信只要把企业的所有权转给国家就足以改变一切”，而“关于振兴经济需要使用的金融手段，关于劳动者可能干预企业管理的标准，关于劳动者为有效地工作应该拥有的权力以及真正实现权力下放的问题，所有这些内容全都被忽视了”<sup>①</sup>。而当

<sup>①</sup>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 282 页。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大二公”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使社会主义经济陷于危机的时候，当左翼联盟政府以国有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已被证明并非发展经济的成功之路后，人们对国有化的幻想就破灭了。

目前，在法国许多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眼里，国有化就像贫困化一样是过时的概念。人们往往把法共主张的国有化，同苏联高度集中管理的、缺乏活力和效益的公有制经济等同起来。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法共把国有化作为最主要的经济措施的主张已不再对人民有吸引力。法共应正视现实，从近年来苏东剧变和世界范围内以股份制形式进行私有化改造的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重新思考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在设计社会方案和提出经济政策时，必须摒弃泛泛地谈论“以新型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失业和不平等，实现真正的国有化”，而不涉及保证经济增长手段的旧习，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实现经济发展，克服通货膨胀，增加劳动者就业的措施，使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实现目标的道路，更符合法国的实际和时代的要求，使人民相信，只有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能给法国指明出路，否则，人们就只能把法共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同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联系起来，把法共所要实现的目标与苏联模式联系起来，失去鼓舞和动员群众的作用。

## 二、用创造性的思维回答科技革命发展提出的新问题

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刻认识和深入研究科技革命的最新发展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从当前看，法共迫切需要回答科技革命发展提出的三大问题：

其一，在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如前所述，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一个相对的“非工业化”的过程，即信息产业和科技进步创造的财富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

大。60年代后,法国石油化工、汽车、飞机制造、电子、宇航、通讯、原子能、高分子合成、激光、信息、生物工程等新兴生产和研究部门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使科研人员人数从60年代的数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45万人,工程师和技术员从1968年的72万增加到1982年的106万,并且一直呈上升趋势。在新兴产业中,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已占职工总数的60—75%。在一些尖端企业中,几乎全体职工均为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1974年到1984年,仅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就增加了193.8万。

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使银行、财政、金融、资本流通等从事宏观调控的国家管理部门职能和规模大大扩大,在这些行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数量从1954年的81万增加到1982年的218万,国家公务员增加到236万,其中中高级公务员137万,占58%。从事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福利事业的教师、医生、艺术家、文学家等专业人员从1962年的70万增加到1982年的186万。根据法国政府的计划,90年代后期,传统产业部门的调整基本完成后,高技术产业的比重将会大大提高并有新的突破。有关学者预测,到2000年,整个就业人口中将只有10—20%的蓝领工人。与此同时,在第三产业中从事服务和管理的,以科研人员、中低级管理人员、中低级公务员、工程师、教师、职员为主的脑力化工人则大大增加。科技革命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生产社会化、专业化的发展,拓宽了工人阶级的外延;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具体利益之间的差别,增加了共产党组织工人阶级开展统一斗争的困难。

工人阶级中的新兴阶层,主要是脑力化工人,尽管同传统工人一样,不占有生产资料和资本,靠给资本家或国家出卖自己的脑力劳动来换取工资报酬,但由于他们在文化程度、劳动条件、工资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都高于传统工人,其中少数中级管理人员和公务员在所从事职业的领域内,拥有资本家或国家赋予的部分经营

权、管理权或处置权，这种经济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思想意识上讲究中庸之道。一方面，他们反对剥削压迫，主张社会公正和民主改革，希望摆脱受雇佣的附庸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想维护自己已取得的较高收入，害怕共产党的激进变革会使自己“无产阶级化”。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更倾向于接受社会党的改良主义主张，支持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作用的“自治管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办公室工作取代工厂工作的现代法国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从客观上看，更有利于以新中间阶层和脑力劳动者为主要基础的社会党而不利于以体力劳动工人为基础的共产党”<sup>①</sup>。

认清科技革命带来的法国社会阶级结构的这一变化趋势，对于法共制定正确的纲领和政策至关重要，也与法共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马克思说过，党的纲领是一面旗帜。人们就是根据一个政党的纲领来决定是否拥护这个政党的。因此，法共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争取群众的大多数，就必须在纲领中反映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日前，广义的工人阶级尽管仍占人口的多数，但工人阶级的主体已从蓝领工人变为白领工人。这些人数日益增加的白领阶层，利益和愿望同传统工人又有很大区别。蓝领工人往往把提高工资水平，免遭失业打击作为斗争的第一目标。而工程师、技术员、管理人员则由于有较高的收入、比较稳定的工作以及受过良好的教育，把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保证自己个性自由，参与企业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他们更关心扩大自己的民主权利，对工作有更大的自主权，要求提供自我实现和精神满足的机会。还有更多的脑力劳动者从广泛的社会和国际范围着眼，把和平、环境、人权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列入自己的考虑范围。这就要求法共转变传统观念，调整纲领政策，着眼于工人阶级未来的发展，更好地反映各个不同层次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和

<sup>①</sup> W. 诺思卡特：《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第 24 页。

需求。

然而，我们从第六章的分析中已经看到，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法共，曾长期对科技革命因素作用下法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及其结果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于脑力化工人的特点和要求缺乏应有的重视，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活动范围，都没有真正跳出传统产业工人的圈子。直到 80 年代中期，法共的纲领和政策主要还是维护传统工人的利益；如保护“夕阳工业”中的工人就业、提高最低工资、增加贫困家庭的补助等等，很少具体反映由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公务员、科技人员等组成的庞大的工人阶级新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甚至把新兴阶层对于诸如参与管理、妇女解放、环境问题的关心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要求而不予理睬。法共二十四大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也承认：“希望更好地满足处境最困难的男女劳动者的需要，这种关心是正当的。然而在实际中，这种关心有时却表现为对其他劳动者的需要注意不够，似乎优先考虑意味着排除对其它一切问题的考虑”<sup>①</sup>。这一缺陷使相当一部分白领工人阶层感觉不到法共能反映他们的需要，代表他们的利益，自然也就不会聚集到法共的旗帜下，投票支持法共。到 80 年代中期，法共的选民基础仍然是产业工人。在 1986 年 3 月议会选举中，只有 4% 的自由职业者和高级管理人员、9% 的一般管理人员和 12% 的职员投法共的票。而社会党在这些阶层中的得票率分别为 32%、38% 和 44%。

近年来，法共领导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和政策已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变化，在 1986 年 5 月和 6 月先后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工人阶级的变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认为，“由于科技的发展，脑力劳动在人类活动中所占的比重、高技术水平的劳动者的地位将不断扩大，科学技术已成为物质生产的基础”；“工人阶级的范围、地位和作用在扩大和更加多样化，不能把工人阶级仅限于

<sup>①</sup>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第 97 页。



工人。粗工、专业工人、熟练工人、绝大多数技术人员，一部分工程师和列为职员领薪者，都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工人阶级的队伍包括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变化，必将导致两者的结合”。因此“过去所提的让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老的概念已经过时，而是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每个人在其中都有自己的位子”<sup>①</sup>。

为了改变由于阶级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社会基础缩小，力量衰退的状况，法共进一步调整了自己的阶级路线和战略策略，加强了争取白领阶层的工作。法共强调：“我们应当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为什么必须承认工人阶级在民族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此同时，也注意关心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处境的劳动者所遇到的问题。重视所有人的利益和愿望。”<sup>②</sup>同时，法共也认识到：“人们希望有更多创新的自由，有更大的革新和创造才能。技术员、工程师要求发挥更加负责、更加有效的作用的愿望，是实现联合的真正基础。如果看不到他们的愿望，就是忽视了主要问题。”<sup>③</sup>如果法共能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认真倾听新兴阶层的呼声，仔细研究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并在制定新的纲领时，增加超前性和预见性，既“优先”表达工人阶级的利益，使这一阶级在最迫切的权利要求方面得到满足；又充分反映新兴阶层的利益和愿望，使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体现科技革命发展的趋势，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那么，法共就不仅能够“在那些由于经济危机和执政集团的政策而承受更大苦难的阶层中得到积极的支持”，而且会得到受垄断资本排挤和打击，要求改善自己处境，争得更多政治经济权利的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的拥护。这样，法共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阶级结构变化造成的

① 《共运资料选译》1986年第10期第43—44页。

②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第97页。

③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第297页。

不利影响，使其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其二，如何处理工业结构改组和大量工人失业的矛盾。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克服结构性危机，增加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更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法国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结构改组，积极采用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发展新兴产业，造成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这是科技革命发展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现象。过去，法共从维护传统工业工人利益出发，一味反对工业结构改组，笼统地指责政府政策加重了失业，甚至提出“不能容忍再增加一个失业者”的要求，这显然是脱离实际的。从长远看，新技术代表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调整产业结构，采用新技术，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机器的生产能力，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会解放人的大部分体力劳动，使劳动者的转型，即由体力型转向智力型成为必要和可能，创造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条件。总的看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社会进步的性质，也是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的。为保证充分就业而反对技术进步，为满足工人的眼前利益而忽视国家以至于广大群众的长远利益，显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以此为出发点制定自己的政策，不仅得不到对技术进步抱有积极态度的新兴阶层的支持，而且也得不到大多数工人的拥护，因而是不可取的自杀性政策。

所以，在西方国家经济普遍衰退、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法共应当放弃盲目地支持下层工人群众一切要求的做法，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支持政府采用新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扭转经济衰退的努力。如果为了保护工人暂时不失业，生活水平暂时不下降，而一味反对政府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只能使法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落后的地位，导致更多企业亏损关闭和更多的工人失业。

当然，承认工业结构改组对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并不

是说法共应对大批工人的失业熟视无睹，听任企业主以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办法进行工业结构的改组，放弃维护工人利益的斗争。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如何在产业结构改组的情况下更好地体现自己的阶级特性，的确是个不小的难题。能否回答好这一问题，对于法共能否赢得数百万受失业之害的下层群众支持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法共不能只用简单化的批判和否定政府政策的做法来显示自己的存在，表达自己的立场。对法共来说，重要的是针对产业结构改组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建议，采取更为现实和更有效的对策，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如在支持采用新技术调整产业结构的前提下，领导工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通过劳资谈判、工会与政府谈判以及适度的游行示威向政府和资本家施加压力，力争达成既有利于工人阶级，又能使企业主接受的协议；通过支持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斗争，迫使政府和企业主在采用新技术的同时，加强对工人进行技术培训，使他们尽快掌握与新技术相适应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以适应产业结构改组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妥善安排好失业工人的生活，采取提供更多新的工作岗位等措施，增加工人就业机会，缩短工人的失业时间。同时，利用各种形式揭露和抨击雇主方利用劳动力“过剩”，人为地压低工资，加重对工人剥削的行为，尽可能地减少产业结构调整对工人阶级的损害，使工人阶级更多地分享新技术带来的好处。

其三，如何应付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挑战。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苏联的解体，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进步加速。这是垄断资本主义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欧共体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又一次大调整，它使欧共体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更加密切的联系，为用政治和经济手段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加速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据欧共体委员会估计，由于统一大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整个欧共体的国民生产总值

1993—2000 年年均增长率将达 4—7%，出口将增长 10%，商品价格将下降 6%，并将创造 200 万个就业机会。这种“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发展趋势正如列宁所说：“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转变……”并且是“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最大动力”<sup>①</sup>。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一体化，将为社会主义在更大的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创造更直接的客观物质条件。

但不容乐观的是，从目前看，西欧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欧洲左翼联合的积极倡导者意共的分裂，更加削弱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在一国和欧洲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在西欧各国共产党还未能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对付联合起来的西欧资产阶级势力的情况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自然会大大加强作为一体化主要推动者的垄断资本势力，使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共产党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变得更加困难。

这一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任何想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发挥作用的政党必须考虑的。法共过去长期对于欧洲一体化持消极态度，竭力反对扩大欧共体，反对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未能提出具体的、明确的、积极的欧洲政策来对付欧洲一体化的挑战。80年代后，法共对欧共体采取了比较现实主义的态度。马歇在法共二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当我们对现实和未来进行思考时，不能不考虑到法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这种状况。作为欧共体的成员，法国在一切场合坚持维护自己的行动自由和正当的民族利益的同时，可以而且应当为建设一个民主的、真正独立的和向世界开放的劳动群众的欧洲发挥积极作用。”<sup>②</sup>当然，由于法共自身力量的局限，由于欧共

① 《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11 页。

②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第 47 页。

体内各国共产党对于一体化的尖锐分歧，欧洲各国共产党目前很难在这一问题上协调立场。法共也难以对法国的欧洲政策施加重大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共可以忽视或回避这一问题。面对欧洲一体化趋势的发展，法共必须在制定纲领和政策时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相应的对策，谋求在一体化的范围内更好地维护民族的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作用。否定以至反对这一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对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进行集体的宏观调控，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一体化进程，只能使自己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丧失应有的社会影响和领导作用。

### 第三节 正确认识和处理与社会党的关系 建立反对垄断资本的广泛联盟

#### 一、认清同社会党伙伴与对手的关系，

#### 坚持联合与斗争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革命是大多数人的革命，能否实现人民多数的联合，是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问题。在法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联盟问题更是法共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我们从前面对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进行的分析中已经看到：“事实上，共产党几乎别无选择，第五共和国的制度对它要比其他政党更为不利；在所有政党中，它难能指望在爱丽舍宫中会有它自己的候选人的安身之地。选举制度迫使它一定要同其他政党结成联盟；根据它在政治舞台上所处的地位，它只能同社会党结成联盟”<sup>①</sup>。这就使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联盟，特别是与社会党的政治联盟，成为法共过去、现在

<sup>①</sup> 拜伦·克里德尔：《法国社会党》，《西欧社会民主党》第 47 页。

以至将来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如前所述，建立联盟本身就包含着利与弊的双重性。一方面，与社会党建立联盟是客观形势的要求和法共自身的愿望，有利于法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同社会党结成联盟，“又无可避免地会冲淡共产党的独立性和身份”。所以，对法共来说，需要解决的不是要不要建立联盟，而是在必须走这条路的情况下，如何趋利避害的问题。

法共在左翼联盟破裂后进行总结时指出：“我们党同社会党以共同纲领形式实现的联盟，制造了幻想和混乱，导致了我们的后退”<sup>①</sup>。法共认为，共同纲领的战略使“三次代表大会（从二十二大至二十四大）所具有的伟大的革新意义被大大地削弱了。同当前现实相联系的政治上的迫切需要，特别是不断被人们提出的我党与社会党的关系问题，压倒了我们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它推迟了全体共产党人对我们决定对主要战略进行革新的全面掌握”；“这种战略革新以难堪的方式表现为我党的革命特性遭到削弱”<sup>②</sup>。这种分析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把自身的衰落都归咎为共同纲领和左翼联盟，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自己 1958 年以来的主要实践，因而是简单的和片面的。法共的主要教训不在于签订共同纲领和寻求左翼联盟本身，而是由于法共在从事这一活动中策略失误和做法失当，非但没有充分利用左翼联盟的“利”，反而加重了其有害的一面，结果削弱了自身，使对手受益。这已在第六章做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1984 年后，鉴于左翼联盟已经破裂，法共在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法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基础上，放弃了单纯同社会党签订上层协议，建立联盟的做法，提出“从事劳动和创造的各种力量在明

<sup>①</sup> 《人道报》1984 年 9 月 20 日。

<sup>②</sup>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 285 页。

确的目标下组成一个行之有效的新的联合”。法共认为,这是“一个比过去的联合更加广泛、更加巩固、更加持久和更加负责的联合,一个能出色地进行法国所需要的变革的联合,这就是新的多数民众的联合。我们把这件事作为我们的一项中心工作”<sup>①</sup>;“这一联合不是我们党在历史上曾主张过的那种基层联合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与今天的需要和可能相适应的联合形式”。法共主张的多数民众的联合,不是号召其他阶层同工人阶级结盟,或者寻求降低条件的妥协,把克服矛盾、解决危机的实质问题推到以后,而是面向具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哲学、政治或宗教信仰的所有劳动者阶层,在具体问题上寻求团结和一致点。也就是说,要在车间、办公室、工厂、银行和实验室实现联合,在居民区、城市实现联合,通过发展多数民众的斗争,把人们广泛地动员起来,不断扩大民主的成果和阵地,纠正只搞上层协议,没有群众参与的错误。

法共新的联盟政策一方面吸取了过去单纯追求与社会党达成上层联盟的教训,强调要在基层通过与各个阶层对话,找出一致的和共同的东西,联合、团结社会党的选民和劳动者,以使他们同共产党的选民共同行动;另一方面,也表示不放弃左翼联盟,并随时准备与社会党就选举等具体问题达成协议,这就使法共的联盟政策更全面,更具有现实性。但要使这一政策付诸实施,法共需要在策略上处理好以下两个问题:

1、处理好多数民众的联盟与社会党联合的关系。共产党和社会党作为同源于工人运动,代表中下层群众的左翼政党,是民众多数联盟的主体。共产党和社会党建立政治联盟,是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主力量实现联合的重要条件。共产党影响着体力劳动者的多数,社会党影响着脑力劳动者的多数,撇开同社会党的某种形式的合作去寻求实现多数民众的联合,恐怕决非易事。正如国际共运

<sup>①</sup>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 309 页。

的历史证明的，上层和下层是密不可分的，在两党上层互相敌对和攻击的情况下，实现基层党员和群众的联合是非常困难的。

目前，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民的大多数与垄断资本的矛盾，而不是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矛盾。人民群众无论支持哪个党派，其共同的敌人都是垄断资本，而左翼联合是对付大资本最有力的武器。法共在实施多数民众联合政策时，必须正确处理与社会党的关系，特别是应该抓住目前社会党与右翼矛盾加深的契机，努力同社会党在反对资本斗争上达成共识，实现一定程度的联合。而决不能因噎废食，消极地接受左翼联盟失败的教训，把由于自身策略失误和客观因素造成的力量下降，完全归咎于左翼联盟。社会党虽然是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政党，推行非科学的民主社会主义，但它提出用民主的方法限制大垄断资本的权力，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改善人民生活，扩大民主权利的主张，使它不仅在中间阶层中，而且在广大工人中也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只有正确处理与社会党政治联盟的关系，才能争取到广大群众，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团结，为建立多数民众的联合创造条件。如果法共排斥与社会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就可能失去社会党影响下的左翼群众，包括各个不同利益阶层、不同政治信仰的“新的多数民众的联合”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近年来，法共在处理与社会党的关系时，吸取了过去把变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与社会党上层建立左翼联盟上的教训，放弃了一个共同纲领、一个有共产党部长参加的左翼政府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幻想，明确宣布：“把我们主张的民主道路看作就是左翼联盟，把参加政府和多数派看作是我们战略的必然的和最终的结果，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战略只有一个目的：变革社会”<sup>①</sup>。所以，“我们不会把寻求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上层协议放在第一位，不会

① 《人道报》1984年9月20日。



让这种做法来削弱我们的工作。”另一方面，法共也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和做法，提出：“法国政治生活现在和将来都是多元化的，这在共产党人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观念中也是如此。因此，新的多数民众的联合同左翼联盟不是对立的。我们仍然坚定地赞成左翼联盟，但是由于我们严肃地吸取了经验教训，我们现在以一种新的联盟观念来看待这个问题”<sup>①</sup>。

马歇明确指出，法共不会把自己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在选举运动中。对法共和它的党员来说，主要任务是在所有领域捍卫受目前政策之害的人们的利益。本着这种精神法共在所有存在左翼联盟多数的各级议会中坚持合作，以实现对人民许下的诺言。本着同样的精神，法共宣布：“我们今后一旦有可能依然准备同其他政党，特别是同社会党达成政治协议”；“这些协议可以作为民主运动所需要的政治延伸，但是无论如何它们不能代替和限制民众运动，不能把它们变成协议的附属物。签订政治协议的时机以及协议所涉及的范围应根据这些要求来具体确定，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其置于首位的民众运动的永久的创造性和活力不会受到妨碍。”<sup>②</sup>

2、处理好联合与斗争的关系，避免极端化倾向。这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从法共的实践看，在处理与社会党的关系时易走极端，强调联合时不惜代价，只看到一致性；出现分裂时又一味否定，进行过火的、不实事求是的指责和批判，仍然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法共在左翼联盟期间遭到的重大挫折，同它在处理与社会党关系上的极端化态度有很大关系。第六章提到的 1974 年和 1977 年法共对社会党态度的突然变化并对其发起的猛烈批判，就是典型的例子。

1981 年，法共在参加联合政府初期，曾高度评价并积极支持

①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 313 页。

② 同上。

社会党的政策。在 1982 年召开的二十四大上,马歇说:“我们高兴地看到,政府的活动体现了近年来我们曾同劳动者一起进行重要斗争以争取实现的那些主张和愿望”。他还说,党对政府一切领域的工作,“不是要指责,而是要解释,不是去批判,而是要建议。不光要解释和建议,而且要建设,获得成果和具体落实,每个共产党员的言行都应该是作为多数派一员和政府的代表”<sup>①</sup>。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推动社会党执行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当法共因抗议社会党的紧缩政策而退出政府后,又完全否定了自己的参政实践和社会党的成绩,表示“我们根本没有参与过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和管理”<sup>②</sup>,并指责说“社会党在执政时期实施的以及他们打算在将来实施的许多内外政策都与右派的政策和方案不谋而合”。这种极端化的做法,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感。

的确,法国社会党在 1982 年后,迫于经济危机的压力,采取了与保守主义相似的克服危机的经济政策,寻求与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妥协,出现了向右转的趋势。但无论从其纲领声明,还是它执行的社会政策方面看,毕竟与右翼有着明显的区别。如 1987 年社会党里尔代表大会决议就严厉批判了右翼的政策,认为:“右翼的社会发展计划不仅是保守的,而且是反动的。它使权力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它在经济上实行自由主义,它推行社会倒退政策,恢复特权”。决议提出社会党的斗争目标是:“争取社会经济的增长,使经济现代化,为就业而斗争。维护和改善社会保险制度。调整对资本收税和对劳动者收税之间的比例关系,恢复大财产税。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反对不平等”<sup>③</sup>。可见,把社会党与右翼相提并论,认为“今天,法国的右翼势力和社会党无论在经济领域或在社会领域里都

①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第 44 页。

②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 309 页。

③ 《人民日报》1987 年 4 月 5 日。

作着同样的阶级选择”的看法是片面的。这种态度，显然不利于争取社会党的选民，也不利于实现与社会党的有限合作。

目前以至未来的相当时期，无论法共采取什么样的联盟政策，都不能回避同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的社会党的联合与斗争。法共应该吸取左翼联盟的教训，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社会党进行具体分析，既要看到它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本质，也要看到它在反对垄断资本，维护中下层人民利益等方面的积极因素。在反对当前主要敌人的斗争中，法共应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同社会党在某些有共同看法的具体问题上实现联合行动；只要法共采取正确的策略，将联合和斗争有机结合起来，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同社会党的关系，就可能在反对右翼保守势力，争取实现人民群众当前利益的斗争中同社会党达成某些一致。如果法共感情用事，对社会党笼统否定，一概骂倒，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适得其反，损害自己的形象。

## 二、努力争取新兴阶层，以正确的方针

### 推动多数民众的联合

法共根据法国劳动人口中 85% 都是领薪者的现状，提出建立“新的民众多数联合”的口号，这是一个大胆和宏伟的设想。但是，实现这一目标对法共来说决非易事，其中最困难的就是如何争取新兴阶层的问题。

如前所述，科技革命的发展使以科研人员、中级管理人员和公务员、工程师、技术员、教师、职员为主的白领阶层已占法国就业人口的半数以上，而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则下降到不足 30%，所以，人们把法国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法国著名学者莫尼克·达索在《阶级更迭》一书中说：“作为现代社会最进步的力量，新阶级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一切人类解放的源泉，它将走在历史前面而

成为现代化的体现者。正如资产阶级在 18 世纪末相对于贵族阶级那样。”这种说法尽管未必准确，但足以说明以脑力劳动者为主体的新兴阶层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

在法国，选民分成势均力敌的两大阵营由来已久。左边以工人为核心，右边以企业主为骨干，而中间阶层居中游动。“中间阶层本身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它的摇摆性。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时而同人民群众，时而同统治者结成联盟。<sup>①</sup>这里的中间阶层主要指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雇佣脑力劳动者，正是他们的这种浮动，决定着大多数选举的胜负。80 年代初，由于中间阶层在左翼联盟的旗帜下左转才使左翼上台执政。而目前，中间阶层的右转又使右翼重新上台。所以，能否争取到新兴白领阶层的支持，是法共能否实现“新的多数民众联合”的关键。

在新兴阶层中，包括职员、技术员、工程师以及中下层公务员在内的大多数，都是受雇于国家或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这种被剥削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是现代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脑力劳动者加入工人阶级队伍，一方面增加了工人阶级的数量，使工人阶级日益同先进的科学技术直接结合，提高了他们的素质，保持了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特性；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概念的拓展，也引起了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削弱了工人阶级传统的集中性、统一性和组织性。上述情况都给法共联合群众的大多数带来了不利影响。为了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统一，争取新兴阶层，法共需要在思想观念和方针政策上实现下列转变：

- 1、改变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承认并重视脑力劳动者在反对资本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传统观念认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集团，总是依附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在资本主义

<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 2 辑第 75 页。

社会，由于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生产和管理中的地位较高，就业稳定，工资收入大大高于工人阶级，因此，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往往站在资本主义一边，是资本主义社会享有特权地位的“特殊阶层”，充其量也只能是无产阶级团结教育的对象和同盟军。

然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科技革命的发展，使知识分子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智力劳动物质化、物质劳动知识化和社会生产进一步专业化、集约化的过程，既是知识分子从管理和决策参与者变为执行者和服从者的过程，也是他们丧失特殊地位，彻底沦为脑力化工人的过程。如果说传统工人阶级是大机器的附庸的话，那么，脑力化工人则成为电子计算机等更为先进的生产工具的附属品。这种变化使他们在劳动方式和社会地位方面更接近工人阶级，他们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也更为尖锐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工会和政党，投入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也是社会党和法国工人民主联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特别是 80 年代后，法国结构性的经济危机使脑力化工人也经常遭受失业的威胁，如 1984 年雷诺公司裁员 13500 人，其中近一半是工程师和技术员；1991 年，管理人员失业人数增加 32%，技术人员和基层管理人员失业人数增加 25.2%，职员失业人数增加 12%；干部失业率增长 30%，1/3 的干部担心失去他们的职位。社会的变化和危机的发展，使以工资为生的大多数脑力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同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之间正在出现相似之处。失业和低购买力不仅是工人和职员的问题，而且技术员和干部、工程师也都面临失业和购买力下降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时期，这些人成批地参加改造社会的斗争是可能的。1986 年法国公共服务部门的全国性罢工，1991 年 9—12 月，医务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电子技术等部门的脑力劳动者的大规模罢工和游行，都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脑力劳动者正

在成为反对资本斗争的重要力量。

可是,法共在 1982 年的二十四大上仍然认为:“各类脑力劳动者由于他们的社会成分、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会低估所遇到问题的阶级内容,往往把同工人阶级的联盟看成是一种骗局”;知识分子“向往变革和惧怕变革之间的矛盾表现的特别复杂”<sup>①</sup>。对知识分子的这种不信任,必然会把在新兴产业和管理部门的脑力劳动者推到政治对手的阵营中去,使法共争取群众大多数的目标成为泡影。

所以,法共必须摒弃把脑力劳动者排斥在工人阶级之外,贬低他们在民主变革进程中作用的错误观念,正视白领工会将会取代蓝领工会地位的趋势;抛弃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注意发挥他们在当前和未来在反对垄断资本斗争中日益增长的作用。法共在 1986 年召开的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中央全会上已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的活动大大发展,已处于社会活动的中心,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没有他们就谈不上民众的联合”;“没有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有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变革”<sup>②</sup>。这种态度对法共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无疑是有益的。当然,要使多数知识分子在法共主张的道路上前进并非易事。他们对法共有成见,在当代一些重大问题上同法共有分歧。有的认为只有削弱法共,才能为建立一个现代左翼开辟道路。法共要把新兴阶层的大多数争取到民主革命的斗争中,就应当一方面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指出他们所遇到问题的阶级性,尊重他们的特点,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支持他们利用自己在科技文化领域、生产管理过程、国家行政机关、各级立法机构中的优势,在更高层次上开展斗争,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通过谈判、

①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第 139 页。

② 《国际共运资料选译》1986 年第 10 期第 44 页。

立法以及同工人的共同斗争等方式，为新兴阶层自身以及其他阶层争取更高层次的利益和更多的民主权利。通过共同斗争，增加法共知识分子的相互信任和理解，启发脑力劳动者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深入了解法共变革社会的政策，进一步认识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雇佣地位，从而逐步接受法共的社会主义目标，投身到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去。

2、转变传统的联合概念，使不同的阶层在联合中充分占有自己的位置。过去，法共从传统的、唯工人主义观念出发，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所以，在寻求建立联盟时，往往是“号召和要求其它阶层去同工人阶级实行联合，号召其它社会阶层放弃自己的愿望”<sup>①</sup>，使其他政党或阶层在联盟中处于从属地位。这样的联合很难让人心悦诚服、欣然接受，即使勉强实现联合，也极易破裂。法共在总结传统联合形式的教训后，在二十五大会上提出：超越传统联合的做法，放弃让“其它阶层同工人阶级结盟”的旧概念，实现多数民众的大联合。这一联合的特点是尊重各个阶层的不同特点和不同利益，不要求参加这一联合的人都同意法共的观点。法共指出：“多数民众联合的基础不是我们党的各项政策，而是可以作为反危机措施的每一个建设性建议。参加者也不是在每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观点的差异、意见的不同不应妨碍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危机。我们要特别考虑到我国劳动界和整个有生力量最新的变化，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某些做法和习惯，给我们的群众工作以新的生机和风格。不要为多数民众的联合搞什么纲领，但可以找出真正共同的利益，确定行动的目标”<sup>②</sup>；“在哪一点上一致，就在那一点上搞共同行动，让人们从这些行动目标中具体领会到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前景。当前，实现联合的斗争目标是就业和经济增长。法

①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第 298 页。

② 《人道报》1984 年 9 月 20 日。

共要在这一过程中，针对所提出问题的实质，持续地进行一场有说服力的政治和思想斗争”<sup>①</sup>。这是法共对联合基础和联合概念认识上的一个重大变化，更为符合不同阶层的实际觉悟水平。

目前，法共的联合观念和联合政策正在转变和调整过程中，完成这一任务，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能否通过这种形式推动人民多数联合的实现，也还要经受实践的考验。

## 第四节 建设一个具有革新精神的群众性革命政党

### 一、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发挥

#### 先锋队的领导作用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担当起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就在于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依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引导革命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起来，是党的领导正确性和科学性的根本保证。诚如法共指出的，“没有我们的党，没有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者用战斗、探索和牺牲造就的党，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是不可能的。”<sup>②</sup>但如果共产党不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同样不可能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取得成功。

法共在党章中明确宣布：“党的理论活动和实际行动都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并被列宁及工人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家

<sup>①</sup>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第 297 页。

<sup>②</sup> 马歌：《让我们说实话》第 149—150 页。



发展了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依据的”；党的领导作用只有通过“在每个阶段为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发展指出前景，为此目的而提出一些必要的措施，推动并组织社会运动向前发展”；“通过在日常活动中具体体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和对人民利益的忠诚”来实现。然而，宣布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并不等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意识到党应该在制定纲领和日常活动中表现出远见卓识，并不等于具备了这种能力。理论与实践，愿望与现实，英勇斗争和实际效果之间的距离与矛盾，贯穿于法共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的始终。这些现象都反映了法共从成立之时至今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重大缺陷，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和思想水平不高。这正是法共长期以来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的主要原因，也是法共 80 年代以来不断衰退的悲剧所在。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巴黎第十大学校长拉卡比教授在谈到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原因时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一开始就遇到困难，这就是工运中心主义在法国工人运动中根深蒂固的存在。30 年代以前，知识分子一直遭到不信任，并被视为资产阶级。法共领导人从来没有一个是出身于知识分子的。这在世界共产党中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下，法国共产党缺乏一个独立的坚强的理论基础。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官方哲学则对法共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斯大林领导下编写的、一定程度上把马列主义某些原理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和模式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法国一版再版，对法共干部和党员的教育起了很大作用”<sup>①</sup>。

在斯大林时代“左”的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期成长起来的，并在法共党内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多列士、杜克洛、弗拉商等人，并未很好掌握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sup>①</sup> 《马史思主义与现实》第 2 辑第 70 页。

观点和方法，而是把马克思列宁的一些具体结论和苏联的经验奉为神明，机械地照搬到法国，以此指导法共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法共从未有过像葛兰西、陶里亚蒂、卡德尔等具有一定独立见解和理论建树的理论家，这不能不影响从领导到党员群众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阻碍法共对使世界进入新时代的基本要素进行深刻的理解，并对当代现实的需求作出恰当的判断。正是由于法共未能真正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正确科学地分析形势和预见社会各阶级变化的新趋势，并以此为依据制定自己的纲领和政策，才在 50 年代后西方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面前陷于被动。

法共在自己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一方面反复声称自己的“政治路线始终是正确的”，“在争取正义、自由、法国劳动者和人民的解放、人民力量的联合、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以及世界各国劳动人民之间和平与团结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正确的一边”<sup>①</sup>；另一方面，又常常在事后承认“我们犯了错误”。“在将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们或多或少地做了不符合法国实际的外国模式的俘虏”。在同社会党实行左翼联盟期间，法共把左翼联盟看作是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在 1985 年联盟破裂后召开的二十五大上，又全面否定了左翼联盟的理论与实践。这些表现不能不使人们对法共担当领导的能力产生怀疑，导致法共的威望不断下降。正如法国报纸在评述法共力量下降时说：“法共在成为现代化祭坛的牺牲品之前，首先当了自己的牺牲品。失败自有其深刻的根源和久远的原因。谁都可以列举它所丧失的机会。1956 年、1968 年、1978 年，政治局一次又一次使知识分子、大学生和中间阶层陷于失望。”<sup>②</sup>从主观上说，这同法共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① 《让我们说实话》第 57 页。

② 《共运资料选译》1985 年第 8 期第 10 页。

认识社会的变化和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法共当了“自己的牺牲品”，这种说法尽管尖刻，但不无道理。

法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和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确是最坚决、最勇敢、最富于牺牲精神的战士。然而，探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单凭良好的愿望和满腔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固然不能充当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仅仅在纲领中宣布信奉马克思主义，表白自己是起领导作用的先锋队，而在理论和实践中却缺乏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具备的较高的思想理论素质和行动能力，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提出的实际问题，同样难以担当起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重任。法共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如果革命党不能提出主张和建议，如果它不能提出社会变革的方案，它不努力赢得人民的支持，提出社会新远景以实现这一方案，它就不能起到先锋队作用，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当然，我们指出法共在理论修养方面的缺陷，并不是否定法共在学习运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革命斗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也不是说只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料事如神，不犯错误，解决一切问题。客观事物是复杂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由浅入深，接近真理，也有一个过程，并且受各种客观环境条件的制约。但作为党本身，决不能以此为理由为自己的失误开脱责任。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曾经说过：“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学科向前推进。”<sup>①</sup> 对于法共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82 页。

来说，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仅意味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求能够根据自己新的探索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前进。这是一个革命政党永远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带领群众前进的保证。

在最近几年召开的几次代表大会上，法共已认识到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马歇在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提高主动开展活动的的能力，提高意识形态斗争的水平，就要求每个党员具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有更高的政治和思想水平；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必须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深入地思考问题，创造性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这是非常可喜的。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才能彻底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不犯或少犯错误，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审视自己的路线和政策，争取群众大多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开辟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

## 二、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革命导师列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总结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思想，把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概括为民主集中制。其核心就是坚持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是党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法共从成立之日起，就把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1979年法共二十三大的党章规定：“为在社会中发挥革命作用，法国共产党有它自己的生活准则，使它能够民主地制定和发展党的政策和理论研究；确保党员的行动一致，从而保证党的政治活动光明正大和卓有成效；民主集中制是确定党内生活准则的基本

原则。”<sup>①</sup> 党实行集体领导,党内不允许存在任何派别,所有组织必须执行上级领导的决定。法共认为,民主集中制“对我们这样的党来说,是避免最坏的东西——行动瘫痪的一种方法,它确保所有共产党人的行动一致。它使劳动者和我国人民确信我们党只有一种声音,一个政策”<sup>②</sup>。“民主集中制可以保证多数人的决定得以贯彻,同时使每个党员保留自己的意见,并在本支部和他所属的党的其它机构内维护自己的意见”,从而保证党的行动能力,提高党的战斗力。它完全不同于党内允许立派的做法。如果允许党内派别存在或试图树立派别,那只会使政治讨论变得贫乏,内部争吵加剧,助长用领导人或集团的利益,派别的纪律来取代全体党员为了达到全党在政治路线上的统一行动所展开的自由讨论,悲剧性地削弱党内的民主,使党丧失发挥先锋作用的能力,损害党行动的效力。所以法共强调:“自由深入地进行讨论,根据多数意见做出决定,全体党员一致执行,允许保留不同意见——这些重要的准则确定了我们唯一的组织方式。对于一个正在进行革命斗争,因而需要真正民主生活的党,这一组织方式是符合其要求的。因此,这也是共产党所特有的运转方式。”<sup>③</sup>

法共的上述规定和论述,将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较好地体现了马克思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思想。然而,同整个国际共运一样,法共在实际贯彻民主集中制时,常常受到“左”的或右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宗派主义的影响,往往过分强调集中,强调思想和行动的一致,而忽视甚至扼杀党内的自由讨论以及不同意见的交锋。在制定路线和政策以及各级领导人选举上也缺乏真正的民主机制,动辄用组织手段对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扣上机会主义和修

①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汇编》(上)第 424—425 页。

②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 302 页

③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第 148 页。

正主义的帽子进行纪律制裁，甚至开除出党，严重侵犯党员的民主权利。1970年的加罗迪事件便是法共党内缺乏民主的一个典型事例。

加罗迪 1956 年就是政治局委员，长期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是法共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领导人。60 年代后期，他在自己的几本著作中，批评苏联模式和斯大林的错误，主张多党制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受到法共中央的批判。在 1968 年出版的《争取法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一书中，加罗迪分析了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指出：科技革命正使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科技革命在法国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处于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中，并导致由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新的历史性集团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正在成为主要的生产力。加罗迪还认为，“由于科技革命，官僚集中制已经过时，党的决定性任务是发挥创造性，制定方针。”为此，“法共必须摆脱集中制，独裁制和官僚制”；“彻底改革组织制度，建立干部的轮换制，通过彻底公开的讨论实现党内民主”；“允许各种不同倾向，在大多数人的决定做出后，各种倾向可以继续保留自己的观点”。加罗迪强调：“必须明确宣布，法共在法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不是勃列日涅夫今天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的那种社会主义”；苏联应当“作真正的改革，从而赋予社会主义以真实的面目，即把人和劳动从一切漠不关心中解放出来”。他号召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在科技革命提出的现实问题面前不要闭目塞听，否则他们将堕落后为固执地宣传苏联是社会主义唯一模式的小宗派。

加罗迪的这些看法，尽管在某些方面有失偏颇，但从总体上

① 罗歇·加罗迪：《社会主义的伟大转折》，《欧洲共产主义的渊源》第 251--252 页。

说,他通过总结“五月风暴”的教训,分析科技革命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如何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扩大党内民主问题,摒弃苏联模式,确立法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问题。这些都是很值得法共认真考虑的独到见解和建设性意见。然而,法共却武断地把加罗迪的意见说成是“过分强调技术的变化,损害党的工人阶级特性,主张派别活动”<sup>①</sup>。

在 1970 年法共十九大上,加罗迪的观点被谴责为“修正主义”“取消主义”和“反苏主义”受到无情的批判。加罗迪在会上发言说:“我拒绝这样的论点,把任何公开讨论或政治分析的尝试都当作搞分裂的呼吁。这种方法必须改变,这些问题必须解决。”<sup>②</sup>最后,他被撤销了党内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同年 7 月,法共领导机构又将不同意党的教条主义政策、反对捷共对布拉格之春的参加者进行镇压的法共创始人之一、1936 年起便是政治局委员的夏尔·狄戎开除出党。

法共这种把一切不同意见都看作是派别活动加以禁止,践踏党员民主权利的做法,堵塞了言路,扼杀了党内新思考的萌芽和党员参与党的事务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助长了各级党组织对党中央领导的权威和立场唯唯诺诺,对党的文件和指示不加思考、不问对错照抄照搬的恶习,使党的领导难以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对加罗迪的批判,使党丧失了抛弃传统观念,调整路线政策,利用科技革命提供的可能性在知识分子和新兴产业中扩展党的影响,壮大党的队伍的最佳时机。结果,直到 6 年后的 1976 年才实现了战略的转变,10 年后才真正认识到知识分子和新兴阶层的作用,大大落在了社会党的后面,造成了严重损失。法共党内生活集

① 麦·阿·德雷斯:《法国共产党》第 200 页

② 罗歇·加罗迪:《社会主义的伟大转折》,《欧洲共产主义的渊源》第 251—252 页。

中有余、民主不足还表现在常常在未经讨论，甚至不作出合理的说明和解释的情况下，突如其来地改变政策。如接受核打击力量、同意欧洲议会直接选举（这些都是法共多年来一直坚决反对的），都是由党的领导人在电视或电台宣布的，党员只是通过舆论媒介才了解这些变化。

缺少自由讨论的气氛和不同意见的交锋，不仅阻碍了法共领导吸取各方面的意见做出正确决定，而且即使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

1976年召开的二十二大，是法共从追随苏联模式到确立独立自主路线的重大转折。但由于法共长期把苏联视为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试金石的教育，在不少党员头脑中根深蒂固，在实现转变时又没有经过自上而下的讨论，全党对这一急剧的变化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因而“二十二大在党的领导中，也在党内引起抵制。对很多人说来苏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批评苏联是大逆不道。”<sup>①</sup>法共历史学家爱伦斯坦认为：“党的领导中和党内一大部分人是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的，他们尽力阻挠这一新的历史运动蓬勃发展，迫使法共不能把自己的行动进行到底。”

二十二大后，党内出现了三个派别：以爱伦斯坦、菲兹班为首的革新派，以多列士夫人维美徐和《人道报》总编勒鲁瓦为代表的亲苏派和以马歇为首的中间派。左右两派勉强共处在一起，中间派则竭力居中调和，以避免党内出现过于严重的危机。1977年，马歇与爱伦斯坦的一次谈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法共领导在执行新政策时犹豫不决，有时甚至发生倒退的原因。爱伦斯坦对马歇说：“必须明确地选择一项政策，脚踏两只船不是办法，如果不能把已经进行

<sup>①</sup> 让·爱伦斯坦：《法共对苏共态度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书讯》1981年第10期第44—45页。



的活动进行到底,你将被迫后退。”马歇回答说:“对,但要带动全党来干。我是党的总书记,我必须考虑更多的因素”,“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对今后来说,这是生命攸关的”。马歇对爱伦斯坦说:“我并不认为你总是错的。但是你提出问题的方式太粗暴,有搞垮党的危险”<sup>①</sup>。1981年法共中央决定参加密特朗政府时,以让·维美徐为代表的亲苏派,纠集一批党员集会,攻击党中央执行“机会主义路线”,扬言必要时,他们要另外建立一个“纯粹的强硬的党”,企图迫使四名共产党部长离开政府,动摇马歇的总书记地位。为了使党避免分裂,马歇在制定和执行新的路线和政策时,不得不考虑这部分人的情绪,放慢前进的步伐,对强硬派做出一些让步。

1976年后,随着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法共党内民主也有所改善。马歇在1978年曾宣布:以后将不再因提出不同意见而开除党员。于是,1978—1979年,左翼联盟破裂和议会选举失败后,党内对于失败原因持有不同看法的人纷纷在《新观察》上发表文章,进行公开的辩论。一派主张与社会党决裂,同苏联恢复密切关系,使法共回到产业工人基础上来。另一派以爱伦斯坦为代表,认为党犯了一些重大错误,如抨击社会党,把竞选运动建筑在穷人的基础上,割断自己同中间阶层、知识分子以至工人阶级中大多数的联系,应对1977年左翼的分裂乃至议会选举失败负责。他们还批评法共思想僵化,党内缺乏民主,错过了欧洲共产主义和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大好机会。60多位著名知识分子党员联名在《世界报》上发表宣言,要求改组法共,扩大党内民主,放弃从属于苏联的对外政策,并对法共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提出了质疑。

马歇在双重压力下采取了强硬的立场,指责党内反对派受雇于工人阶级的敌人。在选举二十三大大代表时,法共有组织地排斥党

<sup>①</sup> 让·爱伦斯坦:《法共对苏共态度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书讯》1981年第10期第47页。

内的不同政见者,导致 1979 年一批党的新闻工作者,如《革命》周刊主编恩格尔、社会出版社领导成员斯皮尔、《人道报》经济处处长卡尔多齐等人辞职。1980 年,法共著名的知识分子和有影响的党员让·爱伦斯坦、让·凯雅汉、亨利·弗兹班等被宣布自动退党,严重地削弱了法共的力量。

二十四大后,针对反对派对党内缺乏民主的批评和修改集中制的要求,法共一方面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也提出要完善党内的民主生活。马歇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指出:“党内的民主生活总是应该不断完善。我们应当重申我们的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的有效性。有人说,民主集中制是铁板一块,这是不对的。相反,它是防止铁板一块的唯一办法。遵守民主集中制,也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要搞死水一潭。深化党内的民主生活是我们时刻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改善党的工作的必要条件必须让每个党员充分了解情况,鼓励自由讨论,保证上下交流。”<sup>①</sup> 1987 年二十六召开前夕,法共政治局委员克洛德·波普朗和皮埃尔·朱坎、中央委员马塞尔·里古、阿兰·阿米卡比勒和费利克斯·达梅特因提出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全面改组法共的要求被拒绝而退党,党内出现重大分裂。面对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法共并没有放弃原则。马歇在二十六大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党的革命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放弃了它,就意味着同时放弃了党的革命性质。当然,我们也不会放弃为完善自己的行为方式而努力。通过这种努力,使我们的党更好地从每一个党员的财富中获益,并且使每一个党员越来越紧密地同党的决定及其实施联系在一起,而使已经得到很大发展的上下沟通和联系获得更多的改善”<sup>②</sup>;马歇还指出:“为了使我国及其领导机构得以在最好的条件下适时做出决

① 《人道报》1984 年 9 月 20 日。

② 同上,1987 年 12 月 3 日。

定，每个支部都有义务让市委、区委、省委或党中央知道旨在更好地执行或丰富党的政治路线的一切建议”，并考虑“在遇到一个重大问题而形势又不要求立即做出决定时，采取向全体共产党员征求意见的适宜形式”<sup>①</sup>，以扩大党员对思考、经验交流及决策的参与权。

近年来，法共总结经验教训，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和实践有了一些改变。马歇在 1990 年出版的《民主》一书中写道：虽然过去在“民主集中制”的名义下发生了一些严重歪曲党内生活准则的事情，但不能由此否定民主集中制原则。与此同时，在对党内矛盾的处理上表现出更为开放和宽容。

马歇在二十七次报告中说：“现在法共不再追求一致同意，过去这样做，使任何不同意见的发表都导致悲剧性的结局。法共领导学会了不再害怕看法的多样性和意见的差异，认为这可以促进共同的思考”。马歇表示：“即使党的领导人和菲泰尔曼（政治局委员、改造派领导人）在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分析上存在实质性的分歧，但谁也不会因政治分歧而被开除出党的领导机关”<sup>②</sup>。马歇还同意将反对派的议案在法共机关报上发表。在领导机构的选举上，马歇专门发言，建议代表们继续选举反对派的头面人物。这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由于法共领导做了工作，反对派的头面人物菲泰尔曼继续被选入政治局，其他一些反对派人物也被保留了在党的领导机构的原职务。这种做法受到党内外舆论的普遍好评，有助于改善法共形象，增强党的凝聚力。

1990 年后，法共在苏东剧变的冲击面前，努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顶住了党内部分人要求改变党的名称和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压力，保存了

<sup>①</sup>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 302—303 页。

<sup>②</sup> 《政党与当代世界》1991 年第 5 期第 16 页。

党的基本力量，使在逆境中坚持社会主义斗争的各国共产党人受到了鼓舞。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能否坚持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是衡量一个党在政治上、思想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过分强调集中，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和党员表达意见的自由，必然造成党内死气沉沉，思想僵化，理论贫乏，决策失误增多和领导能力降低，使党对自由和民主的承诺失信于民，也无助于真正实现党内的思想统一。但如果将扩大民主理解为追求不受限制的绝对自由，不要任何必要的集中和纪律，允许各种反对派在党内自由活动，那也会破坏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瓦解党的组织，导致党的分裂，使党丧失战斗力。如何将民主和集中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维护党内团结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党内民主，真正做到集思广益，避免重大决策失误，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仍然是法共今后面临的难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共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在1994年1月召开的二十八大会上，法共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决定是正式宣布放弃民主集中制。与会代表通过激烈辩论，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党章修改草案，放弃了自1920年建党以来始终坚持的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这是法共继1976年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概念、1979年放弃马列主义提法（改提科学社会主义）之后又一重大举动。1990年法共二十七大大时，党内就有少数人提出取消民主集中制。由于意见不统一，法共决定二十八大大修改党章时再予解决，1993年6月法共召开中央全会，马歇以个人名义提出修改党章，取消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制的建议。半年来，全党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意见趋于统一。大会文件指出，民主集中制在法共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但现在已不能很好地反映党内出现的新的民主生活方式，步调一致的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再具有生命力，党内唯一运转的原则是民主，“党员是党的主人”

党的决定应以“民主方法,通过多数”作出,但与此同时新党章也明确规定在党内“不允许存在有组织的派别”。

法共作出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抉择主要基于三点考虑:①为了进一步消除原苏共所犯错误给法共带来的消极影响,同苏共式的共产党彻底划清界限。法共认为,原苏共打着“民主集中制”的旗号,推行的是专制和官僚集中制,致使这一提法名誉扫地,成为法共的负担。法国右翼势力攻击法共“过时、落伍”,执行民主集中制便是“罪名”之一。②为了适应法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使法共树立“革新、开放”的形象。随着法国中间阶层迅速扩大,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人数大幅度减少,法共党员的社会成分以及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只有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集思广益,才能使党更具有代表性和战斗性。③法共这样做也是迫于党内反对派的压力,如果不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做出某种妥协,党内就有可能出现分裂。

法共二十八大提出了空泛、笼统的“民主”作为组织原则取代民主集中制,在具体作法上还依照过去的方式,如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依然采取等额选举的方式。法共尽管强调不许在党内成立反对派,但它对党内事实上存在着的反对派也无约束手段。此外,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已表示只对选民负责,不按党的指示行事。法国全国总工会也提出要维护工会的特性,拉开同法共的距离。凡此种种都预示着今后法共党内多元化的倾向还会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形式可能向松散体制方向演变,其后果如何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考察。

### 三、改进党的活动方式,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法共认为,“为了反对危机和变革社会,我国人民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没有一个群众性的党,没有一个与人民有紧密联系,在民众中、特别是在关键地方——聚集着成千上万体力和脑力

劳动者的大中小企业和人民群众集中的地方——深深扎根的党，就不可能在各个方面积极开展我们的活动”<sup>①</sup>。所以，法共始终注意在基层开展党的工作，积极发展新党员，不断扩大党的队伍。70年代末，党员人数已由50年代末的40多万人发展到70万人。

然而，近年来，法共吸收党员的速度明显减慢，党员人数急剧减少。这中间固然有前述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法共未能根据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及时调整工作重点，改进工作方式也是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法国传统工业工人日益减少，新兴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急剧增加，使以传统产业工人为党员主要来源的法共社会基础不断缩小，党的基层组织活动面临新的问题。

首先，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很多工人由共产党基层组织力量较强的传统工业部门流向党组织影响小的新兴工业部门和服务行业。这种流动本来是党在新兴产业中发展组织的好机会，但由于法共未能及早认识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结果不少党员因工作变动而失去与原支部的联系，党组织又没有及时提出在新的企业开辟工作的要求，削弱了基层组织的力量。

其次，传统工业企业中的党员因失业或退休日益减少，而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的青年人大多在社会党力量较强的新兴产业，法共缺乏足够的力量开展党的活动和吸收新党员的工作此外，以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为主的新兴阶层的特点、愿望以及所能接受的斗争方式，同传统的产业工人有很大的差异，而法共对此缺乏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无论是宣传语言、斗争口号还是活动方式都显得陈旧、僵化，难以对这些人产生吸引力，使党补充新生力量的工作遇到了困难。

第三，法共在发展党员中，有时片面强调数量，忽视党员质量。

<sup>①</sup> 《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第147页。

很大一部分党员只是在参加《人道报》节活动时填写入党志愿书，很少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知识教育。同时，科技革命的发展使电视、卫星等先进的信息传播手段日益普及，这些覆盖面最大的新闻媒介，从总体上看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充满着对社会主义国家失误和缺点的大肆渲染和对法共路线与政策的猛烈攻击。相比之下，在野的法共缺乏现代化的宣传手段，只能靠发行量有限的党报党刊和定期召开的各级党组织会议，学习党的文件等传统方法进行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由于思想建设跟不上，在法共发展比较顺利时入党的党员，缺乏应有的政治觉悟，当苏东剧变、右翼进攻使法共处于不利地位时，这批党员便成批退党。

由此看来，法共要想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就必须针对组织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改进党的工作方式，把加强党在基层企业支部、特别是新兴工业企业的支部工作放在一切活动的中心，提高党的支部和党员的工作能力，充分发挥党员联系各阶层群众的桥梁作用。正如法共所说：“要使党的战略深入到生活中去，就必须建立众多的、强有力的、领导得当的、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和面向群众的支部。支部的每个党员，应当积极同人们接触、讨论，把他们联合起来，帮助他们发挥参与作用；各支部的党员应当开展适宜的思想斗争，参与制定、讨论、消化并执行党的政策，通过这些活动使自己得到培养和锻炼。”<sup>①</sup>

为了建设一个群众性的大党，法共还提出必须把面向企业、面向经济活跃地区和机关学校的工作真正放在首位，尤其对那些采用尖端技术的部门，应当给予特别的重视。这是因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是危机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有所反映的场所，是工人阶级和其他领薪阶层集中和进行组织活动的决定性场所，因而也是斗

<sup>①</sup>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 317 页。

争发展、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以及它同其他阶层联盟的场所，任何斗争的成功和失败在企业引起的反响也是最大的。所以，加强党在企业存在、活动和发展，是革命党变得更加强大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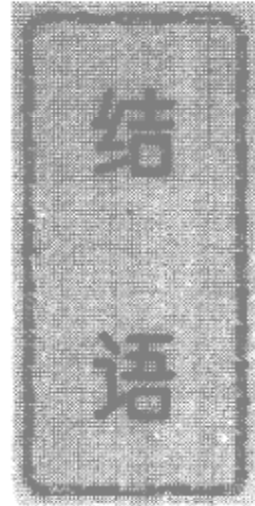
为了使党的政策为群众所了解，吸引更多的群众加入党的队伍，法共要求党员深入到人民中间去，同那些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对话并建立联系，进行大胆的工作，在自己的周围积极发展党员。法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广泛接触所有的人，不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不论工人还是工程师，不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或是领薪者，不论失业者还是退休者，虽然他们保持着自己的能力和要求，优点和缺点，但都可以在党内找到自己的位子。党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推动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发展，付出巨大的努力，采取明确而具体的办法帮助青年小组或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省委会开展活动”。

加强党的宣传教育活动对于扩大党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法共应当积极开展活动，通过多种形式的和联系实际宣传来使党的政策人人皆知，使群众更积极、更迅速地参与日常的斗争。党的所有组织必须加倍努力，针对自己的对手，进行及时的、明确的和有战斗性的宣传，使党的宣传工作适应党的多种多样的需要，适应新的交流形式。

目前，对法共来说，最艰巨的任务还是如何从那些在政治生活中影响日益增加的新兴阶层中发展党员，以进一步扩大党的社会基础。解决好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在组织和宣传教育方面采取具体的行动和有利的措施，使党组织自身不断革新和民主化，而且还要求法共的纲领和政策进一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更好地反映广大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体现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那些不满社会现状，但又找不到出路的广大青年和新兴阶层才会把法共看成是一个有前途的党，加入法共队伍。而这些人加入法共，又会从根本上提高党员的科学文化素质，改善法共日益老化的年



龄结构，改变党员的文化素质大大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状况，使党更加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富于开放和革新精神。党员素质的提高，又会从整体上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决策水平，为开展更高层次和更有成效的斗争，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形成良性循环。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本教科书。从本书对法国左翼联盟兴衰的历史考察及其原因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初浅结论：

一、任何一种政治现象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客观环境，左翼联盟之所以在 70 年代产生于法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独特的现象，是由法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力量对比状况决定的。

首先是第五共和国建立后的两极化趋势使国家被分成势均力敌的两半，左翼和右翼的矛盾对立十分尖锐，排除了社会党走中间道路的可能性。如果法国社会矛盾没有发展到如此冲突的地步，左翼力量取得这样的进展是不可能的。

其次，左翼联盟的建立，也同左翼两大党力量接近，特别是同法国共产党力量较为强大密切相关。从西欧情况看，除法国、意大

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地中海北岸国家外,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工党)力量都比较强大,几乎可以单独与右翼政党抗衡,因而对比自己力量小得太多的法共不屑一顾。北欧的一些社会民主党虽然同共产党结成了“社会主义政党集团”,但社会党不是把共产党作为平等合作的伙伴,而是作为俯首称臣的附庸,更谈不到在执政时考虑让共产党代表入阁了。在这种情况下,左翼联盟的产生根本无从谈起。

另一种情况是意大利。二战后,意大利共产党力量一直比较强大,曾在大选中取得 37% 的选票。但意大利并没有出现类似法国的左翼联盟。原因就在于意大利社会党相对较弱,只能赢得 10% 左右的选票。因此,他们怕在联合中被共产党吃掉,只好避开同共产党结盟,在左右翼两大党之间的夹缝中左右逢源,凭借高超的平衡术技巧,求得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也使左翼联盟的产生成为不可能。

再次,密特朗重建社会党后,奉行比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更为激进的社会改造纲领和政策主张,与法共有较多的共同点,这也是左翼联盟得以在法国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弄清左翼联盟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政治条件,才能较为客观地估价它的意义和影响。

二、共产党和社会党同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两个流派,两党社会基础相近,历史渊源和同,对社会主义的主张相似。这就决定了两党在一定的条件下,为了反对当前的共同敌人,可以调整各自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一定程度的合作。而左翼联盟就是共产党和社会党合作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但由于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根本分歧和分裂后形成的历史积怨,这种合作的基础比较脆弱,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其表现一是在合作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二是一旦某些条件发生变化,两党的合作就会破裂。在两党关系中,对立和斗争是长期的,合作和统一是暂时的。

法国左翼联盟的兴衰史说明,两党合作有利于法国左翼力量

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分裂对立则只能两败俱伤，被右翼各个击破。想靠削弱对方来发展自己已被证明是损害整个左翼力量的不明智之举。从目前两党力量对比和意识形态对立的情况看，两者之间的矛盾既不能用一方吃掉另一方的阶级斗争方式去解决，也不可能用两党合并的方式去解决。两党应当面对现实，各自承认对方在法国多党体制下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坚持自己特色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在反对右翼势力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求同存异，联合起来，协调行动。

当然，重建左翼联盟决非一厢情愿之事。由于种种原因，近期内两党建立以共同纲领为基础的左翼联盟的可能性很小。但只要两党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出发，抱着真诚合作的愿望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在新的实践中实现左翼联盟的重建。

从长远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两党的理论纲领和方针政策将会逐渐发展完善，造成两党对立的一些因素将会发生变化。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两党最终实现长期合作以至合并也并非不可能。

三、无论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要想发展壮大，赢得民心，都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纲领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更新。如果思想僵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拒绝自我革新，教条主义地对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就会使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被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所抛弃。而如果以改造和革新为借口，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念，党也会因失去自己的特性而走向衰退以至消亡。

目前，法国左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处于困难时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然而，正如列宁所说：革命政党只有经过错误和挫折“才能给自己打通一条通过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的道

路”<sup>①</sup>。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法国左翼两党在几十年合作和斗争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成为今后继续前进的宝贵财富。尽管目前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短期内还难以扭转被动局面，但科技革命发展所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化生产力，必将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更大范围内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道路。对于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我们应该相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法国左翼力量，一定能够通过自我革新不断完善自己，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走上复兴之路。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8卷第54页。



外文版

1. Northcutt, W  
The French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Party  
Under the Fifth Republic, 1958—1981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 1982
2. Aderch, M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a Critical History (1920—1984)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3. Stiefboled, A • E

- 
-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in transition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7
4. Schain, M • A  
French Communism and Local Power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5
  5. Tiersky, R  
French Communism (1920' — 197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6. Gaffney, J  
The French Left and the Fifth Republic:  
The Discoures of Communism and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Franc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7. Nugent N, and Lowe, D  
The Left in Fra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 1982
  8. Serfaty, S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French Lef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 1979
  9. Wall, I. M  
French Communism in the Era of Stalin (1945—  
1962)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83
  10. Ross, G  
Workers and Communists in France  
Berkley, Univ. of Califonia Press 1982
  11. Williams, S  
Socialism in France; From Jaurés to Mitterrand

- New York, St. Martin's Pr. 1983
12. Bell, D. S  
The French Socialist Party  
Oxford, Oxford Press, 1984
  13. Economic Policy and Policy—making  
under the Mitterand Presidency (1981—1984)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5
  14. Reader, K. A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ft in France since 1968  
New York, St. Martins Pr. 1987
  15. Hirsh, A  
The French Left: a History and Overview  
Montreal, Black Rosebooks, 1982
  16. Friend, J. W  
Seven Years in France: Francois  
Mitterrand and the Unintended Revolution  
(1981—1988)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17. Cerny, P. G. and Schain, M. A  
Socialism, the State and Public Policy in France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5
  18. MacCarthy, P  
The French Socialists in Power (1981 — 1986)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7
  19. Bell, D • S  
The French Socialist Party: Resurgence and Vic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20. Bourderon, R



Le P · C · F: Etapes et Problèmes (1920—1972)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81

21. Donneur, A

L'alliance Fragile Socialistes et Communistes

Français (1922—1983)

Materiaux, Nouvelle Optique Press, 1984

22. Robert. V

P · C/P · S—Une lutte pour L'entents

Paris, Editions Seghers, 1976

23. Willard, C

Socialisme et Communisme Français

Paris, Clolin, 1978

中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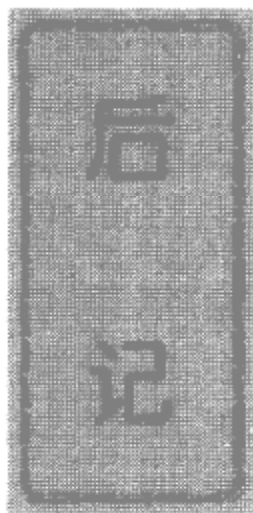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2. 《列宁选集》第 1—4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3. 《多列士言论集》(1944 年 11 月—1945 年 11 月),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年版。
4. 《法国共产党文件选集》(上、下册),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 1960 年 11 月版。
5. 《法共和意共论当前时局和党的任务》,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
6. 《法国共产党论点摘录》(1960 年 12 月—1963 年 3 月),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 1965 年版。
7. 《法共为和平与民主而斗争》, 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
8. 《法共为保卫共和制度而斗争》,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8 年版。
9. 法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
10. 《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下册),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

办 1985 年版。

11.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重要文件选编》(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年版。
12. 高放等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13. [法]乔治·马歇:《让我们说实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4. [法]法共中央经济部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15. [法]多列士:《人民的儿子》,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16. 《法国共产党史》第 1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年版。
17. 《法国共产党史》第 2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6 年版。
18. 师应能主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与现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19. [法]克洛德·维拉尔:《法国社会主义简史》,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20. [法]雅克·夏普萨尔:《1940 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年版。
21. 《赫鲁晓夫言论》第 5 集(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年版。
22.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
23. [英]尼尔·麦金尼斯:《西欧共产党》,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版。
24. [美]戴维·奥布尔赖特编:《西欧共产党和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25. [美]阿·里贝尔:《斯大林与法国共产党》(1941—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3 年版。
26. [意]贝·瓦利:《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中国社会科学

- 出版社 1983 年版。
27. 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28. [法]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
  29. [苏]T·T·季里根斯基主编：《法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30. [法]弗朗索瓦·博雷拉：《今日法国政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31. [法]雅克·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32. 《各国社会党重要文件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年版。
  33. 《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党校科研办 1985 年版。
  34. [法]密特朗：《此时此地》，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35. 徐达深主编：《密特朗政府的经济政策》，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
  36. 弗·奥·吉埃斯贝尔：《密特朗传》，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
  37. [英]丹尼斯·麦克希恩：《弗朗索瓦·密特朗传——部政治史诗》，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
  38. [法]克洛德·芒塞隆等：《密特朗传》，新华出版社 1982 年版。
  39. [法]乔治·阿耶歇：《法国社会党及其领导人物》，新华出版社 1982 年版。
  40. 乔·乌尔班编：《欧洲共产主义》，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
  41. 殷叙彝编：《当代西欧社会党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42. 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43. [英]威廉·E·佩特森等编:《西欧社会民主党》,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版。
44. 张契民、潘琪昌编:《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
45. [奥]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 2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
46. 吴国庆著:《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198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
47. 《西欧新技术革命》,时事出版社 1985 年版。
48. 林振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活状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49. 《新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50. 罗肇鸿等著:《国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国计划出版社 1988 年版。
51. 黄文杰著:《法国宏观经济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本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1990—1993 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在导师张汉清教授以及曹长盛教授、黄宗良教授和杨荫滋教授的指导下，将法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确定为博士论文题目。在写作过程中，导师从基本框架到论文的修改都给予了悉心指导，甚至连行文中的标点符号都进行纠正，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献身事业的精神和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这些将使我终身受益。

由于论文题目和篇幅的局限，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关系的演变未能在论文中充分展开，当时，导师们曾向我建议，毕业后如有条件，可以写一本关于左翼联盟兴衰的小册子，把法国第五共和国时期共产党和社会党关系演变放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变化的大背景中加以系统论述。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才于取得博士学位后，

花了一年时间，完成了这本论著。

值此本书出版之际，我谨向各位导师，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张汉清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本书欣然作序，使我深受感动。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还得到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李兴耕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中央党校张中云教授等一些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的热情帮助和指导，使我受益匪浅。李兴耕副局长还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这里，特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作者还参考和吸收了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也一并对他们表示感谢。

研究法国左翼联盟的理论和实践，是一项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完成的这部著作，只是初步探索之作。由于缺乏实地考察得来的感性认识，加之自己的知识水平有限，收集的材料有限，写作时间有限，本书的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恳请各位师长、专家、学者、同行批评指正。

侯玉兰

1994年11月于北京



自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9年共产国际诞生以来，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非常重要，但又极其复杂的问题。而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的关系演变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具有突出的典型性。70多年来历史反复证明，能否正确处理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法国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而且也是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1920年法国社会党分裂、法国共产党产生后，两党关系经历了数次分分合合的曲折发展。早在1935年，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法国工人阶级两大派别——共产党和社会党，为击退法西斯的进攻，就曾捐弃前嫌，以人民阵线的形式首次实现了成功的合作，为捍卫法国的民主、独立、尊严，促进法国社会的进步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共

产党和社会党又在联合政府中合作共事，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维护劳动人民利益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其成就载入了法国的史册。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后，随着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又开始了各自调整政策，寻求联合的过程。经过长期的酝酿协商，终于在1972年签订了共同纲领，建立了左翼联盟，实现了两党的第三次合作。在这次合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两党经过长期艰苦的谈判、斗争、妥协，终于在1981年组成了冷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第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法国左翼联盟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不仅对法国社会的发展和欧洲政治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正因为如此，研究左翼联盟这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特现象，特别是法国左翼联盟的兴衰，为西方许多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重视。他们以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重大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写出数量可观的论文与专著，值得我们参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我国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这一重大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有系统的研究。一些学者虽然对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进行过若干初步的研究和有益的探讨，但着重对法国左翼联盟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与教训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专著尚未问世。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侯玉兰同志的这部专著《法国左翼联盟的兴衰》是力图填补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空白的可贵尝试。

侯玉兰同志1990年考取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后，在撰写学位论文《法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与实践》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有关两党关系的中外文资料，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资料准备。1993年底获得博士学位后，她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把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关系演变放在法国国内阶级结构变化、政治



变革和经济发展的环境中，放在国际政治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与分析。全书共八章，可分为三部分：第一章是历史的概述，通过对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关系演变的历史回顾，揭示了第五共和国时期两党关系发展的历史渊源。第二至第六章是对第五共和国时期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关系演变的详细评述。具体分析了这一时期左翼联盟酝酿、建立、发展、瓦解的曲折过程，深刻揭示了左翼联盟成败和两党力量对比变化的复杂原因与经验教训这是本书的主要部分和精华所在。第七、八两章是对左翼联盟破裂后两党现状和前景的分析。书中指出，左翼联盟破裂和苏东剧变后，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都遭到了巨大冲击，面临着严峻挑战。并说明，为了重建左翼联盟，实现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两党都需要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对自己的理论和纲领进行反思和更新，对政策和路线进行调整。对于法共来说，关键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定适合科技革命新情况的纲领和政策，回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

综观全书，我认为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作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重大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力求做到以史带论、史论结合。作者遵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客观地分析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落脚在社会主义运动必将复兴，坚定地指出：“自由、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理想仍然是人民的向往和追求”。二是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具体分析法国第五共和国时期左翼联盟的成败和两党力量的消长时，力求做到持之有据、言之有理。如分析法国共产党力量的衰退及其原因时，指出教条主义和“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危害，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三是作者高扬了勇于探索和勇于创新精神。应该说选择一课题进行研究，著书立说，就是知难而上，敢于攀登的表现。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不少有自己独创性的见解，如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对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衰退原因的分析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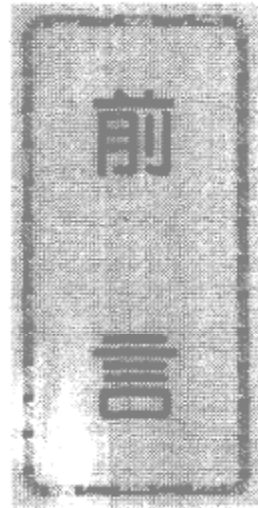
对重建左翼联盟的看法，都是非常深刻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较强的说服力。上述特点贯穿全书，表明侯玉兰同志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较高的科研水平。

应当指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研究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问题有很大的难度。这不仅因为国情不同，涉及的问题广泛复杂，现实情况瞬息万变；而且绝大多数作者又缺乏实地考察和亲身感受，更增加了研究的难度。这点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尤其突出。因而侯玉兰同志在书中难免对有些问题的分析不够确切，个别问题的提法也会有不妥当之处。这有待于作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加以订正、补充和发展。

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原苏联、东欧各国党的解体与蜕变，西欧国家一些共产党的兴衰与挫折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认真深入地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努力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大量新课题，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是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生活在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理论工作者，应当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我们要抓住大好时机，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积极跟踪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和新动向，进一步搞好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复兴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侯玉兰同志这一学术专著的出版，就是我国学者跟踪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经验的一项可喜成果。我们期望作者持之以恒，努力奋进，继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张汉清

1994年11月28日于未名湖畔朗润园寓所



自从共产国际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形成的欧洲革命高潮中成立以来，国际工人运动就分裂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和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两大对立派别。70 多年来，如何认识和处理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在反对垄断资本、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统一行动，始终是西方国家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但又非常棘手的问题。西方工人运动的兴衰成败，无不同此有密切关系。

在研究共产党和社会党关系的演变时，我们不难发现，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关系在西欧社会具有典型性。作为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摇篮和巴黎公社的诞生地，法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正如恩格斯所说：“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

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sup>①</sup>受这种革命传统的影响，法国工人阶级的两大派别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也具有特殊性。从图尔大会的分裂到人民阵线的合作，从二战前夕的分裂到战后初期的合作，从“冷战”时期的分裂到 70 年代的左翼联盟，两党关系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其成功的经验、丰硕的成果和深刻的教训，都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着重对 1958 年后，即第五共和国建立后法国左翼联盟酝酿、建立、发展、破裂期间两党关系的发展进行历史考察。这一时期，正是西方科技革命取得重大进展，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也是法国各种政治力量为适应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进行重新分化组合和激烈斗争的时期。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按照各自的理论纲领，为推翻垄断资本统治，建立左翼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和艰难的探索。左翼联盟就是这种探索的产物。

正是由于左翼联盟的曲折发展，才产生了冷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第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巨大反响，远远超出了一国政局演变和政府更迭的范围。它不仅对法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法共在这一过程中力量逐渐衰减的趋势，也不能不引起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关注和思考。

因此，研究左翼联盟的兴衰这一法国社会独特的政治现象，探讨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关系演变和力量消长的原因，分析其对法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为 70—80 年代许多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01—602 页。

西方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重视。他们依据西方的观点，从不同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出了数量可观的论文和专著。我国的有关专家学者也撰写过一些论文，对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但是，着重对法国左翼联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专著还未见问世，这不能不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拟以 50 年代后法国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为背景，以第五共和国各个时期重大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为线索，以翔实的资料为依据，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系统研究第五共和国时期左翼联盟兴衰的进程、阶段及其对法国社会的影响，分析导致两党关系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揭示两党力量消长的复杂原因，总结左翼联盟兴衰的经验教训，从中探讨科技革命新形势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左翼政党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

目前，国际形势的剧变要求处于战后工人运动低潮的欧洲各国社会党和共产党重新审视自己的理论纲领和战略策略。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和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不同社会主义模式潮流的兴起，也为共产党以更加开放和求实的态度客观地研究和评估社会党的纲领政策和社会作用提供了契机。一方面，社会党作为推行改良的社会主义流派，其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它的一些政治主张和改良实践也反映了广大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和劳动群众摆脱垄断资本压迫、消除资本主义弊病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状况，因而在广大中下层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只是一般地笼统地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把它说成是万恶之源，对社会党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忽视了对民主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进行深入研究和对具体国家社

会党纲领政策变化进行具体分析。这就难以说明社会党在欧洲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原因，难以说明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与资产阶级右翼政党的区别以及与共产党的异同，也就难以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我们正在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了完成这一前无古人的伟业，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及与此相联的发展民主政治的一些具体做法。借鉴与吸收首先需要认识和了解。希望这本小册子对两党理论、纲领、政策及其相互关系演变进行的研究，能够有助于我们扩大视野、开阔思路、深化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党的实质及其两面性，提高处理与社会党关系的策略水平，利用其积极因素，抵制其消极影响，充实和完善对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探索，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法国社会现状，并通过它进一步认识当代科技革命条件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和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新发展、新问题，处理好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以便“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使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作者

1994年11月